

沈从文全集

沈从文全集

第十三卷 ● 文论

沈从文 ONGWEN, SHENJUNJI

文学运动杂谈

废邮存底

昆明冬景

云南看云集

新废邮存底续编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 .1~17卷/沈从文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12

ISBN 7-5378-2463-0

I. 沈… II. 沈… III. ①沈从文(1902~1988) - 全集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777 号

责任编辑: 谢中一
陈 洋
美术编辑: 任丽凤
印装监制: 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1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44 字数: 540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套

×

ISBN 7-5378-2463-0

I·2352 定价: 56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
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问：汪曾祺 王 序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维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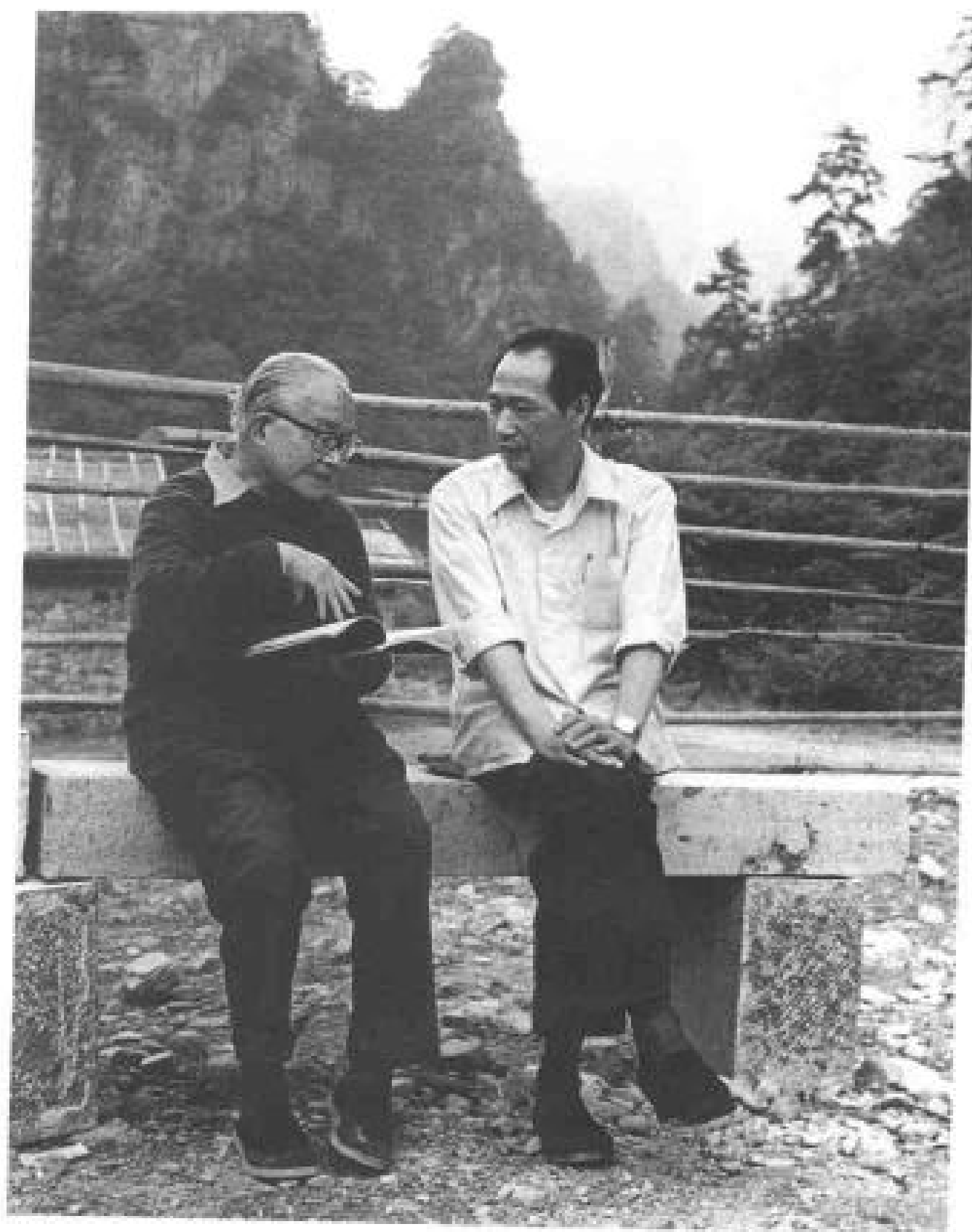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凌 宇



1981年4月中旬于长沙

王亚蓉 摄



1982年5月在张家界与当时《芙蓉》编辑弘径交谈



沈从文夫妇1948年夏与友人在颐和园
留排左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张翼若夫人，杨振声先生



作者与叶圣陶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两人间已有多年的友谊。

1935年叶圣陶先生（靠前穿长衫者）和沈从文、张兆和（稍后穿深色衣者）及张充和女士（穿黑裙者）同游天平山。

目 录

沈从文
全集

S
H
E
N
C
O
N
G
W
E
N
Q
U
A
N
J
I

□ 文学运动杂谈	1
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	3
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	32
窄而霉斋闲话	37
上海作家	42
文学者的态度	46
论“海派”	54
关于“海派”	59
禁书问题	62
《上海通信》附记	69
【附录】 曹聚仁：上海通信	73
编者复信	78
【附录】 莲生：从宇宙苍蝇到大众语	80
新文人与新文学	83

谈谈上海的刊物	89
新诗的旧账	
——并介绍诗刊	94
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	101
文学界联合战线所有的意义	109
文坛的“团结”与“联合”	114
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119
我对于书评的感想	123
一封信	129
滥用名词的商榷	135
关于看不懂	142
再谈差不多	148
对新文学有贡献的湖南人	154
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159
一种新的文学观	166
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	174
□ 废邮存底	179
<hr/>	
一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录	181
二 给一个写诗的	184
三 给一个写小说的	187
四 给一个大学生	190
五 给某教授	192
六 谈创作	196
七 致《文艺》读者	199

八 元旦日致《文艺》读者	202
九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206
十 风雅与俗气	211
十一 情绪的体操	216
十二 给某作家	220
十三 给一个读者	225
□ 昆明冬景	231
<hr/>	
真俗人和假道学	233
谈朗诵诗	238
谈保守	253
一般或特殊	260
昆明冬景	265
□ 云南看云集	271
<hr/>	
第一组	
“文艺政策”检讨	273
文学运动的重造	289
小说与社会	298
第二组 新废邮存底	
一 云南看云	307
二 给一个广东朋友	313
三 给一个大学生	318
四 给一个青年作家	320
五 给一个诗人	322

六	给一个中学教员	324
七	给一个军人	327
八	学习写作	330
九	职业与事业	333
十	给一个在芒市服务的小学教员	338
十一	给一个作家	344
十二	给驻长沙一个炮队小军官	347
十三	明日的文学作家	353
十四	美与爱	359
十五	论投资	363
十六	读书人的赌博	368

□ 新废邮存底续编 373

致施蛰存函	375
致王云五先生	376
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	377
致一个读书人的公开信	380
给李先生	386
“诚实的自白”与“精巧的说谎”	388
谈话剧创作	392
关于“批评”一点讨论	397
谈作家集团组织	400
答辞六	
——从艰难中去试验	403
答辞八	405

答辞十	
——天才与耐性	407
答辞十三	409
给志在写作者	411
致施蛰存函四通	416
致赵景深函一通	421
致赵家璧函二通	422
给一个作者	424
对作家和文运一点感想	427
作家生活自述	431
自滇池寄	432
作家书简	433
致灼人先生二函	435
【附录】 灼人先生的信	440
致大牛先生	451
致今是先生	453
谈新诗五个阶段	456
谈文学的生命投资	458
一首诗的讨论	461
一个边疆故事的讨论	463
致周定一先生	469
致柯原先生	474
谈现代诗	476
复一个木刻工作者	480
复市中老百姓社诸同学	482
论议无从产生作品	484

复姚明清信	486
【附录】 姚明清给沈从文的信.....	489

文学运动杂谈

文学运动杂谈

WENXUE YUNDONG ZATAN

本集为新编，收作者 1949 年以前有关文学运动、文坛论争的文字 26 篇，集名“文学运动杂谈”，为编者所加。

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

北京出版物之多且杂，在全国恐亦当首屈一指。即以文艺刊物论，近数年来，略一纪之，亦不下五十余种。兹但就我所知而较足为此新兴时代代表者数种来说，先列其名称，对于各作家之艺术观及作风，更于后分别略一言之。

附于每日新闻发行，现今尚能按所定之日期继续出版的有三种：

《晨报副刊》

《京报副刊》

《国民新报副刊》

附于每日新闻发行，但近因事故已不能继续出版的有两种：

《民国日报副刊》

《民报副刊》

此外，虽附于每日新闻发行，（但性质为周旬刊）今亦已不能继续下去的还有六种：

《文学旬刊》

《艺林旬刊》

以上晨副的

《文学周刊》

《妇女周刊》

《民众文艺》

《莽原》

以上京副的

独立发行之纯文艺日刊，北京地方，还不一见。至于独立发行之周刊，现尚继续出版的有两种：

《语丝》

《沉钟》

独立发行之周刊，虽非纯属文艺刊物，但其性质亦时偏于文艺或间及文艺者，有三种：

《现代评论》

《猛进》

《燕大周刊》

周旬或半月，或一季，或不定期，纯文艺或间及文艺刊物，近已不能出版的有四种：

《诗学半月刊》

《燭火》

《清华文艺季（旬）刊》

《平大文学周刊》

不定期刊物还可希望其继续出版的有一种：

《狂飚》

拟出版迄未见出得成版的有一种：

《骆驼》

以外，如研究国故之北大《国学门周刊》，为新文化运动反动极卖力气之《甲寅周刊》，此两种前者常录了许多美丽的民歌，后者于这种可怜亦复可笑的浅薄文艺园土里也生了点影响，故于篇末，一便论之。

今日依我所排的秩序说说各刊物之内容——

《晨报副刊》

我先把《晨报副刊》提出的原故，是因为它在北京提倡新文艺的刊物中算一个较老的刊物。它的性质虽不是专门来登载文艺作品的，（实在说来，还是一个讨论学术思想的东西）但我们若论及此间数年来对文艺上有所贡献的刊行物时，无论如何，我看忘却不了它。

它近来已出至一千四百多号了。平时不能另卖，每日附到晨报的正张发行，到月终，则另订成一个本子，价洋三角。每月据说除正张附发之万分上下外，还可销去成册的三千分左右。

编辑它的人先是孙伏园，去年改了丘景尼，不久，复为其正张编辑刘勉己代编，近则由徐志摩负责。

孙编辑时，式样为书册形，分四个单页，每页又分三格，一期约六千字的样子。是时就附了一个《文学旬刊》，遇到出《文学旬刊》的日子，则是日无副刊。文旬撰稿人以文学研究会北京方面的会员为多，文旬编辑人是王统照。

丘一仍其旧。

至刘勉己时，新加了一个《艺林旬刊》，又加了一个《新少年旬刊》。连同前有之文旬，已三种了。各旬刊出版日均无副刊，故实际上每月只有廿一期副刊。式样从此也起了变动，由四单页改为八单页，版虽较小而页数加多，故字数也比之从前多了一点。

最近副刊改组由徐志摩主持后，式样又改成了横幅，如上海昔日之《学灯》式，省得再要读者拦腰一裁的手续，真给了读者许多方便。

各旬刊已一律停止了，然为稿件故，副刊的出版，近反减而为间日刊了。计每星期只四日（系一三四六等日）所剩余之三日，则让另外有人负责编辑之国际、社会、家庭三种周刊，以次出版。

作者，在孙负责时，作家可就多了。是时北京城出版物也极少，除晨副外就仅一《新潮》，然《新潮》又是一种月刊，且不偏重文艺，故近来较成熟的几个作家，其初期尝试作品，莫不系晨副发表者。即如鲁迅先生《呐喊》中的一部分文章，周作人先生几年来所集之散文，冰心女士之诗，川岛君之《月夜》，孙伏熙君之《山野掇拾》，此皆先载诸晨副而得到很好批评近始另印成单本的。此外还有许多小东西因文章在晨副上才为世人认识。

孙辞去后，丘来继续，作者也因之变更了。以前的几个作者都随到孙所新接手的《京报副刊》上去做文章去了，因此晨副上，始渐见几个新进的陌生的人名。晨副为对抗京副起见，乃有创造社郁达夫、郭沫若以及几个小东小西的文章出现。新的作者中，常见到的，又以黎锦明、休芸芸、许君

远、焦菊隐、于成泽、蹇先艾、默深、天心等为最熟。

刘来无所异，只不过把几个从前较陌生的作者人名使读者已不感到陌生罢了。

于此又可见晨副于时稿件的空乏。

加以京副新起，京副之外又产生个《语丝》，晨副的地位，在北京刊物中，因此似乎抑下了一点。

副刊的地位抑下，无好稿件自然是一个很落实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说，也可以说是近来读者们对于文学的欣赏力比之两年前进了一步。

志摩一来，空气似乎就变了。他原是乘了一股雄心，想把副刊振刷一下的，头一次开场白就说是“先逼死了别的不三不四的副刊，再来掐死自己的副刊”。且先不先就列了一大串此后副刊撰稿人的大名。但是，不久，他的自信心似乎就完全没有了，别的副刊不消说他是不会逼得死的，自己的副刊呢，两个月来，除了他自己时常写一点流水账似的文章外，就只是以前宣言上那几个列到最后的新作者写一点通常创作诗歌。

从副刊上我们除了式样成横幅外，一点看不出什么不同处来。

《京报副刊》

京副产生，本来也有了两年左右的生命了，但在孙伏园办理以前，却不另印什么单张。也时常登些小说诗歌，却芜杂不清的放在正张第四版上。那时就附了一个《劳动文艺》，但也值不得寓目。

孙从晨副脱离了出来，就给《京报》老板邵飘萍请过去了。

因此京副才变了--一个新式样。

照晨副办法，成了单张，每日就附到正张发行，先不另卖，到月终则另订成册，价亦三角。

《京报》同时还附加了一种周刊，每天总有一种或两种周刊随同原有之正副张发行，月终欲购买此种特别附刊时，亦能够向《京报》营业部接洽。

这样一来，《京报》在北京的销行数便骤增了。由两千份上下之报纸一跃而至七千份以上，其实就是新副刊使然。单是成册之京副，据说每月亦可售至两千份以上，惟近来似乎亦不能比其他同样刊物为精彩。

作者，最为人所注意的，自然还是鲁迅兄弟俩。不过他们自己同时又办了一个《语丝》，因此虽然也做了些短短杂文，但较有永久性的一点文字，却总在自己的《语丝》上去发表了。此外呢，还是他从晨副带过去那一骥人马。

大概是编辑先生一种趣味吧，几个浅薄不过的女人作品就时时上到副刊之一角了。要说是编辑者之眼光呢，怕也不像，总会还有种别人不大容易清楚的原因吧。

在它（副刊）上面，我们得到一种同样的感觉，就是觉得《小说月报》上每期的几个熟姓名样样这里都有，当然不能说是外面进来的客坐编辑先生所取的手段是拒绝，但倘若熟人是熟人，稿子总比较的容易上副刊一点。（这在任何刊物上都是一样，其实这也给了许多困难与编辑者。）

新的作者中许钦文同编辑的老弟孙伏熙（春台）要算是与读者顶熟的人了。创作方面还有个尚钺，还有个陈学昭，

努力下去，看来是比文学研究会那一群老不长进的怪物是有希望一点的。

新京副的寿命，到如今已是满过了一周岁的小孩了，其另外附带发行之十种附刊，除前所举之四种有文艺性质周刊外，还有极力提倡脸谱戏主张红花脸杀进黑花脸杀出之《戏剧周刊》，编者为民大教授徐凌霄。还有努力于国音希望促行注音字母讨论改善方块字的《国语周刊》，编者为国语研究会，负责编辑人是钱玄同。还有送儿童们看的《儿童周刊》，编辑者师范大学汪馥琴。还有《经济半月刊》，北大经济学会编。还有《图画周刊》，本报社制版部编。还有《科学与宗教》（未详编者。）共计六种。《图画周刊》已停止。另外几种周刊，不幸在京副刚满一周年时，也都一律死去了。死去的原因是为《京报》的经济上新预算所限制。此十种附刊近能独立自行出版的只有《国语周刊》一种，此外《文周》同《莽原》虽曾说预备于今春单独出版，但迄今尚不见独立后第一次刊物。

关于《文学周刊》等四种附刊之内容，另篇当详论之。兹将最新才出版之《国民新报副刊》谈谈。

《国民新报副刊》

这刊物出版仅月余，由鲁迅编辑。

每逢一礼拜中之双日，我们可以见到这小小刊物。（其单日附到《国民新报》出版的是另一种多谈国家社会的刊物，由陈承脩编辑）它的形式极小，仅及京副之一半。

但从这一半中我们已可以见到如京副大小的刊物上全刊

物足以寓目的材料了。

在这小刊物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比较上有向前进取那新的另一个未曾发掘过的地方的希望来。

作者还是从前《民报副刊》那儿位，也就是以前的莽原社那儿位。如像黄鹏基，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韦丛芜，韦素园，朱大枏等。

他们的态度是攻击一切在普通社会中已认为成文章了的文章，但他们攻击的对象，几多地方是在人——不是真的那人的文字。在这点，我以为他们纵所攻击的是很对，但攻击的目标已不正当了。且不必攻击的文字也加以一番轻蔑，有时反而使这人文字因之而特别显现于读者前。要说是他们把自己看得极高，从这些上面又不能给我们一点相信的证据。他们自己的文字，其实也不怎样有力。他们所写的文字多数是半象征的。不过，处到这种萎靡不振的文艺园中，他们能大胆无畏的朝一个陌生的不为人走踏过的道路上走去，一面又还能回过头来骂骂保守现状的阶级，精神总是很可佩服的了。

这刊物未闻另卖，月终也不见合订本，只有订《国民新报》的可以见到。其销路大致总在五千（或三千以下也不可，因《国民新报》是国民党之机关报。）

《民国日报副刊》

此副刊一切与其他副刊同，附于《民国日报》正张发行，不过它不是单张，却占了正张一面，与《时事新报》之《学灯》同。

可惜一个礼拜就随同它的因事被封的正张消灭了，上面我们只看到一篇鲁迅创作。

编辑人为罗敦伟。

《民报副刊》

《民报》乃继前报而起者。

正张分英文中文两部，规模极大，副张因之也印刷得极其精美。

副张随同正张发行，篇幅约八千字，编辑者韦丛芜。

作家就是后来《莽原》上做文章那几个人。这报纸继《民国日报》而起，并且命运也是一样；正张因登载了一个不应载的新闻，官厅把正张的编辑抓了去坐牢，副刊也就为正张拖下水溺死了。

《文学旬刊》

看名字就可以了然了。这刊物比之别的副刊，自然更注意于文学。关于文学的研究，批评，翻译，创作小说，诗歌，戏剧，的确每期一样总有一点。人物呢，文学研究会北京会员的全体，加上会员以外的不少作家。

照此说来，大致这东西总还过得去了！

《文旬》在此间文艺上的贡献，我们是应得对它表示相当钦敬的。不过所谓作家们，到了今日，给我们的失望，是同北京大多数作家所给我们爱好真美善的艺术的人失望一样多的。

它因《晨副》最近改组才收束了，也是说不久将自行独立出版的，但到今日为止，我们还不听到出版的日期。

作者中顶能干，每期都有文字的是编辑旬刊的王统照。他的诗是有名了的富有哲学意味的，（这哲学意味并不是使人悟什么诗的微妙处来，不过处之使人莫名其妙罢了！）翻译的程度是只能增加些对翻译素来已怀疑的人更深的疑心，然而旬刊上他的诗与翻译是不少的。

《艺林旬刊》

性质是对文艺新的方面追求与旧的方面整理；但他们的追求比一般人所做的工作还不如，旧的整理也还是不能得个所以然出来。

说他们的希望是新的追求与旧的整理，那是无语病的。他们的希望纵如是，他们的力量究竟觉得太薄弱了。

他的社员半是武昌师大国文系几个学生，编辑者即艺林社同人。

作者中刘大杰算是顶刮刮叫的了。因了晨副的改组，他们近已自己在武昌方面出版。

《文学周刊》

这刊物由从天津方面到北京来的绿波社社员和北京之星星文学协会会员办的。

寄托到京副上出了一足年。

绿波社方面如焦菊隐，于成泽，姜公伟，星星文学会方

面如张友鸾，周灵均等：都算是肯努力向前做的。

他们的旗帜与《艺林旬刊》及一切文艺刊物一个样子，也许也是因为他们们的生活并不比其他少年学生们两样吧，他们的希望都是不小，可是他们表现的能力都太与希望隔远了。

或者这是我一种偏见，我以为若把未来的文艺的花朵希望如像他们一般人为培养茂盛起来，终究是要使我们失望的！我的意思是以为凡是如今自己把发掘文艺的锄头扛到肩膀上向前走的学生纵能掘到点什么，但当真能掘出一个大源泉的还非得要那些别一阶级的人出来动手不可。这另一阶级的人不是学生教授，也不是官僚政客，只是那些剃头匠，裁缝，车夫，兵士，等等。

他们附于《京报》发行时是礼拜六出版的。如今《京报》不能再托身，一时又无从独立办下去，所以只好停下来了。虽不久于成泽有个对于《文周》复活的启事，不过这一类刊物即使不再在出版界上发现，想来也绝不会使爱好文艺的人感到寂寞的，有时市场书摊上此类刊物太多时，反而冲淡了对于文艺有嗜好的读者们的趣味。

《妇女周刊》

对于妇女问题也时常讨论及，女学士们的文章也时常见到，这就是北京地方惟一的关于妇人的刊物了。

对于女人抱有种（也不是尊敬也不是嫌恶）只是对女人怀疑的一类人，时常听到很幽默的说是“妇人会照料家事以外又会了打绒汗衣，更能做诗做文，总算是进步了”！这不消说是对于她们文字表现力薄弱一种嘲笑。但实在说来，女人

有她所特有的细腻的思致，倘若我们不否认文艺有多方面的话，我们对于她们的东西，即或是比较上肤浅的作品，总也会生出许多兴趣了。并且《妇周》中做散文的波微，（石评梅）真真实实说自己所能说的狭狭环境内的话时，笔致的不虚伪，是很能使人感动的。

然而我另一方面总嫌她们太小姐气太太气，这不能不说是我的希望过奢。因为我希望女子文字虽保守了她主妇温柔细致神态的作风，同时就希望她又有一种不安现状的突进的不为小姐太太因袭的驯伏于现状下的气概。至于我眼下的女人是些什么？除了太太就是小姐；除了小姐又是太太。本来处到这微温的世界中，男子还没有什么希望可言，把对男人还无希望的希望来期诸女人，又那能不失望呢？

从她们的文字上看来，至少比其他男子们办的刊物上的文字要清白一点，写文章的态度也来得诚实一点，总算罢了！

《妇周》的编辑是女师大蔷薇社同人办理的，由石评梅负收稿责。她的出版期是礼拜三，近来也同到其他属于《京报》的几种特殊副刊一样，停办下去，无法出版了。小姐们无所抓弄，大概也很寂寞吧，为她们自己着想，为别的正感到需要女子软性读物的人着想，这刊物是愿它早早复活的，因为北京虽出版物已多到使书摊上找不出置放的情形，但女子刊物除了《妇周》竟无第二个。

《民众文艺》

是“想发掘民间固有文艺宝藏”的一种刊物，登载些用很笨的笔调记录下的民间故事与歌谣。这刊物先由民众文艺

社社员们共同编辑，到后社员只剩到一个人了，然而这唯一的社员还能继续办下去，直到近时，才同此外《京报》各特殊副刊死去。

每礼拜二出版，编辑人荆友麟。

《莽原》

性质是不单向文艺一方面做批评破坏的。其外政治与一切制度，他们感觉到不满的都说出他的不满意来。虽然对艺术上的虚伪性他们尤觉得忿恨。

鲁迅负编辑责任，间亦时作点杂感文，但他的创作这刊物上却不见。

近来谈刊物的，总给《莽原》一个地位。他的作者半系狂飚社之人物。

他们的文艺思想是破坏这虚伪的现实基础，另向前面追赶着的。他们不承认文学是士大夫公子哥儿太太小姐们茶余酒后的娱乐消遣物。专从描画爱与美上所能满足的文艺观，在他们是不能承认而应当攻击的。他们的自己的创作就是力的奔赴，故他们对俄国的狂热作家崇拜而且攀拟。

假若是我们对文艺还抱有欣赏艺术醇化以外的使国民性趋于非微温的地方去的愿望，我们当然得同情他们！

作者中黄鹏基、高长虹，文字是尤其能表现出刚折性的个性的。常氏兄弟与李霁野努力于俄文翻译，他们的成就，是比之于耿济之为有望的。向培良对戏剧的努力，虽他自己所编那个不忠实的爱情我们不认为是要得的东西，但能向这方面努力，又能时时指摘着监视着把戏剧的编演看得太不忠

实的人一种戒心，也正是此时的需要。

这刊物近已拟复活，改为半月刊，如在上海出版之《洪水》样订成小册，一二月内或可望其出版。

《语 丝》

这刊物值得特别介绍一下。

“他的价值在不标榜任何主义，但由语丝社中几个伙计们说所想说的话”：近来某一种刊物，就是文艺刊物，也少不了隐隐中要受一种自己顽固粘持着的文艺观所左右，一种刊物能不受这顽固的艺术观所左右，自然已难得了。

不过《语丝》的宣言虽是那么说，其实他们还是不自意的成了一条顽强的战线。也有创作，也有诗，也有各种各种翻译，尤其使人注意的就是周氏弟兄同钱玄同辈写的，那种玩笑般骂人文字。文字的内容，对文艺的攻击，还不如对社会上不妥贴的可笑的虚伪地方加以攻击嘲骂时为多。其嘲骂有时但及于个人，这态度是否对，我在后面总论上再说。但看他们竟放弃自己的绅士态度，而去搔别人的痒，总算已得到不虚伪的孩子的心了。

它的文字，从另一个出发点看来，也许是不会给我们满意的。尤其是这般人的现在地位，影响了他们说话的口吻与他所能看到事物。他们虽说不愿自己的绅士态度也把别人的绅士衣裳扯破，但是我们所站的地方，仍然是在中产阶级的一段上，其实社会上许多的缺点他们是无从看到，单是他们的地位，在别一无产者看来，就该杀却而有余了。

他的作者如鲁迅，开明，平伯，玄同，语尝，川岛，半

农、春台等，在现在的文坛上，都是有了相当地位的。在北京论刊物上作者之多且像样，怕要算《语丝》了。它已产生一年有余，其产生之原因，即因那一次孙伏园脱离《晨报》而起。

（先是孙在编辑《晨副》时，稿件之常川供给者，要算是几个浙江乡亲了；乡亲中之周氏兄弟，自然尤形其为重要，有一次，为了一篇小诗，给其正张编辑见到，为抽去了，另加了一篇别的文字。抽去之意，自然就是为得副刊对社会非立于专开玩笑的地位。但抽去之先，未得孙之同意，这么一来，孙以为编辑的责任失了尊严，甚且以此作为一种信托不专的侮辱，心就怀了点不平。倘若这诗是一个别的外来稿子，怕也不致生出什么多大问题吧，不幸这新拟的打油诗的作者又是鲁迅。

为了老师的二只手大的一块脸，同自己的面子，因此孙伏园在第二天就出了晨报社的大门。几个人想自己来说所愿说而又不受别种牵制的话，是以《语丝》乃其时产生。）

现在负编辑责任的是周氏兄弟。通讯的地点是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转。报费在本京是铜元四枚一分，外埠购买的是二元钱可得到一年刊物看。

他的销路约三千分左右，以京内学生界订者为多。

《沉 钟》

这是几个对于文学抱有很大的希望的少年们办理的刊物。它属于浅草社。

社员们以四川人为多。先时曾出过一些，近复活后，又

已出到了十期。作者中如陈炜谟、陈翔鹤、王一庵、冯至等，埋头到自己所做的工作中找寻金屑，对外面的毁誉却不置闻问，每期出来，总都能在一般各个人心目中所持的水平线上。比之《文周》等刊物，固然是高明了许多，就是同《语丝》并提，它也有它自己特有的对文学抱忠实殉情的态度。不过因了作者们的现有地位的原故，这东西在现时的北京，常只好无声无闻的死下去了。虽然有些对北京刊物注过意的人，都对这刊物也表过他相当的同情，然而看刊物的人“一只眼在文章上，另一只眼却放在文章题目以下的人名上”毕竟如此聪明懂事的比“单把两只眼睛放在文章上不问那人的名姓”的傻人为多，故近来的发行数每期只印一千分，且有十期以后无法继续的消息。

在默默无闻中死去的战上也不知有多少了！所以我们对这类刊物的前途，纵抱着普遍的怜悯的同情，也只好让它像一般战上的死法一样样看到它在同行的伴侣践踏排挤，读者们的冷酷忽视下消灭！

近代出版物，若是你不希望别人注意则已。万一你还有一点希望，望别人在你把法宝吐出后能如你所期的做出许多不同的谦屈，同情，发怒，打哈哈，流眼泪，面孔来反应你，逗人对你也希望继续要下去，那你得先学学一般得名的人的法术。他们其所以能占据读者们心上的地盘，第一是他们同类们的相互的标榜，第二是同资本家携手，第三步又回到相互用夸张的动人听的话来标榜的道儿上去，第四呢，仍然是具帖子到有钱的书贩子足下去磕头。磕头的礼数，纵不能用之于今日，但至少你们得到一个以上的占地位的书店为知己，为你们的倚靠者，为你们的工具，才能有继续玩下去

(或说干下去)的可能,不然第一步的标榜工夫即或是已经做到,但也是完全白做了。

如像《沉钟》上作者这类人,既不会自己来吹捧自己,又还更硬起脊梁骨,从各人破破烂烂的荷包里来挖铜子印自己刊物,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行径,真可说是愚不可及,就此死下去固然是其所应得,不死下去所得的是毫无回应的沉默,这也只能说是活该啊!

《现代评论》

是一种顶时行的刊物。

其使人注意的原因,不是全因为他上面文艺作品而来。文艺在这刊物上,只等得一个附带的产物。这刊物注重的是政治上的无所偏的批评,与学术思想之共同的讨论。正因其是多方面的一种刊物,执笔的又是几个有名的大学教授,所以每期发行的数目至少亦在七千份。数的分配,京外与京内为二与一之比。(《语丝》则相反)近出至六十期了。每份售铜元十枚。外埠订报的,洋一元四角可得一年的刊物。它也同《语丝》一样办法:单分外更有合订本出售。合订本近至第二册,每册一元二角。

编辑人在别的方面,统由陶孟和办理,只文艺一种由陈西滢看稿。(但此系以前,近则系杨振声负文艺方面审稿责任。其编辑法似由社员轮流担任。)

陶之文章不多见,陈则每期总有他一篇《闲话》。这闲话又必是对社会所引为重要的时事,(如学潮类)做一种不容恕与惑疑似的批评。这一来反响就够多了。攻击他最力的,要

算是《语丝》，《猛进》，与《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几种了。闲话有些是很能针对社会现状的谬误与虚伪的，但立在一个固定的地位，观察许多不能望到的事物，自然也免不了偏持与腐固！然《闲话》上的文章，是做得很俏皮而曲折的。

它的作者，关于评论学术方面呢，是王士杰、周鯁生、胡适辈。其于文艺，有徐志摩之诗歌与凌叔华、冯文炳之小说，算是能给人以注意价值的。志摩之诗，有一种莲花落似的格调，而用字的丰富，都是能于新诗外另立一种新形式的。不过他的诗的劣处也就在此。我们通常读诗，我们咀嚼它若干单词组合成的篇或一句，总好像在某一篇或句外，还有一种与此篇或句又不同又相似的情感在，才觉得这诗意思好。这使人于诗句以外得到一种幻忽游离境的诗句，音节与字句的美丽，是一种重要的东西；但音节的长短，却不是一直流下去的；好像要迂屈萦绕的走去才好。一直泻去是奔放，诗歌写史事或某一种记述时，得用那种一往无羁的奔放辞句，若为得是说一种淡淡的或杳然而去的片断情事时，似乎值不得那么奔放。且奔放的辞句，用到这一类应含薄薄的写来的诗情时，正如把极酽冽的酒代了一瓯清淡的茶，酒虽酽冽使人兴奋，但我们所领会过那种清茶微涩的味道却不可得了。（但他的诗用字的美丽丰富，我也同许多人一样，极其佩服。）

字句的美丽，也正如辞句的刚性，我们得需要它来形容一切非普通简单字句所能形容的情感。倘若是这一类诗只合用几个平常非贵族的字句，就能把我一种情感维系到这诗上，且恰到好处，而我却“真珠木楠……”写上一大篇，正同很温和平静时偏用些刚折性的辞句一样；描写上即或算是成就，

在创作上仍然算是失败了。因为创作的成功，是文字的普遍性，从越具有普遍性的文字中看出作者自己的个性来，这才是创作的价值。并且有时还可感觉到，专重在字面的表现时，诗的内含的热情反而不见了。

志摩的诗似乎就忘了这一点。且不止他一人，近来有不少摹拟他或类似他的诗，都把这一点忘掉了。他们思从字的华美上增加诗的热情，又因为中国诗新的形容状拟词还极少，故结果仍然把学四六排律的一些老调子借为座上客，最甚者，如有个自命为中国济慈的大作家样，不但诗的题材是离不了节令，且“桂子”“月宫”“白兔”“嫦娥”“蒲鞭”“艾虎”纸上都布满了。会做新诗且能在诗坛上略有点名的，拜伦，济慈，雪莱，自然是极好的老师，但自己的东西总无不是读了点旧诗旧词变形脱皮的结果。因多数读者都是同时或已曾读过旧诗旧词的，一般拟物状形词记得烂熟，而我欣赏他们的诗时也并不与旧诗两样，所以就觉得他们的诗好。其实这种样子下去，要诗的前途转入一个新的境界，那是没有希望的。志摩的诗，虽说已立了一个新的标格，凑成诗句的材料也比之朱湘、闻一多辈爬进了一步，所取的由锦绣缎匹到大车灰土，也许是诗兴太热烈了，下笔不能自己似的，总是倾筐倒匣的，尽量将所想到的写出，在别人看来，钦佩他的想象力以外，还另外有一种欣赏诗以外的趣味，但这趣味就来得有点滑稽了，他的诗句子正因其为太累赘，所以许多诗句子徒美，反而无一点生命。缠绵是够缠绵，但得要同时认得到他的人才能觉得。

在这种论他人诗的语气上，我正像一个与日本式小诗口味极合的人。不过中国几个拟摹日本式太戈尔式小诗的成名

者，我嫌它不会怎样去表现自己的真实热情，（表现的方法笨拙到比什么还劣）正如对其他能写长诗的诗人一样，我还不见到一册使我满意的诗来。

冯文炳的小说，最近才出了一个创作集，《竹林的故事》，我个人是很喜欢他的东西的，不过因为穷的关系，我所见到他的几篇文章，还是《语丝》同《现代评论》登载的，不知其他怎样。他的创作写得极其细致，但并不累赘，把自己儿时所得的印象，用女人似的笔致写来，至少是我为他那篇《竹林的故事》，（集中之一）已深深的感动了。在他集子上他自序的创作正是一种“悲哀的玩具” 他所见的人生，似乎就只是他创作中那类人生，使他感着亲切。这只是人生的一片，但他能把这一片人生送给我们，（虽然他说是自己的悲哀玩具。）已觉得很不少了。

我的希望，是现在的文艺园圃中，能多产生一些这类美丽文字，才能给人一点安慰。不过那类破坏旧组织思想向前面突进着的，热一点的，以至于跑到另一个地方大喊其“厌世”，“肉的享乐”，“革命”的，我也喜欢。

淑华女士，有些人说，从最近几篇作品中，看出她有与曼殊菲儿相似的地方来，富于女性的笔致，细腻而干净，但又无普通女人那类以青年的爱为中心那种习气。这是可信的。她的几篇文字中，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太太，这太太的年龄是二十六到三十，所用以为纬的又必是普通家庭的一类事；还是脱不了爱，但这是另外一个阶级中的爱了。这类爱不是一个二十岁少年男女所希望的，也不是他们所想得到的。

有个朋友对我说，作《酒后》的人，她所要的家庭也是那样。这是一句笑话。我们不能拿某个人每一篇作品来加上

她一个相类希望或相类悲哀来论，不过我们若要知道她的环境，却多少可以从作品中了解！

对她作品不满意的，是那些无论对什么都感到有缺点的“小批评家”，我说的小批评家，这类人在北京是很多的。在什么副刊周刊之类尾子上，杂感类放口小气的文字随时都有。这类文字不论站在某一点上，当然都可以说是动机很对的，能把某篇创作的拙劣处指出；或是动作与心理分析的错误，果真是这样，是很需要的；不幸批评者所得的结论，总是“范围太窄了，脱不了老爷太太小姐的话”一类对人却作能耐的讥笑，把作品的好坏放过。这类事恐怕也不止北京一个地方如此。他们对作者创作方面希望必宽一点，也许可以说是好意。我意思，则以为一个人最适宜的，是写他所得印象须较深的一部分事物。要一个公子哥儿对别种生活漠漠然的人，去写一个车夫的儿子故事，失败是一定的；倒不如照他自己贾宝玉似的生活中，写一篇同婢女相调的纪事能成功！

淑华女士作品中劣点是人物总不大有生命，尤其是男的（也许是自己还是女孩子的原故吧），我觉得。

此外，西林君的短剧，使大家知道的，是《现代》上介绍出来。

他的短剧，在现在中国这种冷落的戏剧空气中，加了点热。过去的，似乎还没见到像他那类对话有力结构巧妙的短剧产生过。近来无论什么会上都有演剧的一节了，但本国短剧可演的太少，民间剧的整理又无从，将来的希望，还是希望几个对戏曲有研究的多给我们一点东西。不过西林的短剧我又觉得不大适宜。此时的社会什么会中，学生们虽占了全部，女的要喜欢的是《可怜闺里月》，男的所要的是《虎去狼

来》：这两剧合演，则热闹凄惨相合，大家都快活了。看剧的人少以去玩味剧中对话的，（他们也玩味，玩味那可打个哈哈的地方。）所以《一只马蜂》这种东西不该演。《酒后》不必演。《亲爱的丈夫》不能演。其所以还有人演的，那是因为末尾有结吻，大家可以从台上拥抱中，满足由他方感到性欲升华的意思来。

其他还有几个人的文章，不多说了。

此刊物文艺方面，本由创造社同人担任的；同时也公开接收外来稿件。到如今，关于文艺的文字，似乎全是外来。

《猛进》

是一个对政治有确定自信主张的刊物。对政治的批评，比《现代》激烈点，固执点。主持者徐旭生，北大一个教授，学生运动群众中，总可以看到他那顶旧帽子下一个不大好看的黄脸庞。

刊物的尾巴上，也像其他不是专卖文学的刊物一样：总有点什么译著小说诗歌；创作小说诗歌。也可以说是点缀刊物的场面，做文章的，还是散见于《京副》《莽原》《国新副》那几位打手。为省略起见，不多举了。它的文艺上略略有点不同的就是因为刊物主张上的关系，文艺也自然而然走到民众一方面和反抗一方面了，所以诗歌上常见到“前进”“杀”“兵士”的“子弹”“大车”一类字句。

我们对那个刊物的希望是：能够怎样说也能够怎样去做。

它的通信处是北大转猛进社，每份卖铜子六枚。刊物全部的主张纵不能是国民党的支配，也可以说是表同情于孙先

生的。

《燕大周刊》

一个对文学上在过去一时代中有过一点贡献的文学刊物。这刊物虽说是向外发展，但似乎是办事人不知怎样去宣传，所以几年来许多人还不知道有这样一刊物。《清华文学周刊》，近来比这刊物糟得多，但知道《清华文周》的人要比知道《燕大周刊》的人为多。其实在先前，一些作者中，如冰心，如落华生，刘廷蔚，熊佛西，白序之，在创作诗歌戏剧方面，都能在艺术界立一只脚的。尤其是冰心同落华生。

此周刊先由熊佛西编辑，熊去国后由董绍明办理。自董接手后，始把刊物的中心移到文学方面来，翻译创作都有许多像样的。

近来又改为焦菊隐编辑。装订形式是益发美丽了。内容似乎比前稍差了一点。这似乎不是一个刊物的病。许多人都觉得近年来的文学刊物比以前要低一点了，这有两个说法：一是欣赏文艺的人欣赏程度进了步；一是做创作的都不及以前的作者来的严重了。

它已出至八十多期，每期约二十页，售洋三分，外埠订报的是一元五看一年。每期的发行数大约在一千左右。作稿是教员与学生。通信处是北京燕京大学燕大周刊社。

《诗学半月刊》

这刊物为一种专载诗歌的刊物，出不多久就消灭了。由

诗学研究会人主持。作者中有蹇先艾、黄绍谷、石评梅等。因为出的日子太少，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

《燭 火》

只出过一期就不能继续了。

此是几个小孩子感于把作品托庇于他人刊物之痛苦而去尝试自办的。也正如别的许多刊物一样：因为经验的缺少，结果得到超过自己所能想到的失败。据他们自己的人间我说过，后来连四十多元印刷费还无从得。当时不但有文学上洗刷一新的希望，就是装订印刷，也曾想另立一个型范的。经过一次挫折，孩子们的锐气也完了，如今还是只好托庇于别的刊物发表文章。

编辑人为蹇先艾，作者如朱大楠、李健吾等近来也不大做文章了。

《骆 驼》

两年前，我们就听见人提起过这个名字了，由骆驼社几位骆驼组织，我所知的，只两个骆驼：就是周作人与江绍原。近来，大概他们自己也忘却了，虽然我一个人感到中国出版物缺乏时还念到这不能出版的东西。

要是谁要我说出我所喜欢的散文作者时，我将说一个周作人，再说一个张定璜，再说一个鲁迅，再说一个徐志摩：

不过我举这些是我这时所喜欢的，是说我对他的文字爱读的，所以我还可以加上一个章孤桐先生。也许最后添上这个，就有人很肯定来说我又是拿过了什么津贴，或受过什么人的恩惠，或做过“圣贤与英雄合论”的吧，这无须乎引申，我只是说自己以为那些文章好罢了。还有我最喜欢的，那是一个少年作者，高长虹。或者因为我也正是年纪不很大吧，我觉得了解他比所喜欢别的都来得更深。周先生的文章，像谈话似的，从朴质中得到一种春风春雨样的可亲处来，如《自己的园地》中论点什么或记述点日常生活的小品文字，我看从过去的一些文字中，（新文学）搜不出比这再美丽一点的了。尤其是介绍一个诗人或别的书籍，可以看出他那种对人对物的亲恰处来。从他的文字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懂人生艺术的人。

鲁迅先生似乎就不同了。把他四十年所看到社会的许多印象联合在一起，觉得人类——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所有的，只是顽固与欺诈与丑恶，心里虽并不根本憎恶人生，但所见到的，足以增加他对世切齿的愤怒却太多了，所以近来杂感文字写下去，对那类觉得是伪虚的地方抨击，不惜以全力去应付。文字的论断周密，老，辣，置人于无所脱身的地步，近于泼刺的骂人，从文字的有力处外，我们还可以感觉着他的天真。

徐志摩先生把他做诗用不胜用的美丽字句用到散文上，写无论那件事都好（但求莫做议论文）。他的诗我们读时，有时找不到诗的意味来，但若是念他的散文，那上面简直都是诗了。字句的美丽与流畅，成了种特殊的文风，纵有天才亦无从去学。在他的文章上，常常感着琐碎，这我也同我的朋

友一个意见，只要它琐碎的不讨嫌，还是很可爱的纯美文！

长虹的好处我不能说出，我只感到有力而且真。或许是少年人情调易于相同吧，看他的文字正在愤着，我的心同时也在愤了。文字是表现自己的；欲望，乐，怒，悲哀；或者是在应酬某一种人生的事业，在那种事业中低头，无言无语，仅有出汗的能力，只要他能忠实的表现自己，我们是可以从那低头的情景中看出他的被压迫着，是在有什么别的希望潜着的。所谓忠实的表现自己，是怎么一种表现法？我太拙了，说不清。但我有点可以为自己来解释的意思，就是用字。好好的——一点不能放松的去捉着一刹那或那一长片的感觉来留在纸上，不必照你所读过的什么诗文的格律去修辞，它自然会好。长虹的短诗，已近于做到我所说的那一步了。读过去年的诗，读现在的诗，总是要你从一片文字中去找一个概念；——就是作者当时的诗境。因为这一篇诗中有了许多为凑字数加上去的字，把作者的印象就弄朦胧了。靠各人去摸索，从不闻两个人看一首诗能得同样的领会。我同时承认正因其为是美是哲学必朦胧着的才叫做诗，我又觉得诗若是为做某一刹那印象的记录，记录的法则，必得明白，不能加一无用之字句。

俞平伯的诗同孙伏熙的散文，细腻妥贴，富于阴柔之致，两人并不异样的。这类作品，最适宜女人，（不是那类女革命家）或女性头脑的男人来读，因为这类软性读物，在需要从文字上得到一种共鸣，引逗出自己潜伏着的悲哀愤激抑郁的少男少女们，看来是极其肤浅的，我从另一点看来也非常喜欢。

做诗的而且我都觉得好的有许多。平列起来，如于麋虞，

吴默深，刘梦苇，朱湘，闻一多，蹇先艾，冯至，我喜欢于赓虞的比爱其他的多一点。默深的诗，同于的诗，一个样，绵丽深切，韵同字都考究，是锤打出来的。读来似乎还是于的多郁咽的情。至于刘梦苇，受了《楚辞》的影响，其实这是他自己觉得的。我看他诗求格律铺叙，有些地方极其雄浑，有些地方就略现着勉强了。他的诗重韵，但他不很会用韵，就是一种缺憾。不过每首诗都可以歌，他的诗格也是近于长歌体的。朱湘的诗其锤打字句，同于、吴一样，但结果却不同了。他的诗都像唐人律诗，而且属晚唐，清丽华贵，却不亢放。也许这就是一个欠缺。能清而不能雄，做小诗是很好了。闻一多用韵用得最自然，像熟读韵府一类典书样，节令掌故记得非常清白，因其为自然，所以我爱它。蹇先艾也是个把诗喜欢延长成一致整齐的，若是另一时代的人，他必最爱做七言排律。我个人意见，对诗是不主张那样的。能像旧词样，虽然对于字句注意，但让它意思的长短写下去，不要四句或六句，果能是好，三句一句以至于四五个字都好。因为四个字的短句，有许多佳句是这样已够我们玩味了。他记得许多状物词，形容词，我嫌他太记得多了，因为记要记得多，并不必都用出去；选那一个顶合宜的就好了。他把这一点忘却。就是于、吴二人也有同样的毛病，诗的热情反而减了许多。但蹇君的诗，美的地方，是许多人不及的。他也有他自己的风格，缠绵而微带抑郁，使人读了惘然。我最念得少的是冯至的诗，但所念过的都使我满意。像小词样，有着青年求爱的热，有着梦境朦胧的幻美。

还有个，诗境极清，几乎近于秋水了的刘廷蔚，许多人会还不见过他的作品。作品中，交织着天真与温情。我总觉

得诗境太清了，从此中虽然找不出人间烟火气味来，但想寻一点更狂一点的热也无从了。或者是我个人趣味是那样，我对悲哀，也须要狂热，我不呜咽，要哭就大哭，但我知道呜咽的情更长。廷蔚的诗，却正是女人样呜咽着。低徊而且眷恋，对一切，得着昔人所谓诗人之旨。

我们又曾听说过，焦菊隐君，不久将有一本诗集出来的，但如今还不见过。菊隐的散文诗，他的朋友，是尝提过的，我不懂散文诗，所以对散文诗也不大注意了。但他的文，我读过，因为趣味的原故，却不大爱。（若把文丢开，人是很可爱的。）

向培良，做过一编戏曲，《不忠实的爱》，尝试的东西，思想与结构，我认为是失败了。但近来极努力，所写的短小文字，朴而不华，还时常做着戏剧一类批评文字。文字朴质。还有两个我所爱的，是李霁野与韦丛芜：我尤其满意韦君所译的文，像鲁迅先生样，直译，几于像笨拙的文字了。然而这样的，他把别的作者的思想忠实的介绍过来了。虽然他们的译文并不多。

我还记起一个许钦文，作品的量，使我们可惊。用最平常略近诙谐的笔调，写出他的小说来，观察像是略略浅薄了一点，不过另一种特殊风格，那是别个不会学到的。人物中总带了点嘲笑样，又像为着游戏而创的态度，虽然失去了严肃，只是写的方法并不怎样坏，也就难得了。

还有……

本来我是想着，把作者中，我能知道的，略有点论列的。只因手边一时无书可以引出那些作品，竟无从动手了，上面

举出了些人，都是一时想着而说的。不但不必同所谓文艺批评家的眼光相同，就是我另一个时候，也许亦会对我此时所认为喜欢的而否认！所举的有些是熟人，更难免是感情用事。幸好我这介绍是介绍我所知道的刊物与我所喜欢的人，个人的意思，且属个人一时的意思；纵对某种作品中有了误解，对原来有过相当地位的作者也不会损及毫末。所以我不必怎样的希望别人对他作品谈的不对劲的谅解！

十五年一月于北平

本篇发表于1926年2月、3月、6月出版的中华基督教《文社月刊》第1卷第5、6、7册。署名沈从文。

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

中华民国十六年后，中国的文学趋势，从几个平时以翻译为生活的小文人手上，产生了大批译作新兴小说，其中尤以由日文转译那种方便，得从事大量的不节制的生产与介绍，使中国出版界显出十分兴奋的样子。市侩商人由小文人手上，用一个并不过大的本钱，接受了若干部新书，且新的小规模书店次第而起，于是引起一种竞争，因此大家的目光皆注意到广告这样东西来了。这竞争，这由于“商业”的竞争，乃支配了许多人的兴味，成为中国文学转换方向使之热闹的背景。在上海转变这两个字是大家所熟习的字，都据说是那么转过来了，这个那个，俨然皆“变”了。或者可以这样说：译书人皆有了觉悟，知道文学将成一种力，一种转动社会，倾翻一切的力。使文学由唯美的陶醉，成为对新的世界的倾心。使个人主义的悲观，转为卑视个人主义的幻灭而为阶级争斗的顽强。这欲望，不纯粹是由于“国内现状”而兴起，却是“转贩”而来的。由于日本人年来对这文学新问题的兴味，由于商业竞争眩目的告白，一面是中国内部的混战，年

青人无信仰，无良好生活，乃使这问题成为一件严重的事情。使这问题得到一个机会，生着翅膀，向内地各方面飞去。但这个问题，在几个以日本或其他国文字印行的刊物作精神上粮食的文学理论者说来，虽是那么勇敢的高呼要变了，已经变了，鲁迅不再被钱杏邨^①骂了，茅盾的书也不受批评了，但其实，这件事对于中国几个创作者是无大关系的。印行了许多新方向作日的底艺术理论书籍，印行了无数小说，全是翻译文，或者抄录转贩。一个做生意的地方，模仿乃成为一般人的技巧。国内几个有相当地位的创作者，却正如与这个问题毫无关系，是很可怪的事。创作者以冷静的眼，所见到的中国近年来的一切姿态，写成时，却是另外一种东西。老舍用他一枝流畅的笔，写到他所见及的都会，在《赵子曰》这本书上，为我们所描下的一切人物，是明白而动人的。叶绍钧，一个在创作态度上保持沉默而又非常诚实的作家，近年来所印行的两本集子，在《城中》同《倪焕之》这两本书上，他不单描画到他所见及的都市与乡村，《倪焕之》那个长篇上，作者同时还注入了自己欲望，对新的时代有所说明。然而在作品中那种人物忧郁的一面，却正是革命文学家所否认的一面。茅盾在这时代以他生活的体念，写了三个长篇^②，同稍后一时印行的一个《虹》。然而所有的人物，却又是为革命文学家所指摘的人物。（许钦文、冯文炳两人所写到的自然离那新要求更远了。）一个在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丁玲女士，以她正确的大胆的观察与描写，产生了《在黑暗中》一书，这本书，就只解释到一样事情，便是一个在都市中进步智识阶级女子，对恋爱所具有的各种观念，以及那种爱憎的姿态。作品中人物能认识“生活”，分析“爱欲”控制“兴味”，却

同“革命”无关。稍前一时以淦女士^③笔名，发表了《隔绝之后》那么为爱而反抗的作品，是那时代男女的苦闷，丁玲作品中的女人，是正如把淦女士作品中人物，生活到都会里，在烂熟的男女关系里而产生烦恼，便在那类男女行为上加以分析有所成就的。茅盾同丁玲，都看到青年男女灵魂的纤细，多疑而善感，却永远不“粗暴”。什么人看到那粗暴一面？完全没有。能够有机会安居在上海一隅，坐在桌边五十枝烛光的电灯下，读日本新兴文学杂志，来往租界乘电车或公共汽车，无聊时就看看电影，工作便是写值三元到五元一千字的作品，送到所熟习的书铺去，这样作家，除了在作品上间或不缺少努力使自己成为粗暴，而结果还是失败以外，是什么也办不好的！读高尔基，或辛克莱^④，或其他作品，又看看杂志上文坛消息，从那些上面认识一切，使革命的意识从一个传奇上培养，在一个传奇上生存，作者所谓觉悟了，便是模仿那粗暴，模仿那愤怒，模仿那表示粗暴与愤怒的言语与动作。使一个全身是农民的血的佃户或军人，以夸张的声色，在作品中出现，这便是革命文学作品所做到的事。又在另一方面，用一种无赖的声色，攻击到另一群人，这成就，便是文学家得意的战绩，非常的功勋。作者中如蒋光慈，批评者中如鲁迅，是那么为人发生兴味的。关于译文，如画室等，文字的涩硬，复使之在一个最窄限度内存在。若把所谓使一切动摇的希望，求之于这类贤人，求之于这类文字，那只是一个奢侈的企图，一个不合事实的梦想罢了。中国或许不缺少产生同时代接近使社会健康这样的作者与作品，在新的时代年青的人中发现，但一定不是上海作家，不是写恋爱故事的张资平，也不是写《瓶》写《我的幼年》的郭沫若。

十年来国内的变乱，年青人中止不缺少以一种不幸的意义，置身到一切生活里去的人，他们看到一切杀戮争夺的情形，听到一切爆裂哭喊的声音，嗅到一切烟药血腥的气味，他们经验这个人生，活到过那个时代里，才能说明那现象，以及从那现象中，明白我们租界以外的人爱憎和哀乐。在明日的时代里，只有这种人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从他们那种作品里，才会看到一些中国人的脸子，才能听到一些中国人的声音。在诗歌，也一定从那些人方面，有好的崭新的作品产生，因为关于诗的文字与韵的处置，由那些人去试验与决定，较之从一点不高明的抄译而来的新诗形式更为适用。那由于自己民族习惯意识唱出的诗歌，在一种普遍的意义中存在，也才能使它成为一种力，代表一个民族向新生努力的欢呼与喊叫。他的喊叫是大家所明白的，感到的，这使文学，成为腾翻社会的盼望，才能近于事实而成立。

用我们“自己的言语”，说明我们“自己的欲望”，以“平常的形式与读者接近”，生息于上海的作家们，不屑注意它，也不能注意到它。这个东西被上海文学理论者与创作者都忽视而放弃过了，却待一切无名作家来寻到它，使用它，写一点东西出来。因为这样，我们期待的文学，却不是上海几个人能够包办得下了。依我想象，内战的小小结束，一定能给一些机会，使一些不是创作家的年青人，也能从容的用他的笔，画出一些他所经验到的时代影子。即或是幼稚，是单纯，是缺少各样组织的技能，然而那在另一时，是可以使这作品成就在技巧以上，且可以从“幼稚”中成为“完全”的。我望到他们“变”，却是一些现在人家所说不革命的绅士作者的努力，使文字成为多数所了解的言语，另外是那些有

生活经验，却因为给上海人所提出的文学方向与文字标准所恐吓的年青人，都有那信仰同勇气，来从事写作。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学，或能尽一点力，成为一个轮子，转移一些现象，与一些使这现象所以凝固的人类愚蠢无耻野蛮的行为。

在文学上所有企图，正像是一个道德的努力，在“创作态度”上，我们似乎也需要一点儿严肃才行。这一点，于无名作家，尤其是一个不可疏忽的信仰。缺少这个顽固坚实的态度，在上海，是可以从那类所谓都市趣味的新海派作者的成就，可以明白的。

我是那么想：文学的希望是使作者充实，使读者充实，在初步努力的方向中，我们的眼是不必太注意到商人做生意的刊物，却应当看分明了所生活的一切事物，趣味在生活里，却不是“在文坛消息”上的。

本篇发表于1930年12月15日《文艺月刊》第1卷第5号。署名沈从文。

① 钱杏邨 即阿英，现代作家。

② 三个长篇 指茅盾著《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

③ 淦女士 即冯沅君，现代女作家。

④ 辛克莱 美国小说家。

窄而霉斋闲话

中国诗歌趣味是带着一个类乎宗教的倾心可以用海舶运输而流行的，故十九年时代，中国虽一切还是古旧的中国，中国的新诗，便有了机械动力的声音。这声音，遥遥来自远处，如一袭新衣样子，因其崭新，而装饰于诗人想象中，极其流行，因此唯美的诗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连云高楼，写着进步的都市的赞美诗，普罗诗人，也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到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写着锻铁厂，船坞，以及其他事物倾心的诗。瞩目远景，幻想天国，诗人的从容权利，古今原无二致。然而数数稍前一时的式样，反使人对那业已为人忘却的“人生文学”，倍增感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滑，自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为诸

诗人崇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取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这人生文学，式样古拙，旋即消灭，除了当时的多数学生，以及现时的少数中学教员，能记忆某某名句出自某某外，在目前，已找不出什么痕迹存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一个谈近十年来文学之发展的情况的人，是不至于有所否认的。人生文学的不能壮实耐久，一面是创造社的兴起，也一面是由于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趣味主义的拥护，几几乎成为地方文学见解的正宗，看看名人杂感集数量之多，以及稍前几个作家诙谐讽刺作品的流行，即可明白。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从此这名词也渐渐为人忘掉了。

上面提及人生文学的没落，所据虽多在诗歌以外，然而诗歌的人生文学，却以同一意义而“不”人生文学的。

“京样”不能流行以后，海上趣味也使人厌倦，诗歌的方向，用最世俗的形容，应当穿上“洋服”才美观的时代就到了。我要学上海商人的口吻，不避采用更富市侩气的名词，“来路货”，在诗歌方面，有一种新的价值，这是我们全无力量去作否认的。格律废弃既为当然的事实，商籁体的分行，我们若不明白，便不足欣赏新诗，无资格评论新诗。在形式方面，自由诗人多数是那么守着新的法令才似乎配说“写诗”的。在内含方面，一个诗人若不拘束他的情绪到前述两个极远的国度趣味里去，也仿佛不能写出一首“好”诗。目前的新诗，标尺既悬于这两类作家手中，若不读诗，那你还是

个自由的人，真可羡慕，若对于诗还不缺少兴味，你的兴味便不许你再有自由了。这种现象我觉得并不是好现象。

新的趣味除了用更新的趣味来代替以外，菲薄并不能动摇事实，所以我们只能等待。看看过去，未来的也应当就可以知道了。不过一个正在学诗的人若尽随波逐流，也就未免太苦，还有一个读者，处到这种情形下，为了习惯一年一换的趣味，他的头脑也一定如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常年政治局面变动情形下，永远是个糊涂的人，这现象真是很可怜的。

有人说，“诗人”是特殊的一种人类，他可以想象世界比你们所见到的更“美”或更“丑”，所以他的作品假若不超越一种卑俗的估价，他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诗人。同时他今天可以想那样是对的，明天又想那样全不对，惟独诗人有这个权利：“让这些天才存在”，我说，“就让他们这样存在吧”

我说，另外我们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再来奖励那种平凡诗人的产生。这平凡诗人不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一种商品常常也不免相伴到一个道德的努力，一首诗我们不妨也如此找寻他的结论。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字叫出来，却应忘记使人生文学软弱的诙谐刻薄趣味。莫严肃到文字形体的规则里，却想法使文学是“用具”不是“玩具”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找寻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虚伪的坚实比虚空的美并不相差多少，然而，一声呼喊却可以壮气旺神，民族主义文学虽笑过左翼作家的法宝，而自己到后又运用了。

说到这里自然我有一点混乱了。因为一个古怪的诗人，

也许就比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更适宜于在作品上保留一个最高道德的企图。不过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仿佛很古怪的诗人，却不见到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所以我想象一个“不存在”的比一个“已存在”的会好一点。其实已存在的比未产生的更值得我们注意和希望，那也是当然的。他们都可以成功，伴着他们成功的，是他们的“诚实”。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方向上，自己若先就缺少信心，他们“玩”着文学，文学也自然变成玩具，“白相文学的态度”，北京人生文学提倡者的堕落处，上海普罗作家或民族主义作家，都不免再向那条方便路上走去，什么也不讲的诗人，那自然更多机会成为“大家玩玩”的现象了。

现在应当怎么样使大家不再“玩”文学，所以凡是与“白相文学态度”相反而前的，都值得我们十分注意。文学的功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不过，这功利若指的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于文学的人，全在这样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较之在朦胡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

说到这里我仿佛看到我所熟识的诗人全笑了，因为他们要说：“对不起，你这个外行，你懂十四行应当怎么分行押韵没有？你不是在另外一个时节，称赞过我们的新诗了吗？你说我们很美，应当怎么更美，即或说得是外行的话，也不会相差太远。但你若希望我们美以外还有别的，你这外行话纵说得十分动听，还是毫无用处的。”

我想，那末，当真莫再分辩了，我们让这个希望由创作小说来实现吧。事实上这里的责任，诗人原是不大适宜于担

任的。一个唯美诗人，能懂得美就很不容易了，一个进步的诗人，能使用简单的字，画出一些欲望的轮廓，也就很费事了。我们应当等候带着一点儿稚气或痴处的作家出来作这件事，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儿，却太富于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习气，去呆头呆脑地干，都相差很远。我想，从另外一方面去找寻，从另外一方面去期待，会有人愿意在那个并不时髦的主张上努力，却同时能在那种较寂寞的工作上维持他的信心的。

应当有那么一批人，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里去。

六月十日

本篇发表于1931年8月15日《文艺月刊》第2卷第8号。署名沈从文。

上海作家

上海近些日子有一件事情，值得在新文学运动发达史上记下一笔新账，就是各大报“礼拜六派”^①的作家，各个失去了二十年来所有原来的地盘，一群“前如散沙——盘新如把兄把弟”的新作家，占领了这些报纸的剩余篇幅。因此一来，大有影响于中国新文学方面，使它异常活动，那是毫无问题的。并且上海一般作家，（不，在这里有许多人得称艺术家或文学家，因为他们就从不作什么的。）在上海团结到一块，平常有点什么意气处，互相当面骂过或背地里造过些谣言的，皆俨然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倾向，间不多久日子，又可从什么报上知道他们聚集在什么地方吃喝过一顿，从这些情形上来看，将来的热闹也是十分显然而又使人抱三分乐观的。

可是这得问问，大家只不过是因聪明老成了一点，明白过去天真生分的错处，十分糟蹋了精力，殊不合算，因此团结起来，好好商量打成一片向报馆捞几个稿费，得来花到吃喝上面呢？还是在此目的以外，也想到乘此机会来为中国

作点事情呢？

一个日报的意义，是包含了一种国民教育的责任的。他们既占领了各个报纸的某一面，作品是不是也应当有一成责任性？

若照过去那么大家只是谈点古典的美，说说空虚的艺术，写点中外文坛佚事来代替三脚蟾美人蟹的纪录，说点新的笑话来代替旧的笑话，唱唱京戏，扮个小丑，照到在某种会场上吃喝的情形生活以外，还来用那种风度写写文章，那真未免辜负了他们的机会。照这样下去，这笔账上应当这样记下他们的工作：

一个旧“礼拜六派”没落了以后，一个新“礼拜六派”接替而兴起。两者之间的不同处，区别不过如此：一是海上旧式才子，一是海上新式才子而已。前者懂得些本国旧诗旧文，也不深懂，后者知道些西洋艺术文学，或装作知道的神气。至于两种人所做的事情，则大同小异，只是倦于正视人生，被社会一切正当职业所挤出，也就缺少那种有正当职业对于民族自尊的责任观念，大家聚集到租界上成一特殊阶级，全只是陶情怡性，写点文章，为国内腹地一切青年，制造出一种浓厚的海上趣味。这海上趣味，对于他们生活，也许可以使他们自觉更变得风流儒雅了一些，可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却完全不是必需的。

如果这份记载是使他们难堪的，其中还有人对于这种不

良趋势感到惶恐，对于这个稀乱七八糟的国家感到愤怒，同时对于自己身分生活又感到一点责任，不甘心承继那个地盘也仍然承继那份趣味，在“新礼拜六派”的意义下打发日子呢？他们有几件事可以注意的，提出来给他们作一个参考。

第一，多方面性质的副刊，他们应当把他们的眼光，对于这个民族的健康上给它一分注意。

第二，属于文学方面的副刊，他们的作品本身应当是热烈的，常态的，诚实的，提示这个民族发生向上自尊的感觉，不应把趣味流入琐碎里去的。

第三，应当提倡新的人生观，一种在个人生活民族存亡上皆应独立强硬努力活下去的人生观。力避衰弱无力的牢骚，小巧无聊的杂感，以及那种海上趣味最坏的一种造谣风气。

第四，应该奖励征求能使国民性增加强悍结实的一切文学作品。

第五，应当很严厉的互相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清算一切作品的错误。凡是不能在作品上存在的趣味，克制它。属于个人兴味那类作品，去掉它，（这作品非印行不可时，送它到自行出版物上去印行。）一个编辑负了一种道德的责任，检察各种稿件，检察它认为妨碍全个民族健康，不宜于国民公众读物时，皆不许到副刊上来。

第六，容纳左翼作家有价值的作品，以及很公正的批评这类作品。同情他们，替他们说一点公道话。

“礼拜六派”是在《申报》及其他报纸，已很诚实的完成

了他们所能完成的事业，新的一群预备向天上飞去，还是向泥淖里钻去呢？我们等着看。我们所盼望的，是机会既不弃他们，他们也不甘于自弃。

二十一年十二月八日

本篇发表于1932年12月15日《小说月刊》第1卷第3期。署名岳林。

①“礼拜六派”即“鸳鸯蝴蝶派”。《礼拜六》为一种通俗文学杂志，主要刊载白话言情小说，后将在此刊物上发表此类作品的作家称作“礼拜六派”。

文学者的态度

这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我却只预备援引出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我家中经管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假若一个文学者的态度，对于他那分事业也还有些关系，这大司务的态度我以为真值得注意。

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也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他所认的字够念点浅近书籍，故作事以外他也读点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见他那么健康和气，负责作人，皆极其称赞他。有一天朋友××问他：

“老景，你为什么凡事在行到这样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说：

“××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应当明白写在书本上的

一切，做厨子的也就应当明白搁在厨房里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觉得奇怪，反把我当成个怪人！”

“你字写得那么好，简直写得比我还好。”

“我用了钱得记下个账单儿，不会写字可不配作厨子！字原来就是应用的东西，我的字也不过能够应用罢了。”

“但你还会看书。”

朋友××以为这一来，厨子可不会否认他自己的特长了，谁知老景却说：

“××先生，这同您炒鸡子一样，玩玩的，不值得说！”

××是个神经敏感的人，想起了这句话里一定隐藏了什么尖尖的东西，一根刺似的戳了那么一下。“做厨子的能读书并不出奇，只有读书拿笔杆儿的先生们，一放下笔，随便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厨房去炒一碟鸡子，就大惊小怪，自以为旷世奇才！”那人司务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脸，笑容里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这样一种幽默。其实不然，他并不懂得这些空灵字眼儿，他无需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点儿小小的窘，意思还想强词夺理的那么说：“我们做先生的所以明白的是书本，你却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实，你若不能称为怪人，我就想称呼你为……”他大约记起“天才”两个字，但他并不说下去，因为怕再说下去只有更糟，便勉强的笑笑，只说“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发开了。

别人都称赞我家中这个大司务，以为是个“怪人”，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称呼。这个人司务明白他分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懒，作过了事

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作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委屈牢骚的神气。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个卷筒鱼，一个芥兰菜，一个四季豆，一个……告给他：“大司务，你今天这菜做得好”，他不过笑笑而已。间或一样菜味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说好他不觉得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他其所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分职业的尊严。他自己以为自己毫不奇怪，别人也就不应当再派他成为一个怪人了。

不过假若世界上这种人算不得是个怪人，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使我们觉得太古怪了。我所指的就是现存的文学家，这些人古怪处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分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时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要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了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作官大不如意，才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作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的小说多预备作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因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着，然而从一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瞧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

装模作样的作下去，但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庄严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一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口，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作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作，带着孩子们心情觉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作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更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诚，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需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他又像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像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成了这种情形；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近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

限制，作品绝不会有如何出奇眩目的光辉。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好绝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有从少数带着胡涂的阿誉赞美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他的头上，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章克标^②先生在他一本書中所列举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来，对于各种事业从比较上皆证明这个民族已十分落后，然而对于十年来的新兴国语文学，却似乎还常有一部分年青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道德性，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蠢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诚实瞳矇的感情，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还缺少托尔斯泰，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氏比亚，教德国文学的

就埋怨中国不能来个歌德。把这两种人两相对照起来时，总使人觉得极可怜也极可笑。实则作者的态度，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教授们所研究的成绩，也将同他们的埋怨一样，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人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事情，都把他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处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需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需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那大司务处世作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模范的态度。他应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自己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表面上处处依然还像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

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

一个厨子知道了许多事，作过了许多菜，他自己就从不觉得他是个怪人，且真担心被人当他是个怪人。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来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希奇。既以为希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从这类人成绩上有所期待，教授们的埋怨，便也只好永远成为市声之一种，这一代的埋怨，留给后一代教授学习去了。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来学我家中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他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假若这种性格虽属于人类的性格，在文学者方面却已为

习气所打荡无余了！那么，从事文学的年青人，就极力先去学习培养它，得到它；必需得到它，再来从事文学的写作。

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北平

本篇发表于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8期。
署名沈从文。

①“博物” 泛指古代记载有关山川、地理、物产、风物等的书籍。

“述异” 泛指古代志怪、笔记之类的小说。

“笑林” 泛指古代笑话一类作品。

“世说” 泛指仿《世说新语》一类小说，内容主要为记士大夫言谈、轶事。

② 章克标 现代言情小说作家。

论“海派”

最近一期的《现代》^①杂志上，有杜衡^②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海派”这个名词。由于北方作者提及这个名词时，所加于上海作家的压力，有失公道处，故那篇文章为“海派”一名词，有所阐发，同时也就有所辩解。看了那篇文章后，使我发生许多感慨，我同意那篇文章。

“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了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吾人今日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自己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

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侷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以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像这样子，北方作家倘若对于海派缺少尊敬，不过是一种漠视与轻视态度，实在还算过于恕道了！一个社会虽照例必有这种无聊人类与这种下流风气存在，但这种人类所造成的风气，是应当为多数人所痛恶深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当道理的。一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康健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根据北方一般从事于文学者的诚朴态度说来，使我还觉得有点遗憾。过分的容忍，一面固可见出容忍的美德，然而严酷检讨与批判的缺少，实在就证明到北方从事文学者的懒惰处。虽各人皆知自重自爱，产生一种诚朴治学的风气，尚不能将那分纵容的过失卸去。照北方从事文学者的意思看来，用好风气纠正坏风气，应当是可能的一件事。我觉得这种办法不是个办法。我主张恶风气的扫除，希望这成为不拘南北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正因为莠草必需刘除，良苗方有茁茂机会。然而在南方，却有并不宜于从海派文人中讨取生活的现代编者杜衡君，来替上海某种人说话了。

这是杜衡君的错处。一面是他觉得北方从事文学者的观念，对于海派的轻视的委屈，一面是当他提到“海派”时，自己却俨然心有所慑，以为自己也被人指为海派了的。这是

杜衡君的错误。

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或展开，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这种轻视与忽视态度，便有他们应得的报应，时间一久，他们便会明白，独善其身诚朴治学的风度，不但难于纠正恶习，且行将为恶势力所毁灭，凡诚实努力于文学一般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者，且皆会为海派风气从种种下流方法上，将每个人皆扮成为小丑的。且照我所谓海派恶劣德性说来，杜衡君虽住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的。不只杜衡君如此。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若干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关于海派风气的纠正与消灭，因为距离较近，接触较多，上海方面的作家，较之北方作家认识本题必更清楚，且更容易与之利害冲突，上海方面作家，应尽力与可尽力处，也必较之北方作家责任更多。杜衡君仿佛尚不明白这种事实，我却希望他已经明白这种事实。他不宜于担心别人误认他为海派，却应当同许多在上海方面可尊敬的作家一样，来将刊物注意消灭海派恶习的工作。

杜衡君，宜于明白的，就是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方，也已经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材”与“风气”。到底是北方，还不至于如上海那么希奇古怪，然而情形也就够受了。在南方所谓海派刮刮叫的人物，凡在作品以外的卖弄行为，是早已不能再引起羞耻感觉，把它看成平平常常一事情了。在北方，则正

流行着旁人对于作家揉合了好意与恶意的造谣，技巧古朴的自赞，以及上海谎话的抄袭。作者本人虽多以为在作品本题下，见着自己名字，便已觉得不幸，此外若在什么消息上，还来着自己名字，真十分无聊。然而由于读者已受了海派风气的陶冶，对于这人作品有所认识的，便欢喜注意这作者本人的一切。结果在作者方面，则凭空增加了若干受窘的机会，且对于陌生的会晤总怀了恐惧，在读者方面，则每日多读到了些文人的“起居注”，在另外某一种人，却又开了一条财源。居住上海方面的作家，由于友仇的誉毁，这类文章原是不求自来的。但在北方，愿意在本人作品以外露面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因此出于拜访者大学生手中的似是而非的消息，也便多起来了。这种消息恶意的使人感觉方法如此下流得可怜，善意的也常常使人觉得方法拙笨到可笑。一个文学刊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应有的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所谓必需东西虽很多方面，为什么却偏让读者来对于几个人的起居言谈发生特殊兴味？一个编辑人不将稿费支配到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却只花钱来征求属于一个人的记载，这种糟蹋读者的责任，实在是应当由报纸编辑人来担负的。很明显的事，若干刊物的编者，现在是正认为从这种篇幅上，搜到若干读者，且希望从这方面增加读者的。这种风气的延长，我认为实在是读者与作者两方面的不幸。

北方读者近来欢喜读点不三不四的文人消息，从本人作品以外的半真半伪记录上，决定对于这作者的爱憎，可以说是这种纵容恶习当然的结果。我所说的身住北方作家对于海派的容忍，必有它应得的报应，这就是所谓报应！

从南方说，几个稍稍露面的对于未来有所憧憬、沉默中在努力的作家，正面的被某种势力迫害以外，不也是成天在各种谣言中受迫害吗？

妨害新文学健康处，使文学本身软弱无力，使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文学失去它必需的认识，且常歪曲文学的意义，又使若干正拟从事于文学的青年，不知务实努力，以为名士可慕，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使皆为这种海派的风气作祟。扫荡这种海派的坏影响，一面固需作者的诚实朴质，从本人作品上来立下一个不可企及的标准，同时一面也就应当在各种理论严厉批判中，指出种种错误的，不适宜继续存在的现象。这工作在北方需要人，在南方还更需要人。纠正一部分读者的意识，并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但我们对于一切恶习的容忍，则实在可以使我们一切努力，某一时全部将在习气下毁去！

我们不宜于用私生活提倡读者对于一个作者过分的重视，却应用作品要求读者对于这个社会现状的认识。一个无所谓的编者，或想借用这种海派方法，来对于一般诚实努力的作家，给他一种不可防御的糟蹋，我们不向他们有何话说。至于一个本意在报告些文坛消息，而对于中国新的文学运动却怀了好意的编者，我希望这种编者，注意一下他自己的刊物，莫因为太关心到读者一时节的嗜好，失去他们对文学的好意。

二十三年一月七日

本篇发表于1934年1月1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从文。

①《现代》文学刊物，1932年创刊，先由施蛰存主编，第3卷起杜衡参与编辑。

②杜衡 现代作家。

关于“海派”

一月十号第三十二期本刊上，我写过一篇《论海派》的文章，一面说及适宜于概括在这种名词下各种作家的活动情形，如何可怜可笑，一面且提示到由于这类人物的活动情形，所产生的某种风气，又如何有害于中国新文学的健康。从“道德上与文化上的卫生”观点看来，这恶风气皆不能容许它的蔓延与存在，是我那篇文章的本来意思。当提及这样一群作家时，是包含了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因环境不同，两方面所造就的人材及所提倡的风气，自然稍稍不同，但毫无可疑，这些人物与习气，实全部皆适宜于归纳在“海派”一名词下而存在。文章发表以前，我便因事离开了北京，直到一个月后回北京时，方知道这文章使“海派”一名词，重新引起了若干人的注意。在各种刊物上，一个月以来已陆续登载了许多讨论文字。

正值某种古怪势力日益膨胀，多数作家皆不能自由说话的此时，什么人从我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来加以讨论，想得出几个办法；或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的海

派风气，或是从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也未必无小小益处。我很想明白这问题从另一观点上所看到的结论，因此从朋友方面，从图书馆阅报室方面，翻阅了许多陈旧报纸。我希望看到一点别人有理性很诚实的意见。

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皆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的时节，故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有虽然已看清楚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且照流行习气作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所以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他意见可说。对这类文章发表意见的，好像只应当是登载那些作品的刊物编者与会计，别人已不用再提了。

但一个朋友×君来到我住处，同我说到“海派”这个名词下的一切情形时，就告给我：“许多人对于‘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成立吾人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一句话，感到怀疑。”

许多人是谁？自然就是那些为这个名词有所辩解的人！朋友是欢喜注意这些作品的。

我明白这朋友是因为看了那些对于“海派”有兴有感的文字而弄糊涂了的。我告给那个朋友说：

“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①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为的是‘装模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地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这种人的一部分若‘从官方

拿点钱吃吃喝喝，造点谣言’，与‘为自己宣传宣传’，或‘掠取旁人文章，作为自己作品’，生活还感觉过于寂寞，便去同有势力者相勾结，作出如现在上海一隅的情形：或假藉维持社会秩序的名义，检查到一切杂志与副刊，迫害到一切正当独立作者的生活，或想方设法压迫正当商人，必作成把书店刊物封闭接收的趋势。假若照某君所说，这种人由于‘力图生存’应有可同情处，我以为必应当明白这种人对于妨碍这个民族文化的进展上，已作过了多少讨厌事情，且还有些人，又正在作些什么样讨厌事情，方不至于误用我们的同情。”

朋友走后，我想起同朋友×君有相同感想的读者必很多，故记下我这点意见，

二月十七日

本篇发表于1934年2月2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从文。

①《儒林外史》 长篇小说，清吴敬梓著。

禁书问题

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处，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很多；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

“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

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应查禁的书籍到二百种。这真是一个大有可观的数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则已全部被禁止。为什么这些书籍皆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无法从当局的文书法令中弄明白的。这个查禁通告据说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先生们阅读过负责审查的个人，是不是还曾经把这些书籍皆细心看过一遍？我也觉得怀疑。就平常禁止的意思说来，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的。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

切真正属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置。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毫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皆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这行为我觉得真很希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真有“非如此处置不可”的理由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の説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为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①并为一谈。

文学被一些读书人看得俨然异常重大，实有理由可说。这些人照例多是两手空空的，不在其位的，无力无势的。这些人生存到这个混乱贫穷国家中，忍受种种痛苦与侮辱，眼见耳闻这个国家一切愚昧与胡闹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点儿力量，渗进社会组织里面去，使这个民族多少健康一点，结实一点。因为自己所学的是文学，承受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有所努力，也仍然因为自己所学的仅仅是文学，对于目前国家社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解释得照例常常比事实简单一些，凭了文学者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气质，在工作中希望一种奇迹，且因为这种奇迹的期待，各人带着点儿宗教的倾心，与目前这个为“应付事实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间或有齟齬处，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认识这问题比较清楚，便明白处置的方法，不适用于把两千年前的故事重演了。这些优秀公民，原是爱他们自己所在的国家，原并不下于任何官吏的。他们只是个作家，容或昧于法律，却不缺少道德。他们为了努力从事于艺术，使这个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为这个民族的光荣，为这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亲爱”，“勇敢”与“耐劳”，加以铸像似的作品的制作，

很诚实也很穷苦的各自独立分布在国内各处地方，过着极端简陋的日子。政府既从不知道对于这种人加以关切，商人因书业萧条，又对于他们不能不待遇吝啬。他们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于就从不能够从从容容过一天较好的日子，平时吃的住的皆远不如一个南京小部员，病了无法从医生处加以治疗，文章不能出卖又难于寻找其他职业时，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结束在一个最悲惨的死亡里。他们坚苦卓绝的精神，他们轻于物质寻觅而诚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东西！政府不理睬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种人总像放心不下似的，反而不断的来压迫与虐待，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所难了解的！这些人在这种国民生产方十分凋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入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需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流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级的只知独善其身，官吏阶级的贪赃无识，以及军人种种无办法处，加以天真坦白的指摘，正因为那种书生似的天真与坦白，便在作品中加以一点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这意见亦即所谓方向的指示，当他们在作品中作着方向指示时，却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弄成如何偏持幼稚的呼喊！政府若善于安排，真在为民族生命着想，不为个人地位着想，对于这些人的工作，难道还不容易成为同情者与保护者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点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种人为了邀功俸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报告，便对于生在中国这种可怜境遇下的

作者，过分的压迫与摧残，似乎不像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的政府所宜继续采取的政策。就三四年来上海一方面作家所遭遇的过去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乃是毫无所得的。如目前这种处置，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文学在别一国家别一民族中，或者也发挥过某种特别的能力。“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纪那个民族崭新人格的种子，与革命爆发成为不可分离的东西”，这说明自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者口中说来，并不嫌其过度夸张。但多数人若只是单记着这些历史的轮廓，便打量从自己国家自己行为方面产生一页新的历史，就有了很大的问题了。在环境截然不同习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中，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样重现的。把某种已成定型的文学观，移植到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中去时，所需要的修正，将到何种程度，这些理论方能发挥它的能力？在一种被修正的理论下，一些作品又应在何种形式下产生，所侧重的必在某几点，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会革命失去其当然必需的联系？有了这种作品，这种作品对于全盘“活动万变”的政治，究竟算个什么东西，它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从事文学运动者，在一种缺少自由缺少饮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况中，事实上就全无一个人能有暇裕来对于这些问题详细加以研究的。在中国目前这种景况下，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宜于从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离开社会，且应当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间接或直接促进政治的机能，应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时节某一限度内能够发挥它的能力，那种“富于活动性与弹性”的政

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学作品相呼应，这些问题不单求生不遑隐藏在上海一隅的穷苦作家们无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从国库中支取一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传部当差办事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家，三数年来不是还不曾作出一篇稍稍像样的文章吗？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种具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智慧的文学理论者，能作出种有理性有系统的引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欲以唯物论的观念为作品中心，在接受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薄弱，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从违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所有的成绩，也可谓就是予反对者以多少藉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需要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出版物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流行的情形。那些带一点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入恶俗猥亵习气里，较慎重的文学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种作品流入社会里去，固如何影响到青年人，同时这些青年人，却就又将如何受一种恶习惯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一个人若不缺少那点必需的冷静与诚实，对于几年来文学运动在国内发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会把这几年来在数万万饥民中仅仅只限于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所起的作用看得过大了。只因为一面是把一个新的文学观移入中国，缺少必需的修正，一面又因为误认政府目前对于文学的恐怖与厌恶，把现在的革命文学，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价值看得过分重大，即此在上海××作家方面，便有了种种的变迁：原来对于左翼文学具有幻想的，因

明白这方面观念的凝固，发展已有个限制，加上那种要生活而又怕事怕死的意识，便陆续向右转了。又有一些作家，本来一无所谓的，则因为不愿意同这种对文化只知摧残的政府合作，便反而向左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对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在现状下抱残守阙的租界逃亡者，则在穷困与迫害交加中，但知死守残垒，以“顽固”与“沉默”来支撑现状，应付现状。然而这些人所保持的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仰，所取法的却多数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一切现象惟待社会自然的推迁，既不知在一个“不背乎目的”而又“合于环境”的方向中思索出个新的手段与办法，避免无益的牺牲，也不想从十分怕事对于一切现象噤若寒蝉的知识阶级方面有所呼吁。这些人信念与行动中间的矛盾处，既无法可以调和，矛盾的延长，便使多数人对于左翼文学的明日，感到在希望中光明的缺少。即或从国际方面他们还有可以相互呼应处，在租界上最小范围内他们还依然能够存在，对中国前途的利害，不至于如鸦片烟公然的流行，与其他种种现象的可怕，也是极显然的事情了！

近年来大学生中学生左倾思想的普遍，以及对于左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徒认为文学的影响，而忘了社会的那一面，这实在是很大的错误。几年来政府对于青年的措置，实在可以说是“无往不在那里抛弃青年”的一种糊涂措置。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展开，不追求它的真实意义，不欲把这个严重的问题，引用到“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他情形作为说明，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来设一全国青年福利委员会，研究这种极其严重的问题，就只装作聪明解事负责办事的神气，移重

就轻把这问题胡胡涂涂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稍有倾向不健康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似乎是太缺少一点儿理性,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做”了。

多数人所希望的政府,常常是一个能“办事”而且也极“懂事”的政府。因为目前有许多事并不是政府权力能否执行的问题,实在是政府明白如何节制权力或滥用权力,引起国内外有识者对政府同情或厌恶的问题。关于禁书这件事出于中央党部中宣文艺科,或出自国民政府?我们住在北方的人还不知道,若出自中央党部的宣传部文艺科,我不想说什么话,因为这也许就是国民党文艺政策中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一种。(禁书自然也算得是个政策!)但若果这件事出自国民政府行政院与教育部,或行政院与教育部还可以来过问一下,我却希望凡是这一次被禁止的文艺书籍,能够交付一个委员会全部重新加以审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书籍必需禁止,有多少书籍不应禁止。朝野皆可以仍然承认文学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正因为不妨当它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一切皆宜出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本篇发表于1934年3月5日《国闻周报》第11卷第9期。署名沈从文。

① 焚书坑儒 秦三十四年,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下令焚烧《秦纪》以外列国史籍等,并将460多名以古非今的方士和儒生坑死于咸阳,史称焚书坑儒。

《上海通信》附记

本刊上次登载杜秦先生那篇关于南方大众语问题的消息时，我曾另外写了一点从读经到大众语的意见和感想，综括言来约有数点：

- 一，军人提倡读经之无益可笑。
- 二，文白之争争不了。
- 三，白话文转入奢侈化，欧化，乖僻化的原因，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欲勉强找寻一个负责者，数年来翻译宜负点儿责。
- 四，当政者以白话文为洪水猛兽，实愚不可及。拥护白话文者若徒然诅咒历史遗产，“该”弃去的未必“能”弃去。还得研究它，活用它，因为大众语一部分就得从此出来。
- 五，我们老实一点，看看毛病从什么方面起，应怎么样治。我们切实一点，看看先可以如何去做，能够做到什么。

因为提到白话文的问题，提到关于文字普遍化的问题，

以为关于简字，方言，通俗语，以及文字大众化诸问题，我曾说过，北方不能参加讨论，是各人正在注意，研究，故反而不能随便来谈它的。我同时且曾随便举出几个人名与团体名称，我认为他们皆配讨论而不来讨论，原因似乎是“各人涉猎得稍多一点，从事实方面认识得稍深一点，空泛激扬的议论自然也就少了一点。”就我所知随手提出的人名团体看来，顾颉刚^①先生，是正在致力于改编民众读物的。刘复^②先生固然死去了，然而他的死便因为过西北调查方言与民谣。黎锦熙^③先生对于语文的研究，从他的国语辞典编纂工作上，与关于这方面汇集的材料可知大略。定县平教会则数年来即一面调查一面且编辑了若干读物，作为北方民众的实验。他们不敢来“讨论”，实在可以说他们是正在为民众“工作”，故不能放下“工作”还来“讨论”的。

南方对于这些问题讨论得很热闹，在大众语问题上，诚如最近一期《现代》杂志苏汶^④先生所言，各人莫不共同有种向前的意识，虽各在忌讳中不能畅所欲言，然而对现状不满而做的工作，他的发展却实在值得我们的关心。所以我把杜秦先生那篇文章登载出来，希望北方也有人就他所研究的经验和感想来说说。感谢曹聚仁^⑤先生，从上海寄来一封信，说到南方对于大众语问题的新发展，并把这问题的经过有系统的见告，很可补充上次杜秦先生那篇文章的疏忽。因此把来信登载出来，让我们可以多知道一些事实。假若顾先生黎先生及其他对于语文问题正在注意的诸先生，能就他们所注意的问题来说几句话，这刊物的篇幅，是为他们空着的。我个人的意见，却是先想弄明白这讨论究竟是“项庄舞剑”的玩意儿？还是真在本题上设想，对目前中国大众，希望他们

能得到认字的好处与用处？若注意的是前面那件事，这种热闹讨论自然有些影响，但这一片热闹是否赶得上一个好作品来得持久切实？可不能说。若注意的原是后面那件事，我以为消极的使白话文不恶化，应当是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流行的译著加以检讨，积极的使白话文合理化或大众化，研究实验则不可少。若两事原是一事，其实只在希望用文字来推动时代，改造历史，要那个“多数”能使用文字，或接受文字，因而把眼前不合理的一切组织，不应存在的种种制度，修正或推翻。那么，从建设意味说来，还是必需要一些“作品”方能济事的！必有适合于大众幸福的新的作品，方能代替旧的，必有适合于大众理解的作品，方能代替旧的。便是破坏，也只有富于建设性的作品或工具方能真实达到破坏的目的。至于只有诅咒意思的理论，即便是这诅咒如何有毒，也仍然不过成为徒然的诅咒而已，假若我们不迷信符咒，对于这诅咒，我们是应当觉得极其浪费的。

现状下的政府若干经国治民大政，原同下民遇天旱时抬狗求雨无多差别。在这时节辟谬固然为一种工作，然而辟谬并不能落雨，最好的工作还应当是用一个可以实验的科学方法或常识，能把雨水得到。我们嘲笑当前的人抬一只“活狗”或“死狗”求雨，我们也得小心莫尽抬一只“理想的狗”求雨，所以我认为，凡有兴味有见解参加这问题讨论的人，不宜于再拈取一二字句与复古者去争辩文白得失，此其一，也不必支离琐碎（同时因多忌讳终不免矛盾）来争辩说明大众是谁，谁要大众语，此其二。极其紧要的倒是计划如何可以使作者向那个真的大众走去的方法，如何产生新作品，如何修正旧作品，如何制止一般作品的恶化趋势。真的大众语运

动的推进，就全国言，需要许多人博收兼取埋头研究，对于历史语文遗产来加以整理与实验。特就南方言，更需要书业出版者，报章杂志编辑人，文学理论家，文学作家，能够打成一片，来大规模的做起码工作。倘若我们对于整理调查实验各种保守性的建设，认为全不足道时，南方破坏性的建设，尤其是更见得需要。但建设应是去实行可行的“方法”，不是许多高远动听的“理论”。我们既明白五四白话文的发展，不能跟着理论跑，我们也应明白单靠目前几个人泛泛的理论，并不能领导未来的作者，支配未来的作品，使明日新文学走它所应走的路。

曹先生的来信上附了五个小问题，要我答复，我没有如他所希望的来一个“切实的答复”。照曹先生来信所说，认真在讨论的已有“很多人”，这些人一定能把这些问题解释得极清楚。我真希望国内能有“几个人”，在认真“为大众”的原则下，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做去。

二三年八月七日北平

本篇发表于1934年8月1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从文。1934年9月15日《社会月报》第1卷第4期又以《沈从文先生的复信》为题发表。

- ① 顾颉刚 现代学者。
- ② 刘复 即刘半农，现代作家。
- ③ 黎锦熙 现代语言学家。
- ④ 苏汶 现代作家。
- ⑤ 曹聚仁 现代作家。

【附录】

上海通信

——大众语问题的新局面

曹聚仁

从文先生：

当杜秦先生告诉您：“自由谈停止讨论大众语，问题的开展，移到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上”时，局面已有小小的变动，自由谈于八月二日打破七月五日“拟停登”的宣告，重开大众语的讨论。这次重开讨论，由于吴稚晖先生那封复我的讨论大众语的长信而起。北方学术界对于这问题的沉默，先生以为是“各人所涉猎的多一点，从事实方面认识得稍深一点，空泛激扬的议论自然也就少了一点。各人正在注意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故反而不能来随便谈这个问题了。”我看未必，最大原因还是对于这问题的隔膜。

关于大众语问题提出的经过，一般的记录很多错误的，杜秦先生也有点说错。今年六月间，南京方面的复古空气非常浓厚；文言复兴，读经尊孔的口才，有汪懋祖，许梦因那些文言遗老喊了出来。汪懋祖的文章，见于《时代公论》，许梦因的《文言复兴之自然性与必然性》，见于《中央日报》。反对这倾向的，始于南京《大华晚报》的副刊暮笈。暮笈刊

出了周曙山驳斥许梦因的文章，就有人警告大华社长，不许再刊这类文章，终因周曙山身为立法委员，警告者才无辞而退。其时《大公报》南京通信，已有文言复兴成为一个大运动的说法，这情势，和章士钊办《老虎报》时有何不同？当年，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吴稚晖的《友丧》，《读经救国》，钱玄同的《甲寅与水浒》，徐志摩的《守旧与玩旧》，何尝不是激扬的议论？请问，谁忍在这个情势之下沉默下去？

上海方面的反复古运动，起于几个关心语文问题的人。有一天，乐嗣炳先生往访陈望道先生，晤谈中说及复古倾向的可怕，想邀同一些关心语文问题的人联合发一反对文言复兴的宣言。第一次参加讨论的，有陈望道，胡愈之，叶圣陶，夏丏尊，傅东华，黎烈文，黎锦晖，王人路，乐嗣炳，陈之展，魏猛克和我，共十二人。还有陶行知赵元任两先生不及参加讨论，而同意于这宣言。宣言底稿，由陈望道先生起草，除表示反对文言复兴，还提出语文学合一的积极主张，那草案定名为话语文学运动宣言。第二次集会讨论，在加厘饭店，在新雅酒楼，剧辩了四五点钟。关于消极方面，彼此意见颇能一致，关于积极建设，彼此主张各有出人。后来大家以为语言文字的改革，乃是社会大众的事，我们只能把这问题诉之社会，看大众对此有什么意见。并且学术上的问题，愈讨论愈能精密，我们不必闭门造车。乃由傅东华先生提议，定名为“大众语文学”，同时又决定几个基本原则：

甲、 消极的

- a, 反对文言文僵尸复活，
- b, 纠正五四空洞粗疏的文学革命，
- c, 反对以文字以观念为游戏的态度，

d, 反对代表封建意识的文学,

e, 反对头巾气的语录体。

乙、积极的

a, 提高大众的语文水准,

b, 建设大众意识的文学,

c, 创造新语汇简笔字及音标,

这次讨论大众语, 彼此步伐, 可说十分整齐。各人署真实姓名, 表示绝对负责。各人依据原则来发言, 问题的各方面, 差不多在那几篇短文都已一一提到, 这并不是“不常在刊物上执笔的作家都来提供意见”, 乃是知识分子精神合作的一种表征。假使要沉默的话, 这十二人中, 至少有十人愿意沉默的, 但是责任心叫他不能沉默, 不忍沉默。

自大众语问题投向社会以后, 在南方可说是非常喧闹的, 有五种附刊八种定期刊物在讨论这个问题。所讨论的种切, 杜秦先生已约略提及, 不再赘述。近日因为我提出五个小问题, 吴稚晖先生来了一封长信, 展开了另一新局面。吴先生的意见, 可分五大项。

a, 文言一时难得完, 也是实在的; 说它会什么复兴, 再来代替白话, 都是笑话; 并且是铁树不能开花, 同样的可以肯定。

b, 文言、白话、大众语, 也是工具, 有容易普遍、或不容易普遍之分……白话比文言容易普遍, 大众语一定比白话更容易普遍。若一说到文学, 恐怕文言白话大众语, 一样的止是少数吧。……在工具方面说, 白话自然优于文言, 因其容易普遍。然而一到文学, 便乌烟瘴气; 文言的好文学, 如袁中郎的小品文, 止供象

牙塔里人消闷，而白话文学的好的，亦不过供亭子间里朋友排闷而已。其多数的怪物，简直在大众都莫名其妙，与古文观止一样。所以兄弟愿意贡献的；不要建设了大众语，跟着便是大众语文学。

c, 到大众教育普及时，由大众中的能者来理出一个头绪来；等弄堂里的瘪三又需要有弄堂消闲品，再让他们来创出大众文学。不要又经今日的文人学士，铁青了面孔，立文例，创语汇，好像大众应当来受我们的钦定。

d, 大众是纵的，指向多数阶级说话，慢慢连到横的方面，一人说话，可以使四百兆大众一齐明白。四百兆大众一齐懂得的，是叫统一语，不是现在第一步急需的大众语。僚侬也有大众，阿拉也有大众；僚侬的大众，把僚侬的语文合一起来。阿拉的大众把阿拉的语文合一起来。僚侬的大众，与阿拉的大众，有了合一的语文，又互相合一起来。一种的统一语，还让大众来造成。

e, 我敢下断语，以答曰：“文学不死，大祸不止。”好了，大众语万岁！若大众语文合一了，写点粗浅的科学工艺文出来，惠及大众的饭碗，尤其圆满。

这封长信，在最近的自由谈上将有更热闹的讨论。《文学》三卷二号，因为吴先生否定了《文学》，也有许多作家在写辩论的文章。此外，上海《社会日报》自第三号起，特辟大众语问题栏，已有鲁迅，吴稚晖，陆衣言，赵元任，姜伯韩诸先生发表意见！这问题，由于各方面的从事注意，或者会有好的结论，亦未可知。我诚恳地请求北方学术界，莫再

矜持了，即算南方学术界是空虚浅薄，有切实研究的更该发表一点切实的意见！我的五个小问题附在这儿：

“一、大众语文的运动，当然继承着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而来的；究竟在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

二、白话文运动为什么会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

三、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知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

四、大众语文的建设，还是先定了标准的一元国语，逐渐推广，使方言渐渐消灭？还是先就各大区的方言，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逐渐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国语？”

五、大众语的作品，用什么方式去写成？民众所惯用的方式，我们如何弃取？”

自然，更希望先生给我一个切实的答案：此颂著祺

曹聚仁敬上

编者复信

莲生先生：

来信并大作皆得到，谢谢。文章甚好，极佩卓见。不过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同许多人一样，并不明白它的根本所在，在某一点。故论旨与编者所见，似乎稍稍不同。关于“大众语”问题，“大众语文学”问题，题旨甚泛，综括而言，应为下面二事：一为反文言复兴运动，一为反封建专制运动，前者可算得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后者可算得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上海方面的热闹，编者在前两期中有点意见和感想，且结论以为“这讨论若徒作大言，并不能同实际的文字改进或大众利益有何关系”，但既有人讨论它，对于这问题被人注意却认为也是好现象，不过希望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莫离题太远，且就事论事，效果也会好些罢了。上海方面说话大不容易，各受箝制，各有忌讳，在箝制忌讳中不能畅所欲言，一提到为大众或得到大众时，常有矛盾，实为自然的道理。从这矛盾中觅疵摘瑕，或评论，或嘲笑，自以为有理性能持中而无偏见的，大有其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先生抓定

“大众”二字，言之虽能成理，但不能与问题核心接触。对于这个运动先生若能“通其意而不至于为名辞所蔽”，认为大众语讨论是一部分关心这个被毒物与其他恶势力充满国家的人，想从这问题在国家出路上贡献一分意见，做出一点事业，那么，持论或者就可以稍稍不同了。若先生如捏定“大众”二字，毫不放松，必循名责实，那真过于天真而且似乎有点憨态了。幸好所注意的为“大众语”，尚能辞而辟之，若一对“政治”加以注意，岂不今日发疯明日自杀？先生对彼不发疯自杀，对此却欲纠谬理惑，就可知先生还不知“文学运动”的另一意义。多明白一点，作文章时所选择的题目岂不就不同一点吗？敬此复颂大安。

编者敬启

本篇发表于1934年8月29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7期。
署名编者。

【附录】

从宇宙苍蝇到大众语

莲 生

近来文坛上似乎太着重“写什么”这个问题了。若依知堂老人说，怕又是言志派同载道派打架的老把戏，所以区区苍蝇也会同庞然的宇宙对起阵来。依我看，文坛上原不该有这场厮杀，文学是不拘于什么道与志的。正如孩子底父母为孩子的食物争论，却不知孩子吃牛乳或代乳粉都可以。文学这孩子原是好胃口，吃宇宙固然吞得下，嚼苍蝇也未必坏肚皮，应当还不至于势不两立，诸位先生也正不必过于介意。

或曰：“因为文学该把握现实，所以一定要人写什么”这大是不通之论。只讲“现在”是无法讲的。现在只是时间，不得单独存在。要想讲它，不能离开空间。所以，有北平底现实，有上海底现实，有古北口底现实，有莫斯科底现实，英伦银行经理室内有一个现实，苦雨斋里也有一个现实，这毕竟该用那个作标准？正如百米竞走，一声枪响，十腿齐飞，其间自有快慢之别。如果学校不把最好的学生打六十分而让其余都不及格的话，那么人人都该有表现他自己的权利。一定要人“遵命”或勒令非写罢工不可，都不免有要“统制”

或“垄断”什么之嫌。

或又曰：“现实有广狭。我们要广大的读者，所以要写广大的现实”。是！这大概是“大众语”问题之所以被提出了。你且听我说，写文章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这种文章销路之广否，全视其友之多少而定，所谓“公诸同好”是也。另一种则是要广大的读者，换句话说，就是要买我书者多，读我书者多。这两种态度毕竟那个正确，还是都可以，姑置不论。单就取后面态度的来说，首先应知道的该是我们底读者是谁。这很容易解答，前些时某报有副刊上说过：“别看现在文坛上人很活跃，其实作者同读者，不外是大学教授大学生，中学教员中学生”（原文大意如此，可惜作者被我忘记了）诚然诚然。所以问题很简单，读者数目的极限，不过是这四种人数之总和而已。大概是觉得自拉自唱自作自卖太无趣了，所以要“更”广大的读者。

其实问题底中心全不在此，要是写文章只为发泄发泄，则读者之多少实在无大关系。要想多赚钱，或想文章有些力量，多刺激些人。那就又有两个问题：也许是写得不好，也许是写出来人家不懂。书已经卖出不少了，而没有回响，大概是不好底成分居多。上段所说的四种人，应当是看得懂的读者了，究竟有没有影响呢？如果还不曾觉得自己底东西十分满意，那还是回去再写一写的好。至于乡农工人何以不买我的书，那一半是由于他们没钱，更没有买书的“闲钱”。另一半原因，更好明白，那是因为教育没有普及，他们常识不够。——自然，常识是很难与以范围的。可是，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农工大众常识是太缺乏了，他们还不晓得日本国是

在那儿呢，——鲁迅把直立着的小脚妇人比做两脚规，我们觉得很像了，可是“大众”还不晓得什么是两脚规，读了自只会觉得漠然。不要说写文字，就任选上面四种人中的两个人在一处谈论——“天气好”等一类话不算——请一位老农旁听，也照样有许多话他听不懂。

所以，问题还是两截，要想出没文坛，只有努力往好处写，要想拉住大众，非“到民间去”不可。事实具在，抓着象尾巴发半日伟论，终是于事无补的呀！

新文人与新文学

五四以后中国多了两个新名词，一个是“新文学作家”，一个是“新文学”。所谓新文学，就是的呢吗啦老古董一见摇头的文学。直到如今新文学虽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能够使那些从前摇头的点头，不过一群新文学作家，在这十年来，可真是出够风头了。“文学作家”在青年人心中已成为一个有魔术性的名词，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名词不知毒害过多少青年人，使他们皆得了极其厉害的神经衰弱症，有业务的搁下业务不理，正求学的抛开书本不读，每天在一堆流行杂志里研钻“浪漫”“古典”“象征”“幽默”字眼儿里，白白的糟蹋掉他们那些宝贵的生命！这些大有影响于青年人的文学作家，其实大多数皆只宜称呼为“新文人”。就因为从前旧文人的恶德，既可以在他们身上继续发现，现社会的恶德，在他们身上也更富于传染性。

一个新文人的特征是：“活下来比任何一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别少。”

这些人照例多少知道一点中外古今文学名著，同时还记

起一些中外古今文坛掌故。各有一张口，好说空话，又会说空话，（对于吃肉喝酒自然也不委屈自己）。看事既朦朦胧胧，作事皆马马虎虎。有些自命风雅，就轻视身边一切活人生活，以为那是“俗物俗务”。有些平常时节读点诗歌小说，放下书时，便自作多情，不免装作无聊失意样子起来。他们照例皆害怕同真实社会对面，不愿受社会规律束缚，因此全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赞同者。然而个人自由主义者每天总仍然得穿衣吃饭，在穿衣吃饭问题上又不能不同那个丑恶俗气社会对面，迨被种种事实围困、打倒、不能振拔自救时，于是便烦恼悲观，不知如何是好。嫌白日太长，无可消遣，即邀约三四同志，打打麻雀牌或扑克牌。嫌夜里太静，睡不着觉，又不妨上舞场去玩个半夜。（胡闹自然有理由的，因为翻开任何大作家传记，皆有前例可援！）有些人玩也不玩，动也懒动，孤僻寂寞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每天便在家中灌个半斤烧酒，写个十首歪诗，十篇杂感。……也许还有为人更聪明更洒脱的，或尚能想方设法，使用都市中种种腐烂身心的玩意儿，来作腐烂自己的行为。

一个教授，一个学生，一个公子哥儿，一个小瘪三，目前只要他本身住在大都市中，有志作这种文人，他就可以找寻机会，令旁人承认他为文人，或自称为文人。既作文人后，就过着如上所述委琐猥褻的新文人生活。这些人身分尽管相去天远，见解趣味，却常常极其相近。他们照例对于社会上许多事情皆不明白，许多人生必需常识皆极其缺少，许多严重现象皆漠不关心。怕责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隐逸淡泊相高，或以放僻邪侈为美。（若有人指摘到这一点时，他们自会援引典籍，保护自己，由于设辞巧妙，反而能令一般人十分

同情。)他们既在那里“玩”文学，认为文学只宜那么玩下去，又潇洒，又自由，还必需如此方不至于失去它的庄严。总仿佛国家社会皆不能缺少这种消闲文学同游荡分子，若稍稍苛刻他们，希望他们在生活态度上与作品上负上一点儿小小责任时，就褻渎了文学，误解了文学，因此一来，文学就再不成其为文学，国家社会同时也就再不成其为国家社会了。

十年来这种新文人日见其多，却用不着为他们作品过多发愁。这些人虽称为“文学家”，终日尽管批评、造谣，在酒食场中一面吃喝，一面传述点自己雅事别人俗事，用文学家名分在社会上作种种活动，受青年人崇拜同社会供养，事情说来很希奇，有些人既不曾在过去某一时节认真写过什么作品，甚至于在将来也就决不会写个什么作品。他们其所以成为新文人，大多数倒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消息，在新出报章杂志上，差不多随处皆可以很夸张虚诞的登载出来。他们原是从这方面成为文人的。

一个新文人既那么潇洒自由，令青年人神往倾心，也不是无理由了。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呢。无论如何应当与新文人是两种人。第一、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品，一点成

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

这种人也许是个乡巴老，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思想信仰也许同现社会制度习惯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这种人缺少新文人的风度，缺少新文人的生活，算不得他的耻辱；他不一定会喝酒打牌，不一定常常参加什么会，不一定是个什么专家，不一定有“学位”或讲座。他观察社会，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得了文学上各种技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得的成果；他决不如某种有“学位”的文人，仅仅以能够摹仿某某名作写得出一首诗一篇小说就沾沾自喜。他不善摹仿，必得创造。（创造需要胆量同气魄，是的，他就不缺少胆量同气魄！）工作失败了，他换个方式再干；成功了，也仍然换个方式企图更大的成功。

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们心中燃烧，他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假若每个文学作品，还许可作者保留一种希望，或希望他作品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以因它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或希望他的作品能令读者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一些，作人更合理一些。他们的希望容或有大有小，然而却有相同的信仰，就是承认人的个体原是社会一部分，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猥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种新的限制，

使它向康健一方面走去，实为必需的情形。一个不自私的现代人，假若他还有眼睛，还能够用眼睛看看书本以外的一切，就不至于觉得把文学赋予这种限制有何种可嘲笑处。他们不怕嘲笑！

社会的流行风气，常常奖励到一些装模作样的新文人，常常奖励到一些懒惰与狡滑东西，这不希奇，因为无限止的容许新文人轻浮与猥亵，读者也就可以满足个人轻浮与猥亵的嗜好。但因此一来另外想把文学加上一种崇高的责任的文学者，自然就见得俗气逼人，见得荒谬绝伦了。这种人一面将受一般社会的奚落，一面还不免为病苦，贫穷，以及各样恶势力所迫害，不是很悲惨的死去，就只得在逃亡沉默中勉强挣扎。这种人不特缺少新文人的潇洒与风雅，有些人甚至于想勉强活下去也办不到。若将这种人同新文人去比较看看，两者相形之下，也就可以明白这所谓“从事文学”的工作，真是一种如何枯燥无味困苦艰难的工作！

一个大学校的文学教授，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或是一个薄负时誉的文学作家，必皆常常被青年人用书信或当面提出一个问题：“先生，我对文学极有兴味，我有志于文学，怎么样我就可以做个文学家？”这些青年人虽说有志于“文学”，大多数或者还只是有志作“新文人”。因为一群新文人的好处，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一群有远见的文学家，十年来所遭遇的忧患，照例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

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世界

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种人才算得是有志于“文学”，不是预备作“候补新文人”的。

一月三十 北平

本篇发表于1935年2月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37期。
署名沈从文。

谈谈上海的刊物

许多人谈到近年来文艺杂志，都觉得太多了点，笔者意见却以为近年来杂志多，文艺杂志并不多。够得上称为文艺杂志，且愿意好好的办下去的，依然寥寥无几。

杂志多有两个原因：一是杂志范围性质宽，内容杂，能广泛的吸收作家，也能广泛的吸收读者，容易办。二是上海方面要作生意的书店多，要写文章的作者多，不新起炉灶不成。三是作官的个人或机关团体为了某种原因，也办杂志。但许多刊物皆随起随灭，有些被查禁，停了；有些支持不下去，三两月又自行歇手了。因此杂志虽然多，能继续生命到一年以上的却仍然不多。尤其是文艺杂志，有些出创刊号时就先作声明，刊物是凑成的。这自然有个理由。把它办得如理想那么好，名作家全部上台，不可能。照理想那么去办，要某一类作家出场，常有阻碍，不能存在。尽某一类无名作家出场，对读者不能发生信仰，也难存在。

办杂志出版人必有个目的，就是要有销路（官办的除外）。这是很自然的事，无可非议。不过单从销路着眼，说来

还有个区别。譬如开明书店出的《中学生》，与另外一个书店出的一种画报，同样有五万份销路，谋出路的态度或方式是显然不同的。《中学生》杂志许多大学生还应当看看，因为它上面有许多文章，值得全中国学生注意。好些画报却不宜多花钱购买，因为除了杂乱刊载一些相片，别的毫无所有。办杂志编辑者自然也有个目的，就是使刊物在社会上发生一点意义，产生一些价值。但作同样打算的编者，各人所有的态度同所用方法，也就大不相同。譬如说生活书店的《译文》，同论语社的《论语》，就代表两方面的例子。《译文》销路据说并不多，然而是个值得注意的刊物。它的内容纯载译文，每期总有几篇文章，读后留下一个印象。至于《论语》，编者的努力，似乎只在给读者以幽默，作者存心扮小丑，随事打趣，读者却用游戏心情去看它。它目的在给人幽默，相去一间就是恶趣。虽在同一书店，办的杂志也常常不同；即以生活书店而言，所出的《国际知识》它告给我们读者的知识并不多，但确是国民很需要的知识。至于《太白》，就不同了。《太白》是注重小品文的，比《论语》健全一些，却同样琐碎芜杂。

上海最多的是画报，定价从两毛到五毛，据说这些画报主顾皆在广东南洋。办画报的大致皆注意“销场”，不过问画报在销行以外的“影响”，所以皆能够办得“热闹”，却不容易办“好”。这种刊物在物质上即或成功，在精神上却失败了。因为它的存在，除了给人趣味以外别无所有。读者多，若无一个健全目的，便等于出版人与读者合作，在那里耗费外国纸张铜版那么一件事了。

画报中有漫画刊物，正同杂志中有幽默杂志一样。近年

来漫画杂志很多，它代表一个倾向，就是普遍的讥讽这个社会人与事。讥讽易触忌讳，因此一来，这类刊物却常常用一个小丑身分存在于读者间了。它同幽默杂志有类似处，本身原为一根小刺，常常向社会各方面那么一戳，内容有时过于轻浮，效率有时只能打趣。其中较好的为《生活漫画》。

杂志载时事消息，载论文；政治经济艺术文学合冶一炉，态度是庄严的，内容是无限制的，刊物中《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皆还不坏。《新中华》比较差一点，惟文艺部分稿却多些。改组以后的《现代》，也那么杂，要办好恐怕不容易见好。这种杂志能不能办好只在编者地位与拉稿逼稿能力。纵好也不易见好，就因为它是真的“杂志”。这种杂志也有用周刊形式出版的，《华年》是比较好的一种。

刊物中有新创一格式的，为《科学画报》这种刊物，小学生中学生读他很好（其实艺术杂志也应当有人肯试那么来办一个）。它好处在“通俗化”，在“浅”。它坏处在定价高。（应当定价一毛钱或六分钱左右，不能再多！）因之内容通俗销路却难通俗。

杂志中我最先提到却在最后方能来谈它的，是纯文学刊物。说起文学刊物，有四种刊物已不存在，我们还记得它。这四个刊物名称是：《小说月报》、《创造》、《新月》、《现代》。我们记得它名称，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些成绩（它们的寿命长短自然也有关系）。另外是它能吸收许多作家，支配许多读者。这种刊物现在还多，却只有《文学》杂志比较引人注意。我们很希望多几个这种刊物。虽有种种原因，这种刊物不容易出现，不容易支持，这种刊物多有一个，它的好处至少可以补救三个诙谐小品刊物所产生的坏处。这种刊物目前

在希望中生长的，有一个《创作》，薰风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李郑英；《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施蛰存；有个《新小说》，良友公司出版，编辑人郑君平；有个《星火月刊》星火艺社出版，编辑人杜衡、侍桁、杨邨人。（又听说《现代》也将恢复，且仍由《现代》前编辑施蛰存负责。）《创作》方出第一期。《文饭小品》编者能努力，且知所以努力，刊物有希望。惟编者若放弃与《人间世》抢生意的名称，不走小品一路，使刊物性质保持昔日《现代》杂志形式，也许更容易办好。新小说应改良，尤其是应把不三不四历史故事去掉。《星火》有生气。这刊物有两点与一般刊物不同，一是短评，注重在指摘与揭发文坛当前的形势，有些什么可笑的人正在作些什么可笑的事；二是登载新人创作（这些人名字比较生疏，文字却还好）。不过这刊物引起读者注意若果只是前面一件事，即短评与文坛偶语，这些文章皆针对着一个目的，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一个术语，便是“争斗”）。刊物若尽靠这种争斗支持，他的命运就不会好，不应好。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也可以说是文学杂志，但限制在小品一方面发展的，《人间世》是好些这类刊物值得说说的一个。它的好处是把文章发展出一条新路，在体制方面放宽了一点，坏处是编者个人的兴味同态度，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郎中”^①，且承认小品文比任何东西还重要。真是一个幽默的打算！编者的兴味“窄”，因此所登载的文章，慢慢的便会转入“游戏”方面去。作者“性灵”虽存在，试想想，二十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那里还能有这种潇洒情趣，那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这类刊物似乎是为作者而办，不是为读者而办的。读者多，那是读者不长进处，读者不明白自己处。

本篇发表于1935年8月18日天津《大公报·小公园》，署名炯之。

①“袁郎中”即袁中道，明文学家，曾任南京吏部郎中，故有此称。

新诗的旧账

——并介绍诗刊

诗的用处照古义说是“言志”，照如今解释是“抒情”。诗可以分成许多类，单说中国诗，就内容言有风雅颂^①，就形式言有律绝五七言等等，它的存在却有个共通的意义，不外乎用文字从一种限制里描写一件人事，或表示一个意见，一点感想。“诗”这个字在古今中外含义尽管不同，然而把它同散文比较，也易明白。它似乎极重“经济”。它的成立是少有点限制的。它必需以约见著，用少数文字求多量效果。它与散文分别就在此。诗要效果，词藻与形式能帮助它完成效果。惟一切事物皆在时间洗炼下失去光色，词藻与形式，在一段长长的时间下也会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在变动中有“新诗”，同旧诗对立的新诗。

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新诗作者自然不能独在例外。不过新诗当时侧重推翻旧诗，打倒旧诗，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无所谓，只独具一种倾向，否认旧诗是诗。受词，受曲，受小调同歌谣影响，用简明文

字写出，它名字叫“自由诗”。那些诗，名副其实，当真可以说是很自由的。

新诗在革命意味中发展，便仿佛特别容易作。凡有勇气执笔的人几几乎都可以写诗，一切刊物必有诗。当时被称为文化先驱的新人，在新风气下尤不能不写诗。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朱经农、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任鸿隽、沈玄庐、戴季陶、傅斯年、罗家伦，把这些人的姓名，同新诗并举，如今看来似乎有点幽默了^②。然在五四前后，这些人是常常写新诗的。正因为当时大家都肯天真烂漫写新诗，所以新诗能引起社会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应当明白。正因为张三李四都可以写新诗，所以初期新诗就数量言，成绩真不差。就质言，说苛刻一点，多数诗都太杂乱，太随便。胡适之是第一个写新诗出新诗集子的作家。冰心会写短诗，被称为“女诗人”。俞平伯、康白情，会写长诗，那些诗当时多被中学校选作国文课，为青年人所熟习。这几个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得是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功臣，值得我们记忆。

新诗既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写出几几乎全可以称为诗，作者鱼龙百状，作品好的好，坏的坏，新诗自然便成为“天才努力”与“好事者游戏”共通的尾闾^③。过不久，新诗的当然厄运来了。多数新人对于新诗的宽容，使新诗价值受了贬滴，成就受了连累；更多数的读者，对新诗有点失望，有点怀疑了。

稳定了新诗的社会地位，是稍后一时另外一群作者。宗白华、梁宗岱、王独清、刘梦苇、冯至、饶孟侃、于赓虞、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一群作者中，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四个人特别有影响。写诗胆量大，气魄足，

推郭沫若（他最先动手写长诗，写史诗）。朱湘是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在新诗格式上的努力，在旧词藻运用上的努力，遗留下一堆成绩，其中不少珠玉。徐志摩诗作品本身上的成就，在当时新诗人中可说是总其大成（他对于中国新诗运动贡献尤大）。其中有一个作者，火气比较少，感情比较静，写作中最先能节制文字，把握语言，组织篇章，毫不儿戏的在韵、调子、境界上作诗，态度的认真处使新诗成为一种严重事件，对以后作者有极好影响，这个人是闻一多。

新诗有个问题，从初期起即讨论到它，久久不能解决，是韵与词藻与形式之有无存在价值。大多数意思都以为新诗可以抛掉这一切（他们希望各有天才能在语言里把握得住自然音乐的节奏），应当是精选语言的安排。实则“语言的精选与安排”，便证明新诗在词藻形式上的不可偏废。这问题到了上述几个作者时，是用作品或理论表示的很明白的。

新诗到这时节可以说已从革命引到建设的路上，在写作中具有甘苦经验的，渐渐明白新诗既不容易作，更不容易作好；用新格式得抛弃旧词藻，内容常觉得“浅”、“显”，用旧词藻又不能产生新境界，内容不可免堕入“熟”、“滑”。作者比较先前自然显得寂寞多了。玩票的诗人已不好意思再来胡乱打油凑热闹。原来对新诗有狂热的，一点儿抒情气分或随年龄衰歇了，或被生活压瘪了，或读好书太多羞于下笔了。死的已死，不死的又或经商作宦，办党教书。中国新诗运动，仿佛也就停顿了一时。国内被称或自称“诗人”的虽日见其多，其中且有“革命诗人”，“革命女诗人”，真在那里傻头傻脑写诗的，倒并不怎么多。书店印出的单行本诗集很多，那些作品或许得在“诗”以外找寻一个名称比较妥当些。

这种消沉酝酿了稍后一时的热闹，少数还不放下笔杆的作者，与一群初从事写作的新人，对“诗”的观念再有所修正。觉得先一时“自由诗”所表示的倾向同“建设的新诗”有点冲突。大家知道新诗得要个限制，在文字上，在形式上，以及从文字与形式共同造成的意境上，必需承认几个简单的原则。并且明白每个作者得注意一下历史，接受一笔文学遗产（从历史方面肯定“诗”是什么，得了遗产好好花费那个遗产）。孙大雨、林徽音、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算得是几个特有成就的作者。这些人完全不是理论家，却用作品证明“新诗不是无路可走，可走的路实在很多”。几个人的作品同时还说明“过去一时在大众化（初期文学革命与后来政治革命）口号下产生的许多新诗，如何毁坏了新诗的前途。要建设新诗，新诗得有个较高标准！”这标准在什么地方？几个作者是各以个人风格独具的作品，为中国新诗留下了一个榜样的。他们作品并不多，比较起来可精得多。这一来，诗的自由俨然受了限制，然而中国的新诗，却慢慢的变得有意义有力量起来了。

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说极其不幸。如从小说看看，二十年来作者特别多，成就也特别好，它的原因是文学彻底商品化后，作者能在“专业”情形下努力的结果。至于诗，在文学商品化意义下实碰了头。新诗标准一提高，新诗读者便较少。读者较少，它的发展受了影响。因之新诗集成为“赔钱货”，在出版业方面可算得最不受欢迎的书籍。凡是单行本诗集差不多全得自费出版，凡是专载诗歌刊物总不易支持一年以上。渐渐的，作者歇手，不欲歇手的纵有兴味写作也无多大机会写作。余下几个不三

不四的诗人，写点不三不四的诗歌，这里寄寄，那里投投，以至于一切文学刊物的编辑人，都不大愿意登载诗歌。新诗的命运，真似乎不得不告结束了。

有人从“文学商品化”着眼，从“新”着眼，以为诗的出路闭塞，或与诗本身“不新”有点关系，“说革命，革不彻底；说建设，建设方式不妥当”。于是鼓起勇气再选新路走，这种工作由上海《现代》杂志上的几个作者启其端（施蛰存……），南京土星笔会几个作者随其后（常任侠、汪铭竹……），此外北京、广州，都有这种诗人（林庚、金克木、侯汝华……）。他们的工作是捕捉眼前的都市光色，与心中一刹那感觉和印象，来写小诗。努力制造意境，属词比事则注重“不落窠臼”。正因为工作只是掠取大千世界一小片，一小点，不乏小巧玲珑的佳作。惟作者要新，嫌笔下符号不够运用，结果把语体文已不常用的“之乎者也”虚字，“然而于是所以”等等名词，也统统搬入诗里去。文字上的“复辟”，恰好又是把诗歌中最妨碍诵读的虚字加入。与海上明人小品文集的翻印，半文半白幽默文的流行，风气相汇，因此新诗又好像很容易作，诗人和诗又日益加多，所谓诗，大多数也自然而然成为不可理解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几个比较好的作者，写作的态度虽极诚实，在忠于个人感觉的目的下努力，不免有南粤上^④赵佗说的“老夫聊以自娱”的趋势。这因为他们所走的路并不“新”，只算得是一条“僻”路。走僻路，成就不容易大，那是很显然的。

就目前状况说，新诗的命运恰如整个中国的命运，正陷入一个可悲的环境里。想出路，不容易得出路。困难处在背负一个“历史”，面前是一条“事实”的河流。抛下历史注重

事实（如初期新诗）办不好，抱紧历史不顾事实（如少数人写旧诗）也不成。有人想两面顾到，用历史调和事实，甩去一半担负再想法涉水过河，因此提倡“本位文化”。倘若这个人真懂得历史，认清事实，叫出“本位文化”的口号，也并不十分可笑。如今之乎者也的新诗，近于诗的本位文化具体化，看看他们使用之乎者也的方法，就可知道他们并不大懂历史上这些字眼儿的轻重。新诗要出路，也许还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也许得回头，稍稍回头。

新诗真的出路同国家出路相同，要的是有人能思索，能深刻的思索，能工作，能认真来工作。认定“洛阳桥不是鲁班一天作成的”，把完成的日期延长一点，又明白“洛阳桥终究是人作成的”，对工作有信心，有勇气。只要有人肯埋头苦干、人多手多，目前即或不成，对于“将来”依然应当乐观。

要有个“好的将来”，必需要有个“目前”。目前新诗不妨说还在试验中，可走的路甚多，从各方面皆可努力。可是若没有个试验的场所，来发表创作，共同批评和讨论，中国新诗运动不会活泼起来，那个将来太渺茫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副刊上，从上期起出一个诗刊，每月预备发稿两次，由孙大雨、梁宗岱、罗睺先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佩弦、闻一多、俞平伯、朱孟实、废名、林徽音、方令儒、陆志韦、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徐芳、陈世骧、孙毓棠、孙洵侯、曹葆华诸先生。这刊物篇幅虽不大，对中国新诗运动或许有点意义，因为这刊物的读者，是本报分布国内外十万读者。编者的希望，不在十万读者永远成为少数作品的鉴赏者，却想这刊物能引起多数读者的注意，从国内外各处地方把诗寄来，把个人对于新诗意见写来，让它慢慢

的成为中国读者最多，作者也最多，同时还为多数人最关心的刊物。内容不好，大家想办法要它好；什么问题值得讨论，多数对于这个问题有卓见有研究的人同来讨论；能够这样，这刊物才会有意义，才算得有意义。

十一月三日

本篇发表于1935年11月1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40期，署名上官碧，副题之《诗刊》，指《大公报》之诗特刊。

① 风、雅、颂 均为诗六义之一，又为诗篇之异体，分指不同诗歌类型。

② 这里是说上述诸人，虽各有所成就，其长处却均不在诗。

③ 尾闾 古传说中海水所归之处

④ 南粤土 南粤，应为南越。

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

近几年来，如果什么人还有勇气和耐心，肯把大多数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流行杂志翻翻看，就必然会得到一个特别印象，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也差不多。有时看完一册厚厚的刊物，好像毫无所得；有时看过五本书，竟似乎只看过一本书。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种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这个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大都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却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逐时髦，所以在作品上把自己完全失去了。一个作品失去了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匠心，还成个什么东西？这问题，时代似乎方许作者思索！

提起“时代”，真是一言难尽。为了追逐这个名词，中国近十年来至少有三十万二十岁以内的青年腐烂在泥土里。这名词本来似乎十分空虚，然而却使青年人感到一种“顺我者生逆我者灭”的魔力。这个名词是作家制造出来的，一般作

者仍被这个名词所迷惑，所恐吓。因这名词把文学作品一面看成商品的卑下，一面又看作经典的尊严；且以为能通俗即可得到经典的效果，把“为大众”一个观念囫圇吞枣咽下肚里后，结果便在一种莫明其妙矫揉造作情绪中，各自写出了一堆作品。这些作品陆续印行出来，对出版业虽增加了不少刺激，对读者却只培养了他们对新文学失望的反感。原因在此：记着“时代”，忘了“艺术”。作者既想作品坐收商品利益，又欲作品产生经典意义，并顾并存，当然不易。同时情感虚伪，识见粗疏，文字已平庸无奇，故事又毫不经心注意安排。间或自作聪明解脱，便与一种流行的谐趣风气相牵相混。作品“差不多”于是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命定。虽“时代”这个名词，在青年读者间，更发生一种特别作用，造成读者与新书密接的关系。但这个差不多现象，纵不至于引起读者的嫌恶，对于读者无多大的益处，看来却简单明白之至！许多作者留给我们的印象，竟像是在那里扮凶恶的屠户，演诙谐的丑角，对于所扮演的角色，对他十分生疏，极不相宜，勉强作来，只为的是赶逐风气。许多作者留给我们的印象，竟像是所有工作，并不曾在用脑子思想某一问题，不过是送脊髓在反应某种活动。这世界单凭一条脊髓就够他活一辈子的人，原来很多，毫不出奇。不过如果一个作家，生活都如此简单，说起来并不可笑，实在可怕！

想明白“差不多”的事实，我们不妨找寻一个近例来看看。大家都知道最近俄国死了一个高尔基。这个人生存时，中国据说就有一个人自称为高尔基专家，有无数高尔基崇拜者或爱好者。人一死，大家自然就忙起来了。这里出一个专号，那里印一个特刊，可是倘若有个好事者，试把各种纪念

文章汇集起来看看，就会看出原来所有文章都差不多。从表面看是一致颂扬这个为人类奋斗的战士，对其死亡表示尊敬与伤悼。然而这“一致”处恰好也就说明所有作家对于这个死者的毁誉褒贬，来源差不多，全是转贩来的。大刊物作了第一次照抄工作，小刊物又来作第二手转贩。大家来装饰这个纪念的，不过是应景凑趣一场热闹罢了。此外，完事大吉。“中国人行为极幽默，却不大懂幽默”从这件事看来，真是一言中的。

应景凑趣不特用在伤悼文字上已成习惯，其他许多问题论战，也无不如此。问题一来，你抄我抄，来个混战一场，俨然十分热闹，到后，无话可说，说来也差不多，不能不结束了，就算告了段落。应景凑趣既然成为一种普遍风气，所以不特理论文章，常令人发生“差不多”的感想，连小品文，新诗，创作小说，也给人一个同样印象。单就小说看，取材不外农村贫困，小官僚嘲讽，青年恋爱的小悲剧。作者一种油滑而不落实的情趣，简单异常的人生观，全部明朗朗反映在作品里。故事老是固定一套，且显出一种特色，便是一贯的流注在作家观念中那一种可怕的愚昧。对人事拙于体会，对文字缺少理解。虽在那里写作，对于一个文学作品如何写来方能在读者间发生效果，竟似乎毫不注意，毫不明白。所有工作即或号称是在那里颂扬光明的理想，诅咒丑恶的现实，悲惨的事，便是不知道那个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丑恶的现实。作家缺少一个清明合用的脑子，又缺少一枝能够自由运用的笔，结果自然是作品一堆，意义毫无，锅中煮粥，同归糜烂罢了。

这种引导作者向下坡路走去的风气，追究起来，另外自

然还有个历史的可悲原因。中国是个三千年来的帝国，历来是一人在上，万民匍匐。历史负荷太久，每个国民血液中自然都潜伏一种奴隶因子。沿例照样成为国民共通的德性，因为秉赋这种德性方能生存。老子向吾人讴歌这种德性，孔子为帝王训练这种德性。到末世则文章有八股^①，诗有试帖诗，字有馆阁体。（数百年一成不变！）每人来到社会上讨生活，第一件事就是模仿，能够“差不多”就可衣食无缺。社会既不奖励思索，个人就不惯独自思索。多数人总是永远浑浑噩噩，至于老死，少数人不能浑浑噩噩，必有机会向上成为中间统治者，虽无迷信，明知是非，然而为生儿育女事牵牵绊绊，自然还是除了解释道德经训，帮同制造迷信愚蒙下民以外，无可作为。辛亥来了一个政治革命，五四又来了个思想文学革命，加上以后的北伐清党……一篇历史陈账，革来革去，死的烂了，活的变了，一切似乎都不同了。可是潜伏到这个老大民族血里的余毒，却实在无法去尽。文学方面“差不多”的现象，这种毒素就负一半责任。三五个因历史关系先走一步的老作家，日月交替，几年来有形无形都成了领袖和权威，或因年老力衰，气量窄小，或因能力有限，又复不甘自弃，或更别具见解，认文运同政治似二实一，这些人的情绪和行为，自然都支持着那个凡事照样的民族弱点。后来者或急于自见，贪图速成，或毫无定向，随声附和，或根本无意从事文学，惟本人明世故，工揣摩，看清楚这方面是一条转入仕途的终南捷径，这些人自然又扩大那个民族弱点。作家创作观念，便被笼罩在一种差不多的空气里。凡稍有冒险精神，想独辟蹊径走去的，就极容易被看作异类，凡写文字特具风格，与众不同，又不免成为乖僻。（异类乖僻，一

加转译，即成落伍。)在这种情形中，身为教书匠之流，还可抱残守阙，孤单寂寞遣送他那个度越流俗的生涯。至于一般从事文学创作者，大多数把工作同生活都打成一片，不可分开。除写作无以为生，不追逐时代虽写作也无以为生。自甘落伍，则精神物质，两受其害，生活无法支持。因此一来，作品当然便从“差不多”一条路上走去了。“差不多”的现象也就俨然是一个无可避免命定的结局。

这“差不多”的局面若不幸而延长十年八年，社会经过某种变动后，还会变本加厉，一切文学新作品，全都会变成一种新式八股，号称为佳作杰作的作品，必内容外形都和当前某种标准或模范作品相差不多。所谓标准作品，模范作品，自然就是那时领袖编辑同有势力的书店老板写的那类作品。

幸而另外还有一些人，看出这个差不多的可怕情形了，明白这种情形对于三五领袖一二老板是个值得赞颂万世统一的基础，但对于大多数青年作家，却似乎太凄惨太不人道了，这些人对于这点认识得既比较深刻，说高尚一点，从文化着想；说卑陋一点，从商业着想，都以为当前趋势得有个调剂，有个补救，出版业若不愿与习气同归于尽，还希望多作出一点贡献，扩大或延长它的组织，一面需要有眼光印书捞钱，同时一面也就得有胆量印书赔钱，就基于这点认识，因此年来我们才居然在一堆“差不多”的新书中，有机会看到几种值得读后再读的新书，在一些篇幅巨大的文学月刊中，间或又还可发现两篇值得看后还留下一点印象的短文。在文学论著中有一本《福楼拜评传》，一本《文艺心理学》^③，散文作家中出了个何其芳，小说作家中发现一个芦焚，戏剧作家中多了一个曹禺，游记作家中且有一个更值得人特别注意的长

江^④。(虽然这个人的通讯文章，无人当他作文学作品，但比起许多载道派言志派的作品，都好得多。)这些人的作品，当前的命运比较起来都显得异常寂寞。作者在他作品上疏解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以及所表现或记录对人生的观照，用的是一种如何谨严缜密态度，一般粗心读者实在难于理会。它们单是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还没有得到应得的尊重，它们的影响，似乎竟不如许多虚伪空疏作品来得大，它们目前虽存在，好像并不存在。

幸而又还有一个刘西渭先生，几乎像凭空掉下，一枝带着感情的笔，常在空中挥来使去，这里写一篇书评，那里写一篇书评，俨然时时刻刻都在向读者指东话西粗声大气的呼喊：“先生们（蠢东西），睁开眼睛，看这个，看那个，细心的看，有道理呀！放下你那个流俗的成见，会看出道理来……”自己老以为这时代人大多数是聋子，是瞎子，是势利鬼，是应声虫，需要一个光脊梁作战的典韦，不避箭矢，自充好汉，来同习惯作战，尽力显扬幽隐，宏奖乖僻，领导读者爬高山，瞻远景。凭着这种迷恋于中世纪的游侠者精神，到处玩着刺风磨的举动^⑤，虽弄得这个人满头是汗，还不休息。书评写到无可再写时，掉过头来，居然尚兴致勃勃的向出版者和编辑先生说：“您这事作得对，物质失败，精神胜利。别担心您那个闲书会老赔钱，赔钱也尽管干！时间会带走那些流行偏见和愚行，消灭了您出版那些走红运捞大钱的新作品，至于那些孤单的著作，从印刷所搬来，如今尚搁在书库里原封不动的东西，终会给您挣一个大面子，终会不朽，永远留存的！我刘西渭为什么存在？就为的是宣扬真理下来阐明这些作品真实价值而存在！”刘西渭先生的事业，自然应

当放在“差不多”的一群以外。什么时候“挣面子”，能不能“不朽”，有天知道。

刊物编辑和书店主持人，虽渐渐明白了印赔钱书刊载不谐俗文章是必需作的事，可是却并无能力使这些作品增多。刘西渭虽俨然为保护这些作品而存在，可是也似乎无能力使这些作品增多。读者呢，好像有一小部分人虽聪明了一点、世故了一点，已明白从一堆“差不多”的作品中找寻杰作，不易发现，然而那个有势力的名词，在心日中却依然极有势力，害羞落伍，不好意思看那些“闲书”。大家知道了一个刘西渭，只老想弄明白这是谁，却不大有兴味注意这个刘西渭直干些什么事，说些什么话。

唯一的希望是在作者本身。作者需要有一种觉悟，明白如果希望作品成为经典，就不宜将它媚悦流俗，一切伟大作品都有它的特点或个性，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或个性，是作者责任和权利。作者为了追求作品的壮大和深入，得自甘寂寞，略与流行观念离远，不啻于自见。作者得把作品“差不多”看成一种羞辱，把作品“差不多”看成一种失败。如此十年，一切或者会不同一点点！

近几年来在作家间所进行的运动很不少，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幽默文学，报告文学，集团创作，……每种运动都好像只是热闹一场完事。我却希望有些作家，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针对本身弱点，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去矫揉造作，更重要的是去“差不多”！这样子来写出一些面目各异的作品。倘若一个文学作品还许可我们对它保留一点奢望，以为它会成为多数人的经典，可能成为多数新人的一种经典，

似乎也只有经过这样子反省来从事写作的作家，可能完成这种经典。这“反差不多”的运动，在刊物上杂志上热闹是不必需的事，却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

本篇发表于1936年10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署名炯之。

① 八股 明清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故称八股。

试帖诗 诗体名。起源于唐代，为科举考试时所采用。

② 馆阁体 书体名。明清科举取士，用于考卷的字体，明称台阁体，清称馆阁体。后用以泛指呆板的字体。

③ 《福楼拜评传》 李健吾著。

《文艺心理学》 朱光潜著。

④ 长江 即范长江，时为《大公报》记者。

⑤ 典出西班牙塞万提斯著长篇小说《唐·吉珂德》，指唐·吉珂德误认风车为恶魔并与之作战事。

文学界联合战线所有的意义

从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家忽然在社会上成为一种特殊阶级，他所有的能力好像比起一般人来都大，他所负的义务也好像比起一般人来都多。我说的能力是指作品对于读者的影响，我说的义务是指作品对于“道德”与类乎这类名词的拘束。虽然直到如今，对新文学发生兴味的人，还不出于中学生和大学生，以及一部分受过相当教育在社会上服务的青年人，但凡是对它有兴味的人，毫无可疑，是把作家看得很高尚，至少以为比别的文化事业重要一点的。都无形中有种信念，文学作品，可以使人兴奋，可以使人更深刻的认识当前人生，可以使人向上，尤重要的是使人明白社会是一个如何社会，应当如何向上。倘若经典这两个字意义是指它能给人以一个法则，必然遵行的法则，则当前文学作品都可能成为经典，有经典的意义和价值。所不同处只是前者重在“永远”，后者重在“普遍”。前者作用是纵的，后者作用是横的，空间的。文学作品的义务——道德的拘束，就是以它能否达到上述那个普遍的经典作用为依归。能办到，是道德的；不

能办到，是不道德的。因此在某一时，人道主义的托尔斯泰便是不道德的。至于人道主义托尔斯泰还被看成不道德的，其余一切作家和作品，被忽视，被轻视，也是可想而知了。

但文学作品虽被多数人当成经典，想凭藉它获得普遍向上的结果，将近二十年来，值得称为这种经典的作品，在中国实在并不多。若说得苛刻一点，竟可说还不曾产生。虽然有些作品，在商业与同行间相互宣传下，某一时也俨成为一时的经典，获得广大的读者，以及读者热烈情绪良好的反映。然而同理论上的需要相去实在太远。它所以能在读者间留下印象，老实说，是仰赖作品以外的不大诚实的相关技术，非其本身所当得。一种近于“商业”的与“政术”的所引起的作用，若无实现的政体支持，是无从持久的，是会在时间——短短的时间——陶冶下失去它的光辉，显出它的本真的。这种价值的重估，且照例还引起一点反感。因此我们现在尽有许多成名二十年以上的作家，却不见多少在二十年内还能引起读者关心，掀住读者情绪的作品。若把这个原因委为社会的变动，因社会变动太快，作品自然随时有被人忘却的可能，又与事实不符。正因为社会虽不断的在变动，所谓最道德的文学观，却始终在作者与读者间被全面的支持。另外近于惰性一种保守文学观的抬头，虽常常把当前作品期待得成就大一点，这种期待也并不妨碍新作品的产生，倒反而处处帮助了新作品在技术形式上的整饬。试来追究一下它失败所在，根本的原因，我们只要稍稍客观一点，很容易就可得到一个结论：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家间，既想使文学得到商品的利益，又想发生经典的意义，这鱼与熊掌一齐到手的事情，应当用一个如何方法始可得到，作家间还显然不曾有具体的

认识。许多人只知道两者同时得到的好处，不明白如何始能两者同时得到。为表示向前，常常想用极英勇的姿态与读者对面，作品观念不协妥，文字不协妥，结果呢，等于零。除了作者个人从创作过程中得到一种愉快外，也坐收一点商品利益，作品对于大多数读者实无多意义。时代苦闷是社会却不是作品影响到大众读者，这种作品即空疏，因为恰恰能迎合读者情绪，一时间具有普遍的可能，这种普遍性却并无经典作用。鱼与熊掌，二者依然不可兼得。这不是对于文学有了一点信心或野心的作家，低头努力的结果。至于此外还有一种作家，更图省事，或什么也不写，或多多少少写一点零零碎碎的对文运有所说明，对现世有所指摘的小文，自然更不能有多少希望可言了。虽世俗浅陋，名实易于混淆，凡有名即可坐收实利，然而无作品的作家，到底不能长远支持。

想此后情形不同一点，就得承认先前的疏忽或错误，重新选路走，重新迈步。第一，文学观的改变，流行性与持久性的共同注意，认为作品能存在能有作用的原因。第二，新的经典概念的展宽，包含一切有建设性的向上，所谓战斗再不仅仅是三五作家以宗派或成见为基础的斗法，吵嘴，或对当前内政无条件——无理性——的否认，应当是团结，统一，求力量集中而对于外来某种暴力与内部某种愚昧的抗议。第三，理论得有东西来支持或实证。“无言之教”不适用于文学。文学就是文学，在一个较宽泛的范围中，大家宜通力合作促进文学作品产生。

联合战线在当前是个很引人注意的名词，这名词背后自然还有些其他什么，并不十分简单。见渊鱼者不祥，可不用提，但就这名词对于目前情形说来，却应当把它看成一件极

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既联合了，既在一个广大范围中联合了，至少从此以后一般刊物中，消极的我们可以不必再读一些属于私人的吵嘴，肉麻的批判，不会再见到左翼的双包案，更不用使许多青年学生，把兴趣集中到“观战”一事情上，向大小刊物去搜集文坛消息。积极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作家各自努力来制作那种经典，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留下一点点机会，许可另外一种经典也能够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正因为这些作品，是在某一时容易为当前少数人嘲讽，却也必然为当前与将来那些沉默无言的多数人所需要的。它的内容也许不是革命，不是义勇军，不是战争，不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物。但是我们只要想一想，除了学生以外，支持这个社会的中坚分子还有多少人，便是学生，除了文法科以外，尚有多少在实验室的，在工场里的学生以及先前是学生，现在已离开学校，在种种事业上直接参加这个国家建设工作的人（尤其是身在边地僻县服务的人），工作之余，还有不有一点需要，从一本书上得到一点有会于心的快乐，得到一点忘却寂寞与疲劳的安慰，就明白那些作品如何重要了。

“宽容”据说属于一个人的性格，缺少它既无从勉强得到，有了它也就不易去掉。在作家间提倡宽容，正如提倡相反的那个怨恨一样，不易办到。不过我们应当明白一些作家在“统一战线”这个口号下，它就有要某种权力承认，同时也承认某种异己存在的事实，要联合也就是需要宽容。实在说来宽容基于对于事物的认识或了解，一个作品写的既属于

人间种种相，想作品博大精深，无所不包，或正确亲切，十分动人，自然不能缺少对于一切人性的认识或了解，——这认识或了解不特是社会，经济的，还应当是生理的，心理的。我们看看近年来一些所谓具战斗性，对当前社会有所讽刺的作品，人事安排，性格描摹，浮光掠影的写成，结果作品本身的浅陋，只常常成为对作者自己空虚薄弱的讽刺，写它时能多有一点认识或理解，也许就不至于如此了。联合战线的意义，或者在这方面，同时也能够使一些作者下笔谨严些，因为写作态度已不同先前。并且这联合战线能否持久，能否有意义，也仍然得看“宽容”在我们作家间能否存在，能否继续存在。

文坛的“团结”与“联合”

这半年来“团结”“联合”在文坛上成为一个极热闹的问题；虽然它的热闹只在对“团结”“联合”几个口号上“论战”，一面也反映国难严重在作家间所引起的觉悟，一面也反映作家间在过去一时，或在当前一时，尚如何不能团结，不易联合。这觉悟自然对中国大有好处，因为它可使新文学力量，集中向建设方面努力迈进。至于不能团结不易联合的事实，则只要读一读新近印出的一本《国防文学论战》，就已经给我们一种启示，一种说明了，涉及抽象名词和口号，需要论战，一到比名词更具体一点的行动时，观点既有歧异，其不能在行动上实现团结或联合，可想而知。虽大家极力把那个口号解释得尽可以包含范围广大的各种行动，拘束性极少，但毫无可疑，它对外，仿佛一致；对内，它不能一致。最显明处就是它不能用同一路线去爱国。不走同一路线，它就会有冲突。对各派言，它会发现有所为的强有力者的权力滥用。单对某一派言，它还会有争夺，为领导权，为宗派，为行帮与私人利益，为口号，甚至于为个人意气爱憎，而有种种争

夺。凡稍稍知道年来中国文坛内幕的人，对于这件事就必然明白它是如何情形。即或一个外行人，什么也不知道，只要把一本国防文学论战较长较重要几篇文章看看，把关涉及争夺战的背景加以检查，对照，也就可以看出在当前这个庄严名词下，还潜伏了些什么东西。这东西并不会因为有了——一个什么联合团体或联合刊物而消灭。它永远不会消灭。什么原因？大凡团结联合可由两种方式得到，一是民主式的自由联合，一是集权式的统一联合。目前却有人想在民主式自由联合下，发生集权式能力的要求。能这么办也不坏。作家本是沙子，各自以为占有一个“全体”各不相附的沙子。宜于自由活动竞争，因为这自由发展可以成为文化进步的基础。然而应合当前需要，假若有一种粘性极强的人和事，能把他们力量集中起来，齐向同一理想走，自然很好。可是，粘合沙子并不是件容易事。目前我们还不曾发现这个能粘合一切的物质。身当其冲的，成就难孚众望，即或具有政治家才干，却还缺少一点宗教家宽博伟大情绪。尤其是目的重获得而不愿牺牲；对外御侮容易转成对内倒谁。联合增加他们的某种方便，他们联合；联合给了另外一些人方便，他们战争。

这战争同中国过去军阀一切内战无异，是一种毫无结果的浪费。这战争可以免除，却依然不断发生，加以按语，应归之于人类的“愚”。本身已愚，又转而使读者胡涂迷蒙，除观战外无所事事。

过去因这种战争，在我们读者间知道谁是什么派，也就始终不能明白谁当真是什麼派。因为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虽有不少会社成立，这些会社有的组织极散漫，有的甚至于毫无组织，较重要的如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就并不曾充分

显示出会社的积极性。大多数都以友谊为基础，相互合作，尤其是大多数作者向各刊物投稿的情形，与其谓为“派别”，不如谓“就方便”。常常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就叫作“语丝派”，间或在那个刊物上写文章，又叫作“论语派”。人在上海容易被目为“海派”，若在北京照例又是“京派”。个人兴趣或态度既不同，所标榜的所爱好的当然常常不同，因此有所谓“战争”，如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语丝》对《现代评论》，《萌芽》对《新月》，这种战争虽好像总是“前进”对“保守”加以攻击，事实上经过一点点时间，也就可以把“前进”和“保守”位置互换。且所谓战始终不过是三五人的对垒，这种战争结果，除了使读者觉得谁暂时被谁骂倒以外，于文学作家倾向或作品成绩竟无多大影响。正因其如此，所以我说是“浪费”。至于近如目前的几个论客，你说他是宗派主义，他说你是行帮主义，去正面问题常常不知不觉就离得很远的战，甚或由批评转入嘲讽，渐至于咬文嚼字，牵来扯去，个人私事与种种不相干问题，都混同在内，所争持的却是个人方面“与公道同在”。这种战争目前自然无结果，可以想象得出；到某一时除了相互骂为“汉奸”以外，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原因易于明白，“真理专卖”利益极大，然而事实呢：真理无从专卖。

文坛内战若照旧式内战看来，要团结联合一致救国，并不什么困难。事情简单，只要作编辑的有魄力能在一切刊物上去掉某种咬文嚼字的作品，在读者方面，就即刻可以收到一个异常良好的联合印象。若更进一步各刊物一律开放，注意从作品上充实内容，作编辑的肯抛下固陋偏狭成见，不分

作家派别新旧和亲疏，惟以作品为主，一例找来帮忙，在读者方面，且即刻可以得到一个向建设努力的印象。能在读者方面产生这样一个印象，这联合希望实在已得到一半，其另一半，就只看作家如何制作他的作品了。

文坛内战若照当前内战看来，要团结联合，就困难了。根本问题不是在作家间能不能通力合作，免去冲突。真正从事文学创作者，相互之间很少发生冲突。容或个人观念不同，在对外御侮前提下既包含各种观念，各凭信念写去，各以作品诉之于读者，既有作品诉之于读者的机会，各自分别低头努力将成为作者唯一信仰。不过在或一派作者之间，在争真伪，争嫡庶，争是非情形中，却将永远有一个不相粘附的因子，要联合无可联合。许多人不为事实而战，将为名分而战。战争一起，唯一武器是想方设法使敌对者成为“破坏联合战线”的奸细，与多数国民的敌人。另外一群作家呢，老实一点的则沉默，狡黠一点的自然也随着所在阵容，写一点新八股，装点这个战争。读者呢，就暂时放下救国大事，且买几本杂志“观战”，看看谁胜谁败。到后来都好像明白一事情，就是文学可以救国，承认许多种文学都可以救国，至于那个救国作品呢，且等等看，慢慢的自然会有人写出来，——换言之，将来再说吧。每个人都相信各种翅膀都可以高飞，可是他们自己既无由高飞，也不曾见谁高飞。也许到那时节已经有什么人业已飞到了贵人门下，但这与读者无关，也与国家无关，却是明明白白的！

作家间真的要团结联合救国，先得有勇气承认那个不能团结不易联合症结所在，各从本身痛自忏悔。倘若作家间有

种反省，有种清算，个人间的政客官僚情绪可以去掉，此外还能够把一些不文的文人和文场官僚文学政客算在联合以外，这团结在极短期间即可成为事实。因为若没有这些寄生在文运方面的人物，作家间毫无可疑能在无条件情形下合作。这种人既存在，作家间又缺少一种献身信仰，只关心作品出路，惟以强力为依归，所谓强力且时有消长，文坛上的多反复投机者，明争暗斗的倾向，当然会永远存在。纵这大多数作家尽喊团结联合，真于事实无补。大多数读者希望作家团结联合，这希望到后必然将成失望。

痛感于十年来所谓文坛内战牺牲之巨，希望各方面能联合向建设努力，使新文学在读者间更多有一点意义的作家，一定很多。这反省同清算，是大家第一件可作的事情。

本篇发表于1936年11月16日《国闻周报》第13卷第45期。署名沈从文。

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先生：

上礼拜接到你们的来信后，又接到高先生夏先生两人来信，信上说及你们为什么想办这个刊物，且如何希望大家帮忙来维持这个刊物，发展这个刊物。我曾请高先生转达各位，我可以在名分上作贵刊长期撰稿人，事实上按期写一点文章。假若这一来真对于大家有益，对刊物需要，我很高兴作这件事。我觉得北方实在需要一个好文学刊物，——对作者需要，对读者也需要——且觉得只要大家能合作努力，且可以把一个刊物办得像个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明明白白，当前是住在一片被恶邻困辱也近于被家长所遗弃的土地上，这地方当前与将来的种种，是特别值得国人关心的。即单单以这个大城一百五十万住民而言，人事上如专家学者的沉默努力，有血性人的悲愤呼喊，多幻想的青年与无心肝的汉奸目的不同各自的暗中活跃，负责当局无可奈何的委曲求全，大小商人藉特殊环境的竞争牟利，小市民的苟安旦夕，以及四郊农民普遍的挨饿待毙，来表现描写，无事不可以着笔。这种作品毫无可疑可以成为中国多数人一种警告，一种兴奋剂。希望放大一点，也许还可以使多数

人从当前观察推测明天,知道我们这一片土地一部人民未来命运将必然受些什么迫害,成个什么样子,如今用个什么方法,又可能有些什么转机,留下多少光明希望。虽说每个人一时成就有限,作品未必都可变成预言,读者各有所业,好作品也不容易变成人人经典。但事很明显,就是一个作家一个刊物,在当前却许可它对这个民族的忧患,多负一分责任,且保留一些解除这忧患的理想。如今大家既然要来办个刊物,当然要想法来把这刊物办得有生气,有意义,而且希望它能够支持长久。不过如此一来,我第一次为这刊物执笔,似乎觉得有点困难了。

困难处是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观念,这观念因年龄性情更显得隔绝,不易沟通。我担心你我之间对当前社会看法也许不尽一致。不尽一致本不妨事,若不一致处容易变成相左,要说话,当然就有了点“应怎么样”的问题了。我是个从二十过三十的人,明白一个人因年龄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情感和观念如何在不断地变动。又是个需要有客观分析能力写小说的人,所以对这种因生理与社会影响的变迁,自然更多关心和理解。我知道二十岁左右的你们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也明白你们只能得到的是什么。就对从事文学创作说吧,倘若要我说一点意见,我说得老实一些,在你们情绪下容易变成浇冷水,我说的浮泛一些,仿佛当前给你们打了点气,事实上却很可能毁去你们将来的成就。对读者言也有类似的情形。我想这刊物既然是大家要办下去,出版处又是在北方,要它办得好,办得有意义,而且要它能够长久支持,它的办法或者还值得讨论讨论。就我经验所及,先来谈一谈这个办法。

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后,办杂志和出小刊物,北平本是最理想地方。因为北平是全国首都,是文化中心地,不特有很多基

本作者,而且也有很多基本读者。所以新文学运动基础在北方,新书业发轫也在北方。但这种事到后却有了变迁。从十五年起,中国新兴出版业在上海方面打下一个商业基础后,北平这个地方就不大宜于办文学杂志了。在先前,办杂志的事原本近于一种“文学票友”的彩排,用私人财力经营,所收入纵某一时除贴补外还略有剩余,也说不上赚钱。迨到把它一放在商业立场上,和上海新书业竞争后,办杂志就必然赔本。在印刷技术上落后,在广告技术上落后,革命成功后,再加上一个在思想情趣上落后,因此纵有冒险者抱有雄心和勇气,想在北方支持他那个刊物的生命,把一期一期刊物从编辑部送过印刷所,又从印刷所一捆捆取送往各书店书摊,到派给读者选择时,便发生了困难。原因易明,读者多是年青人,人人照例活泼跳动,富于情感而容易为有刺激性名词着迷,即或人在北方,需要杂志也常常是南方具商业意味的新刊物,有新插图和新论调刊物。一切要新,要奇,要广告上说明这是如何新,如何奇,方能吸引住眼睛和感情。一个老老实实的刊物,即或在上海出版,纵还有些同样老老实实的读者,沉默的办下去,少则三月五月,多则一年两年,因经济周转不灵当事者弄得精疲力竭,也依然得完事大吉,何况还在北方出版?因此在这个大城里虽冒险的陆续有人,结果一例异途同归——完全在商业上失败,同归于尽而已。这种事值得我们引以为例的,周刊如《骆驼草》,半月刊如《沉钟》,月刊如《学文》,《水星》,《绿洲》,两月刊如《文学评论》。鉴往可以知来,这事实我们当然得把它认识得清清楚楚。如有人想要在北方办一个刊物,且希望这个刊物能有一年以上的寿命,似乎先得设法凭自己力量能支持这个刊物一年的寿命。没有这个力量惟希望微倖成功,这希望实在十分渺茫。若目的是

在大多数读者来支持一半,也得有个完美方法,使这些读者乐于出而支持。

如今且假定凭私人力量和热心读者共同帮忙,已经能够把这个刊物支持下去了,可是这刊物应当如何编辑,方能够比较别的刊物显得更有生气更有意义而且得到那个广大读者群?是照《文季月刊》的规矩,还是照《译文月刊》的统一,是照《宇宙风》的综合,还是照《诗刊》的纯粹?是积极的有为,还是消极的有为?是注重事实,用建设态度对当前社会也攻击也拥护,也否认,也承认;还是偏于理想用破坏态度对当前社会只诅咒,只攻击和否认?这些看来好像不成为问题,可是事实上却是每个预备办刊物的人应当考虑到的问题。尤其是在北方出版的刊物,照目前上海任何刊物办法,似乎都不大相宜,必需有个性,有特性,方能存在,方值得存在。个人私见以为这刊物的诞生,对支持它的读者若无何等把握,本身力量总还是准备充分一点较好,否则刊物不妨缩小点,免得有头无尾,难以为继。其次属于编辑方面,目标宜以团结御侮为前提,综合在北方多方面有力作家共同来发展它,较有意义。至属于同人写作态度方面,以用严正的方式作有建设性的努力,较容易得到普遍好影响。无意义的属于个人的盲目攻击,咬文嚼字的杂耍,能减少尽减少。这点平凡意见如果还不十分可笑,且与各位本来目的不甚冲突,就算它作为我个人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沈从文 敬复

十一月十八日

本篇发表于1936年12月1日《青年作家》第1卷第1期。署名沈从文。

我对于书评的感想

有一件事说来简单，作来困难；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恩怨；最宜公平，却又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就是书评。这个名词看来充满了矛盾，因为它目的有矛盾。它要兼顾好几方面；应当是一个作品的同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它恰如俗语所说“一石打三鸟”的那个石头，要打中的是作家，读者，和他自己。这里也许只有两只鸟，其一是作家，其一是读者。也许共有四只鸟，另外还有两只无形的大鸟；编辑先生和出版家。也许那鸟儿比我所说的还要多，因为作家是一群，读者是一群。石头只有一个，鸟儿那么多，书评当然不容易作了。书评家工作的反应，不是被人戴上一顶谄谀的帽子，就是被人指为一种攻讦的武器，给人的印象总不大好，那是很自然的。一个稍有自信的作家，似乎照例对书评家和书评都

缺少尊敬，看得很轻。这轻视的理由说来可笑，原来恰好是对它希望太大。

我们倘若真的轻视书评，那就到此为止，不用提了。若重视书评，对它一定抱有两种感想：一是觉得它“很”庄严，一是觉得它“容易”堕落。倘若它能尽职，譬如说：它能将一个作品——尤其是被流行的有商业味的观念所抑扬的作品——加以分析和解释，扼要而具体的指出内容的得失，一切能作得恰如其分，见解既深切，透辟，态度又诚实坦白，且笔下生动亲切，本身还是一篇好文章；它沟通了作者与读者的间隔，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言它是一个诤友，对读者言它是一个良友。它的意义当然是庄严的。但倘若有人把书评目的当作媚悦友好，侍候编辑，应酬出版家，蒙蔽读者的工作，看作品不过浮光掠影，下断语又只是应景凑趣。随笔写来，敷衍成篇。言之不诚，使用“政术”“战略”等等自饰欺人，它结果当然容易堕落。

理想的书评是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可是理想的书评，事实上在过去目前都不容易见到。一切事倘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将来，理想的书评也还得留待将来。他失败的原因还不在于它想打许多鸟，只是被许多鸟所妨碍，无从打任何一只鸟。我们不能无条件的说所见到的大多数书评都要不得，但必需明白大多数的书评在过去和当前情形中，实在不能十分尽职。不可免受党见，友谊，以及一个商业背景所控制，所拘束，去理想距离还远。这些控制或拘束，有些方面也许将永远存在，负责的与其说是书评家的能力薄弱，不如派给作者，刊物编辑者，和出版家的共同束缚。一个有见识知自尊

的书评家，感于个人工作的重大，又明白习气之转深，他不甘沉默，依然有所写作，执笔时或者还知道如何努力减少那个牵制或拘束。一个次一等的书评家，成就便难说了。

理想的书评有待于理想的书评家。一篇书评对作者读者同样有意义，当然不容易。但如果一个书评家，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长成有一贯的认识，对于一个作品的价值和内容得失能欣赏且能说明，执笔时不敷衍，不苟且，这样子写成的书评，至少对于读者是有意义的。理想的书评家应当是懂得各种作品，且能够极中肯繁的说出那个作品得失的人，这种人产生固有待于从事书评者本身能力的培养，以及责任意识觉醒，其实另外也还得作者，刊物编辑者，和出版家的共同关心，以及对书评价值加以重新认识，方有希望。

这里我们当前的一点事实。我说的是作家的小气，自私，——尤其是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的作家，量小偏罕处说来真令人难于相信。工作粗心的或能力不足，在编译介绍上有了若干错误时，书评家若特为指出，不特不能引起这种粗心浮气的人自惭或感谢，还俨然因此一来即结成一种仇怨。若批评的是创作，则不问这作品如何拙劣平凡，一点公正的批评，照例也以为是评者有意的损害。便是批评他的朋友的作品，批评他的偶像的作品，也不可能。“欢迎莫明其妙的捧场，难忍受斤两相称的忠告”，大部分作家具有一种害神经病不健全的倾向，刊物编辑者是明白的。编辑者欲刊物热闹持久，照例又需要作家的帮忙。因明白作家这种小气自私情感，很容易转而成为不合作的行为，人事上不能不小心，自然多

怀着“不得罪于巨室”的可怜心情，支持他那个地位。对于书评者的书评，所给的范围可想而知。一个出版家又另有他的生意经，把书评看得更“物质”一点，或用书评作为广告以外的应酬，略有点缀，所有书评，当然褒多于贬。或也彼此之间略有抑扬，然终不能与商业习惯背道而驰。巧黠者甚至把变相的广告，以及用一纸书券诱来的读后感，一例当作书评，设法载出。书评消极的被三方面限制于前，积极的又被这种无价值的书评混淆于后，当然越来越不能给人注意，地位越来也越低落了。

涉及出版家的事，为营业起见，当然得印行各种书籍，书籍出版后当然尽力推销，我们对之似不能作何种奢望。补救方法有一个，就是读者此后遇到什么出版月刊新书月报以及类似这种刊物，赞美到什么新书时，且作有保留的注意，捏紧荷包，就可以少受一些损失。

对于刊物的编辑人呢，必需他能够多负一点责任，多有一点业务上的尊严，爱朋友也爱真理，承认现状之糟糕，且知道如何努力慢慢的来打破现状。

对于作家呢，真需要变一变态度，对书评有种宽容！大多数作家把书评只看成一个人对于某种作品一点反应，一点意见，事情就简单多了。一个作家既有把作品散播于群众的权利，就得承认读者有对于这个作品自由表示感觉的权利。一个作家作品对象是现在未来无数读者，读者之一近于攻讦的批评，他不会在意，有意阿谀的批评，他也不会在意。要书评能够成为新文学运动一部门，帮助新文学在建设上繁荣，必先来努力解放书评，使它比较多一点自由发展的机会。解

放书评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以为就是三五有地位的作家的反省，态度坦白一点，光明一点。

年来常有人拈起“中国为什么无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来讨论，因此有机会拜读了许多名人的名文，明白好些重要事实。可是大家都似乎疏忽或避开了一个小小事实不谈。我们在任何文学刊物上，都可以拨见“自由”这个名词，殊不知事实上我们这个文坛就那么不自由，文学口号上最普遍的是“打倒偶像”，殊不知事实上有多少作家编辑就正在那里小心谨慎给我们在重造偶像。结果成为少数作家市场独占而多数作家出路毫无，批评家想欲有所纠正，打倒偶像，书评写来又那么不自由。文坛上的作者集团和编辑集团，惟以巩固当前利益支持当前地位为基础的态度不改变，就无形中在奖励平凡，奖励摹仿，奖励捧场和献媚，且奖励作家放下笔来联亲结友，位置书评家成为一个清客。想从这种情形中产生伟大作品，岂不是痴人妄想？

我们对于作家态度编辑态度自然的转变，倘若无可希望，又明白社会上某种不好习气，日趋堕落，虽能够产生二三空洞的伟大人物，却实在无从产生具体的伟大作品，书评的自由解放也正是整个文学运动的自由解放，书评家似乎还应当好事一点，来努力共同实现一个专载书评的单独刊物。这刊物不受任何拘束，完全以善意和热诚来注意一切新作品；批评一切新作品，对一切被习气所疏忽时髦所称颂的作品，都老老实实的来给一个应得的估价。它也许和作家个人都显然离得很远，却实和整个文运的发展关系异常密切。我希望有这种好事者。因为我看看似乎也惟有这样的刊物，书评本身

才会从读者中重新建设一个庄严印象。否则书评家就只好沉默，一说话，倒真真像个清客，所有工作的意义，除了维持这个愚而伪的不健全的现实场面以外，别无作为可言！

十一月二十九日北平

本篇发表于1937年1月1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285期，署名沈从文。1946年5月1日又以《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为题，并作少量删节在《上海文化》第4期重发。

据《大公报·文艺》本编入。

一封 信

编辑先生：

得到来信，知道前不久在“文艺”上我那篇谈“差不多”的文章^①，所提起的一点意见，已很有了些反响：对于一件事情，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原是很自然的。尊意拟把它汇集一下，刊载出来，作为一种讨论，询问我有什么意见补充，对于这种讨论我并无何等意见。尤其是照时下风气，在讨论文中常发现“你是汉奸”“你是混蛋”一类名词情形下，我是更无意见可言的。我写那篇文章只说明我个人对当前情况一点所见所信。我的希望，我的目的，在本文末尾就说得明明白白，并不如你所加按语要引起一种观念不同两不接头的讨论的。

近几年来在作家间所进行的运动很不少，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幽默文学，报告文学，集团创作，……每种运动都好像只是热闹一场完事。我却希望有些作家，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针对本身弱点，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去

矫揉造作,更重要的是去“差不多”!这样子来写出一些面目各异的作品。倘若一个文学作品还许可我们对它保留一点希望,以为它会成为多数人的经典,可能成为多数新人的一种经典,似乎也只有经过这样子反省来从事写作的作家,方能够完成这种经典。这“反差不多”的运动,在刊物上杂志上热闹是不必需的事,却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

我的对象是一些同我一样有诚心写作,而又感于自己成绩不佳,且明白失败根本所在,也希望自己作品更好一点,坦然承认必须虚心努力的作者。这种作者在当前不是没有的。至于那种自信心极强,有机会印了几个单行本创作集,就以为对于文学已经作过很大贡献的,那是用不着我来说话,提出个什么“基本信条”,只要书业中人作广告时为介绍“这是中国伟大作家”,就很够了。倘若因为我在文章中对他们不提提,像是疏忽了他们,抹杀了他们,因而十分不平,便由于这种情绪,引起一些极可笑的谩骂,这个你知道,去我写那文章的意思已离得太远,更无从讨论了。

我说的“差不多”一个名词,自然很伤了一些作家的心。尤其是在这种年头,有些人拿了一支笔在手上,就天真烂漫的以为只有他是在“爱国”,而又保有“真理”,他是预言家,是全个身心浸透了对人类同情,所有作品都得照普通广告上常见的措词得到读者反应的。他在趋向上要表示与“多数”一致,在写作方式上又最忌讳与人一致的矛盾中(也就是思想上他要从差不多中讨好,文章上又要从反差不多中见好的矛盾),我这句话不是打中了他的胸膛,就是触着他的背脊,不受用是当然的。但

其实倒是这些人自信心不大坚强，或明知自己也空空洞洞，一点点成就还是“头脑”和“老板”凑和的，心虚而内疚，所以对我提到的一个名词便感到愤恼或痛苦，不然就不至于如此了。

我认为“一切伟大作品都得有它的特点或个性，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或个性是作者的‘责任’和‘权利’。作者为了追求作品的壮大和深入，得自甘寂寞，略与流行习气离远，不亟亟自见。”这点意见和当前一般人说来，的确是如你那按语所说有些“孤单”的。我明白这点孤单。这孤单即或对当前“作家”无意义，至少对某一些人也许还有用处，就是给那些对创作真有信心，真有野心，自甘寂寞埋头努力的无名之士，一点“空谷足音”的感觉。我相信到处都有这种无名之士。他们在生长，在各地各种生活里慢慢的生长，而且毫无可疑，所谓真正伟大的作品，是要由他们手上产生的。他们当前的沉默，便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未来。他们的努力，也许与“作家”“文坛”“集会”“论战”都仿佛无关，然而作品却将与“真理”和“艺术”更近，成绩将成为历史之一环。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此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也越多。

为作家设想，为作品的自由长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响设想，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个对社会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团团转。）理由简单而明白，实行家是有目的而不太择手段的，因此他对人对事是非无一定，好坏无一定，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今天拥护明天又打倒，一切惟看当前情形而定。他随时可以变更方法而趋

向目的,却不大受过去行为的拘束。文学家照例得捏紧一支笔,不幸这枝笔另一时也就缠缚着他。他若跟着“政策”跑,他似乎太忙一点,来不及制作什么有永久性的作品。不管他属政府派还是属反政府派,奉命执笔既必然常常得变更其毁誉目标,所说的人事是非无固定性,违命执笔则不可能,稍受压迫且特别容易转变。转变又转变,人转变了文章却好好的摆在那里。一个稍有记忆的读者,试来对照对照,就可看出有多少作家去年的文章却骂了今年的本人,当前的行为倒嘲讽了先前的作品。结果恰好两两抵消,本人的文章行为在社会上皆无从引起信仰。对革命言只是化“悲壮”为“幽默”,对文学言只是从“有为”变“无为”。

为读者设想,读者是更需要各方面作品来教育或娱乐的。若文学作品真如某种人的妄想,以为只要在一个作品上说“我是真理,信我就可得救”所有读者当真信从真理一律得救,文学与社会关系简单到如此,那也就好办多了。事实上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却有它的限度,它既受历史上那一大堆文学遗产所控制,又被人人赖以生存的各种职业所牵制。易言之,就是大部分读者的文学观,是建设在一切现存的文学作品上面,某种新的理想要从文学输入,那个作品必然得达到一个较高作品的水平,才会发生效果。大部分读者的人生观又是建设在当前贴身事业上,任何未来的理想主义,一涉及变更他们当前生活时,照例绝不会即刻抛下他的固有事业而去追求理想的。读者如此,作者却只是几个长远寄托生活于大都市中的人物,书本知识和人事知识皆异常薄弱,惟各以便利机缘,成为作家,露面于老板与读者之间,知自爱的还肯老老实实努力于作品制作,具政客手腕活泼跳脱的,却老在想法从一个口号或一种运动上企

图伟大。砂上建屋，瘠地种树，求作品能笼罩一切，对读者能有多大作用，当然事不可能。

我说的自由发展，不特是解放抽象的观念上的拘束，也是打破事实上的少数作家的市场独占。不特是为作者，同时也是注意到读者。

在文坛联合的问题上，有点文章可作我对于这种见解的说明：

联合实具有解放的意义，因为既联合了，既在一个广大范围中联合了，至少从此以后一般刊物中，消极的我们可以不必再读一些属于私人的吵嘴，肉麻的批判，不会再见到左翼的“双包案”，更不用使许多青年学生，把兴趣集中到观战一事情上，向大小刊物去搜集文坛消息。积极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作家各自努力来制作那种经典；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留下一点点机会，许可另外一种经典也能够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个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正因为这些作品，是在某一时容易为少数人嘲讽，却也必然为当前与将来那些沉默无言的多数人所需要的。它的内容也许不是革命，不是义勇军，不是战争，不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物。但是我们只要一想想，除了学生以外，支持这个社会的中坚分子还有多少人，便是学生，除了文法科以外，尚有多少在实验室的，在工场里的，以及先前是学生，现在已离开学校，在种种事业上直接参加这个国家建设工作的人（尤其是身在边地僻县服务的人），工作之余，

还有不有一点需要,从一本书上得到一点有会于心的快乐,得到一点忘却寂寞与疲劳的安慰,得到一点向上的兴奋,就明白那些作品如何重要了。

(《大众知识》第三期)

我说是的“事实”,因此也许就比一些人谈的“理想”似乎显得平凡。不过一个作家当他提笔写他的大作时,他固然需要理想,且不妨驰骋妄想,但提笔以前无论如何他总得明白事实,承认事实。目前许多作家,要别人了解他或崇拜他的情绪特别浓厚,自己却无多大兴味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也就是要人类对他同情太切。他却对人类根本缺少同情。)作品之无从伟大,是必然的。自己若存心用文字写一本好好的小书,先得去好好的读一读那本包含万有用人类行为写成的大书。这点希望对已成名的作家,也许以为近于嘲讽,对未露面的准作家,或者是种诤友的忠告。

专此敬复,并颂著安。

炯之

十二月十五

本篇发表于1937年2月2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署名炯之。

①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一文。

滥用名词的商榷

前不久《宇宙风》上有一篇梁宗岱先生的文章,对于当前作家滥用名词加以批评,觉得不是个好现象。以为这现象一面显示作家的粗疏,一面也显示文坛的不健全。他并且举出两个人作例,一个是李健吾先生,一个是朱光潜先生。从两个好朋友方面起始,正可见梁先生对于这问题认真的态度。六月二日《大公报·文艺》(三四三期)又载出一篇梁先生致李健吾先生的公开信,把一个某教授,一个大学者,一个名流,和一个梁实秋先生,作为引例,解释提出这问题的理由,说明这问题值得讨论。

既是公开信,显然是容许大家来说几句话了。谈到滥用名词的问题,除梁先生所举理由外,我们似乎还应当用比较近情的看法,弄明白为什么多数人滥用名词。

第一,得承认这是一个普通常有的现象。原因是多数外来名词初入中国,文字体制又新经变革,一个名词在“专家眼下”和“习惯使用”不能一致,也似乎容许它不完全一致。譬如说,梁宗岱先生对“象征主义”,说明时可以写一篇洋洋万言的大

文,至于这个名词的含义,在一般人印象上,当然就简单得多,并且会不相同,使用时也不相同的。(正如“科学”二字,爱因斯坦和梁宗岱先生两人使用时不相同一样。)梁先生循名求实精神,我们表示尊敬,但如果梁先生肯注意一下这点平常事实时,也许就不会从一二名词牵涉到中国“文坛”、“学术界”上去,批评态度也许稍稍好些了。因为文坛学术界的进步与否,未必是一两个名词的关系,尤其不是一两篇文字上误用了一两个名词可决定的。就一二名词指摘全文,已近于拢统武断,若因此而说及整个学术界,似乎不大说得去。

第二,是我们还需承认一点事实,通常读一篇文章时,我们读者照例对一个名词的是非不甚关心,特别留下印象的倒是作品中一段或全篇所说的道理合不合,文章完美不完美,思想健全不健全,态度诚恳不诚恳。易言之,是概括的非字句的。例如梁先生的公开信上说:

在我未执笔写那篇文章之前,我在各出版物上注意到我们底散文界渐渐陷于一种极恶劣的倾向:繁琐和浮华,作者虽然是极力要作好文章;可惜才不达意,手不应心,于是急切中连“简明”,“清晰”,“条理”等一切散文底基本条件都置诸脑后了,只顾拚命堆砌和拉长,以求观瞻上的壮伟,明明是三言两语便可以阐说得致的,作者却偏要发为洋洋洒洒的千言或万言。结果自然是:不消化的抽象名词,不着边际的形容词,不恰当的譬喻等连篇累牍又翻来覆去地使用。单就形容词说吧,在一篇文章里你可以发见“深远的幽邃”,“特出的超卓”,或什么“精细的微妙”等等。于是读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一大堆抽象名词,形容词,

和譬喻等游泳到另一大堆同样东西之后,只觉得汪洋万顷,森森乎莫知其底止。这实在是中国文坛一大危机。

(见给李健吾信)

大意上说得过去,就不会寻章摘句的推求。如用梁先生方法去认真分析,问题可就多了。梁先生说散文界陷于恶劣倾向,是繁琐和浮华。并且是从各种出版物注意而来的结论。梁先生真看过中国多少出版物?是不是真在看多数出版物后下的结论?因为据我意见(读者较多数也必有同感)中国目前流行的散文,支配一般作者的笔和读者的眼,就并不是繁琐和浮华的散文。梁先生有兴味认真普遍注意过中国近年来散文的倾向,很可怀疑。若就引文看来,事实上不过是把一个青年书评家几句不合文法的话举出,若下批评,指明他书评“写得不通”,劝他“好好的写”,如此而已。如因此便认为我们是在堕落,是中国文坛一大危机,说的岂不过分?梁先生赞成法国式的一剑一枪,平常和朋友对面时,很显然“深受法国学术界第一流大人物的影响”,语言奋斗极认真,又对于自己的语言逻辑深有自信的。然而使用名词就还是大可商量。若我们都照梁先生的法国式办法,来在筵席上,在茶会上,不客气的讨论,什么时候得到结论?文坛又是不是就有长进的希望?若写出来,是不是有那么多刊物的篇幅可供讨论?

再引一例:

我想你一定拜读过梁实秋先生在《东方杂志》发表的那篇大文《论文学的美》了。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除了日本,或者还有美国——能够容许一个最高

学府底外国文学系主任这般厚颜去高谈阔论他所不懂的东西——真的，连最初级的认识都没有！试看这一段：“我们要知道美学的原则往往可以运用到图画音乐，偏偏不能应用到文学上去。即使能应用到文学上去，所讨论的也只是文学上最不重要的一部分——美。”还有比这更明白地袒露作者对于美学，甚至对于图画和音乐的绝对的愚昧的么？而他竟不知天高地厚地根据这几句话写成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

我们先不妨假定说梁实秋先生的万言文章，恰恰如梁宗岱先生所引的那一小段文章一样，对于美的定义下得如此天真而单纯。但批评者如此写出他的意见，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又是什么？是使我们照样不相信除了日本或美国都不许有梁实秋那么一个人作外国文学系主任，还是相信法国有像梁宗岱先生那么写批评文章的人？从这里可以弄明白，其实倒是“找寻真理”的方式，如宗岱先生所使用的方法，全不适宜。即或法国文化就像宗岱先生所说的办法发展的，中国依然未必合用。这不像是求真，是最不高明最拢统的一种谩骂。

梁先生说毕法国情形后，又回头看了一下我国情形。

回头看看我们智识阶级的聚会，言及义的有多少？言及义而能对他的主张，他的议论负责的又有多少？除了“今天天气哈哈”，除了虚伪的应酬与恭维，你就只听见说长道短了。

代表中国“智识阶级”应当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中国哲学

会,政治学会,生物学会,地质学会……大小公私团体不下百十种,梁先生参加过多少次这种团体聚会?就如说是文学团体的聚会,私人集会,事实上梁先生参加过有多少?事实上这些聚会又都是言不及义,除虚与应酬与恭维就无可作?我倒同意梁宗岱先生另外说文坛流弊根源那几句话,以为很诚恳动人,其中或有一二错字,意思是明白的。

但是我那篇文章所抨击的,又不止文坛上一种恶倾向而已。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便会发见我们学术界流行着一种浮夸,好炫耀,强不知以为知,和发议论不负责任的风气;那才是我们文坛底流弊的根源。

我以为值得凡是拿笔——尤其是拿笔议论人或讨论事的朋友注意。因为这种注意可以去掉执笔的一些不必需的傲慢,却又可稍微增加一点应有的谦虚。写出来的文章也许不那么雄赳赳,理直气壮,热烈兴奋,但自己立场总站得稳一点,也就比较容易接近“真理”。真理是一个渺茫名词,就常识言,不妨说它容易有“效果”;如作者所等待的效果。一篇批评文章辞胜于理,而又气胜于辞,它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本文第一点说的是滥用名词不可免。因为许多名词在专家和流行习惯下使用时,含义不一致,值得原谅。第二点说的是滥用名词不可免,或错误,或轻重失宜,有心人欲救济,也不一定必需照法国式一枪一剑,因为它求不出结论,如梁宗岱先生办法即是一例。综合两点得来一个结论,却是盼望拿笔的用笔时谨慎一些。在个人机会上有到法国或英国跟名流谈天的,在职业上有教授和专家,容许他因此对于个个生活多得一种精

神上的乐趣,和身分上的自尊。也许可朋友,因自己年纪轻轻,用“我不明白不妨事,你还不应当明白吗”态度而增加被指摘的揶揄分量,得到快乐。但拿笔发表意见时,还是同样应负责的。批评要效果,不只是自己写出,得到情感排泄的痛快,同时还要给被批评者看,令他首肯,还要给一般人看,觉得坦白而公平。

梁宗岱先生求真的方法,可说代表一种风格,吵吵嚷嚷的风格。不嫌褻渎,作个俗气的譬喻,这是江北娘姨街头相骂的求真,有时是声音大能持久就可成功的。若我们觉得这太需要精神,不大经济,还不如学学“在帮的”吃讲茶^①办法,压住气谈谈好。在帮的谈的不过买卖妇女占夺权利俗事,但说理方法却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取法。

至于文学的进步,在一篇文章中寻章摘句,或筵席上一剑一枪,即便是极重要的,事实上恐怕也只有少数人如梁宗岱先生可作,因为这需要丰富的学问,以及在一个名词上求真的兴味。至于大多数人,倒似需要从大处看,明白中国情形,(不提国家至少也应当明白中国文学过去当前的情形,)知道想分担这个建设的光荣,得低下头来苦干,不自满自骄,也不妄自菲薄;不因自己一点长处忘却世界之大,也不因为珠玉在前即不肯努力。诚于工作而不必急于自见,不至于因一时得失而转变不已。各有所信也各有所守,分途并进且相互尊敬。批评它的得失者,能虚心客观的去认识它,明白过去和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形,再从此推测未来,比较有意义些,说的也中肯些。要进步,期以十年,必然会得到相当的进步。若说堕落和危机呢,似应当由三种人负责,一是写作态度不诚实,或变相抄袭,不觉得可耻,又善于作伪,用各种方法推销其作品的作者。二是见解窄,野心大,知道的有限,话说的极多,毫无真实信仰,唯利其

趋,反复无常,却常居领导地位的论客。三是又热心,又诚实,不过英雄气分太强,自视太高,容易把写作(不拘是论文,批评,创作)当成排泄情感的工具,不大明白自己也不大明白读者的人物。这三种人在许多情形下,都将成为进步的绊脚石,但也在可能机会上,大有助于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第三种人。)正因为我们背后还有一个无言者“时间”,虽沉默却比较公正,将清算一切作品,也教育一切作家。“信天翁”^②是我们用来嘲笑不负责之徒的名词,但一个作家在工作上尽责,在时间上等待,却并不十分可笑。一个关心目前中国文学,又明白文坛内情的人,一定会承认口号多,问题多,战争多,只缘于作家中忍受寂寞甘于作信天翁的太少。一些很有前途的作家,都在一面写作,一面推销忙碌情形中混,时间不能帮助他反而毁了他。从这种当前的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未来,未来的希望或危机,与其说是在“思想抉择”上,不如说是在“写作态度”上。

六月五日北平

本篇发表于1937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署名上官碧。

① 吃讲茶 旧时民间以喝茶形式,邀约当事双方谈判、协商,调解、平息双方之间的矛盾与纠纷。

② 信天翁 鸟名,为旅鸟及冬候鸟。

关于看不懂

适之先生：

《独立评论》（二三八期）载了一篇絮如先生的通信，讨论到一个问题，以为近年来“不幸得很，竟有一部分所谓作家，走入魔道，故意作出那种只有极少数人，也许竟没有人，能懂的诗与小品文”。从那个通信，还可知道絮如先生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已然教了七年书。他的经验，他的职务，都证明他说那些话是很诚实很有理由的。但就他所抄摘的几段引例，第一是卞之琳^①先生的诗，第二是何其芳^②先生的散文，第三是无名氏^③大作。卞之琳的诗写得深一点，用字有时又过于简单，也就晦一点，不特絮如先生不懂，此外或许还有人不大懂。至如何其芳的散文，实在说不上难懂。何先生可说是近年来中国写抒情散文的高手，在北大新作家群中，被人认为成绩极好的一位（其散文集《画梦录》，最近且得到《大公报》文艺奖金）。但絮如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却说简直不知道作者说的是什么。同时您的按语，也以为写这种散文，是“应该哀怜”的，而且以为“其所以如此写些叫人看不懂

的诗文的人，都只是因为表现能力太差，他们根本就没有叫人看得懂的本领。”我觉得有些意见，与你们稍稍不同，值得写出来和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谈谈。

一、为什么一篇文章有些人看得懂，有些人却看不懂？

二、为什么有些人写出文章来使人看不懂？

三、为什么却有这种专写些使人看不懂的文章的人？

四、这种作家与作品的存在对新文学运动有何意义？是好还是坏？

我想先就这四点来作一个散文走入魔道的义务辩护人，先说几句话。

其一，文学革命初期写作的口号是“明白易懂”。文章好坏的标准，因之也就有一部分人把他建立在易懂不易懂的上头。这主张是您提出的，意思自然很好。譬如作一篇论文，与其仿骈文^④，仿八股文，空泛无当，废话一堆，倒不如明明白白写出来好些。不过支持或相信这个主张的人，有两件事似乎疏忽了。一、文学革命同社会上别的革命一样，无论当初理想如何健全，它在一个较长时间中，受外来影响和事实影响，它会“变”。（且会稍稍回头，这回头就是您谈中国西化问题时所说的惰性。适宜于本来习惯的惰性。）因为变，“明白易懂”的理论，到某一时就限制不住作家。二、当初文学革命作家写作有个共同意识，是写自己“所见到的”，二十年后作家一部分却在创作自由条件下，写自己“所感到的”。若一个人保守着原有观念，自然会觉得新来的越来越难懂，作品多“晦涩”，甚至于“不通”。正如承受这个变，以为每个人有用文字描写自己感觉的权利来写作的人，也间或要嘲笑到“明白易懂”为“平凡”。作者既如此，读者也有两种

人，一是欢喜明白易懂的，一是欢喜写得较有曲折的。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一篇文章有些人看不懂，有些人又看得懂的原因。

其次，有些人写文章看不懂，您的意思以为是这些人无使人明白的表现能力。据我意见，您只说中一半。对于某种莫明其妙的摹仿者，这话说得极有道理。但用它来评当前几个散文作家的作品，和事实似乎稍稍不合。事实上当前能写出有风格作品的，与其说是“缺少表现能力”，不如说是“有他自己表现的方法”。他们不是对文字的“疏忽”，实在是对文字“过于注意”。凡过分希望有他自己的作者，文章写来自然是不大容易在短时期为多数人全懂。（除非他有本领用他的新风格征服读者，他决不会与多数读者一致。）不特较上年纪的读者不懂，便是年事极轻的人也会不懂。不过前者不懂（如絮如先生），只担心文学的堕落，后者不懂（如一般学生），却摹仿得一塌糊涂罢了。

其三，这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是就作者说，他认定一切站得住的作品都必需有它的特点，这特点在故事上固然可以去努力，在文字修整排列上也值得努力。一是就读者说，读者不懂不一定是多数，只是受一个成见拘束的一部分。既有读者，作者当然就会多起来了。

其四，由第一点看去，中国新文学即或不能说是在“进步”，至少我们得承认他是在“变动”。目的思想许可它变，文体更无从制止它不变；就它的变看去，即或不能代表成就已经“大”，然而却可说它范围渐渐“宽”。它固然使中学生乐于摹仿，有不良影响，容易引起教员的头痛，对新文学的前途担心。但这些渐渐的能在文字上创造风格的作者，对于

中国新文学的贡献，倒是功大过小。它的功就是把写作范围展宽，不特在各种人事上失去拘束性，且在文体上也是供有天才的作家自由发展的机会。这自由发展，当然就孕育了一个“进步”的种子。

适之先生，如今对当前一部分散文作品倾向表示怀疑的，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表示怜悯的，是一个文学革命的老前辈，这正可说明一件事，中国新文学二十年来的活动，它发展得太快了一点，老前辈对它已渐渐疏忽隔膜，中学教员因为职务上关系，虽不能十分疏忽，但限于兴趣认识，对它也不免隔膜了。创始者不能追逐时变，理所当然。但一个中学教员若对这种发展缺少认识，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我认为真真成问题的，不是絮如先生所说“糊涂文”的普遍流行，也许倒是一个中学国文教员，在当前情形下，我们应当如何想法，使他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过去，现在，得到一个多方面的合理的认识。且从这种认识上，再得到一个“未来可能是什么”的结论。把这比较合乎史实的叙述也比较健全的希望，告给学生，引导学生从正面去认识一下中国新文学，这件事情实在异常重要。不过关于教员这点认识，是尽他自己去努力好些？还是由大学校帮他们一个忙好些？中学教员既多数是从大学出身的，由大学校想办法应当方便得多。

我这点看法假若还有一部分道理存在，我们不妨就一般大学校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表上，看看负责的对这问题有多少注意。检查结果会有点失望，因为大学校对它实在太疏忽了。课程表上照例有李白杜甫或《文选》^⑤的专题研究，有时还是必修课，一礼拜上两小时，或四小时，可是把明清“章回小

说”的研究列入课表上的就很少，至于一个学校肯把“现代中国文学”正式列入课程表，作为中国文学系同学必修课程的，那真可说是稀有的现象。（有的学校虽有一两小时“文学习作”，敷衍敷衍好弄笔头的大学生，事实上这种课程既不能造就作家，更不能使学生有系统的多明白一下新文学二十年来在中国的意义。）大学校对这件事的疏忽，我们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受规则影响，好像世界各国大学都无此先例，中国当然不宜破例，减去文学系的尊严。二是受事实拘束，找这种教授实在不容易。重要的或者还是“习惯”。负责的安于习惯，不大注意中国特殊情形。临到末了，我们不能不说各大学负责者对于这问题认识实在不够。因为他如若明白中学生读的课本虽一部分是古典作品，其余所看的书大部分都是现代出版物，中学生虽得受军训，守校规，但所谓人生观，社会观，文学观，却差不多都由读杂书而定。感于这个问题的重大，以及作中学教员责任兴味对学生关系如何密切，也许在大学课程中，会努力打破习惯，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员的朋友必修课。若说教员不容易得到，为什么不培养他？为什么不再打破惯例，向二十年来参加这个活动，有很好成绩，而且态度正当思想健全的作家去设法？

我想提出这个问题，请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责人注意注意。且莫说一个教师对于文学广博的欣赏力，如何有助于学生。只看看教育部课程标准，在初中一年级教本中，语体文即占百分之七十，高中教本语体文依然还有一部分。可是那些人之师在学校读书时，对这方面

的训练，有的竟等于零。他不“学”，怎么能“教”？这不特是学校的疏忽，简直是教育部的过错。

我很盼望听听您对这问题的意见。

沈从文

六月十八日

本篇发表于1937年7月4日《独立评论》第241期，署名沈从文。

① 卞之琳 现代诗人。

② 何其芳 现代诗人、作家。

③ 无名氏 原名卜宝南，现代作家。

④ 骈文 文体名，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全篇以双句、骈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

⑤ 《文选》 总集名，南朝梁萧统编选。

再谈差不多

去年冬天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某一期上写了一篇文章，大意说：“近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品，似乎由于风气的控制，常在一个公式中进行，容易差不多。文章差不多不是个好现象。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所谓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要从一堆内容外形都差不多的作品达到成功，恐怕达不到。”这篇文章随后是被《书人月刊》，《月报》转载过的。

因为文章正搔着一些人的痒处，所以这问题忽然就热闹起来了。热闹即所谓反响，劝作家用脑子得来的反响。这反响是我料得到的。不拘左或右，习惯已使人把“思索”看成“罪恶”，我却要一些人思索，当然有反响。不过就一篇文章来作寻章摘句的反对，虽人人可以说几句话，事实上或前或后大家还得承认“差不多”现象在文学作品上的确存在。或说这存在是“必然”的，“必需”的，或又从反面说，“这

个那个都并非差不多！”综合看来倒恰好证明我那小文所说的即或不完全对，至少有一部分已触着了了一个问题，一个中国新文学运动发展上值得注意的问题。作家应如何写作，宜用什么作品和读者对面？等待回答。

最好的回答倒是鲁迅先生的死，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最伟大人物”。伟大何在？都说在他性格、思想、文章比一切作家都深刻。“比一切作家都深刻”，这是从万千纪念文章中抽出的结论！倘若话是可靠的，那鲁迅先生却是个从各方面表现度越流俗最切实的一位。倘若话是不可靠的，那一切纪念文章都说错了，把鲁迅先生的伟大估错了。

这件事并不能平静一切随之而起的嚣扰，另有原因。护短为近代中国作家一个特色，作家是从不用自己的矛试试自己的盾的。所以不问事实如何，提出差不多问题的人，若是自己一伙，还不免认为“胡闹”，认为“有意在分化前进同志的战斗”，认为“反对爱国”，终止于认为是“汉奸”。若一个无党派的自由人，自然更容易得罪人了。事实上我们看惯了十年来文坛上各种希奇古怪的诬蔑造谣，对这些话自然也就不会有何气愤，只觉得情形十分可悯。

尤其是为一些身住小城市，对国内文坛莫明其妙的人，跟随着人云亦云，觉得可悯。

作者在本文上曾事先声明，“发生笔战，无从奉陪”，所以沉默下来，看看作家（我指的是真正在拿笔写作的作家，一些自称为作家并不写作的人不放在内），要他自己有点成就，要“作品”在社会上留个印象，是走鲁迅那么一条比一切深刻的路好，还是走张三李四赵五钱六多一个或少一个都无关系的路好。是好好的多用点心思，写出些有风格有个性

有见解的作品好，还是不思不想写点不三不四应景凑趣小文，且跟随着风气来嚷嚷骂骂好？

反响不过是一种人事上的摩擦，所以反响尽管热烈，作家中且俨然各有义务为差不多作辩护，到他自己拿笔时，还是愿意把他作品写得像样一点，无论任何一方面都比人不同一点。除了投机者与冒险家以及热中护短的在外，凡真有远见，注意国家情形熟习文坛状况的人，都不能不默认作品在差不多倾向下，实在难以为继。且明白在受主义统治和流行趣味所支配时，好作品不易产生。要中国新文学有更好的成绩，在民主式的自由发展下，少受凝固的观念和变动无时风气所控制，成就也许会大一些。并且当朝野都有人只想利用作家来争夺政权巩固政权的情势中，作家若欲免去帮忙帮闲之讥，想选一条路，必选条限制最少自由最多的路。换言之，作家要救社会还得先设法自救，自救之道第一别学人空口喊叫，作应声虫，第二别把强权当作真理，作磕头虫。若说信仰是必需的，也得有点真信仰，别随风气压力自己老是忽左忽右，把近十年来新文学在读者间建设的一点点信用完全毁去。

得到多数不是什么可笑的奢望，但也不是什么很容易的工作。不管那左翼文学或民族主义文学，你得有“作品”，你的作品至少得比同时别的产品高明些，精美些，深刻些，才有人愿意看，看了又才可望引起良好作用。你个人所有作品内容若差不多，假若我是个读者，就只看一本。你和你朋友的作品若差不多，看过你的他的我就不用再看。（因为要有影响，那一本书就会有影响，不必看十本书。若无影响，多看还是毫无意义。）大家不想办法避免作品表现的雷同，若只能

把提出这问题的人，用各种不相干的丑话骂骂，还造作出些无稽的罪名，读者对这种方法，还是会感到厌倦。要用作品作什么运动，不会有结果。要在作品以外支持原有的地位，支持不下去。要得到多数，教育多数，所能作的事，至多不过是“大世界”一类地方所已作的事，热闹一场完事。

我们尝见到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要大众，要多数，表现的是同情他们，了解他们，事实上结果倒很容易变成所要的只是大众知道有个某某，在同情他们，了解他们，要大众承认那个人是他们中唯一的英雄，唯一的爱国志士。结果大众虽知道了这个人，可是这个人既不曾好好的真正的去注意过国内一切活人的情形，也并无兴味作这件事，倒老是住在南方或北方一个都市里，即便是都市，都市里上层生活沾不着，下层生活又插不进。既轻视道德，又害怕罪恶（对所谓道德或罪恶也就永远不能有何具体认识）。生活在一个很窄小的圈子里，仅有的少数朋友或同行。工作虽说是为人类正义或真理，情感反应却走不出少数又少数的同行友敌文章范围中。若这人当真还有点热情，有点信仰，间或还会幻想用作品改造社会，推动革命，使人类生活进步一点，完美一点。若是假志士，目的倒只想用不诚实的行为，在读者间建设一个好印象，奔走钻营，机会来时得便作官。个人可以“成功”，对真正那个改造社会的革命，实无关系（那是出生入死的实行者的功绩）。对那个接续历史的文学，又无成绩（那是埋头苦干的努力者的成绩）。有热情有信仰的人，热情误用，信仰容易转人空虚，我觉得实在可惜。无热情无信仰而装作雄赳赳的人，照例善观风色，随时转变，我当应为他道贺。因为他们要个人“成功”在这个乱糟糟的社会中，原有许多机会

可以成功。可是他们虽建树了自己，却毁坏了中国新文学的前途，因此一来出版业在读者间应有的信用，难于维持，同时这种出版者再也不能和作家间维持已有信用。当前的情形就可证明。

我说的是一点“事实”，就个人十年来在所谓文坛中观光认识的平常事实。“实现的”或近似这类名词虽为每一个论客常常提出，照例大多数作家倒不乐意和这种事实对面。只因为事实将引起一部分人幻想的破灭，也不免损害另一部分人做作的尊严。但是明白承认它对一个真实作者未尝无好处，正可藉此反省一下，怎么办工作能够更有意义一点。对一个冒牌作家或者也有好处，由此可以重新走一条路，譬如说，放下文学，走更稳当更便利的成功之路。其中只有一种人真正要受损失，就是分布国内各地天真纯洁的读者。他们的年龄，他们的环境，都是不宜与事实上的人生对面的：要希望，对某种不可能的事有所希望；要崇拜，对某种有形无形的偶像徒然的崇拜。明白这个事实可糟了。心热一点，便会随同人乱骂一通，以为谁已“落伍”，谁是“汉奸”。心冷一点，必然异常灰心，对一切社会人事而灰心。

不过我的希望却是要这种人从事实上得到一点教训，学习自己用脑子来重新思索。现在要生存，将来要写作，都先应自救，从个人盲目信赖的情感主义救起。应明白目前有些作家拿手好戏不是写作，只是策略。策略虽能造就一个作家的地位，并不能造就一个作品的价值。若把社会和个人看得清楚一点，自会明白一个国家的建设或改造，决不是三五个拿笔的人空口说白话办得好。能嚷会骂的不过只是能嚷会骂，用他的嚷骂来爱国，虽然他用的方式能在一时间排除你情绪

上的郁结，也可以振作一下你萎靡不振的精神。真正在求国家进步，由进步而得到解放，爱人类真理且为真理而努力的，或者倒是在各种科学研究室埋头工作的，各种事业上认真苦斗的，作地质调查的，作铁道水利建设测量的，改良农产的，办理乡村教育的，此外还有那分布在国内各大都市的几百万工人，分布国内各处生活极苦的几千万农民，和生活极苦同时还拘束极严的几十万兵士。这些人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所受的困辱，他们长久的忍耐，在忍耐中的向上求进步，我们胡胡涂涂活在都市里的读书人，把生活和他们对照起来时，真应当如何自愧！年轻人倘若有一点无所归宿的宗教情绪，要找寻崇拜的对象，与其对喉咙响亮空头作家倾心，倒不如去注意另外那些人，了解他们，再崇拜他们。他们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崇拜的英雄。崇拜一个作家，只能支持你的空想，崇拜这个民族的无言者，却能够引起你对事实感到那种应有的庄严，把“战争”或“改造”这一类名词，看得更切实更具体。到各方面迫促战争或改造不可避免时，你才知道如何在本分上尽责；才会如何为人类正义而尽责。

本篇发表于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第1卷第4期。署名炯之。

对新文学有贡献的湖南人

欧阳予倩：辛亥革命最大的动力，为留日学生和新军。配合留日学生的革命潮流，当时重要文化工作是“文明戏”，最重要的组织为“春柳社”^①，这是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欧阳予倩是这个团体中的知名分子。欧阳先生对于话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戏剧运动史第一章上必须提到的。

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写的《留东外史》，是以辛亥革命时代留日学生的种种活动为背景，写得有声有色。这个作品连缀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般说来，虽常把他称作礼拜六派的代表作品，然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的优越技术，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至今为止，尚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一问题，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

孙良工：在“五四”前后，一般人深以旧工具难表现新

思想，因之才有新文学运动。所以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运动。这个运动期的理想之一，是多数人能用笔，能有勇气从学习观点上试用手中一支笔。然如何用笔？标准何在？在当时大有助于一般中学教员国文教学和初学执笔从事写作的，是孙俚工先生写的《新诗作法》一类启蒙书。这些为中学示范参考读物，目下说来似无何等价值，但在当时一般社会是有它的广泛意义的。

李青崖：文学运动初期，以团体言，新潮社与文学研究会，实为两个领导组织。文学研究会因出版机构的控制，无形中成为独占局面。文学研究会的贡献一部分在翻译，法国短篇小说，第一手莫泊桑^②的全集是由李青崖先生一人努力作完的。检讨近三十年新文学运动各部门成就时，吾人似觉得短篇小说实有相当收获，则李青崖先生介绍莫泊桑的贡献也就不言可知了。（至于莎士比亚几个剧本能与中国读者见面，实应当感谢田汉先生。）

袁昌英：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翻译介绍实有极大贡献。袁昌英女士是湖南女作家最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希腊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成仿吾：文学研究会的文坛独占，有他的贡献，也有他的弱点。最大弱点，即倾向一致性，使文运受限制拘束，不易作更多方面试验与发展，无名作家在此种独占趋势中，欲抬头更不容易。创造社^③因之以破藩抉篱为目的，自张一军，

纯粹以文学研究会为对象，建设一种新的作风。属于创造社，成仿吾先生以一个批评家充满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强、泼辣精神，来写新的批评，打破独占趋势，使新文学运动走向一条更宽广的道路。吾人论及现代中国文学时，尽管有更大成见或偏见，也不能疏忽或抹杀其一支笔所成就的事功。

田 汉：新文学运动在试验中发展，受当时理论观念拘束过大，笔下忘不了问题，因而不能见出如何特别成就。直到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始有两个作家以抒情方式写独幕剧。田汉先生是在南方写独幕剧最先得到成功的一位作家，也是“五四”以后对剧运努力，使之学术化、职业化，又使之与政治发生联系，最具热忱和勇气而得到相当成功的一位。

向培良：民十五左右，革命前期，中国一般思想新旧的矛盾对立，以及其不自然混和，形成文学运动一种新的要求，这要求在北方产生若干小文学团体。狂飙社^④是当时比较泼刺有生气的-一个团体。向培良先生是那个团体中写批评有希望的一位。可惜因时代变动过剧，还得不到好的发展，团体一分解停顿，个人也埋没无闻了。

白 薇：新文学运动虽概括了文学各部门，各部门的发展实不一致，亦若不相联系。企图将诗歌与戏剧合而为一来写诗剧最成功的一位，是白薇女士。她的《琳丽》的出版，在民十五以前被誉为十本大作品之一种。

黎锦明：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自鲁迅先生用乡村风土为背景写成他的《呐喊》《彷徨》后，当时湖南青年作家作品从之取法，具有一新的风格，得到鲁迅称赞的，为黎锦明先生作品。

刘梦苇：新文学运动诗歌部门，在民十四五可说是新月社诗派的前期。就中有一个作者，以文字排比、格律谨严见称，名刘梦苇的是湖南人。

谢冰莹：民十六北伐，谢冰莹女士用北伐作背景写成《一个女兵的自传》，曾为林语堂^⑤先生译成英文，得到相当成功的，也是湖南人。

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的青年作家。刘大杰先生在创作方面虽无如何特别成就，近十年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魏晋思想研究综合前人意见整理排比，写了几部书却有相当贡献。

舒新城：在出版方面，则主持中华书局编务的舒新城先生，对新文学丛书的印行，实相当注意。

向达：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研究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

发源，讲经中俗讲研究报告，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治学，为人的诚恳态度，尤足为吾湘青年朋友取法。

本篇发表于1946年7月10日《湖南日报》。署名沈从文。

① 文明戏 中国早期话剧，1910年后盛行于上海、汉口等地。

春柳社 清末综合性艺术团体，以戏剧为主，1906年成立于日本东京。

② 莫泊桑 法国小说家。

③ 创造社 五四时期重要文学社团，1921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

④ 狂飙社 现代文学社团。

⑤ 林语堂 现代作家。

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新文学运动起于“五四”，随同“社会改造”运动而来。当时认为谈思想解放和改造，与工具大有关系。旧工具难于表现新思想，因之才有“新文学运动”，所以这件事可以说即“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运动。然而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便利的发展，却还有个前期——酝酿期作背景，培植了承受这个新运动的心理基础。这事似乎得从“五四”上溯到清末民初。外来影响当为梁任公^①先生，年纪还不到三十，即来湖南讲新学，具有极大的刺激性。讲学在当时实多忌讳，虽得力于湘抚江西陈宝箴，及其公子三立先生^②，努力促其实现，则为吾湘熊希龄^③先生。然对于新问题的认识与发现，且企图从一较新的学术观点上，用一种较新的方式加以处理，这种有创造性革命性的工作，前辈值得我们特表敬意的，实应数谭嗣同^④先生和易白沙先生。

辛亥革命的大动力，为留日学生和新军，配合留日学生的革命潮流，当时重要文化工作是“文明戏”，最重要的组织为“春柳社”。（“文明戏”三个字在当时实如字面意思，代表启迪新知而灌输文明，并无轻薄鄙视意味。）这个号称中国第

一个话剧团体，湖南人欧阳予倩，是这个团体中知名分子。欧阳先生对话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戏剧运动史第一章上必须提到的。至于记叙这个时代留学生的种种活动，写得有声有色，人物性格突出于背景，为“五四”前最有号召力一个小说作家，一种作品，实应数“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先生）写的《留东外史》。这个作品连缀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裁写成，一般来说，虽常常把他称为“礼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学运动所致力攻击的“黑幕派”^⑤作品之一种。然吾人若能超越时代所作成的偏见，来认识来欣赏时，即可知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的优秀技术，给读者印象却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至今为止，即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一问题，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

“五四”到了，湖南人的响应，表现于爱国行为，激烈处在全国中首屈一指。虽然这种“极端性”近于三楚青年的本来，然亦有扩大此动力原因与背景。重要的是长沙几个中学校的主持人，自由开明思想的浸润影响极大。易寅村先生主持省一师范，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泽东先生，即当时教员之一，彭施滂先生主持桃源女师许多年，男女同学运动，女子剪发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此外省中私立中学如胡子靖老先生主持之明德中学，平时学课虽以谨严见称，然学生活泼性即从未减少；此外兑泽、岳云、广雅^⑥……无不各有所长，学生活动能力，且因相互竞争而得到更多表现机会。这个向前、向上情感反应于文学运动，则为报纸、杂志的兴起与普遍流行。对于写作且能守住一个基本原则，即工具重用必用在社会重造理想上。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虽并未曾产生如何知名作家，如何重要作品，实产生了许多革命斗士。

学校中自由开明思想影响及教学方面，与社会发展相配合，外省教员如王鲁彦、赵景深^①两先生，是以世界语专家或作家身分来教书的。至如本省主讲文史的教员，如曹典祺、曹礼吾……诸先生，可以说，湖南有这种学识丰富、坦白热忱的教师，实为湖南的光荣。诸先生在教学上的贡献，比起近三十年来所谓伟人达官的政绩与事功，是远过十倍的。

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有十年试验期间。这个运动初期的理想之一，是多数人能用笔能有勇气从学习观点上试用手中一支笔。然如何用笔？标准何在？在当时，大有助于一般中学教员国文教学和初学执笔从事写作的，或应数孙佺工先生编写的《新诗作法》一类启蒙书。这些为中學生示范参考读物，目下说来似无何等价值，但在当时一般社会是有它的广泛意义的。文学运动的初期，以团体言，“新潮社”与“文学研究会”实为两个领导组织，文学研究会受出版机构的控制，更无形中成为独占局面。文学研究会的贡献一部分在翻译，法国短篇小说第一手莫泊桑的全集，是由长沙李青崖先生一人努力作成的。检讨近三十年新文学运动各部门成就时，吾人若觉得短篇小说实有相当收获，则青崖先生介绍莫泊桑的贡献也就不言可知了。（至于莎士比亚几个剧本能与中國读者见面，却应当感谢田汉先生。）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翻译介绍实有巨大贡献。袁昌英女士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先露面的一位，也是目前治希腊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文学研究会的文坛独占，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弱点，最大弱点即倾向一致性，使文运受限制拘束，不易作更多方面试验与发展。无名作家在此种独占趋势中，欲抬头更不容易。民十一年左右，“创造社”因之以“破藩扶篱”为目的，自张一军，且纯粹

用文学研究会作攻击对象，建设一种新的作风。属于创造社，成仿吾先生以一个批评家充满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强、泼辣精神，来写新的批评，打破独占趋势，使新文学运动走向一个更宽广的道路。吾人论及现代中国文学时，尽管怀着更大成见或偏见，也不能疏忽或抹杀其一支笔所成就的事功。

新文学运动在试验中发展，受当时理论观念拘束过大，笔下忘不了“问题”，因而不能见出如何特别成就。直到民十四五年以后，始有两个作家从抒情方式写独幕剧。在北方，为丁西林先生，在南方，则为田汉先生。田汉先生是在南方写独幕剧最先得成功的一位作家。也是“五四”以后对剧运努力，使之学术化，职业化，又使之与政治发生联系，最具热忱和勇气，而得到成功的一位。

民十五左右，革命前期，中国一般思想新旧的矛盾对立，以及其不自然混合，形成文学运动的一种新要求。这要求在北方产生若干小文学团体，狂飙社是当时比较泼辣有生气的一个小团体。向培良先生是那个团体中写批评有希望的一位。可惜因时代变动过剧，还得不到好好的发展，团体一分解停顿，个人也埋没无闻了。

新文学运动虽概括了文学各部门，各部门的发展实不一致，亦若不相联系。企图将诗歌与戏剧合而为一，来写诗剧最成功的一位，是白薇女士。她的《琳丽》的出版，在民十五以前，被誉为十本大作品之一种，同类作品中，无可并提的。相似而不同，由儿童教育歌剧起始，转而为职业歌舞团活动，与文学运动游离，与初期电影结合，论作用影响实不大好的，论成就亦热闹一时，则为黎锦晖先生的《毛毛雨》梨花歌剧团工作。

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自鲁迅先生用乡村风土为背景写

成他的《呐喊》、《彷徨》后，当时湖南青年作家作品从之取法，具有一新的风格，得到鲁迅称赞的，为黎锦明先生作品。

新文学运动诗歌部门，在民十四五可说是新月社诗派的前期，就中有一个作者，以排比文字，格律严谨见称，名刘梦苇，是湖南人。民十六北伐，以北伐作背景写成《一个女兵的自传》的谢冰莹女士，曾为林语堂译成英文，得到相当成功的。作者也是湖南人。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的青年作家。刘大杰先生在创作方面虽无如何特别成就，近十年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魏晋思想研究，综合前人意见，整理排比，写了几部书，却有相当贡献。

在出版方面则主持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先生，对新文学丛书的印行，实相当注意。

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发源于讲经中“俗讲”研究报告，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治学，为人的诚恳态度，尤其为吾湘青年朋友取法。

民廿左右，在国内小说作家中有两位湖南作家，最为读者所熟悉，即张天翼先生和丁玲女士。丁玲女士可说是革命成功后十年女作家中获得读者注意最多的一位。也是左翼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张天翼先生，则作品素以从语言中表现中层分子人物性格身分见长。文字风格独具，诙谐中有悲悯情感浸润，为一般作家不可及。所作童话，虽因笔下较粗，“讽刺”分量多于“抒情”，难称理想佳构，惟依然为叶

圣陶先生写《稻草人》后一个现代童话作家代表。对于现实敏锐的讽刺，是充满战斗气味的。

就个人所知，大略来说，吾湘人对于近二十五年新文学运动的努力，实已作出相当贡献，无负于时代所给予的机会。许多人对于工作的谨严态度，说来都值得我们增加敬重。至于工作的成就，有些作品无疑是可以留下来，成为时代进步里程碑的。个人于此，有一点小小感想，即楚人历史传统的激情，极容易形成性格上的孤立性和悲剧性。竟若自然的分定无可避免。在文学运动上，或尚可从异途同归中见出进步成绩。在军人中则“互不相下”与“人自为战”，长处与弱点已平分。在政治上则易创始而不能守成，能得人信托而不善适应机会。在读书人中，却臭草与香花杂植，好的极好，坏的也就特别坏。譬如说，民初有热心民主革命的黄克强、范源濂、宋教仁^⑧、熊希龄，同时也有对帝制特感兴趣的杨度^⑨。当前有覃振、周鲠生^⑩、戴修瓚、胡庶华，同时也就有周佛海^⑪。这种“极端”性继续与扩大，“五四”十年后，已造成湘中青年大规模牺牲，以及当前西北一隅所形成的局势，由此不祥局势发展，对于此后国家重要过程中，还可能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种种麻烦。稍不谨慎，即可使国人的热血，在本国土地上再度横流，消耗国力于无望中。昔人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户虽能亡秦，然在一崭新的时代中，楚人求所以自存，在教育设计上，是值得有心人重新加以注意！三十年来，吾人所得教训经验，实为湖南人应当在一较新观点上、较远理想上，重新学习如何“合作”与“团结”，把各方面因疏远隔阂而分散了的“抽象”或“具体”力量，重新好好结合起来，明日方可望有一真正的转机！否则，即或将军满街、伟人满朝、志士满天下，到头来恐仍不免为某种人用“政术”或“柔术”

个别击破，收拾净尽！欲家乡一切稍稍像样合理，即不可得也。

本篇发表于1946年7月30日上海《大公报·文艺》第43期，署名沈从文。

① 梁任公 即梁启超。

② 陈宝箴 清末维新派人士。任湖南巡抚期间，曾倡办新政，开设时务学堂等。

陈三立 近代诗人。其父陈宝箴创办新政、提倡新学，三立佐之，多所筹划。

③ 熊希龄 早年曾参与维新运动，1913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兼财政总长。

④ 谭嗣同 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⑤ 黑幕派 近代小说流派，其作品多记录社会各种丑恶现象，有的更成为官僚政客相互中伤、攻讦的工具。

⑥ 兑泽、岳云、广雅 均为当时长沙中学名。

⑦ 王鲁彦、赵景深 均为现代作家。

⑧ 黄克强 即黄兴，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

范源濂 早年就读于时务学堂，1905年任清政府学部主事，辛亥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总长。

宋教仁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

⑨ 杨度 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并筹组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后来向往革命，并于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⑩ 覃振 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的秘书长和国会议员。

周鲠生、戴修瓚 均为现代法学家。

胡庶华 现代科学家。

⑪ 周佛海 著名汉奸，抗战时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

一种新的文学观

中日战争由北而南后，好些从事写作的朋友，感觉国家应付这个问题的庄严性，和个人为战争所激起的爱国热忱，兴新的工作的渴望，都干脆简单，向各战区里跑去。有的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来往于南北战区最前线，或转入沦陷区随同游击队活动，日子虽过得异常艰苦，精神实很壮旺，或经常有作品发表，或在准备中有伟大计划等待实现。有些人又因为别有原因，从前方退回来转到几个大都市里住下，用“文化人”身份，一面从事写作，一面还可参加各种社交性的活动，日子似乎也过得忙碌而紧张。又有人退回到原有职务上，或从政经商，或埋头读书，虽然对写作已息手，因为明白了“持久战争”的意义，从抗战建国广泛解释上，过日子倒也还心安理得。就中却有几个朋友，前线奔走二年后，在都市文化人中又混了二三年，再退到一个小地方来消化自己的社会经验和人事印象时，不免对于写作感到厌倦与灰心，且对文学本身表示一点怀疑。战事结束后这种情形且更显著怀疑的是用文学作为工具，在这个变动世界中，对于“当前”

或“明日”的社会，究竟能有多少作用，多少意义？具有这种心情的作家，虽只是个少数，但很可能在某种情形下，逐渐会成多数。平时对文学抱了较大希望与热诚，且对于工作成就又有充分自信的作者，这点怀疑的种子发芽敷荣，不特将刺激他个人改弦易辙，把生命使用到另外工作上去，且因为这种情形，还会影响到新文学已有的社会价值，和应有的新进步。

试分析原因，即可知一种因习的文学观实困惑人，挫折人。这种文学观在习惯中有了十多年历史，已具有极大的势力，不仅是支配一部分作家的“信仰”，且能够支配作家的“出路”。一般作家虽可以否认受它的“限制”或“征服”，实无从否定它的“存在”。我们尽可说这是比较少数论客的玩意儿，与纯粹而诚实的作家写作动机不相干，与作品和历史对面时的成败得失更不相干，然而到我们动笔有所写作时，却无从禁止批评家、检查官、出版人和那个分布于国内各处的多数读者，不用“习惯”来估量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且决定它的命运。这种因习文学观的特性，即“文学与政治不可分，且属于政治的附产物或点缀物”，作家的怀疑，即表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实各有异见。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毁去了文学固有的庄严与诚实。终结是在这个现状继续中，凡有艺术良心的作家，既无从说明，无从表现，只好搁笔。长于政术和莫名其妙者，倒因缘时会容易成为场面上人物。因之文学运动给人的印象，多只具一点政策装点性，再难有更大希望可言。

文学属于政治的附产物或点缀物，这个事件的发展，我曾检讨过它前后的得失，且提出些应付未来的意见。在利害

得失上，虽若比较偏于消极的检举驳议，然而一个明眼的读者看来，会承认原来这一切都是事实，并非凿空白话的。从民十五六起始，作家就和这种事实对面，无可逃避。虽和事实对面，多数人却又不肯承认，亦无努力改正。习惯已成，必然是“存在的照旧存在”，因此若干作家便用一个“犯而不校”态度来支持下去，恰恰和别个的读书人应付社会一般不公正情况一样。低首“承认事实”，与固执“关系重造”，前者既费力少而见功易，所以我爬梳到这个问题伤处时，转若过分好事，不免近于捕风。风虽存在，从我手指间透过，如可把握，无从把握。

文学既附于政治之一翼，现代政治的特点是用商业方式花钱，在新闻政策下得到“群”，得到“多数”。这个多数尽管近于抽象，也无妨害。文学也就如此发展下去，重在短时间得到读者的多数，或尊重多数的愿望，因此在朝则利用政治实力，在野则利用社会心理，只要作者在作品外有个政治立场，便特别容易成功。一些初初拿笔的人，不明白中国新文学搅混入商场与官场共同作成的漩涡中后，可能会发生些什么现象，必然还会有些什么结果，另一方面个人又正要表现，要露面，当然都乐于照习惯方式，从短短时期中即满足一切。这些人也就作成某一时节某种论客说的“政党虽有许多种，文学只有两种，非左即右，非敌即友”论调的基础。许多人在风气追逐中打混下去，于是不甚费力即俨然已成了功。这种成功者若世故与年龄俱增，作品却并无什么进步，亦无可望得到进步，自必乐享其成，在伙儿伴儿会社竞卖方式中，日子过得从容而自在。物质上即或因为抢的是个冷门，得不到什么特别享受，情绪还俨然是尊严而高尚。他若是个

年龄越长越大、经验越积越多、情性却越来越天真、在写作上又抱了过多的热诚（与时代的不合的古典热诚）的人，自必对于个人这点成功，不大满意，对于文学作家中的依赖性，和其他不公正不诚实的包庇性，转趋怀疑。会觉得维持现状，不仅堕落了文学运动固有的向上性，也妨碍这个运动明白的正常发展。文学运动已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作家便再不是思想家的原则解释者，与诗人理想的追求者或实证者，更不像是真正多数生命哀乐爱憎的说明者，倒是在“庶务”、“副官”、“书记”三种职务上供差遣听使唤的一个公务员了。其用以自见于世的方法，再不基于人性理解的深至，与文字性能的谙熟，只是明白新式公有程式之外，加上点交际材干，或在此则唯唯诺诺、或在彼则装模作样，兼会两分做戏伎俩。总而言之，一个“供奉待诏”，一个“身边人”而已。凡有自尊心的作家，不能从这种方式中得到所从事工作的庄严感，原是十分自然的！他若看清楚习惯所造成的不公正事实，和堕落倾向，而从否认反抗下有所努力，不可免即有另外一种不公正加于他的本身。能忍受长久寂寞的，未必能忍受长久苛刻，所以无事可为，只好息手不干。然而这不甘铺糟啜醢的心情，尚难得社会同情，反作成一种奚落，“这个人已落了伍，赶不上时代”。坚贞明知素朴诚实的落了伍，另一些人似乎前进了。试看看近十年来若干“前进”作家的翻云覆雨表现，也就够给人深长思！即始终不移所信所守的有许多人岂不是虽得伙儿伴儿合作来支持他做“作家”的名分，还不能产生什么像样作品？

拿笔的人自然都需要读者，且不至于拒绝多数读者的信托和同感。可是一个有艺术良心的作家，对于读者终有个选

择，并不一例重看。他不会把商业技巧与政治宣传上弄来的大群读者，认为作品成功的象征。文学作品虽仰赖一个商业组织来分配，与肥皂牙膏究不相同。政治虽有其庄严处，然而如果遇到二三与文学运动不相干的小政客，也只想用文学来装点政治场面，作者又居然不问是非好坏，用个“阿谀作风”来取得“风气阿谀”时，不仅是文学的庄严因之毁去，即政治的庄严也会给这种猥琐设计与猥琐愿望毁去！，近代政治技术虽能产生伟大政治家，可不闻在同样安排中产生过伟大艺术家或文学家。一个政治家能在机会中控制群众情感。取得群众好感，并好好用群众能力，即可造成伟大事业。一个音乐家或文学家其所以伟大，却得看他能否好好控制运用音符文字。新闻政策虽能使一个政治家伟大，若艺术家文学家失去与民族情感接触的正当原则，仅图利用政治上的包庇惯性和商业上的宣传方式，取得群众一时的认可，个人虽小有所得，事实上却已把艺术文学在这个不良关系上完全坠落了。近十余年来情形，一个真有远见的政治思想家，一个对新文学发展过程有深刻理解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以及一个对写作有宏愿与坚信的作家，对于这问题得失，都应当清清楚楚。现状的过去，只作成社会上这部门工作的标准纷歧，以及由于这种纷歧引起的思想混乱。北伐统一后最近十年中青年人的生命国力的种种牺牲。三十岁以上的人，必尚保留一个痛苦印象，现状的继续，另一面便作成目下事实：国内少数优秀作家，在剥削与限制习惯中，尚无法用工作收入应付生活。许多莫名其妙的人物，不折不扣的驯侏，倒各有所成，为文运中不可少的分子。事情显明，一种新的文学观，不特为明日文学所需要，亦为明日社会不可少。

国家进步的理想，为民主原则的实现。民主政治的象征，属于权利方面虽各有解释，近于义务方面，则为各业的分工与专门家抬头。在这种情形中，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其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为分工分业，就必需重造。尤其是为政治的庄严着想，更不能不将关系重造。照近廿年来的社会趋势，一种唯利唯实的人生观，在普通社会中层分子中实到处可以发现。许多事业都以用最少劳力得到最大成功为原则，个人或社团的理想，说来虽动人堂皇，实际竟常与得到“数量”不可分，有时且与得到“货币”不可分。中层分子人生观，既在各种支配阶级中占绝大势力，因之在国家设计上，就都不可免见出一点功利气味，看得近，看得浅，处处估计到本钱和子息，不做赔本生意。我们常常听人说到的“现代政治家”，事实上这些人有时却近于一个商行管事，或一个企业公司的高级职员，不过是因缘时会，从信仰这个拥护那个方式中变成一个官僚罢了。这种人精明能干处，虽是应付目前事实，举凡略与事实相远的问题，与小团体功利目的不相符的计划，即无从存在或实现。普通所谓‘思想家’，在一般倾向上，也就不知不觉变成了“政治公文”的训话家或修辞学人物。社会上另一部分有识无位的知识分子，在凝固情感中无可为力，自然只好用个独善其身的退缩态度混下去，拖下去。……然而我们在承认“一切属于政治”这个名词的严肃意味时，一定明白任何国家组织中，却应当是除了几个发号施令的负责人以外，还有一组顾问，一群专家，这些人的活动，虽根据的是各种专门知识，其所以使他们活动，照例还是根据某种抽象原则

而来的。这些抽象原则，又必然是过去一时思想家（哲人或诗人）对于人类的梦想与奢望所建立。说不定那些原则已陈旧了，僵固了，失去了作用和意义，在运用上即见出扞隔与困难。高尚原则的重造，既无可望于当前思想家，原则的善为运用，又无可望于当前的政治家，一个文学作家若能将工作奠基于此种原则的理解以及综合，实际人性人生知识的运用，能用文学作品作为说明，即可供给这些指导者一种最好参考，或重造一些原则，且可作后来指导者的指导。新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的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坚实得多！

一面是如此理想，另一面是如彼事实，如何使文学作家充满新的信心来面对事实证明理想？若说人生本是战争，这件事也就可说是种极端困难的战争！为的是任何合理的企图，若与“习惯”趋势不大相合从习惯而来的抵抗性，都不免近于战争。所以支持这种反清客化的新的文学观，并从据点上有所进取，是需要许许多多人来从事的。这种工作与另外一些从“阿谀风气”得到“风气阿谀”的文人，目的既完全不同，难易自然也无从比较。不过事情虽困难亦不太困难，这从“过去”即可推测“未来”。试数一数初期文学运动对于“腐败现象”“保守观念”所见出的摧陷廓清成绩，以及对于“高尚原则重造”在读者人格中所具有的影响，来和新的问题对面，实不由人不充满乐观信仰。官僚万能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新的国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国家设计一部门，“国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

也惟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相熟或陌生朋友，曾经充满热诚来从事写作，在那个因习文学观困辱下得到成功，又从成功中因经验积累转而对文学怀疑的，我觉得不应当灰心丧气。因为这种认识正可谓“塞翁失马”。我们明日作事的机会，正不可下于另外一种人当前作官的机会，实在多而又多。我们需要的是十分信仰，和九分从“试验”取得“经验”的勤勉，来迎接新的历史。恰如走路，能去到什么地方，不是我们所能预想，也许如此走去到达一个预定的终点，还是毫无所得，必将继续走去，到死为止。正因为对人生命言，死才是一个真正的终点，才容许一个有理想有思想的生命获得真正休息！从文学运动言，必有许多人将生命来投资到这个工作，方可望有作用，见效果，使若干具有新的经典意义的作品能陆续产生！

本篇发表于1946年9月1日《文潮》月刊第1卷第5期。署名沈从文。

文学与青年情感教育

近年来从高考试，留学考试，大一考试，高中毕业会考，各方面出的国文题目中，以及有些考试暗示中，都让我们好像嗅到一点特别空气，即古文的重视，但事实上却又似是而非，正和伟人欢喜和人谈佛学易经一样，不大接头。因为从学术立场来看，最理解古典文字价值和性能的，应当教国内治古文学的专家，这些人的研究报告，即很少还用古文发表。他们且一定明白会不会写古文，对于理解古典接受传统文化实无多大关系，所以近二十年在国内研究文史贡献最大的北方的几个大学，就从不鼓励学生作古文。至于从政治立场来看看，当前一切新政的设计进行的文件，似已即少用古文。纵有些地方，比如香港地方或某种教会学校，还正式禁止学生学习。看。作白话文作品的布告和其他文件，就常常要用纯粹语体文写成，也可知古文用不通。原来古文的俨若受重视，只限于政府各级会考上，以及少数的学校中，与其余完全不相干。因之这种受重视的情形，给人一个奇异印象，觉得这件事有点近于不可解。受重视的结果，既不能增加一般

阅读古典兴趣，更无望提高他们写作古文能力。除却使出题者从受试者窘态上，感觉一点虐待狂的快乐外，可说毫无所得。

当前四十以上的知识分子，谈起三十年前对国家比较进步思想，对个人比较开明的态度，受影响最大的，实在是梁任公先生那种半文不白的文章。那个新文体的运用所发生作用的广泛，即任公先生本人也未必能想及。只因为这个工具的运用，当时限于任公先生个人，不能引起一个广泛的学习运动，因之辛亥革命成功后，大家的注意目标，即一致转移到任公先生笔下所常道的抽象约法和具体议会，不认识这个工具本身单独存在的重要性，结果是袁世凯做了皇帝。袁世凯的死，虽说是起因于一个蔡锷起兵护国，过不久，实力派都掉过头来响应，因而气倒。但使这些拥兵自卫割据称雄的都督将军，从默认到否认，从否认到反抗，拒绝了封王封公的爵禄，觉得中国不应当再有皇帝，任公先生的一支笔，从新再用，写的那些文电，还是大有关系。

五四来了，书呆子的对国家重造幻想，起始在年青人情感中发生了影响，其次在年青人行为上有了表现。行为虽留下个深刻动人印象，可并不能持久。接着还是将文字作“工具重造”运动，广泛试验和研讨，到一年后即得到国家认可，国语白话文由部定作为国民教育唯一工具，新文学因之才会普遍而广大的作用。至于这个工具从报章杂志对于一般人（尤其是大中学生）所发生的影响，如何有助于革命势力的重振，有助于北伐前的种种便利，一个身经其事稍微注意这个过程的知识分子，必然明明白白。北伐成功后不久，随即有政见上的分裂，几回清党十年内战牺牲了万千青年和壮丁。

试追究因果，即可知实由于“思想”分裂而起。涉及抽象的思想，就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毛病出于文字上的第一回疏忽。在民九左右，书呆子用文字所表现的社会重造设计，无从好好的配合政治设计，即发生分歧，当时无人注意，因之种下恶果。到文字在多数人情感中生命中泛滥发酵时，产生那么一个现象，有心人即想用别的方法来补救，已来不及了。

民十八后这个问题似乎从痛苦教训中，大家都有了个较新看法，在朝在野的双方，才来着手经营新文学，争刊物，开书店，办副刊，喊口号，提出与政治有关的文学运动主张和目标，企图使白话文中的文学一部门成就，成为政治之一翼。然而结果却并不怎么好。由于两方面理解这个问题都不够深刻，属于左翼则显明只要用来作工具，点缀政治场而，真正的武器还是看中了那个枪枪炮炮。作家在这种事实下，自不会如何特别成就，经耐久试验。属于政府且更说不上。稍能执笔的都升了委员，主持这部门工作的既无能力又少知识，因此直到战前一年为止，一切活动并点缀性也谈不上。这从当时商业与政治对于这个问题的投资比较也可看出。当新书业已成为一种企业，新出版物的投资且已到数万万元，这笔资本所发生的作用，使得云南甘肃以及东北边省中小学也无新书报流行时，国家为这个事花的钱，每月就还不到三五万元。然而新文学运动却依然在泛滥，由学校而及于社会，不仅巴金茅盾一时节成为国人所熟习的名字，且进而刺激了内地中小学教员学生，不断有新作家新作品产生，这不能不归功于一件事，即廿年来使用这个工具有以自见的，无不起始即抱定一种宏愿与坚信把这个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并非职业，并明确认识，必须从试验中探讨，牺牲大于获得，充满

勇气来从事，从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挫折困辱中挣扎而出，才有那个情形。这也就是直到当前为止，还有大部分作家，觉得在文学运动中，和政治不关联，反而可以使其自由独立健康发展的一个原因。

抗战发生后，政府方面为此问题虽花了点钱，对于这问题也好像有了个较深刻的看法，其实一切还离不了点缀，努力作来结果又照样并点缀效果也得不到。某一时在国内后方数省，似乎到处都可听到人在使用“文化”二字，事实上呢，八年中就不曾听说有个什么年青作家是由文化什么会鼓励扶持而产生。有个什么成名作家，从立法上得到帮助，取得个人应得的生活。教部的学术奖，每年像是照例要点缀点缀各方面，教育部的最高当局，就决不会还想到就中有一本《逻辑学》，曾被指定为国内大学应采用的教本，已十多年。当这个书在某些地方已卖到数千元一册时，作者数年版税的总数，还是法币九元七角五分！文化文化，原来我们就活到这么一种现实文化空气中！奇异的是即活在这种文化空气中，居然还有人写作，把它当成一种无收成的石田耕种下去。工作上庄严感始终未失去，还是紧紧的捏住手中那支笔。其所以能够如此，原因是这种人他明白，现实尽管如何要不得，他的对面还有个“读者”。年青人从近二十年养成的社会习惯上，大部分是用新出版物取得娱乐和教育。一个优秀作家在年青读者间所保有的抽象势力，实际上就永远比居高位拥实权的人还大许多。现实政治聚万千人于一处，名为关心多数争城争地所建树的功勋，即远不如一二书呆子对多数所具有的信用来得可靠而持久。在这个问题上，让我们明白一件重要事情，即语体文中的文学作品，于当前或明日的“国家发展”

和“青年问题”，还如何不可分还可能起些什么作用。政治上的浑沌，若还将继续下去。清明合理一时无可望，凡有做人良心的文学作家，游离于争夺以外，如何近于事势所必然。

本篇发表于1946年9月1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署名沈从文。

废邮存底

废 邮 存 底

FEIYOU CUNDI

《废邮存底》，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7 年 1 月初版。原书中“甲辑”为“沈从文：废邮存底”14 篇，“乙辑”为“萧乾：答辞”15 篇。现仅收其中沈从文所著部分。

原目：一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录、二 给一个写诗的、三 给一个写小说的、四 给一个大学生、五 给某教授、六 谈创作、七 致《文艺》读者、八 元旦日致《文艺》读者、九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十 风雅与俗气、十一 情绪的体操、十二 给某作家、十三 给一个读者、十四 《边城》题记。

其中除《边城》题记已收于第 8 卷《边城》集外，余皆据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编入。

一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录

甲

不要为回忆把自己弄成衰弱东西，一切回忆都是有毒的。

不要尽看那些旧书，我们已没有义务再去担负那些过去时代过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观念了。在我们未老之前，看了过多由于那些老年人为一个长长的民族历史所困苦融合了向坟墓攢去的道教与佛教的隐遁避世感情，而写成的种种书籍，比回忆还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

乙

大概人是要受一种辖治才能像一个人。不拘受神的、受人的、受法律的、受医生的、受金钱或名誉、受过去权威或未来希望，……多少要一点从外而来或自内而发的限制，他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奴性”原是人类一种本能，一个人无所倾心，就不大像一个人了。

失恋使你痛苦也是当然的事，就因为这是你自己选定的

主人。这主人初初离开你时，你的自由为你所不习惯，所以女人的印象才折磨到你的灵魂。觉得痛苦，就让它痛苦下去，不要用酒或用别的东西去救济，也用不着去书本上找寻那些哲理名言。酒只是无用处的人和懦弱的人才靠到它来壮胆气的东西，哲理名言差不多完全是别一个人生活过来思索过来后说出的话语，你的经验，应当使你痛苦，去深深的思索，打发一些日子。唯一的医药还是“时间”。时间使一个时代的人类污点也可以去尽，让时间治疗一下你这个人为失去了“主人”、因理性与感情的自由而发生的痛苦，实在太容易了。

丙

你来信尽提到作家，不要羡慕那些作家，还是好好的作你的物理实验吧。

一个写小说的人算什么？他知道许多，想过许多，写了许多，其实就永远不能用他那点知识救济一下他自己。他的工作使他身心皆十分疲劳，他的习惯罚他孤单独立。……他自己永远同一切生活离开，站得远远的，他却尽幻想到人世上他所没有的爱情和其他东西。他是一个拿了金碗讨饭的乞丐，因为各处讨乞什么也得不到，才一面呻吟一面写出许多好梦噩梦到这世界上来。一个健康人的观念，对于这些人只有“怜悯”的。

丁

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是能用思索的人就目前环境重新去打

算,重新去编排,不是仅仅保守那点遵王复古的感情弄得好的。

与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

不要因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牺牲,就把胆气弄小了。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要杀死许多人,饿死许多人,这数日应当很大很大!综合成一篇用血写成吓人的账目,才会稍有头绪!

戊

一个女人本来就要你们给她思想她才会思想,给她地位她才有地位,同时用“规则”或“法律”范围她,使她生活得像样一点,她才能够有希望像样一点!

女子自己不是能生产罪过的!上帝造女子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用情男子;上帝毫不忽略已尽了他造人的责任。可是你们男子,办教育的,作丈夫的,以及其他制香料化妆品的,贩卖虚荣的,说谎话的,唱戏扮王子小生的,缝衣的,发明鞋子帽子的,……却把女子完全弄堕落了。

廿一年八月(载《现代》杂志)

本篇收入《废邮存底》一书前,曾刊载于1932年9月1日《现代》杂志1卷5期。署名沈从文。

二 给一个写诗的

××：

你寄来的诗都见到了，在修辞方面稍稍有些不统一处，但并不妨碍那些好处。

你的笔写散文似乎比诗方便适宜点。因为诗有两种方法写下去：一是平淡，一是华丽。或在思想上有幻美光影，或在文字上平妥匀称，但同时多少皆得保守到一点传统形式，才有一种给人领会的便利。文学革命意义，并非是“全部推翻”，大半是“去陈就新”。形式中有些属于音律的，在还没有勇气彻底否认中国旧诗的存在以前，那些东西是你值得去注意一下的。“自由”在一个作者观念上，与“漫无限制”稍不相同。胡乱写一点感想，不能算诗，思想混杂信手挥洒写来更不成诗。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可以写诗却并不一定写好诗。好诗同你说的那种天才并无关系，却极与生活的体念和工夫有关系。因为要组织，文字在一种组织上才会有光有色。你莫“随便”写诗，诗不能随便写。应当节制精力，蓄养锐气，谨慎认真的写。

我说的话希望并不把你写诗的锐气和豪兴挫去，却能帮助你写它时细心一点。单是文字同思想，不加雕琢同配置，正如其他材料一样，不能成为艺术，你是很明白的。要选择材料，处置它到恰当处，古人说的“推”“敲”那种耐烦探讨，永远可以师法。金刚石虽是极值钱的东西，却要一个好匠人才磨出它的宝光来，石头虽是不值钱的东西，也可以由艺术家手上产生无价之宝。一切艺术价值的形成，不是单纯的“材料”，完全在你对于那材料使用的思想与气力。把写诗当成比写创作小说容易的，把写诗当成同写杂感一样草率的，都不容易攀到艺术高处去。因为尽有些路看来很近走去很远的，耐心缺少永远却走不到头。

你的创作小说同你的诗有同样微疵，想找出个共通的毛病，我说它写作时似乎都太“热情”了一点。这种热情除了使自己头晕以外，没有一点好处可以使你作品高于一切作品。在男女事上热情过分的人，除了自己全身发烧做出一些很孩子气可笑的行为外，并不会使女人得到什么，也不能得到女人什么。

那些写得出充满了热情的作品的人，都并不是自己头晕的人。我同你说说笑话，这世上尽有许多人本身是西门庆^①，写《金瓶梅》的或许是一个和女性无缘纠缠的孤老。世上有无数人成天同一个女人搂抱在一处，他们并不能说到女人什么，某君也许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光身子女人，他却写了许多由你们看来仿佛就像经验过的荒唐行为。一个作家必需使思想澄清，观察一切体会一切方不至于十分差误。他要“生活”，那只是要“懂”生活，不是单纯的生活。他需要有个脑子，单是脊髓可不成。更值得注意处，是应当极力避去文字

表面的热情。我的意见不是反对作品热情，我想告给你的是你自己写作时用不着多大兴奋。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表现的。

许多较年青的朋友，写作时全不能节度自己的牢骚，失败是很自然的。那么办，容易从写作上得到一种感情排泄的痛快（恰恰同你这样廿二岁的青年，接近一个女孩子时能够得到精力排泄的痛快一样），成功只在自己这一面，作品与读者对面时，却失败了。

本文收入《废邮存底》一书前，曾以《谈诗》为题，发表于1931年6月1日《创作月刊》第1卷第2期，收信人为“家良”。署名沈从文。

① 西门庆 长篇小说《金瓶梅》中主要人物。

三 给一个写小说的

× ×：

前一时因有事不能来光华看热闹，要你等候，真对不起。文章能多写也极好，在目前中国，作者中有好文章总不患无出路的。许多地方都刊登新作品，虽各刊物主持人，皆各有兴味，故嗜好多有不同，并且有些刊物，为营业不得不拖名人，有些刊物有政治作用，更不得不拉名人，对新作家似乎比较疏忽。很可喜的是近来刊物多，若果作者有文章不太坏，此处不行别一处还可想法。也仍有各处碰壁终于无法可想的，也有一试即着的，大致新作品若无勇气去“承受失败”，也就难于“保守成功”，因近来几个“成功”者，在过去一时，也是失败的过来人。依我看，目前情形真比过去值得乐观多了，因作编辑的人皆有看作品的从容和虚心，好编辑并不缺少，故埋没好作品的可说实在很少。不过初写时希望太大，且太疏忽了稍前一点的人如何开辟了这一块地，所用过的是如何代价，一遭失败，便尔灰心，似乎非常可惜。譬如××，心太急，有机会可以把文章解决，也许反而使自己写作受了限

制，无法进步了。把“生活”同“工作”连在一处，最容易于毁坏创作成就。我羡慕那些生活比较从容的朋友。我意思，一个作家若“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也是自己看重自己的方法，这方法似乎还值得你注意。把创作欲望维持到发表上，太容易疏忽了一个作品其所以成为好作品的理由，也太容易疏忽了一个作者其所以成为好作者的理由。自己拘束了自己，文章就最难写好。他“成功”了，同时他也就真正“失败”了。

作品寄去又退还这是极平常的事，我希望你明白这些灾难并不是新作家的独有灾难，所谓老作家无一不是通过这种灾难。编辑有编辑的困难，值得同情的困难。有他的势利，想支持一个刊物必然的势利。我们尊重旁人，并不是鄙视自己。我们要的信心是我们可以希望慢慢的把作品写好，却不是相信自己这一篇文章就怎么了不起的好。如果我们自己当真还觉得需要尊重自己，我们不是应当想法把作品弄好再来给人吗？许多作品，刊载到各刊物上，又印成单行本子，即刻便又为人忘掉了，这现象，就可以帮助我们认明白怯于发表不是一个坏主张。我们爬“高山”就可以看“远景”，爬到那最高峰上去，耗费的气力也应当比别人多。让那些自己觉得是天才的人很懒惰而又极其自信，在一点点工作成就上便十分得意，我们却不妨学伟大一点，把工夫磨练自己，写出一点东西，可以证明我们的存在，且证明我们不马虎存在。在沉默中努力吧，这沉默不是别的，它可以使你伟大！你瞧，十年来有多少新作家，不是都冷落下来为人渐渐忘记了吗？那些因缘时会攀龙附凤的，那些巧于自画自赞煊赫一时的，不是大都在本身还存在的时候，作品便不再保留到人的记忆

四 给一个大学生

× × 先生：

您信收到了，谢谢。

真像你信中说的，我们是“认识”了的。我曾经如此认识许多人，我觉得十分快乐。文字是能使人心与心相通，把人与人距离缩短的。我们全是正在学习用文字表现自己意见或观念的时节，倘若还相信文字可以作到某种工作，当然不应担心失败。生活环境也许不甚如意，但不要气馁，不要烦恼，也不要怕，总得结实硬朗活下去，方算得个活人。中国情形不好，希望他好，就正需要许多青年人“结实做人”，方能个光明的明日可言。我是个乡下人，总相信勇敢雄强的读书做人，是我们青年人一种不可缺少的德性。做文章呢，不要怕失败。做一切事皆不要怕失败。譬如走路，跌倒了，当然得爬起再走。因某种理想死了，也死得硬朗，做个榜样，让还活着的人填补自己的空处。

最要紧的还是不要因为我说学校教育不合用，就轻视学校教育。学校有学校的好处，不过在学校时做文章的方法，

问所谓“创作”稍隔一问罢了。我很羡慕一个人能受大学教育，我尤其尊敬那些能用自己力量不靠家中帮助在大学校念书的人，因为他可以读许多书，知道许多有用的知识！一个人应当知道的太多，能够知道的可太少了，不拼命总不成！此复并颂安好。

本篇收入《废邮存底》一书前，曾发表于1935年7月14日天津《大公报·小公园》第1734号，原题《废邮存底》。署名沈从文。

五 给某教授

××先生：

从××处知道您近来看了《文艺》上一篇小说^①心中很不高兴。小说上提到自杀问题，恋爱问题。据说那小说讽刺了您，同时还讽刺了另一人。这小说原是我作的，使您痛苦我觉得抱歉。我更应当抱歉的，还是我那文章本来只在诠释一个问题；即起首第二行提到的“爱与惊讶”问题，写它时既不曾注意到您，更不是嘲笑到您，您似乎不大看得明白，正如我文中一提和尚秃鹫，天下和尚皆生气一样，就生了气。我目的在说明“爱与美无关，习惯可以消灭爱，能引起惊讶便发生爱。”我于是分析它，描写它，以刘教授作主人，第一先写出那家庭空气，太太的美丽，其次便引起一点闲话，点明题目，再其次转到两夫妇本身生活上来，写出这个教授先生很幸福；自己或旁人皆得承认这幸福，离婚与自杀与他连接不上。然而来了一点凑巧的机会，他到公园去，看见一个女孩子，听了一个故事，回家去又因为写一篇文章，无结果的思索，弄得人极疲倦，于是也居然想到自杀。太太虽很美

丽，却不能激动他的心。幸福生活有了一个看不见的缺口，下意识他爱的正是那已逝去的与尚未长成的：至于当前的反而觉得平凡极了。先就用毋忘我草作对话，正针对那个男子已忘了女人。若说这是讽刺，那讽刺到的也正是心理学教授刘，与您无关。想不到文章一枝一节上提出个社会普遍型的人物时，恰恰正中了您。

我给您写这个信的意思，就是劝您别在一个文学作品里找寻您自己，折磨您自己，也毁坏了作品艺术价值。其中也许有些地方同您相近，但绝不是骂您讽您。我写小说，将近十年还不离学习期间，目的始终不变，就是用文字去描绘一角人生，说明一种现象，既不需要攻击谁，也无兴味攻击谁。一个作品有它应有的尊严日的，那目的在解释人类某一问题，与讽刺个人的流行幽默相去实在太远了。您那不愉快只是您个人生活态度促成，我作品却不应当负责的。

我们虽然不大相熟，我倒常常心想，像我这种人也许算得是最能领会您在社会上在生活上所演悲剧痛苦的人。一、因为我是个从事文学创作在人类生活上探险的人，一切皆从客观留心，一切不幸的人皆能分析它不幸原因；二、因为我天性就对于一切活人皆能发生尊敬与同情，从不知道有什么敌人。您许多地方似乎同社会隔了一间，理解您的人，总会觉得您很天真很可爱，不理解您的人呢，您自然不会从他们得到公平待遇的。社会上多的是沾沾自喜的小聪明人，因此您无处不碰壁，无时不在孤立无助情形中。您虽有不少同事，不少朋友，不少女人，可是在他们眼中，您显得如何可怜啊！您的行为，您的打算，又如何与那个真的世界离远啊！觉得您人很真实，很可爱，也觉得您生活不如意代为扼腕的，未

尝无人，不过这些人也许不称赞您的旧诗，不同情您的痛苦，甚至于更不欢喜您某种生活态度，您无从知道那些好朋友罢了。

您在生活上与心灵上的悲剧，也许是命定的，远近亲疏朋友皆无法帮忙的。就因为您既不明白自己，更不明白别人。您要朋友，好朋友没有多少；要女人，好女人永远不易对您发生兴味。您读了许多书，这些书既不能调和您的感情，使您作人处世保持常态，又不能扩大您的人格，使您真的超然物外，洒脱豪放，不拘小节。你读儒家的典籍，儒家中庸与勇于维护真理体会人情的精神您得不到，您欢喜浪漫文学，浪漫文学解放人的全部心灵，却不曾将您解放。一切书不能帮助您，使您聪明一点，大派一点，只是束缚您；紧紧的束缚您。结果弄得您这样办不妥，那样办又不成，要活下去可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要死更不能死。总觉得这世界太不好，社会太坏，自己太受委屈。于是不可免的多疑，小气，支配了全部生活。再继续下去，幸而好，机会来时若遇着一个比较老实的女子，结了婚，一份安静家庭生活或者结束了您的悲剧。若不幸，您遇到的女子还是不能对您发生兴味的女子，永远还是摇摇头走开了，您却仍然作出一些引人发笑的故事，到被人注意后你又难过，未了你当然不是发疯就得自杀。

我的年龄学问比你少得多，可是对于观察人事或者“冷静”一点也就“明白”一点。我很同情您，且真为您担心。从您看我小说而难过一件事说来，可以知道您看书虽多，却只能枝枝节节注意；对于自己恋爱或教书有关的便十分注意，其余不问。您看书永远只是往书中寻觅自己，发现自己，以个人为中心，因此看书虽多等于不看（无怪乎书不能帮助

您)。对于人，您大致也用的是这种态度，对您稍好就觉得中意，与您生活态度略不相同就弄不来；且在许多机会中被你当成仇敌。先生，这怎么成？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或历史，任何一本书皆会告您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与“雷同”。必承认它方能生存，必肯定它方能生存得更合理更有价值。如今任何书似乎皆不能帮助您，因为您有病。这种病属于生理方面，影响到情绪发展与生活态度，它的延长是使您的理性破碎。治这种病的方法有三个：一是结婚，二是多接近人一点，用人气驱逐你幻想的鬼魔，常到××，××，与其他朋友住处去放肆的谈话，排泄一部分郁结。三是看杂书，各种各样的书多看一些，新的旧的，严肃的与不庄重的，全去心灵冒险看个痛快，把您人格扩大，兴味放宽。我不是医生，不能乱开方子，但一个作者若同时还可以称为“人性的治疗者”，我的意见值得你注意。

九月十三

本篇发表于1935年9月1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署名沈从文。某教授指吴宓。吴宓，现代作家，“学衡派”代表人物。

①指《自杀》，原载1935年9月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

六 谈创作

有人问我“怎样会写‘创作’？”真是一个窘人的题目。想了很久，我方能说出一句话，我说：“因为他先‘懂创作’。”问的于是也仿佛受了点儿窘，便走开了。

等待到这个很诚实的年青人走后，我就思索我自己所下的那个字眼儿的分量。我想明白什么是“懂创作”，老实说，我得先弄明白一点，将来也省得窘人以后自己受窘。

就一般说来，大家读了许多书，或许记忆好些的书，还能把某一书里边最精彩的一页，背诵如流，但这个人却并不是个懂创作的人。有些人会做得出动人的批评，把很好的文章说得极坏，把极坏的文章说得很好，但也不能称为懂创作的人。一个懂创作的人，也应当看许多书，但并不需记忆一段两段书。他不必会作批评文字，每一个作品在他心中却有一个数目。最要紧的是从无数小说中，明白如何写就可以成为小说，且明白一个小说许可他怎么样写。起始，结果，中间的铺叙，他口上并不能为人说出某一本书所用的方法极佳，但他知道有无数方法。他从一堆小说中知道说一个故事时处

置故事的得失，他从无数话语中弄明白了说一句话时那种语气的轻重。他明白组织各种故事的方法，他明白文字的分量。是的，他最应当明白的是文字的分量。同时凡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他皆能捡选轻重得当的去使用。为了自己想弄明白文字的分量，他得在记忆里收藏了一大堆单字单句。他这点积蓄，是他平时处处用心，从眼睛里从耳朵里装进去的。平常人看一本书，只需记忆那本书故事的好坏，他不记忆故事。故事多容易，一个会创作的人，故事要它如何就如何，把一只狗写得比人还懂事，把一个人写得比石头还笨，都太容易了。一创作者看一本书，他留心的只是“这本书如何写下去，写到某一件事，提到某一点气候同某一个人的感觉时，他使用了些什么文字去说明。他简单处简单到什么程度，相反的，复杂时又复杂到什么程度。他所说的这个故事，所用的一组文字，是不是合理的？……他有思想，有主张，他又如何去表现他这点主张？”

一个创作者在那么情形下看各种各样的书，他一面看书，一面就在那里学习经验那本书上的一切人生。放下了书本，他便去想。走出门外去，他又仍然与看书同样的安静，同样的发生兴味，去看万汇百物在一分习惯下所发生的一切。他并不学画，他所选择的人事，常如一幅凸出的人生活动画图，与画家所注意的相暗合。他把一切官能很贪婪的去接近那些小事情，去称量那些小事情在另外一种人心中所有的分量，也如同他看书时称量文字一样。他喜欢一切，就因为当他接近他们时，他已忘了还有自己的身分存在。

简单说来，便是他能在书本上发痴，在一切人事上同样也能发痴。他从说明人生的书本上，养成了对于人生一切现

象注意的兴味，再用对于实际人生体验的知识，来评判一个作品记录人生的得失。他再让一堆日子在眼前过去，慢慢的，他懂创作了。

目下有若干作家如何会写得出小说，他自己也就说不明白。但旁人可以看明白的，就是这些人一切作品皆常常浮在人事表面上，受不了时间的选择。不管写了一堆作品或一篇作品，不管如何善于运用作品以外的机会，很下流的造点文坛消息为自己说说话，不管如何聪敏伶俐的把自己作品押在一个较有利益的注上去，还是不成。在文字形式上，故事形式上，人生形式上，所知道得都太少了。写自己就极缺少那点所必需的能力。未写以前就不曾很客观的来学习过认识自己，分析自己，批评自己。多数作家的思想皆太容易转变了，对自己的工作实缺少了一点严格的批评、反省。从这样看来，尤好成绩是很自然的。

我自己呢，是若干作者中之一人，还应当去学，还应当学许多。不希望自己比谁聪明，只希望自己比别人勤快一点，耐烦一点。

本篇发表于1934年1月《文学》第2卷第1期，原题为《新年试笔》。署名沈从文。

七 致《文艺》读者

十五年以来，随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两个极无意思的名词，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是“灵感”。两个名词虽从不为有识者所承认，但在各种懒人谬论中，以及一般平常人意见中，莫不可以看出两个胡涂字眼儿的势力存在。使新文学日趋于萎靡，失去健康，转入个人主义的乖僻；或字面异常奢侈，或字面异常贫俭，大多数作品，不是草率平凡，便是装模作样的想从新风格取得成功，内容莫不空空洞洞。原因虽不止一端，最大的原因，实在就是一般作者被这两个名词所毒害，因迷信而失去理性的结果。

作者对于“天才”怀了一种迷信，便常常疏忽了一个作者使其伟大所必需的努力；对于“灵感”若也同样怀了一种迷信，便常常在等候灵感中把日子打发走了。

成名的作者因这点迷信而成的局面，是作品在量上希奇的贫乏。仿佛在自览“天才已尽灵感不来”的情形中，大多数作者皆搁了笔。为这搁笔许多年轻人似乎皆很不安，其实这并不是可忧虑的事情。因这种迷信，将使他们本人与作品

皆宜乎为社会忘去，且较先一时，他们或即有所写作，常常早就忘了社会的。一个并不希望把自己的力量渗入社会里面去的人，凭一点儿迷信，使他们活得窄一些，同时也许就正可以使他们把对于人类的坏影响少一些。他们活着，如小缸中一尾金鱼很俨然的那么活着，到后要死了，一切也就完事了。金鱼生存的时节，只在眩人眼目，许多人也欢喜金鱼。既然有人因迷信愿意去作金鱼，照我想来，尽他们在不拘什么样子的缸里去生活，我们也应当把他们当金鱼看待，莫希望他们太多，他们的生活态度，大多数人也不必十分注意的。

但一些还未成名的或正预备有所写作的，若不缺少相似的迷信时，却实在十分可惜。因为这些人若知道好好的如何去发展自己，他们的好作品，也正可以如另一时或另一国度一般好作品样子，能在社会民族方面发挥极大良好影响的，但这些人若尽记着“天才”两个字，便将养成一种很坏的性格，对于其他作品，他明白是很好的，他必以为那是天才产生的东西，他作不到，就不肯努力去作。那作品他觉得不好，在社会上又正是大多数人所需要的，他会以为这作品所表现的并无天才，只是人工，他又不屑于努力去作。他作出来自以为很好，却不能如别人作品一般成功时，他便想起：“天才历来很少为人认识”的一句旧话，自欺自慰下去。他摹仿了什么人的文章，写成了一篇稍稍像样东西，为了掩饰他的摹仿处，有机会给他开口时，他又必说：“这是我……。”自然的，说这句话时他不会用“天才”字样，或许说的是另外一个字眼，还说得很轻，但他意思却在告人那成就“应由天才负责！”这些人相信天才的结果，是所谓纪念碑似的作品，永无机会可以希望从他们手中产生。这些人相信天才以外还相

信灵感，便使他们异常懒惰起来，因为在任何懒惰情形下，皆可以用“灵感不来”作为盾牌，挡着因理性反省伴同而来的羞耻与痛苦。

对于中国新文学怀了一种期待，很关心它的发展，且计算到它发展在社会方面的得失的，自然很有些人。这些人或尝从论文上，反复说明作者思想倾向的抉择，或把希望放在更年青一点的作家方面去。其实一切理论还是毫无裨于伟大作品的产生。一个有迷信无理性的民族，也许因迷信而凝聚了这个民族的精神，还能产生点大东西，至于一个因迷信而弄懒惰了的作家，还有什么可以希望？

中国日前指示作家方向的理论文学已够多了，却似乎还无一篇理论文学指示到作家做“人”的方法。倘若有这种人来作这种论文，我建议起始便应当说：

人类最不道德处，是不诚实与懦怯；作家最不道德处，是迷信“天才”与“灵感”的存在；因这点迷信，把自己弄得异常放纵与异常懒惰。……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载《大公报·文学》①）

本篇 1933 年 12 月 30 日曾以《创作杂论》为题，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 28 期（实为第 29 期，错印为第 28）。署名从文。

题中《文艺》，即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① 文学 疑为《文艺副刊》之误。

八 元旦日致《文艺》读者

在前文中，我说到作者间因迷信而成为异常懒惰的一件事情。这懒惰倘若别作诠释，另外是不是找得出一个原因？为了把作者本身错误减轻一点，我们似乎还可以要历史去负一点儿责任。

一个民族已经那么敝旧了，按照过去的历史而言，则哲学的贫困与营养不足，两件事莫不影响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号称黄帝冢嗣的我们，承受的既是个懒惰文化，加上三千年作臣仆的世故，思想皆浮在小小人事表面上爬行，生活皆无热无光，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第一件事胃口就不好。我们做什么总没有气力。我们多数人成天便仿佛在打盹里过日子。我们的懒惰，可以说是曾祖著的书，祖父穿的衣服，爸爸吃的东西的结果。作家天生就有个容易在“天才”“灵感”这些字眼儿上中毒的气质，因迷信而更其懒惰，也是必然的事！

或人将说：

“欧洲许多有识的历史学家，莫不称赞我们民族是个能够

忍劳耐苦稀有的民族。同时我们自己对于中国农村若多具一分理解，也必能够认识我这本国的农民，是一种如何不懒惰的农民！”

是的，不独从外人论断以及自己观察，对于农民皆可以得到个乐观的结论。便是一个美国留学生，他也会告诉我们，中国大学生在美国学习什么时，在功课上如何不让于人。一个上海人，也就会说上海乐华足球队，在国际赛时所取得的光荣。一个稍有内战经验的军官，他还会用他的名誉，证明他所参加的内战，凡是一切兵士，在壕沟边作战时，是一种如何勇于牺牲的英雄！农民，留学生，乐华足球队员，以及万千的兵士，他们的勤苦，聪明，活泼，勇敢，谁能怀疑，谁能否认？

但这些人对于目前的中国有什么用处？

中国成为问题的，不是农民不愿耕田，却是大多数农民无田可耕。不是留学生不配作一个美国或英国好公民，却是这些人留学回来不知如何来作一个中国目前所需要的好公民。……不是足球队员无能，更不是兵士懦弱。明明白白的只是大部分有理性的人皆懒于思索！人人厌烦现状，却无人不是用消极的生活态度，支持现状。人人皆知道再想敷衍下去实在敷衍不下去，却无人愿从本身生活起始，就来改变一下，大家皆俨然明白国际压力与国内一塌糊涂的情形，使这个民族已堕落到一个不可希望的悲惨境遇里去，因此大家便只有混着活下去一个办法，结束自己，到自己死亡时，仿佛一切也就完事了。

这些独善其身的君子，大家且俨然以为一切现在坏处的责任，应由帝国主义的侵略，鸦片烟的流毒去担负，此后民

族复兴的责任，也就应由帝国主义者的觉悟，与鸦片烟自己的觉悟，方能弄好的。在这里我用了个“鸦片烟自己觉悟”的名词，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只看看国内所有知识阶级对于这种毒物流行的漠视态度，如何近于相信“鸦片烟自己会觉悟！”

事实上则所谓帝国主义与鸦片烟，极左倾的残杀与极右倾的独裁，农村破产与土匪割据，……一切现存的坏处，虽可以由历史上的人物，书本，饮食，各种东西去负责，但这个民族未来的存亡，却必需由我们活到这地面上的人来负责的。如今老年人好像已不能为后人思索，年轻人又还不会来为自己思索，有知识有理性的中坚份子，则大多数在不敢思索情形中鬼混下去，这样一个国家，纵想在地球上存在，还配在地球上存在下去吗？

在多数愚人心目中，皆希望一个奇迹；来一个领袖，来一个英雄，把全国民族命运皆交给这样一个人。且皆由于愚昧，由于其他一片地面所有领袖作出的事业，得到一个证据，皆期待这样一个人，以为这样一个人有一天终会来到的。

一个作者天才的迷信，既可以在他本身生活中发生懒惰的影响，倘若把这点迷信移植到一个其他人物方面去时，也必依然使他懒惰，发出种种懒惰的谬论，与懒惰的人生观，因这种人生观去期望一个主人或一种政体，且依赖到这个希望异常懒惰活下去。

在这样情形下，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

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去尽力。

我们实在是需要作家的。这作家他最先就必是个无迷信的人。他不迷信自己是天才，也不迷信某一种真命天子一个人就可以使民族强大起来。他明白自己在这社会上的关系，在他作品上，他所注意的，必然是对于现状下一切坏处的极端憎恨，而同时还能给读者一个新的人格自觉。他努力于这种作品产生，就为得是他还明白，只有从这种作品上，方能把自己力量渗入社会里去！

我们需要的是这种朴实作家。倘若我们还相信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纠正这个民族若干人的生活观念的错误，使独善其身的绅士知耻，使一切迷信不再存在，使……缺少这种作家，是不能产生我们所理想的这种作品的。

二十三年元月。

本篇发表于1934年1月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0期，原题为《元旦试笔》。署名沈从文。

文题中《文艺》，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九 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

在我一个自传里，我曾经提到过水给我的种种印象。檐溜，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

“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

年纪六岁七岁时节，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坏小子，把书篮用草标各作下了一个记号，搁在本街上地堂的木偶身背后，就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攒入高可及身的禾林里，捕捉禾穗上的蚱蜢，虽肩背为烈日所烤炙，也毫不在意。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整个心思只顾去追

我的写作与水的美

在我二十岁传来之时，我曾经提到
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美不
学会用小；脑子里去思索一切，全新
这一笔，也写的是水。

孤独——善在你缺少一切的时候，
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或者我自己的
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
水不能分离。

年轻六岁七岁时，我整在我者未
我不能忍受那个偏窄的天地。无论如
的日光下生活。六月里，每一世同街以
手你下了一千把号，捆在本街土地堂以
到城外去，钻入高身及身的森林裏，捕
日晒烤炙，也毫不在意。耳屎中只听
个心思，只想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死
来的东西已懂得一颗星，管了，才到河边

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伶俐的小生物。到后看看所得来的东西已尽够一顿午餐了，方到河滩边去洗濯，拾些干草枯枝，用野火来烧烤蚱蜢，把这些东西当饭吃。直到这些小生物完全吃尽后，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用大石压着衣裤，各自从悬崖高处向河水中跃去。就这样泡在河水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挨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有时正在绿油油禾田中活动，有时正泡在水里，六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各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坊下或大树下去躲避，雨落得久一点，一时不能停止，我必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所捉的鱼逃了，所有的衣湿了，河面溜走的水蛇，钉固在大腿上的蚂蟥，碾坊里的母黄狗，挂在转动不已人水车上的起花人肠子，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皆记忆温习起来了。

也是同样的逃学，有时阴雨天气，不能向河边走去，我便上山或到庙里去，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爬上了这一株，到上面玩玩后，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株。若所爬的是竹子，必在上面摇荡一会，爬的是树木，便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雨落大了，再不能作这种游戏时，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这个日子方能发遣开去。雨落得越长，人也就越寂寞。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那么大的雨，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不敢再想了。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作丝线的人牵丝，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作工，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我很熟习

的人。也就因为这种雨，无从掩饰我的劣行，回到家中时，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仓屋中。在那间空洞寂寞的仓屋里，听着外面檐溜滴沥声，我的想象力却更有了一种很好训练的机会。我得用回想与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我因恐怖得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

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辰河^①无从离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五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十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他的流动，帮助我作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人世中过着日子！

再过五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

再过五年后，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他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

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载《我与文学》)

本篇发表于《文学》一周年纪念特辑，1934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以《我与文学》为书名初版，署名沈从文。收入《废邮存底》一书时被删去原作前二段文字：

我可以说是与文学毫无关系的一个人，在这种题目上来说话，真是无话可说的。第一，我看不懂正在研究文学的人所作的文章，第二，我弄不明白许多作家教人作文章的方法，第三，我猜不透一些从事于文学事业的人自己登龙为人画虎的作用。近十年来我虽写了一大堆小说，但那并不算个什么，这不过从生活上，我经过的是与人稍稍不同的生活，从书本上，我又恰恰读了一些很杂乱的书，加之在军营里作书记时，我学得一种老守在桌边的“静”，过去日子又似乎过的十分“闲”，所以就写成了那么些小说故事罢了。

但在我的工作上，照一般称呼说来既算得是“文学事业”，这事业要来追究一下，解释一下，或对于比我年青一点的朋友，多少有点用处。我可以说的，是我这个工作的基础，并不建筑在“一本合用的书”或“一堆合用的书”上，因为它实在却只是建筑在“水”上。

① 辰河 即沅水。

十 风雅与俗气

××先生：

你的信从××转来，已收到了。谢谢你。你想要明白的消息，我不是个文坛消息家，对不起，没有可告你的。这些事你最好还是问上海方面的熟人。你想知道左倾批评家某某集子刚出却又传说作了×××，也得向他们打听。你想知道我对于幽默文章的意见，我这个乡下人懂什么幽默？我同你一样，也看了许多这种刊物的第一篇文章，那文章说明过幽默对于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对于他们究竟有多大价值，我或者比你知道的更少。

去年秋天某一天，我家中院子里大槐树下，有一只小小甲虫爬行。为了这小生物在阳光中有一点眩目的金光，便引起同我在院中散步的朋友某某先生注意。他很沉静的看了那甲虫约五分钟，眼睛方离开它。到后我就同这朋友出门去理发，他告给我东城某某理发馆有个技师，手艺真很可观。我服从了他的提议，同过东城去试一试。到了那里他还让我占先，自己却一直等候下去。你应当知道，我这个朋友平时是

个不胡乱浪费时间的人，这一次可并不埋怨时间花得太多。前些日子这朋友又来我家拜年，见我桌上有个小小铜炉。这东西色泽形体皆美丽得很，在应用方面，若把它当作一个烟灰碟子，似乎正十分合用。他爱上了它，我明白，因此有一天，我就尽他捎去，于是搁到他书房里成为桌上烟具之一了。

从几件小事上看来，皆可证明我那朋友不是个不讲究艺术不认识美的人。

然而这个朋友当他同我讨论到文学时，对于一个作品在词藻上与组织上的价值，却加以轻视。他同许多人一样，某一时节会成为很前进的人物，就是当他“不甘落伍”时。他说他疑惑文学形式的美能有多少价值。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重在有思想，有目的，有意义。一个作品若具备上述三个条件，不必需何等技巧，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作品。很可惜关于这一点他并不详细为我解释，这伟大作品没有组织与文字上的技巧，如何还能伟大的理由，还能使读者承认它为伟大而受感动的理由。他也许故意含糊其辞，对于他立论方便一些。

在政治意见上，我这个朋友很相信统一中国需要实力，他不否认用武力巩固中央的基础，推行当前的政治。若我的观察不错，我相信他还更赞同用一种新的武力，来推翻旧的一切。然而，就正当谈论到这里时，我问他：“你同意思想统治，是不是？莫说统治吧。把文学积极的赞美某一种新的道德与制度，否认另一种旧的道德与制度，是不是可能的？文学是不是宜于用来解释一个社会的理想？请你告我一点意见。”我以为他一定说“是，可能。”谁知他却红着颈脖说：“这是妄人的打算。把文学附庸于一个政治目的下，或一种道德名义下，不会有好文学。用文学说教，根本已失去了文学

的意义了。文学作品不能忍受任何拘束，惟其不受政治或道德的拘束，作者只知有他自己的作品，作品只注意如何就可以精纯与完美，方有伟大作品产生！”他说明他这分态度时，辞令比我记在这儿的似乎还动人些。这朋友在辞令上或审美观念上，原皆可以称为一个风雅人。这时节，明明白白，他不同意把文学粘上商业功利意味了。

且试把朋友前后两种议论加以比较，就可明白我这个朋友原来矛盾得很。这矛盾反映他个人对于当前社会的态度。这个人的的人生观原来是：在一切享用上，他不否认美，不拒绝美。至于论及文学时，他的意识却被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把文学看得同其余艺术不一样。以为文学不需要“艺术”了。不需要艺术，有勇气嘲笑文学上的技巧，能给文学一个新的观念，自然很好。然而欲把文学在卫道致用方面搁下，与实际问题的接近时，一个古旧的观念在朋友心中又发生了影响。他或许会想到：文学同道德或政治联合起来，一个作品邀求一种用途，或为某种用途产生作品，仿佛太“俗气”了。一定的，他觉得“俗气”了。谁不害怕“俗气”？何况俗气以外还不免有意外危险与麻烦。于是我那朋友又一变而为艺术至上主义者了。这矛盾不止为朋友所独有，他不能专美，目前的中国，与他差不多的人太多了。在作家间这种矛盾尤显然存在。

中国近两年来产生了约二十种幽默小品文刊物，就反映作家间情感观念种种的矛盾。（这类刊物的流行，正说明这矛盾如何存在于普遍读者群。）这些人一面对于文章风格体裁的忽视与鄙视，便显得与流行文学观并不背道而驰。这方面幽默一下，那方面幽默一下，且就证实了这也是反抗，这也是否认，落伍不用担心了。另一面又有意无意主张把注意点与

当前实际社会拖开一点，或是给青年人翻印些小品文籍，或作点与这事相差不多的工作，便又显得并不完全与传统观念分道扬镳。（这些人若觉得俗气对于他有好处，当然不逃避这种俗气，若看准确风雅对于他也有方便处，那个方便自然也就不轻易放手！）因此一来，作者既常常是个有志之士，同时也是个风流潇洒的文人。谁不乐意作个既风雅又前进的文人？许多人对于幽默小品文刊物的流行、或觉得稀奇，或独怀杞忧，其实它的发展，存在，皆很自然，明白这道理也就不必担心了。

我那朋友个人长此矛盾下去，养成了他每天读幽默刊物的习惯。除此以外还欢喜看看木傀儡的小丑戏，看一个小小木人，在小戏台旁木架上剥剥剥的碰着那颗木头。大致两样东西皆可以使他容易过日子一些。那朋友我以为不妨尽他那么活下去，到腐烂为止。他自己说假若他当真厌倦了每天吃喝，厌倦了上床下床洗脸刷牙齿，有一天也许会自杀的，我不相信这种人会自杀，因为木傀儡戏同幽默文学在中国还容易见到。

至于充满矛盾那一群神经衰弱，害胃病癆病、软骨病而装疯的作家们呢？他们是再活上那么一年，发舒发舒性灵，投掷两下匕首，把日子混下去，还是尚可希望变更一个方法，把自己工作同生活在一分极彻底的新方式中试试看？等等看吧。

我以为一个民族若不缺少有勇气，能疯狂，彻底顽固或十分冒失的人，方可希望有伟大作品产生。幽默刊物综合作成的效果，却将使作家与读者不拘老幼皆学成貌若十分世故，仿佛各人皆很聪明，很从容，对一切恶势力恶习气抱着袖手旁观的神气。在黑暗中他们或许也会向所谓敌人抓一把捏一把，且知

道很敏捷的逃避躲开，不至吃亏。但人人都无个性，无热情，无糊涂希望与冒险企图，无气魄与傻劲。照这样混下去，这民族还能混个几年？纵能长此混下去，又有个什么希望可言？从这方面希望有些纪念碑似的作品产生，那是很不合理的。

“迷信”使人简单，他比“世故”对于人类似乎还有用些。我们对于鬼神之力的迷信时代算已过去了。然而如果能够把这种迷信或所谓“宗教情绪，”转而集中在人事方面，却并不是一种无意义的努力。作者若真有这种迷信，事实上他那作品也就可以希望成为符咒之一种，使多数人受其催眠，或为之兴奋，对于人的能力发生信仰，产生变革，得到进步。说简单一点，就是作家只要不怕“俗气”，敢把他的作品预备作为未来光明颂歌之一页，倾心于那个“明日”，肯为“大多数人如何可以活下去”打算打算，他的目前工作即或十分幼稚，不妨事的。（文学作品本许可保留一个人类向前的憧憬：进步的憧憬。目前所受的限制，迫害与嘲笑，皆只是目前的事！）一个青年人，若感情还不曾被“幽默”或“世故”所阉割，且不欲居于这种阉割之列，他自会有所迷信，尽那迷信支配自己，且能在迷信中生龙活虎的活下去，写下去。

你来信说有几个朋友想找我谈谈，如像先前所说那种矛盾的朋友，我有一个觉得很够了。至于那种俗气而迷信的青年人呢，我很愿意各处皆可碰着他们。这是一种精神上武装的国民，我欢喜这种不懂风雅不怕俗气的朋友。

此候安好。

十一 情绪的体操

先生：

我接到你那封极客气的信了，很感谢你。你说你是我作品唯一的读者，不错。你读得比别人精细，比别人不含糊，我承认。但你我之间终有种距离，并不因你那点同情而缩短。你讨论散文形式同意义，虽出自你一人的感想，却代表了多数读者的意见。

我文章并不骂谁讽谁，我缺少这种对人苛刻的兴味。我文章并不在模仿谁，我读过的每一本书上的文字我原皆可以自由使用。我文章并无何等哲学，不过是一堆习作，一种“情绪的体操”罢了。是的，这是一种体操，属于精神或情感那方面的。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你厌烦体操是不是？我知道你觉得这两个字眼儿不雅相，不斯文。它使你联想到铁牛，水牛。那个人的体魄威胁了你。你想到青年会，柚木柜台里的办事人，一点乔装的谦和，还有点儿俗，有点儿谄媚。你想起“美人鱼”，从

贫乏无味。你自己比别人许更明白那点糟处，直到你自己能够鼓足勇气，来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承认，请想想，这病已经到了什么样一种情形！

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因为文字能服从你自己的“意志”，只要你真有意志。至于女人呢？她乐于服从你的“权力”。也许……得了，不用提。你的事恰恰同我朋友××一样：你爱上艺术他却倾心了一个女人，皆愿意把自己故事安排得十分合理，十分动人。皆想接近那个“神”，皆自觉行为十分庄严，其实处处却充满了呆气。我那朋友到后来终于很愚蠢的自杀了，用死证实了他自己的无能。你并不自杀，只因为你的失败同失恋在习惯上是两件事。你说你很苦闷，我知道你的苦闷。给你很多的同情可不合理，世界上像你这种人太多了。

你问我关于写作的意见，属于方法与技术上的意见，我可说的还是劝你学习学习一点“情绪的体操”，让它把你十年来所读的书消化消化，把你十年来所见的人事也消化消化。你不妨试试看。把日子稍稍拉长一点，把心放静一点。到你能随意调用字典上的文字，自由创作一切哀乐故事时，你的作品就美了，深了，而且文字也有热有光了。你不用害怕空虚，事实上使你充实结实还靠得是你个人能够不怕人事上“一切”。你不妨为任何生活现象所感动，却不许被那个现象激发你到失去理性。你不妨挥霍文字，浪费词藻，却不许自己为那些华丽壮美文字脸红心跳。你写不下去，是不是？照你那方法自然无可写的。你得习惯于应用一切官觉，就因为写文章原不单靠一只手。你是不是尽嗅觉尽了他应尽的义务，在当铺朝奉以及公寓伙计两种人身上，辨别得出他们那各不

相同的味儿？你是不是睡过五十种床，且曾经温习过那些床铺的好坏？你是不是……？

你嫌中国文字不够用，不合用，别那么说。许多人皆用这句话遮掩自己的无能。你把一部字典每一页皆翻过了吗？很显然的，同旁人一样，你并不作过这件事。你想造新字；描绘你那新的感觉，这只像是一个病人欺骗自己的话语。跛了脚，不能走动时，每每告人正在设计制造翅膀轻举高飞。这是不切事实的胡说，这是梦境。第一你并没有那个新感觉，第二你造不出什么新符咒。放老实点，切切实实治一治你那个肯读书却被书籍壅塞了脑子压断了神经的毛病！不拿笔时你能“想”，不能想时你得“看”，笔在手上时你可以放手“写”，如此一来，你的大作活泼起来了，放光了。到那个时节，你将明白中国文字并不如一般人说的那么无用。你不必用那个盾牌掩护自己了。你知道你所过日的每一本书上面的好处，记忆它，应用它，皆极从容方便，你也知道风格特出，故事调度皆太容易了。

你试来做两年看看。若有耐心还不妨日子更多一点。不要觉得这份日子太长远，这只是一个学习理发小子满师的年限。你做的事应当比学理发日子还短，是不是？我问你。

十二 给某作家

× ×：

你的长信接到了，你说的事情我了解。你自己以为说得极乱，我看时却清楚得很。凡是你觉得对的，我希望你能做得极顺手，凡是你以为我看错了的，我希望我到某时节不会再错。这是关于做文章一方面而言。关于做人呢，即如说关于“政治”或“文学”或“人生”见解呢，莫即说我的，只说你的。我以为你太为两件事扰乱到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你太容易受身边一点儿现象耗费感情了。前者增加你的迷信，后者增加你的痛苦，两件事混在一块，说增加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感觉方面的孤独。因此会自然而然有些爱憎苦恼你，尤其是当你单独一人在某一处时，尤其是你单独写文章或写信时。说不定你还会感觉到世界上只有你孤单，痛苦，爱人类而又憎人类，可是，这值得讨论。你也许熟读法国史，但对于中国近百年史未必发生兴味。你也许感觉理想孤独，仿佛成天在同人类的劣性与愚性作战，独当一面，爱憎皆超越一切，但事实这个世界上比你更感觉理想

孤独，更痛苦，更执着爱憎皆有人，至少同你相似的还有人。客观一点去看看，你就会不同一点。再不然，你若勇敢些，去江西四川××里过阵日子，去边省任何一个军队里过阵日子，去长江流域什么工厂过阵日子，去西北灾荒之区过阵日子，去毒物充斥的××过阵日子，再来检查一下自己，你一切观点会不同些。生活变动的太多，自然残忍了一点，一切陌生，一切不习惯，感受的压力不易支持。但我相信至少是你目前的乱处热处必有摇动。再好好去研究一下这个东方民族，如何活下这么许多年，如何思索同战争发展到如今，你的热和乱，一定也调和起来，成为另一个新人了。你对这个“现在”理解多一点，你的气愤也就会少一点。不信么？你试试就相信了。你对于生命还少实证的机会。你看书多，看事少。为正义人类而痛苦自然十分神圣，但这种痛苦以至于使感情有时变得过分偏持，不能容物，你所仰望的理想中正义却依然毫无着落。这种痛苦虽为“人类”而得，却于人类并无什么好处。这样下去除了使你终于成个疯子以外，还有什么？“与绅士妥协”不是我劝你的话。我意思只是一个伟大的人，必需使自己灵魂在人事中有种“调和”，把哀乐爱憎看得清楚一些，能分析它，也能节制它。简单说，就是因为他自己还是个人，他得多知道点人的事情。知道的多，能够从各个观点去解释，他一切理想方有个根。假若他是有力量的。结果必更知道他的力量应使用到什么地方去。他明白如何方不糟蹋自己的力量。他轻视一切？不，他不轻视，只怜悯。他必柔和一点，宽容一点。（他客观点去看一切，能客观了。）使人类进步的事，外国方面我的知识不够说话资格。从中国历史而言，最先一个孔子，最后一个×××，就是必先调和

自己的心灵，他的力量从自己方面始能移植到人类方面去。这两个人我们得承认他们实在比我们更看得清楚人类的愚与坏，可是他们与人类对面时，却不生气，不灰心，不乱，只静静的向前。不只政治理想家如此，历史上著名玩耍刀刀枪枪的大人物何尝不如此？雷电的一击，声音光明皆眩目吓人，但随即也就完事了。一盏长明灯或许更能持久些，对人类更合用些。生命人格，如雷如电自然极其美丽眩目，但你若想过对于人类有益是一种义务，你得作灯。一切价值皆从时间上产生，你若有理想，你的理想也得在一分长长的岁月中方能实现。你得承认时间如何控制到你同世界，结果也并不妨害你一切革命前进观念的发展。你弄明白了自己与时间关系，自己便不至于因生活或感情遭受挫折时使尔灰心了。你即或相信法国革命大流血，那种热闹的历史场面还会搬到中国来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时还明白排演这历史以前的酝酿，排演之时的环境了。使中国进步，使人类进步，必需这样排演吗？能够这样排演吗？你提历史，历史上一切民族的进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吗？阳燧^①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实，然而人类到今日，取火的简便方法多得很了。人类光明从另外一个方式上就得不到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你自己那么热，你很容易因此把一切“冲动”与“否认”皆认为生气或朝气。且相信这冲动与否认就可以把世界变得更好，安排得更合理。不过照我看来，我却以为假使这种冲动与否认是一时个人心中的东西，我们就应当好好的控制它，运用它。（××便如此存在与发展。）若是属于自己心中的东西，就得节制它调和它。（如你目前情形。）必如此方能把自己这点短短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凝聚到一件行为上去；必如此方

能把生命当真费到“为人类”努力。你不觉得你还可以为人类某一理想的完成，把自己感情弄得和平一点？你看许多人皆觉得“平庸”，你自己其实就应当平庸一点。人活到世界上，所以成为伟人，他并不是同人类“离开”，实在是同人类“贴近”。你，书本上的人真影响了你，地面上身边的人影响你可太少了！你也许曾经那么打算过，“为人类找寻光明”，但你不曾注意过中国那么一群人要如何方可以有光明。一堆好书一定增加过了你不少的力量，但它们却并不增加你多少对于活在这地面上四万万人的欲望与挣扎的了解。你知道些国际情形，中国人的将来命运你看到了一点，你悲痛，苦恼，可是中国人目前大多数人的挣扎，你却不曾客观一点来看看。你带着游侠者的感情，同情××，憎恶××，（你代表了多数年青人的感情，也因此得到多数年青人的爱敬。）你却从不注意到目前所谓×××，向光明走尽了些什么力，××又作了些什么事。你轻视绅士，否认××，你还同一般人差不多，就从不曾把“绅士”“××”所概括的好坏弄个明白，也不过让这两个名词所包含的恶德，给你半催眠的魔力，无意思的增加你的嫌恶罢了。你感情太热，理性与感情对立时，却被感情常常占了胜利。也正因其如此，你有许多地方极高超，同时还有许多地方极伟大，不过倘若多有点理性时，你的高超伟大理想也许对于人类更合用点，影响力量更大一点。罗伯斯比尔^②若学得苏格拉底^③一分透澈，很显然的，法国史就得另外重写了。你称赞科学，一个科学家在自然秩序上证明一点真理，得如何凝静从一堆沉默日子里讨生活！我看你那么爱理会小处，什么米米大^④的小事如×××之类闲言小语也使你动火，把这些小东小西也当成敌人，我觉得你感情

的浪费真极可惜。我说得“调和”，意思也就希望你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

本篇发表于1935年12月16日《文学月刊》第2卷第4期。文题中“某作家”，系巴金。

- ① 阳燧 古代向日取火的用器。
- ② 罗伯斯比尔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
- ③ 苏格拉底 古希腊哲学家。
- ④ 米米大 凤凰方言，极细小之意。

十三 给一个读者

××先生：

来信已见到，谢谢。你说“关于写小说的书，什么书店什么人作的较好。”我看过这样书八本，从那些书上明白一件事，就是：凡编著那类书籍出版的人，他自己绝不能写创作，也不能给旁的作者多少帮助。那些书不管书名如何动人，内容皆不大合于事实。他告你们“秘诀”，但这件事若并无秘诀可言，他玩的算个什么把戏，你想想也就明白了。真真的秘诀是多读多做，但这个已是一句老话了，不成其为秘诀的。我只预备告你几句话，虽然平淡无奇，也许还有一点用处，可作你的参考。

据我经验说来，写小说同别的工作一样，得好好的去“学”。又似乎完全不同别的工作，就因为学的方式可以不同。从旧的各种文字，新的各种文字，理解文字的性质，明白它的轻重，习惯于运用它们，这工作很简单，落实，并无神秘，不需天才，好像得看一大堆“作品”方有结论的。你说你也看了不少书，照我的推测，你看书的方法或值得讨论。从作

品上了解那作品的价值与趣味，这是平常读书人的事。一个作者读书呢，却应从别人作品上了解那作品整个的分配方法，注意它如何处置文字如何处理故事，也可以说看得应深一层。

一本好书不一定使自己如何兴奋，却宜于印象底记着。一个作者在别人好作品面前，照例不会怎么感动，在严重事件中，也不怎么感动——作品他知道这是写出来的，人事他知道无不十分严重。他得比平常人冷静些，因为他在看，分析，批判。他必须静静的看，分析，批判，自己写时方能下笔，方有可写的东西，写下来方能够从容而正确。文字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人理会文字的用处，比旁人渊博，善于运用文字，正是他成为作家条件之一。几年来有个趋向，多数人以为文字艺术是种不必注意的小技巧。这有道理。不过这些人似乎并不细细想想，没有文字，什么是文学。《诗经》与山歌不同，不在思想，还在文字！一个作家思想好，决不至于因文字也好反而使他思想变坏。一个性情幽默知书识字的剃头师傅，能如老舍先生使用文字，也就有机会成为老舍先生。若不理解文字，也不能使用文字，那就只好成天挑小担儿，各处做生意，就墙边太阳下给人理发，一面工作一面与主顾说笑话去了。写小说，想把作品涉及各方面生活，一个人在事实上不可能，在作品上却俨然逼真，这成功也靠文字。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作品专重文字自然会变成四六文章^①。我并不要你专注重文字。我意思是一个作家应了解文字的性质，这方面知识越渊博，越容易写作品。

写小说应看一大堆好作品，而且还应当如何去看。方能

明白，方能写，上面说的是我的意见。至于理论或指南作法一类书，我认为并无多大用处。这些书我就看不懂。我不明白写这些书的人，在那里说些什么话。若照他们说出的方法来写小说，许多作者一年中恐怕不容易写两个像样短篇了。小说原理小说作法那是上讲堂用的东西，至于一个作家，却只应看一堆作品，作无数次试验，从种种失败上找经验，慢慢的完成他那个工作。他应当在书本上学安排故事，使用文字，却另外在人事上学明白人事。每人因环境不同，欢喜与憎恶皆不相同。同一环境中人，又会因体质不一，爱憎也不一样，有张值洋一千元的钞票，掉在地上，我见了也许拾起来交给警察，你拾起来也许会捐给慈善机关，但被一个商人拾去呢？被一个划船水手拾去呢？被一个妓女拾去呢？你知道，用处皆不会相同的。男女恋爱也如此，男女事在每一个人解释下皆成为一种新的意义。作战也如此，每个军人上战场时感情皆不相同，作家从这方面应学的，是每一件事各以身分性别而产生的差别。简单说来就是“求差”。应明白每种人为义利所激发的情感如何各不相同。又譬如胖一点的人脾气常常很好，且易中风，瘦人能够跑路，神经敏锐，广东人爱吃蛇肉，四川人爱吃辣椒，北方人赶骆驼的也穿皮衣，四月间房子里还升火，河南河北山西乡村妇女如今还缠小脚，这又是某一地方多数人相同的。这是“求同”。求同知道人的类型，求差知道人的特性。我们能了解什么事有他的“类型”，凡属这事皆相去不远。又知道什么事有他的“特性”，凡属个人皆无法强同。这些琐琐知识越丰富，写文章也就容易下笔了。知道太少，那写出来的就常常“不对”。好作品照例使读者看来很对，很近人情，很合式。一个好作品上的人

物，常使人发生亲近感觉。正因为他的爱憎，他的声音笑貌，皆是一个活人。这活人由作者创造，作者可以大胆自由来创造，不怕说谎，创造他的人格与性情，第一条件，是安排得“对”。他可以把工人角色写得性格极强，嗜好正当，人品高贵，即或他并不见到这样一个工人，只要写得对就成。但他如果写个工人有二妻六妾，会做诗，每天又作什么什么，就不对了。把身分、性情、优乐安排得恰当合理，这作品文字又很美，很有力，便可以希望成为一个好作品的。

不过有些人既不能看“一大堆”书，又不能各处跑，弄不明白人事中的差别或类型，也说不出这种差别或类型，是不是可以写得出好作品？换一个说法，就是假使你这时住在南洋，所见所闻皆不能越出南洋天地以外，可读的书又仅仅几十本，是不是还可希望写几个大作品？据我想来也仍然办得到，经验世界原有两种方式，一是身临其境，一是思想散步。我们活到二十世纪，正不妨写十五世纪的历史小说。我们谁皆缺少死亡的经验，然而也可以写出死亡的一切。写牢狱生活的不一定亲自入狱，写恋爱的也不必需亲自恋爱。虽然这举例不大与上面要说的相合，譬如这时要你写北平，恐怕多半写不对。但你不妨就“特点”下笔。你不妨写你身临其境所见所闻的南洋一切。你身边只有《红楼梦》一部，就记熟他的文字，用那点文字写南洋。你好好的去理解南洋的社会组织，丧庆仪式，人民观念与信仰，上层与下层的一切，懂得多而且透彻，就这种特殊风光作背景，再注入适当的幻想成分，自然可以写得出很动人故事的。你若相信用破笔败色在南洋可以画成许多好画，就不妨同样试来用自己能够使用的文字，以南洋为中心写点东西。当前自然便不免发生一

种困难，便是作品不容易使人接受的困难。这就全看你魄力来了。你有魄力同毅力，故事安置的很得体，观察又十分透彻，写它时又亲切而近人情，一切困难皆不足妨碍你作品的成就。（我们读一百年前的俄国小说，作品中人物还如同贴在自己生活上，可以证明只要写得好，经过一次或两次翻译也还仍然能接受的。）你对于这种工作有信心，不怕失败，总会有成就的。我们作人照例受习惯所支配，服从惰性过日子。把观念弄对了，问好也可以养成一种问好的惰性。觉得自己要去做，相信自己做得到，把精力全部皆搁在这件工作上，征服一切皆无困难，何况提起笔来写两个短篇小说？

你说“一个作者应当要多少基本知识？”这不是几句话说得尽的问题。别的什么书上一定有这个答案。但答案显然全不适于实用。一个大兵，认识方字一千个左右，训练得法，他可以写出很好的故事。一个老博士，大房子里书籍从地板堆积到楼顶，而且每一本书皆经过他圈点校订，假定说，这些书全是诗歌吧，可是这个人你要他自作一诗时，也许他写不出什么好诗。这不是知识多少问题。是训练问题。你有两只脚，两只眼睛，一个脑子，一只右手，想到什么地方就走去，要看什么就看定它，用脑子记忆，且把另一时另一种记忆补充，要写时就写下它，不知如何写时就温习别的作品是什么样式完成，如此训练下去，久而久之，自然就弄对了。学术专家需要专门学术的知识，文学作者却需要常识和想象。有丰富无比的常识，去运用无处不及的想象，把小说写好实在是件太容易的事情了。懒惰畏缩，在一切生活一切工作上，皆不会有好成绩，当然也不能把小说写好。谁肯用力多爬一点路，谁就达到高一点的峰头。历史上一切伟大作品，皆不

是偶然成功的。每个大作家皆得经过若干次失败，受过许多回挫折，流过不少滴汗水，方把作品写成。你虽不见过托尔斯泰，但你应当相信托尔斯泰这个人的伟大，还只是一双眼睛、一个脑子、一只右手作成的。你如今不是也有两只光光的眼睛，一个健全的脑子，一只强壮的右手吗？你所处的环境，所见的世界，实在说来还比托尔斯泰更幸运一些，你还怕什么？你担心无出路，你是不是真想走路？你不宜于在迈步以前惶恐，得大踏步走向前去。一个作者的基本条件，同从事其余事业的人一样，要勇敢，有恒，不怕失败，不以小小成就自限。……

本篇收入《浚邮存底》一书前，曾以《一封信》为题，发表于1935年6月《中学生》第6期，署名沈从文。

① 四六文章 指骈体文。因骈体文多用四言六字句于排比、对偶。

昆明冬景

昆明冬景

KUNMING DONGJING

《昆明冬景》，收文5篇，原目：《真俗人和假道学》、《谈朗诵诗》、《谈保守》、《一般或特殊》、《昆明冬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9月初版；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又于1941年12月再版。

真俗人和假道学

朋友某教授，最近作篇文章，那么说：“世有俗子，尊敬艺术，收集骨董，以附庸风雅”，觉得情形幽默，十分可笑。我的意见稍觉不同，倒以为这种人还可爱。“风雅”是什么，或许还得有风雅知识或有风雅意识的人来赞美诅咒。风雅的真假，也不容易说明。我想来谈谈俗事。俗似乎也有真假区别，李逵可爱，贾瑞^①就并不怎么可爱；我们欢喜同一个农夫或一个屠户谈家常，谈生意，可不大乐意同一个什么委员谈民间疾苦。何以故？前者真，后者假。所以我认为俗人尊重艺术，收集骨董，附庸风雅，也有他的可爱处。倘若正当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艺术家不知中国艺术为何物，眼光小，趣味窄，见解偏，性情劣到无可形容时节，凡艺术家应作而不作的事，有俗人来附庸风雅，这人虽是李逵，是贾瑞，是造假货的市侩，是私挖坟墓的委员，总依然十分的可爱。为的是艺术品虽不能在艺术家手中发扬光大，还可望在这种人嗜好热心中聚积保存。这还是就假俗人不甘协俗附庸风雅者而言。至如真俗人，他自己并不以俗为讳，明本分，重本业，

虽不曾读万卷书，使得心窍玲珑，却对于美具有一种本能的爱好。颜色与声音，点线或体积，凡所以能供其直觉感受愉快的，他都一例爱好。因爱好引起关心，能力所及，机会所许，因之对于凡所关心的事事物物，都给以更深一层注意。或收积同类加以比较，或搜罗异样综合分析，总而言之，就是他能从古今百工技艺，超势利，道德，是非，和所谓身分界限而制作产生的具体小东小西，来认识美之所以为美。这种艺术品既放宽了他的眼睛，也就放宽了他的心胸。话说回来，他将依然俗气，是个不折不扣的俗人。他或许因此一来还更拥护俗气。他不必冒充风雅，正因为美若是一种道德，这道德固不仅仅在几卷书本中，不仅仅在道学，风雅，以及都会客厅，大学讲座中，实无往不存在，实无往不可以发现，实无往不可以给他教育和启迪，使他做一个生命充满了光辉和力量的“人”！他将更广泛的接近这个世界，理解人生。他即或一字不识，缺少文明人礼貌与风仪，一月不理发，半年不祷告，不出席时事座谈会，不懂维他命，终其一生做木匠，裁缝，还依然是个十分可爱的人。很可惜的是这种俗人并不多，世界上多的倒是另外一种人。

与这种人行为性情完全相反，在都市中随处可以遇见的，是“假道学”。这种人终生努力求“可敬”。这种人的特点是生活空空洞洞，行为装模作样。这特点从戏剧文学观点来欣赏，也自然有他的可爱处。不幸他本人一切行为，一切努力，都重在求人“尊敬”，得人“重视”，一点点可爱处，自己倒首先放弃了。这种人毛病就是读了许多书籍，书籍的分量虽不曾压断脊骨，却毁坏了性情。表现他的有病是对鬼神传说尚多迷信，对人生现象毫无热情。处世某种宽容的道德，与

做学问慎重勤勉处，都为的是可以使他生活在道德的自足情绪中与受社会重视意识中。他本来是懒惰麻木，常容易令人误认为持重老成。他本来自私怕事，又令人误认为有分寸不苟且。他的架子虽大，灵魂却异常小。他凡事敷衍，无理想，更无实现任何欲望的能力，在他们自己说来是明道守分。他的道是“生活一成不变”，他的分是“保全首领以终老”。他也害病找医生，捐款给抗敌会，参加团体宴会，并且在有分寸不使自己难为情的方便中做做爱，（秘密而温柔！）做爱时心在胸腔子里跳跃，可是这也只是一会儿的事，因为他做人的趣味，终战胜不过做道德家的趣味。他期望软弱处最多不过一秒钟，便刚强起来了。他爱名誉，为的是名誉是他生命中最重要装饰。他间或不免作点伪，用来增加他的名誉。他从自己从别人看来都是有道德的，为的是在道德生活中他身心异常安全。

他貌若嫉恶如仇，在众人广座中尤其善于表现。他凡事力持“正义”，俨然是正义的维持者。

他若是个女人，常被人称为模范母亲，十分快乐。这种快乐情绪一加分析，就可知尤以“贞节”成分最多。贞节能与美丽结合为一本极难得，至少比淫荡和美丽结合更见动人。不幸这种贞洁居多却与老丑结合为一。（伊如上帝造人，十分公正，失于此者可望得之于彼，许多女子不能由美丽上得到幸福，却可由贞节意义上得到自足！）虽然事多例外，有些上帝派定的模范人，依然乐于在客厅中收容三五俗汉，说说笑话，转述一点不实不尽属于私人的谣言，事事依然是“道德”的，很安全，很愉快。若他是个绅士，便在人前打趣打趣，装憨，装粗率，装事不经心，用为侍奉女子张本。他也依然

是“道德”的，很安全，很愉快。

另有种年青男子，年纪较轻，野心甚大，求便于欲望实现，于是各以担负新道德自命。力所不及，继以作伪。貌作刚强，中心虚怯，貌若热忱，实无所谓。在朝则如张天翼所写华威先生，在野则如鲁迅所写阿 Q^②。另有种年青女人，袭先人之余荫，受过大学教育，父母精神如《颜氏家训》^③所谓欲儿女学鲜卑语，弹琵琶，以之服侍公卿，得人怜爱。鲜卑语今既不可学，本人即以能说外国语如洋人为自足。力尚时髦，常将头发蜷曲，着短袖衣，半高跟鞋，敷厚粉浓朱，如此努力用心，虽劳不怨。然而一身痴肉，一脸呆相，虽为天弃，不甘自弃。或一时搔首弄姿，自作多情，或一时目不邪视，贞节如石头。两者行为不同，精神如一：即自觉已受新教育，有思想，要解放，知爱美！凡此种种，常不免令人对上帝起幽默感。好像真有一造物主，特为装点这个人生戏场，到处放一新式傻大姐，说傻话，作傻事，一举一动，无不令人难受，哭笑不得。这种人应当名为“新的假道学”。

假道学的社会纠纷多，问题多，就因为新旧假道学虽同样虚伪少人性，多做作，然而两者出发点不同，结论亦异。所为新式论客说法，这名为“矛盾”，为“争斗”。解放这矛盾争斗并无何等好方法，只有时间可以调处。时间将改变一切，重造一切。

未来事不能预言，惟可以用常理想象，就是老式假道学必然日将消灭，以维持道统自命的作风不能不变，从新做人。这从一部分先生们四十以后力学时髦，放他那一双精神上小脚时的行为可以看出。新式假道学又必将从战争上学得一些新说明，来热热闹闹度过他由二十岁到三十五岁一段生涯。文化或文明，从表面上看，是这些读书人在维持，在享受，

余人无分。可是真正异常深刻的看明白这个社会的一切，或用笔墨或用行动来改造，来建设活人的观念，社会的组织，说不定倒是要一群不折不扣的俗人来努力。

真俗人不易得，假俗人也不怎么多，这或者正说出了数年前有人提出的那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无伟大文学作品产生？”伟大文学作品条件必贴近人生，透澈了解人生。用直率而单纯的心与眼，从一切生活中生活过来的人，才有希望写作这种作品。世上多雅人，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轻微妒嫉，多无根传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的燃烧，且都安于这种燃烧形式，不以为异。如不相信，随意看看我们身边人事，就明白过半了。我们当前的问題，倒是上层分子俗人少，用闷劲与朴实的人生观来处世，为人，服务的俗人太少，结果什么都说不上。多有几个仿佛极俗的作家，肯三十年一成不变，继续做他的事业，情形会不同多了。

载于廿八年五月十五日《中央日报·平明》第一期

本篇发表于1939年5月15日《中央日报·平明》第1期。署名从文。

收入《昆明冬景》一书时，增加了文末两段文字。

① 李逵 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中人物。

贾瑞 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中人物。

② 华威先生 张天翼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之主人公。

阿Q 鲁迅小说《阿Q正传》之主人公。

③ 《颜氏家训》 书名。北齐颜之推著，以儒家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

谈朗诵诗

朗诵诗可说是一个近年来很动人的名辞。这名辞虽大家已经十分熟习，分析一下，倒极新鲜。因为“朗诵诗”在习惯上，它的用途多指散文而言。“诗”在习惯上是韵文。“朗诵诗”这名辞就令人怀疑。近二十年来新文学部门中有自由无韵诗，近于分行写的散文，当前朗诵诗的提倡者，在理论上既常常谈到韵律，作者写作时，事实上又常用落脚韵，正好像“诗”是一种无定形的东西，“诵”也是一个无定义的字眼儿。诗无定形，于是任何人提起笔来都可写诗。诵无定义，于是每个文学刊物都有“朗诵诗”。（中央广播电台，某一时还附会时髦，邀请几个朗诵诗作者，到播音台前，去朗诵他们的大作！）事无可疑，热闹转增加迷惑，使关心它的人不免迷惑。朗诵诗的提倡者和写作者，都仿佛极明白朗诵诗的好处，且相信朗诵诗前途光明，可是却不大注意，诗怎么样方能诵朗，诵朗真有多少意义。因此数年来虽建树了“朗诵诗”

这个名辞，产生了无数朗诵诗作家，还不曾发现有什么人的诗，在标题下必需标明“朗诵诗”，更不见标明“朗诵诗”的作品，在朗诵上获得多少成功的事实。若说有些作品用“朗诵诗”作子题，意思不过表示“这首诗可以朗诵”，那倒简单多了。可是一般作品在朗诵试验上，将依然不免陷于失败。原因显明，许多诗关于文字排比处理的方法，都太不讲究，极端的自由，结果是无从朗诵。比较便于诵读的，不是带标题的“朗诵诗”，反而是时间较前，在形式上并不十分自由，一些已成过去的新诗。这些作品恰为最新诗人所嘲笑，诗形是“带了些脚镣手铐”的。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儿人作品可以作例。

二

我们不妨随随便便作一点掇拾工作，看看诗的“朗诵”在过去诗的应用时可能性如何。征之于古，有无先例可得。

“诵”字的意义或者今古不一，各有用处。引经据典来分析叙述，很容易成为博士买驴，书写满纸，不见驴字。本文不在乎此。现在只想就中学生易知的问题来说说。我们大致都记得家中长辈称赞神童有一句老话，“过目成诵”。诵些什么？自然是诵诗书。“讽诵诗书”虽是一句成语，诵的用意倒似乎多在散文一方面。过目成诵或可指作一览即能默读，“高声朗诵”翻译成白话就应当是大声大气来读。欧阳修^①有篇《秋声赋》，起始就说，“欧阳子方夜读，……”推想那个夜读情形，必与朗诵相近。《聊斋志异》^②上某故事中，写一个人在客店中遇着了僵尸，拔关逃亡，被僵尸所追逐，跑近一个

庙宇前大树下时，正听到有和尚敲木鱼朗诵佛经。若求便于记诵，尤其是便于个人的记忆，大约以文字有一定格式，为最合实用，经典中如《诗》与《易》^③（格言式的对句，）应用文中如《急就章》、《汤头歌》，以启蒙书如《三字经》，《龙文鞭影》^④，以及劝忠，教孝，叙事，言情，杂冶骈散韵为一炉如佛经，宝卷^⑤等等，都是想使其他多数人兴奋感动，诵的方式似乎不易成功。尤其是诵诗。

一般习惯总觉得诗是拿来吟的。“吟诗作赋”是人所熟知一句话。诗人必“苦吟”方有成就。诗上有“吟成一个字，拈断数根髭”的说法：“短歌微吟不能长”，可以想见吟或许是低低的。又“朗吟飞过洞庭湖”，可见吟也有时无妨朗朗的，诗同吟不可分，但是这个“吟”字似乎大多数用在作者本人听觉上，因此作“啸咏自适”，吟啸有自得其乐之趣。这种吟啸有时不免惊动世人，都是有意的。若诗人想把诗歌的欣赏转赠给他人，尤其是多数人，在欣赏之余还要感动，吟不会有什么效果。只有一个办法，合乎实际，就是配合乐器来“歌”。

诗的本来诉之于宗庙或群众，最通常的方式就是歌。唐诗人故事如旗亭赌酒，王昌龄^⑥等七言绝句，就是由有好歌喉的美丽女人，在梨园子弟^⑦管弦嘈杂中歌唱的。李白的《清平调》^⑧，是交给乐工的。身当二三同好朗诵新作，或是常有的事，近于诗中所谓“口号”。杜牧之^⑨在分司御史任上，撞入人家筵席，作一个不速之客，见了那个出名的女子紫云时，于是口号一绝：“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齐迴！”据情推理说来，在那筵席上或许他会那么哼哼唧唧朗诵一次。用到别一处，还是要配点音乐，以歌唱形式出之，方

有意义。

唐人传奇小说《李娃传》^⑩，记荥阳公的儿子，翩翩少年，因恋妓女李娃，作了“遗策郎”。到成人幕之宾后，纸醉金迷，流连忘返。财尽被弃，穷困无聊，去为人唱挽歌，参加东西两肆丧仪店的比赛。如文中所记——

乃置层榻于南隅，有长髯者拥铎而进，翊卫数人，于是奋髯扬眉，扼腕顿颡而登，乃歌《白马》之词。

有顷，东肆长于北隅上设连榻，有乌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篋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发调，容若不胜。乃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歔掩泣。

就这一段记载看来，虽明明白白说的是歌《白马》，歌《薤露》，还可勉强引为“朗诵诗”成功唯一作证，可惜这证例却不能援引作当前张本。因为那种朗诵的成功，诗的被欣赏，是有条件的。正如演戏，必需铺排场面，十分可观，诗本身只尽一小部分责任。场面身容，必臻美妙，方能办到感人至于泣下。它的成功是戏剧性的成功，音乐性的成功，不是诗单纯的成功。这从对方那个黄脸大汉的失败，恰好成一对照。同样是诗，成败实因缘于歌喉的好坏。“举声清越响振林木”的方能获胜。

若从当前的事上来观察，“说书”似乎还合于朗诵条件。名为“说书”，与诵诗仅仅相差一间。可是为什么同样说三国关公长单刀赴会，白云朋就远不如刘宝全生动感人，至如你我来说它时，听也没有人肯听，可见它注重处还不是书中的

“事”，依然是腔中的“韵”。一种诉之于肉，引起音乐性的作用。一种将文字置于次要地位的作用。朗诵诗可别有目的。

近于由朗诵而给听众印象的还有“道情”^①。道情多作“唱”，然而其中惊人处已由“声”到“事”，传达的工具，渔鼓筒板的地位，缩小到最不重要，所唱的声容重要性也较减，居于一个平常地位。可是说一件事，有形容，有描写，在事件发展上包含一个意义，表示一种观念，劝忠，教孝，叹人世无常，应回头猛省，冤亲平等，荣辱皆幻，容易有效果。若短短篇章，不到百十字，无故事，无描写，只有些抽象意义，习见名词，如当前朗诵诗人作的朗诵诗，想使听众兴奋，就不会有如何效果。

至如南宋中瓦子说书，说的多是短篇白话小说，小说中多杂引诗歌，若除了故事本文，只说诗歌，应当是最好的朗诵实用证据了。可是分析起来就会觉得今古仍不相侔。原来这些诗词大多数是当时流行的诗词，体例本于讲经经上的偈，意义近于为本文作引子或收束。在说书时是否用某种乐器，虽不可知，叙诗词时，似乎还是离不了用吟唱方式。还有一点不可不知，就是这些诗词的作用多是消极性的，有时不过是用来延长故事开场时间或增加听众兴趣的。

单纯的诵既不能用为旧诗传达的工具，当然更不大适用为新诗欣赏的媒介。诗的朗诵，方法还待讨论，事极显明。

如今的朗诵诗，使用的多是些报章记事常用的句子，仅仅分行写出（分行的意义就多是诉之于视觉的），除了落脚处间或用一个韵，或更用些不三不四的交互换韵方式，就中文字平仄既不注意，语言惯性也不大讲究，随随便便那么写成，

更随随便便拿去什么大会场上“朗诵”，凡稍懂一点生理学或心理学的人，就会明白这种朗诵是无从激动人的情绪，兴奋不了听众神经的。它唯一成功是使那个朗诵诗的作者兼读者，自己在那无准备不习惯的试验上而兴奋，在试验后又为听众的茫然而茫然；对于听众则受教育较多的人，不免起幽默感，受教育较少的人，容易起莫名其妙感，这种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准备条件不够而失败。

三

关于新诗运动，企图在诵读上将个人视觉欣赏转而为多数人听觉的欣赏，这种努力随新诗运动而发展，已有了许多年。这种诵读试验的集会，与中国新诗运动极有关系，与诗的朗诵更有关系，值得作一度叙述。

中国新诗人的作品，印成集子，最先与读者对面的，是胡适之先生的《尝试集》。胡先生是一个乐于在客人面前朗诵他新作的诗人。他的诗因为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由他自己读来，轻重缓急之间见出情感，自然很好听。正如杨小楼^⑫戏文中说白，令人起干脆利落之感，可是轻轻的读，好；大声的读，有时就不免好笑。

冰心女士是白话文学运动初期人所熟知的一个女诗人，在她写短诗时，虽注明献给母亲，赠给弟弟，可不知这赠献是写还是读。直到她搁笔那一年，写了一篇长诗给另一个女人，告那人说，“惟有女人知道女人的心”。“诗人的话是一天花雨，不可信。”那首诗写成后，似因忌讳，业已撕碎。当那

破碎原稿被另一个好事者，从字篓中找出重抄，送给我这个好事编辑时，我曾听她念过几句。冷眼一瞥，那时桌上还放有一部石印的《诗韵集成》，可想见那种苦吟的情形。那首诗是这个女诗人给另一个女诗人，用一种说教方式告给她不宜同另一男诗人继续一种友谊。诗人的话既是一天花雨，女诗人说的当然也不在例外，这劝告末了不免成为“好事”。现在说来，已成文坛掌故了。

谈新诗和新诗运动的人，不会忘掉徐志摩先生。我头一次见到这个体面作家时，是在北平松树胡同新月社院子里，他就很有兴致当着陌生客人面前读他的新作。那时节正是秋天，沿墙壁的爬墙虎叶子五色斑斓，鲜明照眼。他坐在墙边石条子上念诗。同听的还有一个王庚先生。环境好，声音清而轻，读来很成功。（新诗用诵读方式来欣赏，在我记忆上只有这次完全成功。）

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这种试验在新月社即已有过，成绩如何我不知道。较后的试验，是在闻一多先生家举行的。他正从国外学画归来，在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职，住家在学校附近京畿道某号房子。那时他还正存心作画师，预备用中国历史故事作油画，还有些孩子兴趣或摩登幻想。把家中一间客厅墙壁表糊得黑黑的，（除了窗子完全用黑纸糊上！）拦腰还嵌了一道金边。《晨报》社要办个诗刊，当时京派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子惠、朱大枬诸先生。为办诗刊，大家齐集在闻先生家那间小黑房子里，高高兴兴的读诗。或读他人的，或读自己的。不特很高兴，而且很认真。结果所得经验是，凡看过的诗，

可以从本人诵读中多得到一点妙处，以及用字措词的轻重得失。凡不曾看过的诗，读起来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更难望明白它的好坏。闻先生的《死水》，《卖樱桃老头子》，《闻一多的书桌》，朱先生^⑬的《采莲曲》，刘梦苇先生的《轨道行》以及徐志摩先生的许多诗篇，就是在那种能看能读的试验中写成的。这个试验既成就了一个原则，因此当时的作品，比较起前一时所谓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稍稍不同。修正了前期的“自由”，那种毫无拘束的自由，给形式留下一点地位。对文学“革命”言，有点走回头路，稍稍回头。刘梦苇先生的诗，是在新的歌行^⑭情绪中写成的。饶孟侃先生的诗，因从唐人绝句上得到暗示，看来就清清白白，读来也节奏顺口。朱湘先生的诗，更从词上继续传统，完全用长短句形式制作白话诗。新诗写作原则是赖形式和音节作传达表现，因此几个人的新诗，都可读可诵。

新诗运动最先提出的口号，是“从民歌吸取新生命新形式”。这个口号的应用却不广，上述几人所运用的形式音节，差不多全取给于外国诗与旧诗词。惟一想把新诗和民歌连成一体，以调驯语言为出发点，加以试验，在实验上见出一点成绩的人，还应当推重五四运动时代老诗人刘半农先生。他的《扬鞭集》一部分拟吴歌体作品，可说是最勇敢的朗诵诗的尝试。其所以不引人如何注意，只为的是体例用吴音不用国语。

正因为大家真在试验，从试验中知道新诗要在诵读上成功，韵即或可以放弃，平仄可以不谈，至少作者也必需弄明白语言文字的惯性。说起这一点，到末了还是离不了形式。

所以诗刊的理论，当时有“戴脚镣跳舞”一词。承认新诗要达到某种目的，就必然受某种限制。这目的就是适于朗诵，便于记忆，易于感受。诗人早死，俨然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公律，徐志摩、刘梦苇、朱湘、刘半农、朱大枬、杨子惠、方玮德诸先生，都不幸早早的死去。若天假以年，这些人对新诗写作又能持久不失去其兴趣，在今日必然有更好的成就，可以断言。

中国文学运动既然是社会革命运动一分枝，当然也不免受其影响。因此当革命者在政治上受了限制，在文学上还保留得一分自由时，俨然找到了一个决口，革命诗人来嘲笑诗人。本只应当说“意识落伍”，嘲笑的无节制，却转成“形式落伍”。这些人实不知道当时重新提出“重语言讲形式”的问题，正是一种求普及的努力。到形式被嘲弄轻视，用当时流行的稀奇古怪名词是“扬弃”。一经“扬弃”后，于是产生了不少以革命为题材的口号诗。结果到现在，我们知道有“革命”，有“革命诗人”，只是数说不出什么是“革命诗”。这从数年来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即可明白。理论家讨论到这个问题时，虽在一方面还消极的不求甚解，指责到北方新月派诗人作品之无价值，可不能积极的提出什么作品，谓为有价值加以表彰。换言之，就是有意想扬弃的“形式主义”，无法扬弃，特别想尊重的“理想主义”，始终不能从作品上有所建设。

不因为“扬弃”的威胁，依然继承北方所提出的原则而写作，到后来有五个作家的成就都很好，中央大学有陈梦家、方玮德两先生，青岛大学有臧克家先生，上海有戴望舒先生，

北平有林徽因女士。

北方《诗刊》^①结束十余年，当时的诗人如徐志摩，朱湘、刘梦苇、朱大枏、杨子惠、胡也频、方玮德、刘半农诸先生全都死了。闻一多先生改了业，放下了他诗人兼画家的幻想，诚诚恳恳的去做他的古文学爬梳整理工作。饶孟侃作了中央政校军校的教官。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

这个集会虽名为读诗会，我们到末了却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和老舍先生的散文。记得某一次由清华邀来一位唐宝鑫先生，读了几首诗，大家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动人。到后读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时，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从那次试验上让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结论，一个作者若不能处理文字和语言一致，所写的散文，看来即或顺眼，读来可不好听，新诗意义相同。有些诗看来很有深意，读来味同嚼蜡。一篇

好散文或一首好诗，想在诵读上得到成功，同时还要一个会读它的人。

当时长于填词作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此外还有个喉咙大，声音响，能旁若无人高声朗诵的徐芳女士，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总结看来，就知道自由诗不能在诵读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力。不自由诗若读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哼唧唧，并无多大意味。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若不会读又来在较多人数集会中大声的读，就常常不免令人好笑。

这个集会在我这个旁观者的印象上，得来一个结论，就是：新诗若要极端“自由”，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得来的成功。但是这种“新”很容易成为“晦”，为不可解。废名的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何其芳、卞之琳几人的诗，用分行排比增加视觉的效果，来救听觉的损失，另是一例。若不然，想要从听觉上成功，那就得牺牲一点自由，无妨稍稍向后走，走回头路，在辞藻与形式上多注点意，得到诵读时传达的便利，林徽因、冯至、林庚几人的诗，可以作例。

四

“朗诵诗”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并不是很久的事。它的

来源还同“集体创作”一样，是由比邻转贩前来的。这名辞虽在一部分海上出版物上创作诗上见到，真的老老实实的朗诵试验，依然还在北方，比读诗会稍慢一点，以北大歌谣学会，燕大通俗读物编刊社，北平研究院历史语言系作中心，有个中国风谣学会产生。这团体目的顾名思义即可知是着力于民间诗歌的。集会时系在北平中南海北平研究院戏剧陈列馆，参加者有胡适之、顾颉刚、罗常培、容肇祖、常惠、佟晶心、吴世昌……诸先生，杨刚、徐芳、李素英诸女士。集会中有新诗民歌的诵读，以及将民间小曲用新式乐器作种种和声演奏试验。集会过后还共同到北平说书唱曲集中地的天桥地方，去考察现代技艺人表演各种口舌技艺的情形。并参观通俗读物编刊社所编鼓词唱本表演情形。当时这个组织，正准备一面征集调查，一面与说书人用某种形式合作，来大规模编制新抗日爱国适用于民间的小册子，可惜这个计划，因芦沟桥事变便中止了。

其时南方有个作家，值得特别提出，是用打油体写劳动诗歌的陶行知^{①⑥}先生。那种独白为战的精神，很可佩服。

中日战争发生后，“朗诵诗”在刊物上到处可见。作品既不少，称应为朗诵诗的作家自然也很多。但就一般成就而言，这些作者的“意”或“辞”，却尚不曾超过并不常用“朗诵诗”字样为子题的臧克家先生作品。试就臧先生作品探检，就可知体制实源于闻一多先生作品，还是保存当年诗刊所应用的那个原则，即在语言上求适合惯性，更在这个条件上将语言加以精选，因此作品便显得有生气多新意。

描写战争的“朗诵诗”既到处可见，语言上合于朗诵条

件的，在当前作者中如田间、蒲风诸先生，一定有些动人的篇章。但就所见到的说来，倒还是要让陈梦家先生在《铁马集》中，为一二八战争写的几篇长诗较成功。这些诗还是六年前作的！（有个路易士先生，虽很热情的写作了一本“为掀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长诗，也许有什么人为译作意大利文、德文、俄文、日本文、法文、英文，且给这些强国领袖读到时，说不定会发生奇迹，以为这是一个东方诗人的预言，为实证预言，于是宣战。可是给中国群众来欣赏，路先生的理想要实现，似乎就很困难，因为看来实在不大容易懂得它的好处。）

去年九月里我由北方跑到武汉，从武汉报纸上常看到一个高兰先生的“朗诵诗”。诗大都是关于抗战的，文字排比都很好，有情感，有辞藻，比起一般刊物上用同样名目写的诗歌，似乎要高一筹。不久又见到什么报上记载在文华学院某集会上，（又似乎是广播电台，）高先生要朗诵他的大作。可惜这种朗诵我无福分一听。但据听过那种朗诵的朋友来说，却以为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尝试。据我估想，诗人对于语言若无特别训练准备，还是以不上台好，不管上的是什么台。当时若要一个声音柔美的女子，来读某种悲哀诗，用声音低洪的男子，来读某种悲壮诗，更找一个小孩子，来读某种需要同情稚弱的诗；总之，拣选语言富于情感，而且与诗中问题相关的人，来朗诵或低诵，成绩一定要好得多！若系由无线电播音，尤必需专家指导，才能放送出去，不至于令人失望。一个诗人冒然与听众对面，个人失败事小，对朗诵诗前途必受不良影响，很可惜。

归结说来，“朗诵诗”不失为新诗努力之一个方向。这名目虽近数年方出现，它的实验已进行了许多年。在诗的朗诵运动中，它的各种试验，不拘成功与失败，对于将来的新诗“怎样写”？“写什么”？都大有帮助。至于它若希望如当前提倡者与写作者的理想，本身既站得住，且能成为新诗中一个主流，使新诗向适于朗诵，便于记忆，易于感受方面发展，理论上似值得从两千年来中国过去凡与“诗”有关系的一切作品，如诗、词、曲、桂枝儿^①、山歌、小调等等，重新加以检讨，分析取舍，就中抽出一些意见，供给作家。作者却根据这些意见，再从活用语言，来学习控纵驾驭这些语言的技术，写成诗歌。若希望它可以成为多数人在公众集会上拿来诵读，使不识字的人也能从听觉上受到教育，有所启发，还必需使诵读者受相当训练。（在《抗到底》这个刊物上，常有冯玉祥、老舍、老向诸先生的作品，在求通俗化的态度下写作，方法可以说是很有意义的。只不知道实验时情形如何。）

朗诵诗的前途，可以说也光明，也暗淡：为什么？为的是若有一群人，能这么实事求是来努力，直接纵无所建树，间接还可帮助新诗在形式观念上有极多修正，前途自然可说是光明的。若理论家只是新八股的出题者，作家也只是新八股的习题者，在作品上一律标明“朗诵”字样，热心背后终离不了一个流行趣味，既不肯分析它的得失，也无从判断作品上的成败，前途当然可说是暗淡的。

本篇发表于1938年10月1日~15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署名沈从文。

① 欧阳修 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② 《聊斋志异》 志怪小说集，清蒲松龄著。

③ 《诗》 《诗经》的简称。

《易》 《周易》的简称。

④ 《急就章》 西汉史游撰，以韵语形式教儿童识字的读本。

《汤头歌》 即《汤头歌诀》，清江昂编，以七言诗体编成的医方书籍。

《三字经》 旧时蒙学课本，均为三言韵语。

《龙文鞭影》 明萧良友始编，旧时蒙学课本。

⑤ 宝卷 由唐代寺院中“俗讲”发展而成的说唱文学，以十字、七字句韵文为主。

⑥ 王昌龄 唐代诗人。

⑦ 梨园子弟 旧时对戏曲演员的称呼。

⑧ 李白 唐代大诗人。

《清平调》 唐教坊曲名，相传始于李白醉中奉玄宗命进新辞清平调，乃成三章，由李龟年歌之。

⑨ 杜牧之 唐文学家。

⑩ 《李娃传》 唐传奇篇名，白行简作。

⑪ 道情 曲艺的一个类别，源于唐道教的“道曲”。南宋时开始以渔鼓与筒板伴奏，故亦称渔鼓。

⑫ 杨小楼 京剧演员，以武戏文唱著称，世称“杨派”。

⑬ 朱先生 指朱湘，现代诗人。

⑭ 歌行 古代诗体之一。汉魏以下乐府诗，题名歌、行的颇多，遂有歌行一体，形式较为自由。

⑮ 北方《诗刊》 指《晨报·诗刊》。

⑯ 陶行知 现代教育家。

⑰ 桂枝儿 民间曲调名，盛行于明代。内容多写恋情。冯梦龙编《桂枝儿》，收小曲四百余首。

谈 保 守

一提“保守”很容易想起英国。多数人都觉得英国以保守著名的。社会组织上，个人性格上，给人的印象，都仿佛比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富于保守性。同时且觉得这种“守成”与“照旧”成就了英国的伟大，正如现代的德、意、苏联，其他国家用“违反传统”所能成就的一样。帝国商务的推进，领土的维持，是由保守成功的。但有一点我们容易疏忽处，英国人对于支持传统虽十分注意，正因为支持传统，举凡一切进步的技术，可并不轻视。他保守，在工业上却不落后，在武备上也不落后，在人事管理上也不落后。保守毫不妨碍它的进步，且从不因保守而排斥进步理想。它的保守是有条件的，经过选择的。

中国也富于保守性，好些场合中国人且以此自夸。可是这种“守成”与“照旧”，却招来外侮与内患。孙中山先生明白贫弱与愚是中国民族的病根，想把这个民族振作起来，在应付人事道德上固然有条件保留些旧有东西，在谋生存技术上却极力讲求进步。因此对于政治组织与富国计划中，费了

数十万文字来说明。孙先生死后，国民都觉得他的人格伟大而识见深远。不过这种敬仰仿佛是一回事，个人愚而自私又另是一回事。换言之，就是敬仰他的从不学习他、摹仿他。正因为若干人依然还是愚而自私，通常且以能保守自誉自慰。当政者则用保守为一种政略，支持其现成权利，家道小康的中层阶级，血气既衰，毫无远志，亦乐于在一种道德的自足与安全中打发日子。一切进步既包含变革，一种由不合理转为合理的变革，对于个人权利，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取得者，如贪污，对于个人义务，凡在保守中用不正当方式规避者，如门阀，社会若进步，即不免失去其保障。因此一来，“进步”便成为多数人惶恐与厌恶名辞。这些人惧怕进步，生存态度即极端妨碍进步。对进步惶恐与厌恶，因之诅咒它，诋毁它，盲目耗费力量极多。倘如把这点抵制进步的力量转移到另一相反方面去，中国便不会像当前情形了。试从中国两件近事取例：山东的韩复榘，妄想用一部《施公案》^①统治一省，用极端保守方式支持他的政权，不知国家为何物，结果战争一起，局面一变，组织崩溃，误国殃民，自身不保。广西的李、白^②两人，眼光较远大，凡事知从大处看，肯从大处注意，对内政建设一切用近代技术处理，抗战期中，成绩昭著，足为全国模范。保守与进步不同处，它的得失，从上述两例，即可明白了然。

对保守情绪作进一步观察，我们便知道它原来与“迷信”有关，同发源于人类的自私与无知，鲁滨孙在他的《心理的改造》一书中认为这是人类蛮性之遗留。他说——

研究原始人生活特质的人，往往惊讶其根深蒂固的

保守性，不必要的束缚个人自由和绝望的惯例。人类和普通植物一样，每易一代一代因循下去，其生活与祖先生活无异。必有强烈的经验逼迫着他们，方能使其有所变革，并且每易藉端回复到旧习惯。因为旧习惯比较简单粗陋而自然——总之，更与他们的本性和原始性相近。现在的人往往以他的保守主义自骄，以为人类是天生好乱的动物，幸有远见保守派所阻遏，而不知正与事理相背驰。殊不知人类天生是保守的，好作茧自缚，阻挠变革，畏怖变革，致使他们自生存以来，差不多全部时期处于一种原始状态中，而至今犹有人在这种近代社会中，维持各种野蛮的习惯。所以根据什么主张或什么教条的保守家，在态度上是毫无疑义的原始人。这种人进步的地方，只在他能够为保持旧心境随时举出若干好听理由来罢了。

这位先生谈的是世界人类问题，针对的是支配世界顽固保守者、强权者，所以说到进步，他还认为只要这些人观念上能有所变革，人类就幸福多了。他说的虽是世界，拿来给中国人看倒也有一二点似乎很相似处。他的希望，是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及其观念上的改变，以为只要观念一改，国家的夸大，种族的仇视，政治的腐败，以及一切缺点，必都可望降低至危险点以下。

困难或许是观念的改变。所以斯多噶派^③的古谚说：人们感受的痛苦，实起因于他们对事物的意见，而非由于事物本身。我们国人的弱点，也很可说正是做人的意见不大高明。

社会由于私与愚而来的保守家到处存在，他们的意见成

为社会的意见，所以三十年来的中国，在物质方面，虽可从沿海各地工商业物品竞争摹仿上，见出一点进步，在负责者作公民的态度上，情形就令人怀疑。尤其是一种顽固保守家，经过一度化装，在新的社会组织里成为中坚以后，因对于任何进步理想都难于适应，感到惶恐，对进步特殊仇视，“进步”在中国更容易成为一个不祥的名辞。

人类天性是易于轻信，且容易为先人印象所迷惑，受因习惯例所束缚的。尤其是中国这种社会，至今还充满了鬼神的迷信，大多数读书人还在圆光，算命，念佛，打坐，求神，许愿种种老玩意儿中过日子。大多数人都习惯将生命交给不可知的运与数，或在贿赂，阿谀交换中支持他的地位，发展他的事业。从这么一种社会组织中，我们对于进步实无希望可言。

年青人都渴望进步，一切进步不能凭空而来。譬如种树，必有其生根处。统治者便于治理，中产者便于维持，薪水阶级便于生活，守常成为当然的趋势。进步种子放在守常土壤中，即生根发芽，生长得也实在太慢了。这事从中国教育即可看出。普通教育的目的，应侧重在养成大多数良好公民的人格和知识。一个人对于国家得到公民权利以前，先知所以尽国民义务。爱国家，知大体。对职务责任不马虎苟且，处世做人时知自重自爱。

不幸之至，教育收成正恰得其反。中国农民中固有的朴厚，刚直，守正义而不贪取非分所当得种种品德，已一扫而光。代替这种性格而来的特点是虚伪与油滑：虚伪以对上，就成为面谀。貌作恭顺虔敬，其实无事不敷衍做作，毫不认真。油滑以取于下，则成为无数以利分合的小团体竞争。有一点相同，即上下一致将无知平民当作升官发财对象，切实奉

类事希望四十岁以上的人，无可希望。

五四运动之起，可说是少数四十岁以上的读书人，与多数年青人，对于中国人“顺天委命”行为之抗议，以及“重新做人”之觉醒。伴同五四而来的新文学运动，便是这种抗议与自觉的表现。拿笔的多有用真理教育他人的意识。惟理论多而杂，作者亦龙蛇不一，因此二十年来新文学作家在中国成一特殊阶级，有一稀奇成就：年事较长的，视之为捣乱分子，满怀无端厌恶与恐惧，以为社会一切坏处统由此等人生事。年事较轻的，又视之为惟一指导者，盲目崇拜与重视，以为未来中国全得这种人负责。两方面对文学作者的功用与能力估计得都过分了一点。加上文学作者自身对于社会的态度，因外来影响，一部分成为实际政治的附庸，能力不足者则反复取巧，以遂其意；另一部分却与社会分离，以嘲讽调笑为事，另一部分又结合浪漫情绪与宗教情绪而为一，对于常态人生不甚注意，对于男女爱欲却夸大其辞。教育他人的渐渐忘了教育自己，结果二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虽促进了某一方面的解放与进步，同时也就增加某一方面的纷乱和堕落。文字所能建设的抽象信仰，得失参半。

人事既有新陈代谢，当前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就是此后二十年社会负责者。一个文学作者若自觉为教育青年而写作，对于真理正义十分爱重，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用明智而产生的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文学理想若必需贴近人生，这样来使用它时，也许容易建设一较健康作风与良好影响。我们所需要的

真理无它，即全个民族，应当好好的活下去，去掉不可靠的原人迷信，充实以一切合理的知识与技术，支配自然，处置人事，力求进步，使这个民族在任何忧患艰难情形中，还能够站得住，不至于堕落灭亡罢了。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尼采^⑤说：“证明一事是不够的，应该将人们向之引诱下去，或启迪上来，因此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学着将他的智慧说出来，不碍其好像愚蠢。”实证真理很容易邻于愚蠢，知识阶级对于各事之沉默，即类乎对此“蠢愚”之趋避。然而时间却将为这种不甘沉默者重作注解，即：社会需要这种人用韧性来支持他的意见，人类方能进步，有人敢对传统怀疑，且能引起多数人疑其所当疑，将保守与迷信分离（与自私和愚昧分离），这人即为明日之先知。

六月十四昆明作七月七日改

本篇发表于1938年7月《新动向》第1卷第2期。署名沈从文。

① 韩复榘 原为冯玉祥部将，曾任河南、山东省政府主席，抗战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因不战而弃山东，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处决。

《施公案》 长篇小说，清无名氏著，叙清康熙年间施仕纶断案故事。

② 李、白 指李宗仁和白崇禧，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桂系代表人物。

③ 斯多噶派 古希腊罗马哲学学派。

④ 语出老子《道德经》。老子，春秋时哲学家。

⑤ 尼采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一般或特殊

人类发明文字后，文字的使用，最先只是少数人有这个权利。因此凡用文字保存的知识，多具特殊性，少数人能运用它，多数人可不能享受它。直到后来发明了印刷术，而且发明的主要原因便是印行经典，力求普遍。多数人虽因此能享受经典，还是不能自由使用文字。这限制自然是由上而下的。多数人能够享受文字的用处，已算得到一般化的意义了。照理想说来，社会组织从法老帝王的极端专制，到民主政治的人类原则平等，知识学问的特殊性必然渐归消灭，一般化必然渐次可以实现。

可是另外还有个事实值得注意，就是人类求生技术越进步，社会越复杂，一切必分工进行，各有所守，各有所专，种种知识学问又会自然而然趋向于专门化，特殊化。一般性口少，特殊性口多。

一个民族的文化或文明，重在一般事情能够特殊化，同时这特殊化的东西又能应用于一般生活。能够这样，是进步。不能够这样，是堕落。这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

举个浅近的例，昆明地方城乡转运的交通工具，大部分还是牛车，若有人能设法使牛车行动较轻便，或甚至于造出一种木牛流马来代替，就是一般的特殊化。这种费力少效用大的交通工具，每人都能用，都能有，就是特殊的一般化。提起地面交通工具时我说马车牛车，不说汽车，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一直到如今还不能够真正自造一辆汽车。

关于牛马车辆问题，不过借来譬喻一下罢了。文学方面也有特殊一般问题存在，很可讨论

文学作品简单说来不过是用文字拼拼凑凑产生的一种东西罢了。古怪是它的存在，好像很有用，又好像无用。即如说有用，它的用处又随人解释，各有不同。现在假定承认它有用，就文字说，不管它是和普遍口语离得极远，还是和口语十分接近，想运用它来编一支小曲，一段短短故事，使情感或理想成为一种型式，或者更不怕汗牛充栋来写一部大书要他发生好作用，必得透彻了解它的性质。比方说，在试验中必作到能令文字“平铺成为湖泊，凝聚成为渊潭”。必有耐心与残忍，肯“扭屈文字试验它的韧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一个作家对于文字的性能了解得越多，使用它作工具时也就越加见得“恰当”。我不说“美丽”，说的是“恰当”，正因为一切所谓伟大作品，处置文字的惊人处，就正是异常“恰当”处。运用文字，表现自己或社会，希望恰如其意所能言，写它出来时，且能明白在某一类读者中必然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可能引起些什么反应，既是每个作者的愿望，这么说来，了解文字性能似乎也可以算得上一种“知识”，而且算得上作家所不可少的知识，这知识稍稍说得不同，便是技巧，调排文字的技巧。

在这时提起技巧，很自然会成为一种迂论，一种反世违俗见解。原因是有一句话在可解不可解情形下流行：一切文字都是宣传。

“一切文字都是宣传”，正如说“一切文字都可载道”，可是自从在作家间流行着这句话后，有好些人从此以后似乎就只记着“宣传”两个字。在朝在野服务什么机关的，也都只记着“宣传”，不大肯分析宣传的意义。标语口号盛行时，什么标语口号能产生什么结果就不大明白。于是社会给这些东西笼统定下一个名辞，“宣传品”。这名辞内容，包含了“虚伪”，“浮夸”，“不落实”，“无固定性”，“一会儿就成过去”，种种意义。又给创造它的人一个称谓，“宣传家”。宣传家可分两种：有少数是能干的，人虽能干，依然不会得人敬重。居多倒是愚笨的，因为仿佛极有信仰，实在无多知识。这件事平常人不能说，不许说，用意虽好，说来还是很容易令拿笔的老实人灰心，护短者生气。但居指导地位的又照例不肯说。所以慢慢的情形就越来越不同，直到有一天，“宣传”两个字当做什么解释，指导者也弄得糊糊涂涂。这一天不一定是“未来”，也许“过去”已有过了。

现在我们一提起用文字作宣传工作时，真像是早已由少数专家的特殊知识，进步到多数人的—般化知识了。想证实它并不困难，许多地方“文化人”忽然加多，便是一例。另外给人一种意义是凡拿笔的通可称为“文化人”，社会进步战争支持全少不了他们。理由是他们会宣传，正在用笔战斗。若让我们说真话，多数拿笔的朋友们，对于这一项知识，应当说实在太薄弱了。“抗战八股”与“自我批判”两句话近来在刊物上常可见到，说明这薄弱的存在。想增加这种“文化

人”的知识，也许还得从宣传家写成的小册子以外想办法。也许还得另外什么人写点东西出来。这本书说不定只是一部小说，内容仅仅写到普遍社会所见的“愚”与“诈”，“虚伪”与“自大”，认识它，指摘它，且提出方式来改善它，与战事好像并无关系，与政治好像并无关系，与宣传好像更无关系，可是这作品若写好，它倒与这个民族此后如何挣扎图存，打胜仗后建国，打败仗后翻身，大有关系！他教育的或者只是一小部分读书人，为的是这些人真正爱重这个国家，有了觉悟，很谦虚的需要接受这种教育。这作品不特内容能启迪他们，文字也能启迪他们

在目前，重庆或桂林，长沙或昆明，忽然有许多读书人都被称或自称为“文化人”，这么一来对“宣传”好像极有意义，因为宣传与热闹本来不可分开。文化人一多，事情就热闹起来了。不过我倒觉得另外有些作家，特别值得注意。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身分，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或用一个平常人资格，从炮火下去实实在在讨生活，或作社会服务性质，到战区前方后方，学习人生。或更抱负一种雄心与大愿，向历史和科学中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这几种人的行为，从表面看来，都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着战争。目的只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探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字来说明它，保存它。他们不在当前的成功，因缘时会一变而为统治者或指导者，部长或参政员。只重在尽职，尽一个中国国民身当国家存亡忧患之际所能尽的本分。他们在沉默中所需要的坚忍毅力，和最前线的兵士

品德，完全一致。这种人和“文化人”比起来，在当前是个“少数”。

这种人的产生增多，并不靠“宣传”，火用火可以接引，这种人当前看来少，战争若持久，此后会加多。不拘是作家，是专家，将个人能力参加到战争方面时，毫无可疑，这是一个贡献生命最切实最合理的方式。话说回来，这种人的态度是很容易被人轻视与忽视。这种人且常常不免被某种“文化人”奚落。原因极简单，“文化人”是在目前唯一有多量时间使用文字的人，他若作的是“宣传”工作，一切无宣传性的工作，需沉默努力而且更需时间和耐心的工作，都容易被误解，受奚落。好在这一切是无妨碍的，战争一延长，举凡冷静而坚实的工作，就会见出它的意义和效果。

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

载于《今日评论》

本篇发表于1939年1月22日《今日评论》第1卷第4期。署名沈从文。

昆明冬景

新居移上了高处，名叫北门坡，从小晒台上可望见北门门楼上“望京楼”的匾额。上面常有武装同志向下望，过路人马多，可减去不少寂寞！住屋前面是个大敞坪，敞坪一角有杂树一林、尤加利树瘦而长，翠色带银的叶子，在微风中荡摇，如一面一面丝绸旗帜，被某种力量裹成一束，想展开，无形中受着某种束缚，无从展开。一拍手，就常常可见圆头长尾的松鼠，在树枝间惊窜跳跃。这些小生物又如把本身当成一个球，抛来抛去，俨然在这种抛掷中，能够得到一种快乐。一种从行为中证实生命存在的快乐。且间或稍微休息一下，四处顾望，看看它这种行为能不能够引起其他生物的关注。或许会发现，原来一切生物都各有心事。那个在晒台上拍手的人，眼光已离开尤加利树，向虚空凝眸了。虚空一片明蓝，别无他物。这也就是生物中之一种“人”，多数人中一种人，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他的想象或情感，正在不可见的一种树枝间攀援跳跃，同样略带一点惊惶，一点不安，在时间上转移，由彼到此，始终不息。

敞坪中妇人孩子虽多，对这件事却似乎都把它看得十分平常，从不曾有谁将头抬起来看看。昆明地方到处是松鼠，许多人对于这小小生物的知识，不过是捉把来卖给“上海人”，值“中央票子”两毛钱到一块钱罢了。站在晒台上的那个人，就正是被本地人称为“上海人”，花用中央票子，来昆明租房子住家过日子的。住到这里来近于凑巧，因为凑巧反而不会令人觉得稀奇了。妇人多受雇于附近一个织袜厂，终日在敞坪中摇纺车纺棉纱。孩子们无所事事，便在敞坪中追逐吵闹，拾捡碎瓦小石子打狗玩。敞坪四面是路，时常有无家狗在树林中垃圾堆边寻东觅西，鼻子贴地各处闻嗅，一见孩子们蹲下，知道情形不妙，就极敏捷的向坪角一端逃跑。有时只露出一个头来，两眼很温和的对孩子们看着，意思像是要说，“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成吗？”有时也成。那就是一个卖牛羊肉的，扛了方木架子，带着官秤，方形的斧头，雪亮的牛耳尖刀，来到敞坪中，搁下找寻主顾时。妇女们多放下工作，来到肉架边，讨价还钱。孩子们的兴趣转移了方向。几只野狗便公然到敞坪中来，先是坐在敞坪一角便于逃跑的地方，远远的看热闹，其次是在一种试探形式中，慢慢的走近人丛中里来，直到忘形挨近了肉架边，被那羊屠户见着，扬起长把手斧，大吼一声“畜生，走开！”方肯略略走开，站在人圈子外边，用一种非常诚恳非常热情的态度，欣赏肉架上的前腿，后腿，以及后腿末端一条带毛小羊尾巴，和搭在架旁那些花油。意思像是觉得不拘什么地方都很好，都无话可说，因此它不说话。它在等待，无望无助的等待。照例向妇人们在集群中向羊屠户连嚷带笑，加上各种“神明在上报应分明”的誓语，这一个证明实在赔了本，那一个证

明买下它家用的秤并不大，好好歹歹弄成了交易，过了秤，数了钱，得钱的走路，得肉的进屋里去，把肉挂在悬空钩子上，孩子们也随同进到屋里去时，这些狗方趁空走近，把鼻子贴在先前一会搁肉架的地面，闻嗅闻嗅，或得到点骨肉碎渣，一口咬住，就忙匆匆向敞坪空处跑去，或向尤加利树下跑去。树上正有松鼠剥果子吃，果子掉落地上。上海人走过来拾起嗅嗅，有“万金油”气味，微辛而芳馥。

早上六点钟，阳光在尤加利树高处枝叶间，敷上一层银灰光泽。空气寒冷而清爽。敞坪中很静，无一个人，无一只狗。几个竹制纺车瘦骨凌精的搁在一间小板屋旁边。站在晒台上望着这些简陋古老工具，感觉“生命”形式的多方。敞坪中虽空空的，却有些声音仿佛从敞坪中来，在他耳边响着。

“骨头太多了，不要这个腿上大骨头。”

“嫂子，没有骨头怎么走路？”

“曲蟾有不有骨头？”

“你吃曲蟾？”

“哎哟，菩萨。”

“菩萨是泥的木的，不是骨头做成的。”

“你毁佛骂佛，死后会入三十三层地狱，磨石碾你，大火烧你，饿鬼咬你。”

“活下来做屠户，杀羊杀猪，给你们善男信女吃，做赔本生意，死后我会坐在莲花上，只往上飞，飞到西天一个池塘里，洗个大澡，把一身罪过，一身羊臊血腥气，洗得个干干净净！”

“西天是你们屠户去的？做梦！”

“好，我不去让你们去。我们都不去了，怕你们到那地方肉吃不成！你们都不吃肉，吃长斋，将来西天住不了，急坏了佛爷，还会骂我们做屠户的，不会做生意。一辈子做赔本生意，不落得人的骂名，还落个佛的骂名。你不要我拿走。”

“你拿走好！肉臭了看你喂狗吃。”

“臭了我就喂狗吃，不很臭，我把人吃。红焖好了请人吃，还另加三碗烧酒，怕不有人叫我做伯伯舅舅干老子。许我每天念《莲花经》一千遍，等我死后坐朵方桌大金莲花到西天去！”

“送你到地狱里去，投胎变一只蛤蟆，日夜哗哗呱呱叫。”

“我不上西天，不入地狱，忠贤区区长告诉我，姓曾的，你不用卖肉了吧，你住忠贤区第八保，昨天抽壮丁抽中了你，不用说什么，到湖南打仗去。你个子长，穿上军服排队走在最前头，多威武！我说好，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去。我怕无常鬼，日本鬼子我不怕。派定了我，要我姓曾的去，我一定去。”

“××××××××××”

“我去打仗，保卫武汉三镇。我会打枪，我亲哥子是机关枪队长！他肩章上有三颗星，三道银边！我一去就要当班长，打个胜仗，我就升排长。打到北京去，赶一群绵羊回云南来做生意，真正做一趟赔本生意！”

接着便又是这个羊屠户和几个妇人各种赌咒的话语。坪中一切寂静。远处什么地方有军队集合下操场的喇叭声音在润湿空气中振荡。静中有动，他心想：

“武汉已陷落三个月了。”

屋上首一个人家白粉墙刚刚刷好，第二天，就不知被谁某一个克尽厥职的公务员看上了，印上十二个方字。费很多想象把字认清楚了，更费很多想象把意思也弄清楚了。只就中间一句话不大明白，“培养卫生”。这好像是多了两个字或错了两个字。这是小事。然而小事若弄得使人糊涂，不好办理，大处自然更难说了。

带着小小铜项铃的瘦马，驮着粪桶过去了。

一个猴子似的瘦脸嘴人物，从某人家小小黑门边探出头来，“娃娃，娃娃，”见景生情，接着他自言自语说道，“你那里去了？吃屎去了？”娃娃年纪已经八岁，上了学校，可是学校因疏散却下了乡。无学校可上，只好终日在敞坪里煤堆上玩。“煤是那里来的？”“从地下挖来的。”“作什么用？”“可以烧火。”娃娃知道的同一些专门家知道的相差并不很远。那个上海人心想：“你这孩子，将来若可以升学，无妨入矿冶系。因为你已经知道煤炭的出处和用途。好些人就因那么一点知识，被人称为专家，活得很有意义！”

娃娃的父亲，在儿子未来发展上，却老做梦，以为长大了应当作设治局长，督办，——照本地规矩，当这些差事很容易发财，发了财，买对门某家那栋房子。上海人越来越多了，到处有人租房子，肯出大价钱。押租又多。放三分利，利上加利，三年一个转。想象因之而丰富异常。

做这种天真无邪的好梦的人恐怕正多着。这恰好是一个地方安定与繁荣的基础。

提起这个会令人觉得痛苦，是不是？不提也好。

因为你若爱上了一片蓝天，一片土地，和一群忠厚老实人，你一定将不由自主的嚷：“这不成！这不成！天不辜负你

们这群人，你们不应当自弃，不应当！得好好的来想办法！你们应当得到的还要多，能够得到的还要多！”

于是必有人问：“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在骂谁？教训谁？想煽动谁？用意何居？”

问的你莫明其妙，不特对于他的意思不明白，便是你自己本来意思，也会弄糊涂的。话不接头，两无是处。你爱“人类”，他怕“变动”。你“热心”，他“多心”。

“美”字笔两并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认识。“爱”字虽人人认识，可是真懂得他意义的人却很少。

廿八年二月六日载香港《大公报·文艺》

本篇发表于1939年2月6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署名沈从文。

云南看云集

云南看云集

— YUNNAN KANYUNJI —

《云南看云集》，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1943 年 6 月初版。全书原目为：第一组 第一篇 文艺政策检讨；第一组 第二篇 文学运动的重造；第一组 第三篇 小说与社会；第二组 第一篇 新废邮存底十六则；第三组 废邮存底十三则。第三组的细目，除《边城·题记》未收外，均同 1937 年版《废邮存底》一书中作者所著部分。本集所收，除《废邮存底》十三则在本卷已另成集外，其余均据 1943 年 6 月重庆国民出版社初版本。编入全集时，对原目标题前、组、篇序号予以简化。

第一组

“文艺政策”检讨

中日战争延长到第三年，成为胶固性以后，“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成为国人一句熟习的口号。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起始，也许就要变更一下这个口号的方式。为的是政治上有好些事都能很顺利的着手，军事上同盟实力一增强，为配合同盟国对于太平洋战区设计，说不定我们在每一线上都要改一改。但这是军事专门家的问题，外行人可不用提。若说政治，自然是要有种种政策活用，在计划中逐渐推行，方能见出功效的。战前的法币政策，在六年战争中，国家得到极大的帮助，是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五年的兵役政策，如何日有修正，渐渐趋于完善，从去年起且已能用大学生入空军服务，到今年还使党员、参政、以及一切历来以特殊身分在国内受特权的阶级，参加兵役，我们得承认这个制度已日趋于合理化。至于最近的土地经济政策，如粮赋征实与物资管理，如能够一一实行，且从试验中将办法不断修正，影响到国家前途，意义自然更加深长。

不迨所有政策的推行，有些事仿佛只是设计者和技术家

(或公务员)的合作,辅以一组法令和条例,附加上奖惩,一年半载即可见功。有些事又似乎并不如此简单,设计者和技术家,法令和条例,到此等问题上都得用别种方法,慢慢的方能收效。就中尤其是某种政策,倘若它涉及于社会上多数人“情感的习惯”,法令和条例的奖或惩,用来用去都不易见效时,问题所在,我们就得承认,说远点,它很可能和民族性有点关系,说近点,它又仍然和近二十年来的社会变迁有点关系。即以“信仰”与“信任”来说,国家对之就决不是普通方式可望解决的。这种争取多数“信仰”或“信任”,既不能尽赖利害事实,就得仰仗文字。必藉文字为作说明,或解释,或启迪……总而言之少不得将文字从各方面好好的去运用,方能见功效,有转机。所以说及现代政治时,如何使用文字,自然也就成为一种政策了。这种政策我们权且叫它做“文字政策”。近年来到处听人说及“文化运动”,文字政策自然即包含在这个运动中。若“文化运动”从较深一点看来,决不仅仅如最近一次“文化夜会”给个人的印象。还要切切实实做点事情,以能给那个多数一点作人的教育和作人的气概为目的,文字政策的善为运用,便必然占据一个主要位置。

文字政策范围广泛,可运用的方式又甚多,我想把它缩小一点,来讨论一下本人所注意的“文艺政策”。提起这个名词时,虽是多数人所熟习,反应可不一致。多数人对于这个名词的熟习,因为它由来已久,反应不一致,因为它在过去运用方式上有得有失。文学当成一个工具,达到“社会重造”、“国家重造”的理想,应当是件办得到的事情。这种试验从晚清即已起始,梁任公与吴稚晖,严几道和林琴南^①,

都曾经为这种理想努过力。这些人的工作，曾帮助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共和后军阀逐渐抬头，十余年内战痛苦的教训，正可说是革命党人和知识分子得到政权得到议会以后，疏忽了控制这个工具作成的。因此五四前后，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②等人的新文学运动，才重新提出“工具重造”（即由古文改语体文）“工具重用”（由应酬庆吊改作向新社会深处发掘，为思想解放努力）的主张。在党中则继之而起的有朱执信、戴季陶、吴稚晖、叶楚傖、邵力子……对这个运动各有贡献。二十年来作者继起，北伐成功所得助力极大，即近二十年来民族发展和社会变迁，也无不与这个工作相关。且单从白话文种种试验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得的成就，便可说是异常庄严而伟大的！

然而到国家注意及这方面，想把它当成一种政策来好好运用时，作来似乎总不见得十分顺手。截到目前为止，国家虽能运用一切物力人力，对于“文学作家”简直就可说还并无什么比较好些的方法来运用他们。这自然有个原因。试加分析，即可知从文学本身，它在某一时曾经因为工具的误用与滥用（从五四起即有大部分用到破坏否定方面去），实种下了些恶果，至今还能起作用。从设计方面说，则又因为由于习惯，负责方面对文学“是”什么，“能”什么，认识不大清楚，处理的方式因之也不大妥当，主持其事的既保持个习惯的心理状态，因此一切设计上的弱点，即自然好好存在，想去去不掉，想改改不来。

就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加以检视，我们实可得如下结论——

文艺政策原是个空洞名辞，历来就不大认真。采用的方法居多是消极的，防御的。或消耗他们的能力，使用之于无意义方面去，使有能力的亦无从好好使用。负责人对这件事尽管好像有个理想，在培养作家来实现它，事实上就只有一句话，“请莫捣乱”。目前的文艺政策，若还容许有点超越近功小利的理想，在这个政策上实现，我们就得有勇气凡事重新著手，方有希望。第一得用一种比较合理的态度认识它，其次得用一种比较合理的办法处理它。若凡事照旧，这方面的用钱将等于白费。

国家对文艺有政策，已经有了十多年。然而在政策上肯花钱，系随同战事而确定，且因战争延长加以修正的。战事发生后，军委会多了个政治部，政治部中设了个第三厅，这一厅负责处理的是“战时文化工作”。文化工作名词宽泛，可作事情本来甚多，推究初期成立的意义，和人事选择，就可知主要目的却是用这个机关来好好运用作家，让作家又好好运用那支笔，来解释战争，描绘战争，增加一点战争的庄严和热烈空气，并增加一点国民对于战争的适应力和容忍力。理想自然极好。至于如何运用，就全看主持其事的人是有心做官或打量作事而定。存心做官便不用说，因为有的是种种官榜样，足供参考，至于打量作事，那得看这个负责人的能力和眼光，若能力有限，眼光又并不高，注意点极狭小，末了当然成就有限。若眼光远大，且不自私，更重要的是明白对于这个工作要有效果，首先使国内作家产生作品以外，还知道如何分配这些作品的技术，末了当然可以推进许多计划，并为将来文运导入常轨打下个最好基础。第三厅的成立，是

先闻每月可动用一百万元经费，可见起始期望相当大。但事到后来，可供使用经费尚不及十分之一，从数目变更上又可见出若不是这笔钱在当局认为用不得当，就是主持者钱用不了，因为这个工作固然值得花钱，但也要会花钱。倘若只在表面上装点一下，出几个刊物，办两份报纸，安插一下老朋友小伙计，那么每月百万元自觉太多，有三五万元也很够了。

战事发生第三年，国家忽又提出一笔钱，作为文学作家作品的奖助金，且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它。办法是作家中穷的，病的，死去的，经请求核准就给一小笔钱，刊物则可请求加发一份稿费。其次是用蒋夫人^③名义成立了一个“妇女文学作品奖金”，过不久报上且发表了谢冰心女士等等为评判员的消息。虽然出自国家那一二十万块钱，近于赈济性质，用意只像是补救过去第三厅花钱方式的缺点，去理想的文艺政策还很远。出于个人的奖金，只三五千元，然而“有”究竟胜于“无”，它的意义总算是国家或个人对于文学作家的关心，以及使作品标准提高的设计。

战事发生后第四年，教育部又有“学术奖金”的条例公布，把文学和纯科学及其他学术并列，奖金最高额达到一万元。办法是大学校的师生有著作，送部呈请审查，到时经过一次会议，决定能为优秀作品的，即可得奖。

“七分政治”若有解释为国家对于文学的重视，用文字作工具，从各式各样文学作品上，燃起这个民族求生存的热忱和信心，并增加他们一点忧患来临的抵抗力，出于政府或有关方面的“文艺政策”，计算起来就是这四件事。有计划收容过一些作家，拟好好运用它，应数第三厅的工作，钱数虽不多而能作广泛运用于各方面作者的，应数文艺奖助金。性质

庄严，意义深远，应数教育部那个学术奖金。可是试看看他们的作用：第一项、第三厅当时所流行的“跳舞厅”嘲讽，就正反映社会对于它的印象。随后三厅的人事上一再更换，也可说明这个设计去理想如何日远。第二项、奖助金还只作到消极救济性质，即以救济而言，给予作家的稿费，就还不曾超过普通排字工人排版费。第三项、学术奖金，头一次戏剧奖，即引起种种不必要的纷扰，反而失去了奖金中应有的庄严性。即就这几件事情说来，也可看出我们国家运用这个“政策”，在试验中，作用还不怎么好。应付战争，有许多方面都无从估计花钱的数量，军事上耗费不必提，即以普通情形而言，某公用机关调一普通职员由申入川，路费即得花二万元。某机关派一科员赴港（或缅甸），来往报公费七万八万，事极平常……若拿来和国家用到“文艺政策”上的总数比较比较，更可见出目前的“文艺政策”，实说不上什么政策了。

形成“目前”的现象，既说是和“过去”不可分，我们还值得就战前过去多明白一些事情。

新文学运动本发生在五四前两年，随同五四而作广大活动后，于是社会上多了些作家和作品。因为文学作品兼有“娱乐”和“教育”两种意味，作家即并有“艺员”与“先知”两种身分。可是当时情形虽极热闹，作用虽极大，它与“商业”或“政治”却毫无关系。文学运动注重在解放多数人行为观念旧的因袭与陈腐束缚，活动工具是报章杂志以及数量不多的新书，活动范围是学校与中层社会。与之对立的有“礼拜六派”“黑幕派”堕落作家群，以及“文选派”“桐城派”顽固作家群。在出版物方面，新的既得到较多便利，在读者方面，更容易引起同情，所以最短期间，即已见出新旧

势力消长新陈代谢的趋势。弄旧玩意儿的，或用作品营谋衣食，或用作品阿谀伶媼，既成为新派作家攻击的对象，因之弄新文学的，便多近于玩票，尽义务唱白戏，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原则，即“用文字当工具来发掘人生重造社会”的原则。主张上既然如此堂堂正正，态度上又充满了天真和诚实，因此不过三五年，这个运动就可说是完全成功了。然而这种成功只能说是“工具重造工具重用”已得到社会认可，对社会改造依然近于抽象，对个人生活则尤其不相干。当时统制国家还是一群大小军阀，代表民众还是一群只知在议会中打架的议员。到民国十二三年，国内知名作家鲁迅、冰心、叶绍钧，论坛健将如胡适之、钱玄同、高一涵、当时既不能用作品卖钱支持生活，更不会用社会地位得个一官半职，国内最流行最有势力的刊物，如《新青年》、《改造》、《小说月报》、《晨报副刊》、《学灯》、《觉悟》^④，尽管读者遍及全国，出版者方面似乎就从不想到过可以发财，或被国会中某派特别关心，因之在实际政局上发生影响。这种素朴风气一直维持到民国十四五年，《语丝》^⑤在北平出版，还是几个好事的人凑足百十元钱，当作玩玩办下去，多余一点钱时就大家吃喝一顿完事，《现代评论》^⑥的出版、刊物销到八千份时，即因代销处不缴账，还不会用商业习惯追讨，经济上周转不来，结果只有停刊。当时虽有某团体某种文学主张（如文学研究会的、创造社的、语丝派和新月派^⑦的），或某个人文学意见，可不闻有文艺政策。军阀的新闻政策，则简单得很，或收买，或杀头。至于新文学运动，虽发展得极快，且被军阀幕中“智囊”与社会上遗老视为洪水猛兽，可是从军阀眼中看来，总似乎新诗或白话小说，只是几个白面书生的玩意儿。至于

所提倡的“自由恋爱”和“平民教育”，事实上也不会影响到他讨下一群姨太太的人生观与手下十万大兵的思想。因此虽不免受身边幕僚怂恿，亦不过对于出版物消极查禁一下，也就罢了。一群青年学生被绞死在北平监狱中，可说是受实际行为的影响。当时用笔作工具向社会挑战的胡适和鲁迅，却与军人似乎不相干。新文学与政治真正发生关系，实在它和商业发生关系以后。

新文学与商业打成一片，是北伐前一年。那时节北方的作家遭受经济压迫，慢慢向南方移动，与上海剩余资本结合，作品得熟于商品分派技术的人推销，因此情形一变。作品一用商品方式分布，于是有职业作家，缘于作品自由竞争产生了选择作用和淘汰作用，所以在短期间作品质与量两方面都得到长足进步，且即奠定了新书业基础。上海得风气之先，作家普遍影响下，那点“先知”成分超过了“艺员”成分，因之以作家地位转入大学教书的也日益加多。这种人的作品主张与广东实力膨胀相呼应，自然直接间接都有助于革命的进行，北伐成功后不久，更有宁汉分裂，武汉势力虽不久解体，江西却保留了一个小朝廷割据局面。加之广东长沙红军的进出，人民情感被政治变局还弄得十分乱。一部分作家或因太不明白政治，或因太明白政治，看中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更看中了上海，于是用租界作根据地，用文学刊物作工具，与三五小书店合作，“农民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等等名称，随之陆续产生。租界既是个特别区域，适宜于藏垢纳污，商人目的又只在赚钱，与同业竞争生意。若投资费用不多，兼有相当保障，为发展营业计，当然就将这些名词和附于名词下的作品，想方设法

加以推销。当时江西（剿共）战争尚相当激烈，看不出个究竟，上海租界上的环境特别，实有点使当局棘手。年青学生则在时代潮流激荡中，情感上不大安定，且寄居上海一隅更容易接受刺激。左翼文学与这两方面相呼应，商人却将作品向年青人推销，当然就显得活泼而热闹，南京方面才一面提出个文学主张，“民族主义文学”一名词，因而产生。然而把初期左翼文学讽刺得最深刻，不是这方面的论文，却是鲁迅在《奔流》上骂太阳社^⑧作家几篇文章。（钱杏邨为答复这种讽刺，在十七年五月《太阳》杂志，把鲁迅作品骂得一文不值。到十九年再作一文，却因为合作，把鲁迅称为最革命的作家了。这也正说明文学与政治混成一体时，不问是非真伪的包庇性，可能到如何程度。）当时的“革命文学”，因无什么真实有价值作品，然而国家带有积极性来准备推行的文艺政策，在南京方面所耗费的金钱数目，就小得令人失笑。上海办两个刊物，是略带强迫性与书店合作，不花一钱的。南京办了个《文艺月刊》，每月耗费不到二千元。（直到民十九年末，上海租界上出版业已在推销“儿童文学”和“幽默文学”。可是当时代表政府的“文艺政策”，据个人所知，就依然只是用那笔钱办个刊物，别无更好的设计。刊物事实上的支出，每月还并不超过二千元。）古人说：“豚蹄祝年丰”，借喻为所费者小所望则太奢。然而若把它来用作国家文艺政策所费数额比较，乡下人许愿，就不免还算是近于浪费了。因为两千元是个多小的数目，“民族主义文学”又是个多大的题目！

如果节物惜费在人类任何方面都可成为“美德”的象征，那么，用这点钱推行文艺政策，实在应当是值得称赞的一件

事 如果这个政策当时的用意，本不在培养作家鼓励优秀伟大作品的产生，倒侧重在抵制那些投机分子的活动，并争取几个无所属的作家，增加首都一点儿文化空气，我们还得承认，这是北伐成功后国家花钱最少而成功最大的一件工作。因为投资虽有限，经过一个相当时期，即已经见出作用。记得在民国二十五年时，南京的什么“文艺夜会”，报上就说到已经有了三百多位作家参加，就中还有六十余女作家。夜会中有讲演与跳舞，大家都吃得好。我们只要一闭目想想，如此多数作家，衣冠齐整，聚集一堂，讨论文学艺术，且在幽美音乐中缓步盘旋，各自为衣香鬓影里的微笑轻颦所陶醉，是一种如何动人的情景！

然而所谓“文艺政策”，自不能以仅仅作到如此为已足。当事者若真正理解这个名词的意义，以及可能产生的效果，且明白一切经典的制作，不离乎文字，新的经典的形式，照近二十年来的社会习惯，又如何适宜于放在一个文学作品中，以便在广大读者群中唤起那个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并粘合这点精神于民族发展某种设计上。那么，所求于文艺政策的表现，必然就不会是争取那数百有名无实的作家，参加夜会的热闹，倒应注意及另外一些在国内各方面有作品足以自见的人了。不是花点钱来供给一些作家取乐，必是想方设法来对国内有希望作家鼓励他们各就性之所宜，来产生优秀示范作品了。文艺政策只作到三百作家夜会，不作到三百部优秀作品产生，并好好分配到国内各方面去，这是失败的。然而这个现象是不宜归咎于一个人的，这是“习惯”。因为事情在习惯下发展，并不曾有什么人好好思索过。且在习惯下便不需要思索。

若说这种检讨和过去事实不大相近，我还可另外提出一件事来证明去事实并不很远。在民国二十五年，政府为供给南京市民娱乐，和外来观光者醒目爽心，也还能花七十万元建筑费，盖一座国立音乐戏剧院。可是同一时期中山文化馆征求中山先生传记时，却标明“奖金三千”。试想想，用中山先生一生奋斗作主题，将清末中国社会作背景，经纬错综，正可望织成一个如何华丽伟大的动人场面！这类作品如写得好，不仅可当作近百年中国人一本经典，且可翻译作各国文字，成为世界上一部有价值有意义著作。这工作即用十倍于剧院建筑费，作为基金，搜集各种资料，聘请国内各部门专家，并用征求方式，制作各式各样传记，费用也不算多，工作也不为白费。为的是所期望的成就，既庄严，又伟大，实无与伦比。然而对于这么一种有历史性大工作，文化馆还只能悬赏三千，所以即从“投资”一事来说，亦可见出我们这个国家，虽说敬重文字，对文字不知敬重，事实上却已到一种如何吓人程度！无怪乎直到如今，就还不曾有一个是与中山先生伟大人格相称的传记，可供党员或一般年青人阅读，自然更难望用辛亥革命或北伐作背景，可当经典的别的文学作品，由国家设计鼓励下产生了。

把民国二十五年情形和目前情形比较，我们就会看出国家对于文学问题的投资，数量上虽已增多，态度上还是相差并不多少。说得老实一点，就是把文学当个工具，好好运用到国家当前进步团结愿望上，以及挣扎图存方式上，文学作品可能作的伟大企图，实在还远过目下负责任的想象以外。因此即从新设计，依然缺少远大的憧憬。事实上虽对作家能控制，并不能运用。这种目前带点消极性的检查制度和带点

积极性的出版情形上，都可见出，国家固无事不在表示进步中，惟“文艺政策”的方法，并无特别进步足言。若将十年前党中陈果夫先生主张，国家设一“文艺学院”来培养作家产生作品的理想，与当前把作家当普通宣传员公务员事实对照，真使人对于过去不免向往，对于当前反而感觉惊奇。因为政策观点上若把“理想”删除殆尽，只剩下一点“事实”，一切又惟注重在目前那点事实，在政策执行时，给人印象当然就只会是“今不如昔”。所有设计不特无助于“文学”，亦无助于“党”，是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谈文艺政策，政策既是当前存在的一种事实，且假定“政策”是必要的，就还待负责方面对本问题重新认识，重新决定，重新着手。

第一是看法不同。传统习惯只作成把文学作家当作是资政策装点的一员，所以总认为这种人属宣传部即属政治部，最好是这人还带点公务员的性质，运用上比较方便。（从这种传统上既已经养成一群人，擅长写作口号标语，并长于在死丧庆吊场面上出席，乐意在带国际性集会上表示作家礼貌风度，就尽这种分子留在都会上装点文坛阵容，在原有地位上服务。）新的看法却需要把作者看成一种“专家”，工作表现应当成为国防设计一部门。凡在当前对于这个工作特有成就，为人诚朴，宜于担当有历史性艰巨工作的，这种人不仅为战时所需要，更必然为战后不可少，很可以把这部分作家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组织，由国家从各国退还庚款提出五百万到一千万块钱，作为基金，将息金并一部分本金分配到这个部门的合理用途上去。它的理想成就应当是保留各种有价值的战纪，和百十本分量沉重内容伟大的作品慢慢产生。这些

有系统的战纪和形式各别的文学作品，即缺少当前的装点性，也不妨事。只要不失为全民族追求一种理想，遵从一种道德原则，奋起而作的种种牺牲行为纪录，以及生于这个时代多数有良心的中国人“情感”或“生命”的历史。这种作品的产生存在，意义就够大了。新的设计所必需态度，即把它当成一种“学术”，于一种广泛限度内，超越普通功利得失，听这种作者在自由思索自由批评方式下作各种发展。政策的推行，费用也许比过去大百十倍，收效见功也许又比较迟，然而它的良好影响，必然将延续到三五十年后。既如学术一部门，目的在提高人类知识水准，或丰饶民族感情，注意方式就宜作一些比较久远的设计，花钱再多也不责望当时即见功取偿。它近于国家向全国优秀脑子与高尚情感投资，它的意义是成就这种脑子并推广这种情感。

第二是办法不同。新的文艺政策的运用，首先就应当承认这是一种纯粹技术性质的组织，主事者最好是一个或一群专家。历史学者或心理学专家可提供一切明智主张，用作参考。决不能用公务员的八股作为原则。对一般出版物言，更必需改良检审制度，凡检查员得先受严格检查，必对于文学作品有深刻认识，方不至误用权力妨碍正当作品出版。这个制度且不宜仅属于消极限制，还应当有个奖励方式相辅而行。国营出版事业更必须改良。一个有价值的好作品，单纯奖励并不能有何意义，还必须要印得比市面普通出版物精美，并能用最有效的商业技术分配廿万三十万册到国内各方面去。……能这么来谈文艺政策的计划和管理，才像是有计划而又明白管理为何事。

“建国”这个名词，所包含的意义，如果是需要把全个民

族的热情粘合起来，更能将最优头脑从各方面去运用，通过一段长而困难的时间，方能够见出一点结果。国家的文艺政策，就必然要有那么一种远大的设计，方可望使国内最优秀作家，一代继续一代，将生命耗费到这个工作理想上，产生大作品。国家也方能希望运用这种作品，把这个民族潜伏的智慧和能力，热情与勇气，一一发掘出来，而向一个未来的理想推进。

三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养成许多人的心理状态，都只是在一种“实际主义”漩涡里打转，“依赖”代替了“信仰”，“阿谀”代替了“忠诚”。中层阶级名为长于政术的，有所进取时，即多以阴柔之术，少阳刚之德。进既不以道，自然难望其人知所守。义利取舍不明，即必然无所不为。任何高尚抽象原则，一与做官的实际主义碰头，即不免失去意义。多数人所谓“信仰”，既缺少崇高含义，转多物欲杂念。最容易证实的事，即大学生在学校习政治时，以为政治是人类庄严而又艺术的事业，一到社会拖混三五年，便对政治保留一个肮脏虚伪印象。在这种情形下，还想从多数国民中，对“主义”或“党”创造一种纯朴宗教感情，使民族热情和理性，都因此重新得到抬头机会。这种工作若从那个实际政治感到束手时，我们还得承认文学作品实在是唯一工具，善用文艺政策，又正是唯一培养文学作品的方法！

因此私意还以为明日的中国，不仅仅是一群指导者，设计者，对于民族前途的憧憬，能善于运用文学作工具，来帮助政治，实现政治家的理想为了事。尚有许多未来政治家与专家，就还比任何人更需要受伟大的文学作品所表示的人生优美原则与人性渊博知识所指导，来运用政治作工具，追求

并实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理想，政治也才会有它更深更远的意义。^⑨

本篇发表于1943年1月20日《文艺先锋》第2卷第1期。署名上官碧。原题为《“文艺政策”探讨》。

① 吴稚晖 光绪进士，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

严几道 即严复，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

林琴南 即林纾，近代文学家，曾依他人口述，用古文翻译欧美诸国文学作品170余种。

② 胡适之 即胡适，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之一。

陈独秀 五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之一。

钱玄同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③ 蒋夫人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

④ 《新青年》 综合性刊物，1905年创刊，陈独秀主编，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

《小说月报》 大型文学刊物，1910年创刊。从12卷1期起，由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等接编，成为文学研究会主要刊物。

《晨报副刊》 北京《晨报》的学术及文学副刊，1921年创刊。

《学灯》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1918年创刊。

《觉悟》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19年6月创刊。

⑤ 《语丝》 文学周刊，1924年11月创刊，由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主编。

⑥《现代评论》 现代综合性刊物，1924年12月创刊，实际负责人为王世杰。

⑦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文学社团，1921年1月正式成立，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周作人、王统照等。

创造社 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文学社团，由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组成，1921年7月正式成立。

语丝派 指《语丝》社编者及主要撰稿人周作人、孙伏园、鲁迅、章川岛、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等。

新月派 指1928年3月创刊的《新月》社成员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人。

⑧太阳社 现代文学社团，1927年秋成立，发起人有蒋光赤、钱杏邨、孟超、杨邨人等。

⑨ 本文入集时，此处删去如下文字：

提起这一点，自然就更不是目下任何文艺政策单独可以左右，实有待于作家本身努力来决定了。因为作家若只是如目前一部分人那么或从政治立场上，以“反对”支持作家身分，或用作品阿谀实力，最高理想不过是作“御前供奉”，取得社会地位。那么，文艺政策即或有所改善，作家的成就，当然还是有个限度，不出于“同志”和“供奉”以外。这类作品对社会的影响，也可以想见。既得失互见，即容易相抵相销终等于零，因此政策政策，还不免只是一场热闹了事。若作者还另有大愿与雄心，能超越小政治的个人功利，会用这个时代人类哀乐得失取予作为镜子，把自己生命淘深，且能从深处表现多数更年青的诚实而健康的感觉和愿望，他们的作品，当然就可望成为明日指导者的指导！

文学运动的重造

世界在变动中，一切必然都得变，政治或社会，法律与道德，似乎都值得有心人给了一种新的看法，至少是比较上新些的看法。为的是必修正“过去”“当前”的弱点，我们才能适应那个新的“未来”。文学自然不能例外，也需要一种较新较深刻的看法。尤其是文学运动要有个较好的明日，我们得从过去和当前了解一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而谋解决它。这些问题在平时，或为一般人所忽略，在战时，或又因为投鼠忌器，讳疾讳医，更不常为人道及的。

谈及文学运动分析它的得失时，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最先和上海商业资本结了缘，新文学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时间稍后这个运动又与政治派别发生了关系，文学作家又成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因此一来，如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值得令人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可看出一点堕落倾向。这堕落倾向起始是对于问题的探讨，失去了应有的素朴，而多了点包庇性，持论的牵牵绊绊，即远不如五四初期的勇敢

天真。其次是写作态度，从无报偿的玩票身份，转而为职业和事业，自然也不能再保持那点原来的诚实。几个业有成就的作者，在新的环境中，不习惯于“商品竞卖”“政治争宠”方式的，不能不搁笔。

新文学作品既成为商品之一种，用同一意义分布，投资者当然先企图在营业上站得住，凡事从“生意经”着眼，五四谈男女解放，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所以过不多久，南方就有张资平多角恋爱小说出现，北方就有章衣萍《情书一束》出现。（后来甚至于年过半百的鲁迅先生，也在书店怂恿下，印行了他的内容并不香艳名称却极动人的《两地书》。）这些作品当时都得到广大的销路。风气所归，变本加厉，于是有张竞生提倡的性生活，用女店员卖书和节育药品，造成一时社会赚钱法门。有关于妇女职业的开放，如同上海百货公司用女职员卖化妆品，起始即还是随同这个“性”的兴趣而来的！……到北伐清党时，政局不稳定，时代禁忌多，拿笔的不容易向两面讨好，读书的也乐意看点“纠纷以外”的东西，林语堂便办个《论语》，来提倡幽默，以一个谐谑态度与读者对面。于是在一年内国内似乎又充满了幽默，只为的是幽默也可以卖钱！接着是“儿童文学”上了市，“农民文学”上了市，“集体文学”……新书店日渐增多，正反映商业上的完全成功。这并不出奇，既然是商品，不管是补药中的百龄机，鹿茸精，刊物中的《论语》或其他，只要推销合理，宣传得法，当然都可望成功的。商业上的目的要赚钱，所以出版方面不仅重在推销有主顾的作品，同时作者报酬方面，一起始也就注意到如何可以少花钱，或不花钱。十七年左右，有好些小说的付印，出版者是不用花钱的。虽有个版税制度，在

习惯上却毫无立法作保障，更缺少出版家良心作保障。因此直到民二十左右，鲁迅或冰心，尽管已经有了十万册作品散布于国内，个人却无从靠那个收入支持生活。

可是话说回来，作品变成商品，对于全国文学运动也未尝无贡献，新文学作品的普遍分布，是得力于这个商业制度的。大量翻译作品其所以能流行，也亏得是这个商业制度的。因为作品一具有商品意义，即发生经济学上的“价值作用”，小书店虽缺少出版道德，比较规矩的书店，赚了钱，作者多多少少总可以分润一点余利。从商人荷包中既多多少少挤出一二点钱，从此方有“职业作家”。作品既能分布国内，作者固然龙蛇不一，有好有坏，然而读者也嗜好酸咸，各有选择。读者鉴赏力较高的，自然盼望从较完美作品中取得娱乐和教育。凡能追随风气趁市场需要的作家，虽在短时期中即可得到多数读者，然而过不久也就会为读者所遗忘。此外写作不苟且，文学见出风格和性格，对人生有深刻理解而又能加以表现的，慢慢的从纵的方面，将依然能得到大量读者，并且这些读者对作品所保留的好印象，多持久而不容易消灭。既有读者，似乎作者所有人生理想，还可望从作品得到传递机会。因此职业作家中少壮分子，更有不少对文学抱了一种远大憧憬，心怀宏愿与坚信，来在艰苦寂寞生活中从事写作的。非职业作家，更有不少人近中年，尚充满试验兴趣，在个人所信所守观点上，来继续拿笔的。前者举例如茅盾，丁玲，巴金，施蛰存，李健吾，曹禺，……后者举例如鲁迅，徐志摩，佩弦，西林，废名……这些作者的眼光，当然不在随同流行趣味制造商品，可是却因为作品可用商品方式分配，引起读者的爱好与敬重，方有许多优秀示范作品产生。读者要

求水准日高，且刺激了后来人，在新陈代谢上，有更多年青优秀作家在文坛露面。

至于作家成为政治工具后，这些人一部分且照例是无作品的作家，虽无何等像样作品，政策与艺术合而为一，因之“政术”却极优长。或置身大庠^①，或名列某籍，或竟极其可笑的以“爱国分子”为口号，在国内大都市和租界上，用“作家”身分，到处活动。有什么事情发生需要有所表示时，即在通电宣言上列一大名。在集会上吃喝之余，大家就胡乱畅谈艺术文学，或照老派文人作风，唱唱京戏作为余兴，为某人某物即席赋诗，且相互赠答。遇到某种场面上需要人带点戏剧性做作时，就写个假遗嘱之类，表示誓必与某城某市共存亡，说不定还把一小瓶毒药带在身边，引人注意，事过境迁，不过付之一笑。这一切的一切，又都可以名为“政治手段”，意即事无是非真伪，惟以发生作用为成功。或表示同伙必要的礼貌与友谊，或表示异类必要的排斥与诋毁，举凡小政治应用的涛张为幻^②处，作家间都无不十分熟悉。精神风度，完全如《金瓶梅》^③中之应伯爵谢希大一流人物，本色是凑趣帮闲，从中捞点小油水。所不同处只是这些人生于现代，因缘时会，各以“思想”“信仰”自见而已。这些人虽以思想信仰自见，或相反，或相承，彼此之间分合却又十分实际。虽常常为抽象真理而奋斗，相争相吵异常激烈，令人为之担心，不过上头“政策”一变，于是顷刻之后，就又有了个新的借口，证明过去只是小小误会，不用再提。（钱杏邨与鲁迅相骂，便是一例。编者。）天下业已同流并进，团结合作，便把原来那个“真理”搁下，再也不会因为倾向不同，不肯吃同样点心了。

此外还有一部分作家……大别可分为老实与黠诡两种；老实的原是好好先生、智慧和能力都在中平标准以下，脑子恍恍惚惚，行为谨谨慎慎，遇事不大思索，也就从不作更深思索。拿笔时什么都写，可是除“平庸”外毫无特色。他之所以做作家，可说是偶然的。如照他本人才具说来，使他经营一个小小纸烟铺，或派他作个管卷员，将比做作家还更相宜。黠诡的却善于利用机会，因地位能支配场面，所以对下便极骄，既惯用清客风度侍候贵人，所以对上又极谄。这种人本来目的并不是做文章，却只在做“文人”，用文人身分取得一切，惟绝对不要作品。做文人的意义，是满足一个生物的基本欲望，食与性，别无更多幻想和贪心，倒很像个知足的动物。……

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一点崇高理想，那个引诱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事实照例是乏味的，因此叙述及这点使人痛苦的事实时，有些人出于情感上的护短，或地位上的自省，将不免颈胀面赤，恼羞成怒。然而它还是事实，还是目前好好存在的事实！

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尤其是商业上关系不大正常，作家难于用收入维持生活，政治方面引诱性又太大，不十分费力即可名利双收，作家中缺少自尊心的，对工作无把握的，本性上就适于充小伙计串戏的，为趋时邀功，因之必然多“朝秦暮楚”现象与“东食西宿”现象。此外，凡自信心强，而又能用作品有以自见，尚保留一点农人沉静与固持性情的，便俨然与“文坛”热闹游离，

不相粘附。到后来，有那么一种情形：真在努力写“作品”的，是一群人。装模作样用政术充“作家”的，又是一群人。拿笔的照例素朴而诚恳，生活相当艰苦，行为态度还保留些村汉气或书生气，除作品外社会上很少他们露面的机会。（有些人不善于活动，在抗战后并个人生活也不能维持。）至于作空头作家的，却活活跳跳，或如官僚，或如丑角，又或兼有两种人风格而为一，在都市中十分活动。这种情形到民二十左右，即已见出端倪，二十三年后，对照更加分明，二十六年抗战一起，就简直像是“必然如此”了。目前只要从报纸上看看，我们便会发现，十五年来写作有极好成就的，个人对于读者都好像十分生疏。另外一群或因善于掉头，姓名在报纸上最习见，生活在消息上最多的，倒是些从无什么像样作品问世的人。优秀作品的发表费，有时还不如那个作品的排字工价，然而活动分子，却又尽人皆知。有些年纪轻笔下好在前线讨经验的作者，作品始终还得不到应有的出路，同时在各个地方，又有许多用国家钱新办的刊物，只登载些不三不四的幼稚习作。到处都见出“浪费”，而在浪费中还将继续造成另外一种堕落。这种种由局外人看来，会觉得不可信，不可解。

就这类现象看看，我们目前的局面，实在可以说是毫无计划而承受一个“习惯”来的活动。现状的继续，只能产生一种后果，即文学运动的漫画化。很可能会作成：举凡政治上看重的“作家”，本人虽养得胖胖的，照例是毫不能得到读者敬重的分子。至于真能得到百万读者爱好的作品，却将永远不会向官家找出路。国家花钱来培养的，收容的，几乎照例是跑龙套人材，至于第一流作家，却独自支撑。撑到末了，

倒下完事。若说在抗战时期，一切人力物力都可由国家集中运用，则在文学运动方面，宣传部或政治部应该有更合理的设计，来集中国内多数优秀作家。

试分析目前我们所遭遇的困难，即可知实由于十五年前文学运动，失于检点。当时即缺少批评的宽容，理论家都成了非左即右的代言人，难于超越“口号名词争夺”纠纷以外，来注意注意事实。无一个人能提醒到出版家或政治家，在他们认为“英才人毅^④”的成功中，即如何潜伏了堕落的种子。因之商人就缺少认识，能明白支持作品的水准，支持优秀作家的生活，即所以支持新出版业。政治家也缺少注意，与其收容一百八十嘴大头小的空头文人，还远不如对于国内三五特有成就的优秀作家，给他一点应有尊重，对于民族品德的提高，和文学发展的正常，为有作用，有意义。这点认识如在二十年左右即可成为事实，到二十六年抗战时，中国文学运动的发展，就必然会比社会任何一部门事业，更富于建设性，更容易与国家向前的理想一致，决不至于如目前情形了。

我们如肯老老实实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就可知文学运动待重新起始，事极显明。需要有个转机，全看有远见的政治家，或有良心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作家，能不能给“文学”一种较新的态度。这个新的态度是把“文学”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则亡羊补牢，时间虽晚还不算太晚。学术的庄严是求真知，和自由批评与探讨精神的广泛应用，这也就恰恰是伟大文学作品产生必要的条件。学术的超功利观，在国家教育设计上，已承认为是一个学术进步的原则，而有助于民族发展。文学运动成为学术一部门，由学校奠基，学校培养，学校着手，更见出它的推进，比漫无计划接受那个

“习惯”而作的一切活动，来得经济而容易有远大效果。

世界在变动中，在坚硬的钢铁的相互摧毁，和民族间的自爱心与自私心所产生的顽固对立变动中，国家民族忧患的加深，个人责任即因之而加重，尤其是中层分子责任的加重。国家民族命运的转机，若不仅仅是在保有那点实力，还在实力的运用。实力运用若又不仅仅是三五个负责人的天生睿智，明察秋毫，还应当要所有优秀脑子的合作分工，以及由于这种分工所表现的调整作用，增加大机构的适应性，灵敏性，以及超越近功小利向更远大目标追求的勇敢强韧性。目前若干作品，如只能“娱乐”二十岁以内的中学生，明日的文学作品，还可望它能“教育”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得承认，如果四十岁以上的中层分子，为唤起他们做一个中国人的尊荣感与责任感，实在还需要好好施以“人”的教育。）

若从政治运用习惯上说，有好些事都似乎只在“应付事实”，既要应付事实，求改弦更张，即无可希望。文学运动重造的理想，从各方面可能产生的抵抗性，否定性，都容易估计得出。不过我们若记着两句旧话，“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择其轻”，文学运动成为学术一部门，一面可防止作品过度商品化，与作家纯粹清客化，另一面还可防止学校中腐败退化现象的扩大，（这个腐败退化现象，是到处可见的！）这个运动在消极方面，即已有如此伟大作用。在积极方面，却尚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分，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的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且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使异世读者还可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

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而变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至于所牺牲的，却不过是一个“不良习惯”，以及附于这个不良习惯的一部分人所保有的不健全情感——即把文学作家当成“小伙计”或“身边人”的情感，再加上一些寄食于这个习惯下的一群所能做成的“热闹”而已。那么看来，文学运动能否重造问题，倒也简简单单，只是“知难行易”四个大字的认识了。

卅一年九月一日作十二月重写

本篇发表于1942年10月25日《文艺先锋》第1卷第2期，署名沈从文。本文主要内容与收入《烛虚》中的《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基本相同，但二者在字数、文字方面有较多差异，故仍收入。

① 大庠 庠是旧时对学校的称呼。这里的大庠指大学。

② 诤张为幻 欺诳、作假之意。

③ 《金瓶梅》 长篇小说，明兰陵笑笑生著。

④ 入彀 原意为进入弓箭射程之内，引申为受笼络、进圈套。

小说与社会

我们时常都可以听到人说：“俺，没有事情作，看小说”。“放了假怎么消遣？看小说吧。”事实上坐柜台生意不忙的店员，办公室无事可作的公务员，甚至于厂长、委员，不走运的牙医，脾气大的女护士，尽管生活不同，身分不同，可是他们将不约而同，用看小说来耗费多余生命，且从小说所表现的人事哀乐中取得快乐和教育。即试从家中五十岁左右认识字的老妈妈，和十岁以上的小学生，注意注意他们对小说故事的发迷，也可证明我的“从小说取得快乐和教育”，是件如何普遍而平常的事情。许多家长对孩子读书成绩不满意，就常向人说：“这孩子一点不用功，看小说发了迷。”其实小说也是书，何尝只有小孩发迷？我知道有四个大人，就可称为“小说迷”。不过和小孩子发迷的情形稍稍不同。第一个是弄社会科学的李达先生，和家中孩子们争看《江湖奇侠传》时，看到第十三集还不肯歇手。第二个是弄哲学的金岳霖先生，读侦探小说最多，要他谈“侦探小说史”，一定比别的外文系教授还当行。还有一个中央研究院梁思永先生，是发掘

安阳殷墟占物的专家（照他自己说应当是挖坟专家，因为他挖过殷商帝王名臣坟墓到一千三百座），可是除专行以外，他最熟悉的就是现代中国小说。他不仅读得多，而且对作品优劣批评得异常中肯。更有一个一般人全猜不着的小说通，即主持军事航空的周至柔先生，他不仅把教“现代小说”的人所重视的书都欣赏到，此外近三十年来的旧章回小说，也大多数被他欣赏到了。对这些作品内容得失提出的意见，恐怕不是目下三脚猫教授能答复的。从这些例子看看，我们即不能说“小说的价值如何大”，至少得承认“小说的作用实在大。”因为它们不仅有时使家中孩子发迷，也可使国内第一流专家分点心！

从前人笔记小说上谈小说作用，最有趣味的是邹弢《三借庐笔谈》^①，记苏州人金某读《红楼梦》事，这个人读发了迷，于是就在家中设了个林黛玉的木牌位，每天必恭恭敬敬祭一祭。读到绝粒焚稿时，代书中多情薄命才女伤心，自己就不吃饭，哭得不成个样子。久而久之，这人自然发了疯，后来悄悄出门去访“潇湘妃子”，害得家中人着了急，寻找了几个月才找回。又陈其元《庐闲斋笔记》，记杭州某商人有个女儿，生得明艳动人，又会作诗，因爱好《红楼梦》，致成痲病。病情沉重快要死去时，父母又伤心又生气，就把女儿枕边的那几本书，一起抛到火炉里烧去。那个多情女子却哭着说，“怎么杀死我的宝玉”？书一焚，她也就死去了。这些人这些事不仅从前有过，现在说不定还有很多。读了《红楼梦》，称宝玉作“真情人”，倾心拜倒的，实大有其人。又或稍能笔墨，间常害点小病，就自以为是黛玉的，也大有其人。古人所不同处，只是苏州那个姓金的，爱恋的是书中美人，

杭州那个老板姑娘，爱恋的是书中才子，现今的先生小姐，却自己影射自己是宝玉黛玉，爱恋的是他自己罢了。

我们讨论小说的价值以前，先得承认它的作用。这因论数量，小说数量特别多，内容好坏不一致，然而“能引起作用”倒差不多。论影响，小说流行相当久，范围特别广，即从《三国演义》来说，遍中国的关帝庙，庙中那位黑脸毛胡子周仓，周仓肩上扛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都是从这个小说来的，下层社会帮会的合作，同盟时相约“祸福同当”，以及此后的分财分利，也似乎必援引《桃园结义》故事。可见得同一小说，它的作用便不尽相同。姚元之《竹叶亭杂记》^②，说雍正时一个大官保荐人材，在奏文中引用小说里孔明不识马谡故事，使皇帝生了气，认为不合，就打了那个官四十大板，并枷号示众。然而陈康琪的《燕下乡脞录》^③，却说顺治七年大学士达海、范文程等，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满洲文，蒙赏鞍马银币。满洲武将额勒登保的战功，据说就是得力于这个翻译小说的（比较时间略前，明末忠臣李定国，也是受《三国演义》影响，而由贼做官，终于慷慨殉国）。

所以从小说“作用”谈“价值”，我们便可以明白同样一个作品，给读者可好可坏。有时又因为读者注意点不同，作品价值即随之而变。《红楼梦》、《水浒传》，卫道老先生认为它诲淫诲盗，家中的大少爷二小姐和管厨房的李四，说不定反用它当做随身法宝，倘若另外来个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把书仔细读过后，却会说“这简直是几百年来中国最真实有用的社会史料！”

又从作者那方面来看“价值”，也很有意思。读过《笑林广记》的人，决不能说这本书有什么价值。可是这类书最先

一部，名为《笑林》^④，却相传是魏文帝曹丕作的（这算是皇帝作的唯一小说！即不是他做的，也是留在这个皇帝身边说笑话的邯郸淳做的）。孔子好像是个和小说和笑话不能发生关系的人了，然而千年后的人，对孔子保留一个印象，比较活泼生动的，并不是他读《易》时韦编三绝^⑤铁挝三折，倒是个并不真实带点谐谑的故事，即韩婴的《韩诗外传》^⑥上，载孔子与子贡南游阿谷之隧，见一个女子“佩璜而浣”，因此派子贡去和女子谈话那个故事。这又可见写一个历史上庄严重要人物，笔下庄严亦未必即能成功，或从别的方法上表现，反而因之传世。表现得失既随事随人而定，它的价值也就不容易确定了。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涉及小说的社会问题，是个多么复杂的问题。同是用一组文字处理人事，可作成的只是些琐琐碎碎的纪录，增加鬼神迷信妨碍社会进步的东西；也可保留许多人类向上的理想，和人生优美高尚的感情。大约就因为它与社会关系太复杂又太密切，所以从一本书的作用上讨论到价值时，意见照例难于一致。我们试从近三十年中国这方面的发展看看，可见它和社会如何相互影响。明白过去或可保留一点希望于未来。

民国初元社会对于“小说”的关系，可从三方面见出：一是旧小说的流行，二是新章回小说的兴起，三是更新一派对于小说的社会意义与价值重估。

当时旧小说的流行，应当数《水浒》、《三国》、《西游》、《封神》、《说唐》、《小五义》、《儿女英雄传》、《镜花缘》、《绿野仙踪》、《野叟曝言》、《情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今古奇观》^⑦……，书虽同时流行，实在各有读者。前一部分多普通人阅读。有些人熟习故事，还是从看戏听书间接来

的。就中读《三国》、《水浒》，可满足人英雄崇拜的愉快；读《西游》、《镜花缘》，可得到荒唐与幽默综合的快乐；读《封神榜》照规矩，必然得洗洗手，为的是与当时鬼神迷信习惯相结合。后一部分多书生和闺阁仕女阅读。有的人从书中发现情人，有的人从书中得到知己。《聊斋志异》尤为人爱读，为的是当故事说即容易动听，就中《青凤》、《娇娜》、《黄英》、《婴宁》这类狐鬼美人，更与自作多情孤单寂寞的穷书生恋爱愿望相称。《今古奇观》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故事说给妓女和小商人听时，很可能会赢得他们许多眼泪，并增加他们许多幻想！

至于新章回小说的兴起，是与报纸杂志大有关系的。如《九尾龟》、《官场现形记》、《海上繁华梦》、《孽海花》、《留东外史》、《玉梨魂》^⑧……这些作品多因附于报纸上刊载，得到广大的注意，（那时上海申、新二报是国内任何一省都有订户的！）它的特点是渐趋于一致的社会性。故事是当前的，注重在写人写事。或嘲笑北京官场，或描写上海洋场，或记载晚清名士美人掌故，或记载留日学生舍命恋爱，或继续传统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情节，如苏曼殊、徐枕亚^⑨等人作品，就名为“香艳小说”，它的时间短，分布少，当然不如旧小说普遍，然而它的影响可不小！因为北京的腐败，上海的时髦，以及新式人物的生活和白面书生的恋爱观，都是由这类小说介绍深印于国内读者脑中的。作品既暴露了些社会弱点，对革命进行自然即有大作用。然而当时有一部分作家，已起始借用它作“讹诈老板”或“阿谀妓伶”工具，所以社会对小说作家就保留个“才子流氓”印象，作品的价值随之而减少。这件事，间接刺激了新文学的兴起，且直接制定了章回小说的致命。

至于更新一派的人把小说社会价值重估，是配合维新思想而来的。吴稚晖先生为提倡科学教育，来写《上下古今谈》。林琴南先生大规模译欧洲小说，每每在叙言上讨论到小说与德育问题。梁启超先生更认为小说对国民影响大，作用深，主张小说在文学上应当有个较新的看法，值得来好好设计，好好发展培养它。林译小说的普遍流行，在读者印象中更能接受那个新观念，即“从文学中取得人生教育”。虽然这个新观念未能增加当时读者对小说的选择力，因为和林译小说同时流行的小说，就是《福尔摩斯侦探案》。然而一个更新的文学运动，却已酝酿到这个新读者群中，到民八即得发展机会。新文学是从这个观念加以修正，并得到语体文自由运用的便利，方有今日成就的。

到现在来说小说和社会，有好些情形自然都不同了，第一是旧小说除了几部较重要的还有因为重新印行重新分配得到读者，其余或因为流行数量越来越少，或因为和读者环境生活不合，不仅老先生所担心的诲淫诲盗小说作用已不大，就是维新派担心的鬼狐迷信与海上黑幕小说^①，也不能有多大的作用了。一般印象虽好像还把小说当消遣品，小说作家和作品在受过初级教育以上的年青人方面，却已具有“先知”、“经典”意味。大学校已把它当作一种研究课目，可作各种讨论。国立图书馆更有个小说部门，收藏很多书籍，国家准备奖金，且给作品一种学术上的敬视，把它和纯数学以及史学等等并列。国家在另外一方面，为扶持它，培养它，每年还花去不少钱。国内出版业在这方面投资的，数目更极可观。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所能引起读者给予的敬意和同情，若从过去历史追溯，竟可说是空前的！就拿来和当前社会上

一般事业成功比较，也可以说是无与比肩的！

说到这一点时，我们自然也还得另外知道些事情。我意思是把那个缺点提一提，因为缺点是随同习惯而来，还需要从讨论上弄明白，可想法补救的。譬如说，过去十年新文学运动，和政治关系太密切，在政治上不稳定时，就得牺牲了些有希望的作家。又有些虽还好好地活着，因为“思想不同”，就受限制不能好好地写他的作品发表。又有些因为无从在比较自由情形下工作，索性放下原有工作去弄政治，这个作风又照例是能增加纠纷而无助于文学发展的。这实在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值得有心人重视。其次是文学运动过去和商业关系不大好，立法上保障不生作用，因此国内最知名作家，他的作品尽管有一百万本流行，繁荣了那个新出版业，作者本人居多是无所得的。直到如今为止，能靠出版税收入过日子的小说作家，不会过三五位。冰心或茅盾，老舍或丁玲，即或能有点收入，一定都不多。因此作家纵努力十年，对国家社会有极大贡献，社会对他实在还谈不上什么实际贡献。他得做别的事，才能养家活口。所以有些作家到末了只好搁下创作，另寻生活，或教书经商，或做官办党，似乎反而容易对付。有些人诚实而固执，缺少变通，还梦想用一支笔来奋斗，到末了也就只好在长穷小病中死去，倒下完事。这自然更是国家的损失！一个进步的国家，照理不应当有这种现象的。（因为这纵不是负责方面的罪过，至少也是可负疚的羞耻！）关于这一点，我们实在需要出版业方面道德的提高，和国家在立法上有个保障，方能望得到转机，单是目前的种种办法，还是不够的！从商业观点来看一本好书，也许不过是它能增加一笔收入，别无更深的意义，标准就不会高。至于

从国家观点看来，一本好书，实值得由国家来代为出版，代为分配。照目前中国情形，一本好书印行十万到五十万本，总有办法可分配的！国家来作这件事，等于向全国中优秀脑子和高尚情感投资，它的用意是尊重这种脑子并推广这种情感。即或麻烦一点，但比别的设计究竟简单得多，而且切于实际得多！作者若能从这个正当方式上得到应得的版税，国家就用不着在这问题上花钱费心了。

这种合理的打算，最近自然无从实现。但这对于一个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作者说来，还是不会灰心的。就因为他的工作物质上即无所得，还有个散处于国内的五十万一百万读者，精神上是相通的。尽管有许多读者是照我先前说的“无事可作，消遣消遣”，可是一本好书到了他的手中后，也许过不久他就被征服了。何况近二十年来的习惯，比我们更年青一辈的国民，凡是受中等教育的，都乐意从一个小说接受作者的热诚健康人生观，好作品能引起良好作用，实在显明不过。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更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己，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上，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若想到真理和热情是可传递的，这个工作成就，实包含了历史价值和经典意义，他就会相信明日的的发展，前途为如何远大。环境即再困难，也必然不以为意了！

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昆明

本篇发表于1942年10月25日《世界学生》第1卷第10期。署名沈从文。

①《三借庐笔谈》 笔记，多叙清代文学故事，清邹弢撰。

②《竹叶亭杂记》 书名，清姚元之撰。内容为记叙清掌故、官仪、科场典实及东北、西北风土习俗、名人轶事等。

③《燕下乡脞录》 笔记小说，清陈康琪撰。

④《笑林广记》 明冯梦龙编《广笑府》，后书坊据之改编为《笑林广记》。

《笑林》 三国邯郸淳撰，古笑话集。

⑤ 韦编三绝 韦，熟牛皮。古代用竹筒写书，用熟牛皮将竹筒编联起来叫韦编。《史记》叙孔子晚年读书，以至韦编三绝。

⑥《韩诗外传》 书名，西汉韩婴撰，杂叙古事古语，引诗以与古事相印证。

⑦《水浒》 古代长篇小说，施耐庵著。

《三国》 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古代长篇小说，罗贯中著。

《西游》 即《西游记》，古代长篇小说，吴承恩著。

《封神》 即《封神演义》，古代长篇小说，许仲琳著。

《说唐》 讲史小说，清人作。

《小五义》 长篇小说，清人作，为《三侠五义》续书。

《儿女英雄传》 长篇小说，清文康作。

《镜花缘》 长篇小说，清李汝珍著。

《绿野仙踪》 长篇小说，清李百川著。

《野叟曝言》 长篇小说，清夏敬渠著。

《今古奇观》 即《喻世明言》，话本集，明冯梦龙纂辑。

⑧《九尾龟》 近代狭邪小说，张春帆著。

《官场现形记》 近代谴责小说，李宝嘉著。

《孽海花》 长篇小说，曾朴著。

《海上繁华梦》 长篇小说，孙家振著。

《留东外史》 长篇小说，向恺然著。

《玉梨魂》 长篇小说，徐枕亚著。

⑨ 苏曼殊 近代文学家，小说以浅近文言，描写爱情故事，多感伤情调。

徐枕亚 现代言情小说作家。

⑩ 黑幕小说 近代小说流派，多以揭发人隐私为主要题材。

第二组 新废邮存底

一 云南看云

云南因云而得名。可是外省人到了云南一年半载后，一定会和当地人差不多，对于云南的云，除却只能从它变化上得到一点晴雨知识，就再也不会单纯的来欣赏它的美丽了。看过卢锡麟先生的摄影后，必有许多人方俨然重新觉醒，明白自己是生在云南，或住在云南。云南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时候，云的颜色，云的形状，云的风度，实在动人。

战争给许多人一种有关生活的教育，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睡了许多床，此外还必然吃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小苦头。然而真正具有教育意义的，说不定倒是明白许多地方各有各的天气，天气不同还多少影响到一点人事。云有云的地方性：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海边的云幻异，渤海和南海云各不相同，正如两处海边的人性情不同。河南的云一片黄，抓一把下来似乎就可以作窝窝头，云粗中有细，人亦粗中有细。湖湘的云一片灰，长年挂在天空一片灰，无性格可言，然而

桔子、辣子就在这种地方大量产生，在这种天气下成熟，却给湖南人增加了生命的发展和进取精神。四川的云与湖南云虽相似而不尽相同，巫峡峨眉高峰把云分割又加浓，云有了生命，人也有了生命。可是体积虽大分量轻，人亦因之好夸饰而不甚落实。论色彩丰富，青岛海面的云应当首屈一指。有时五色相炫，千变万化，天空如展开一张锦毯。有时素净纯洁，天空只见一片绿玉，别无它物。看来令人起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情欲感。一年中有大半年天空完全是一幅神奇的图画，有青春的嘘息，煽起人狂想和梦想。海市蜃楼即在这种天空显现，海市蜃楼虽并不常在眼底，却永远在人心中。秦皇汉武的事业，同样结束在一个长生不死青春常在的美梦里，不是毫无道理的。云南的云给人印象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素朴，影响到人性情也应当挚厚而单纯。

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风，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尤以天晴时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天上一角有时黑得如一片漆，它的颜色虽然异样黑，给人感觉竟十分轻。在任何地方“乌云蔽天”照例是个沉重可怕的象征，惟有云南傍晚的黑云，越黑反而越不碍事，且表示第二天天气必然顶好。几年前中国古物运到伦敦展览时，有一个赵松雪^①作的卷子，名《秋江叠嶂》，净白如玉的澄心堂纸上用浓墨重重涂抹，给人印象却十分美秀。云南的云也恰恰如此，看来只觉得黑而秀。

可是我们若在黄昏前后，到城郊外一个小丘上去，或坐船在滇池中，看到这种云彩时，低下头来一定会轻轻的叹一

口气。具体一点将发生“大好河山”感想，抽象一点将发生“逝者如斯”感想。心中一定觉得有些痛苦，为一片悬在天空中的沉静黑云痛苦。因为这东西给了我们一种无言之教，比目前政论家的文章，宣传家的讲演，杂感家的讽刺文，都高明得多，深刻得多，同时还美丽得多。觉得痛苦原因或许也就在此。那么好看的云，孕育了在这一片天底下讨生活的人，究竟是些什么？是一种精深博大的人生思想？还是一种单纯美丽的诗的感情？若把它与地面所见、所闻、所有两相对照，实在使人不能不痛苦！

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②。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习经济、习会计，都可说对于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作事。“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挤挤挨挨，皆为利来，利之所在，群集若蛆。”社会研究所的专家，机会一来即向银行跑。习图书馆的，弄考古的，学外国文学的，因为亲戚、朋友、同乡……种种机会，又都挤进银行或相近金融机关作办事员。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其余无知识的脑子，成天打算些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

近两个月来，本市在连续的警报中，城中二十万市民，无一不早早的就跑到郊外去，向天空把一个颈脖昂酸，无一

人不看到过几片天空飘动的浮云，仰望结果，不过增加了许多人对于财富得失的忧心罢了。“我的越币下落了”，“我的汽油上涨了”，“我的事业这一年发了五十万财”，“我从公家赚了八万三”，这还是就仅有十几个熟人中说说的。此外说不定还有个把教授之流，终日除玩牌外无其他娱乐，会想到前一晚上玩麻雀牌^③输赢事情，聊以解嘲似地自言自语，“我输牌不输理”。这种教授先生当然是不输理的，在警报解除以后，还不妨跑到老同学住处去，再玩个八圈，证明一下输的究竟是什么。一个人若乐意在地下爬，以为是活下来最好的姿势，他人劝说站起来走，或更盼望他挺起脊梁来做个人，当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就在这么一个社会一种情形中，卢先生却来展览他在云南的照相，告给我们云南法币以外还有些什么。即以天空的云彩言，色彩单纯的云有多健美，多飘逸，多温柔，多崇高！观众人数多，批评好，正说明只要有人会看云，就从云影中取得一种诗的感兴和热情，还可望将这种尊贵的感情，转给另外一种人。换言之，就是云南的云即或不能直接教育人，还可望由一个艺术家的心与手，间接来教育人。卢先生照相的兴趣，似乎就在介绍这种美丽感印给多数人，所以作品中对于云物的题材，处理得特别好。每一幅云都有-一种不同的性情，流动的美，不纤巧，不做作，不过分修饰，一任自然，心手相印，表现得素朴而亲切。作品成功是必然的。可是得到“赞美”不是艺术家最终的目的，应当还有一点更深的意义。我意思是如果一种可怕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把每一个人都有形无形市侩化。社会中优秀

分子一部分，所梦想，所希望，也都只是糊口混日子了事，毫无一种较高的情感，更缺少用这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时，我们这个民族应当怎么办？大学生读书目的，不是站在柜台边作行员，就是坐在公事房作办事员，脑子都不用，都不想，只要有一碗饭吃就算有了出路。甚至于做政论的，作讲演的，写不高明讽刺文的，习理工的，玩玩文学充文化人的，办党的，信教的，……出路也都是只顾眼前。大众眼前固然都有了出路，这个国家的明天，是不是还有希望可言？我们如真能够像卢先生那么静观默会天空的云彩，云物的美丽，也许会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堕落，不甘心堕落。我以为这才像是一个艺术家最后的目的。正因为这个民族是在求发展，求生存，战争已经三年。战争虽败北，不气馁，虽死亡万千人民，牺牲无数财富，仍不以为意，就为的是这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我们之所以能忍受，不特是我们要发展，要生存，还要为后来者设想，使他们活在这片土地上，更好一点，更像人一点！我们责任那么严重而且又那么困难，所以不特多数知识分子必然要有一个较坚朴的人生观，拉之向上，推之向前，就是作生意的，也少不了需要那么一分知识，方能够把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放在同一目标上，分道并进，异途同归！

举一个浅近的例来说说：我们的眼光注意到“出路”“赚钱”以外，若还能够估量到在滇越铁路的另一端，正有多少鬼蜮成性阴险狡诈的木屐儿，圆睁两只鼠眼，安排种种巧计阴谋，在武力与武器无作用地点，预备把劣货倾销到昆明来，

且把推销劣货的责任，派给昆明市的大小商家时，就知道学习注意远处，实在是目前一件如何重要的事情！照相必选择地点，取准角度，方可望有较好成就。做人何尝不是一样，明分际，识大体，“有所不为”，敌人虽花样再多，劣货在有经验商家的眼中，总依然看得出，取舍之间是极容易的。若只图发财，见利忘义，“无所不为”，日本货变成国货，改头换面，不过是反手间事！劣货推销仅仅是若干有形事件中的一种。此外各层知识阶级中不争气处，所作所为，实有更甚于此者。

所以我觉得卢先生的摄影，不只是给人看看，还应当给人深思。

二十九年昆明 载《大公报》

本篇发表于1940年12月12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87期。原题为《看云》。署名上官碧。

① 赵松雪 即赵孟頫，元书画家。

② 法币 国民党中央银行1935年11月禁止银元流通后，由中央、中国、交通二银行发行的纸币称法币。

③ 麻雀牌 即麻将牌。

二 给一个广东朋友

× ×：

得你路上来信，知道车子翻了三回，还不至于把颈脖扭断，很觉快乐。单身一人，行动自由处，冒点险吃苦头时，不至于为家中人担心，实在令人羡慕。我们在这里各事照常，学校迁动的计划已成过去。目下大家对于空袭，已经成为习惯，警报响时，不过城外走走罢了。对于中日战事前途，实在更加乐观。恶邻加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分量虽然不轻，然而近二十年来（也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所产生的民族气概，一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却一定担当得起这种忧患。所以“不久胜利”虽近于一个空洞名辞，“招架得住”业已表现于各种事实。既招架得住，争取时间便成为我们胜负的关键。以目前情势说来，乐观是有理由的。一个朋友对日本人的失败，说得很有意思。他以为日本人的支那通，只懂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字，民初军阀时代的政治，中国方面较深一点的文学作品，所表现这个民族的伟大感情伟大思想，照例看不懂。较浅一点，如二十年来的白话文，所煽起这个民族的

热情，表现这个民族进步的情形，也照例不明白。不懂中国古书，至多在附庸风雅上，见出一点小家子相，玩瓷器只知买均窑，玩绘画只知重夏圭、牧谿^①，还不算大失败。至于不明白中国政治，处理中国事件，只学会用他本国流氓勾搭中国失意军阀和油滑政客，以为可以得到成功，不能不大大摔一个跟斗。“支那通”把近代中国由于文学革命以后，将文学当成工具，从各方面运用，给国民的教育，保有多少潜力这一件事根本疏忽了。小动作是派一些日本兵，送点小糖果给中国小孩，以为小孩子甜甜口就可以讲亲善。亲善既不成功，于是到处搜寻神经不健全的老牌官僚，如毛克敏、梁鸿志、××××××××××，如汪精卫、褚民谊、殷汝耕，这里放一个，成立个伪政府，那里放一个，成立个委员会。满以为稳扎稳打，极有把握。事实上就是政治上自以为本领极大的近卫^②，身材徒然高大可观，行动却实在十分拙劣可笑。看看向中国说的大话全说过了，中国还是不在乎。向世界各国说的大话也说过了，各国负责者和人民，倒好像只是发笑，嘲弄似地回答说：“你有力量征服中国，你尽管打呀！我们不干涉，看你打呀！”大话无结果，末了才把汪精卫当成傀儡，以为与东三省的满洲傀儡放在身边，恰好成为一对，可以左右提挈。也未尝不明白汪精卫是什么材料，上了台能起多大作用，只是如此一来，自己面子才下得去！爱小便宜是日本人的共通性情，近卫虽料到在军事方面的“成功”已不可能，却料不到在政治方面，还绝对要“失败”！这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不懂中国。即以本地情形来说，日本总以为从挑拨离间方式上，可以分化上层分子，从物价高涨上，可以扰乱动摇中层和下层分子。谁知挑拨离间的方法，用多了后实在毫无

作用。物价高涨好了有业的下层，只苦到一部分中层薪水阶级。然而在心理上反口，与日本决无妥协思想的，也就是这种中层分子。东西越贵大家生活也就越简单，把战事看得单纯而自然，打下去，忍受一切，在任何情形下，决不同日本合作。这只要看看这里几个大学的状况，也就可以明白。一个优秀图书馆员的薪给，不如资源委员会的门房，他忍受。一个学有专长的教授的薪给，不如昆明市的堂倌和理发师，他也忍受。使大家忍受的原因容易明白，“这就叫做战争！”大家是明白战争意义的。战争既是争国格，争民族人格，并争取人类生存不可少的一个庄严名辞，即“正义”。这事从有知识的中层分子看来，当然是要无条件忍受下去的。你说的最近出版的刊物，我见不着，内容如何也不明白。但据我估计，纵见着也不会如你那么难受气恼。有些人生活不得意，用“文化人”名义寄食于他所看不起的人篱下，牢骚满腹，既无勇气向腐败者攻击，又无知识向社会或历史算一算账，无事可作，到末了自然只好在小刊物上，向同行人名气较大为人注意较多的，发发牢骚。或学鲁迅先生手法，也在冷空处来那么一箭。一面算是站在“爱真理”一面，一面且自以为也“伟大”起来。写作的情绪既如此，文章不高明，态度又欠佳，事情都极其自然，并不足奇。你所说的某某作家，和在那刊物上写杂感的作家，既只能写点这种文章，即骂到头上，我还觉得可以同情，不会生气！你喜欢读曹植诗，诗有断句曰：“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是非义利，取舍不同如此。读书人在知识教养上，在作人见解上，也正有相同情形。有些人所思所虑，或在这个民族将来的命运，有些人却只为个人出点小风头便已得到满足。有些人拿笔写作，为

理解人生，表现人生，有些人写作目的，又只在泄泄私怨。我们对“文学”与“人生”看法，和别一部分人虽无是非可分，无高下可分，然而却实在有些不同。这不同从短短时间中辩论上纠缠，了无意义，不会有何结果。若从一个人十年八年工作成绩的表现上看看，情形就很容易明白。历史是一条其长无尽的链索，每个人多少必读过一点历史，同时多少也必然愿意自己成为将来历史。若只是成天与二三似通非通的“文化人”在小刊物上打笔仗，各执一是，如《吕氏春秋》^③说的妄人争年故事，两人争年，以最后歇口的为胜，未免太小觑自己生命了。既知道有多少吃“文化人”身份饭的脚色，都似通非通，所以应当将注意点放远一点，奖誉既不以为意，诋毁更不以为意。要紧处或许还是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向深处走，多读些书，多明白些事情，了解人之所以为人，从生物学上说来，不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动物，虽复杂依然脱不了受自然限制。因新陈代谢，只有一个短短的时期得生存到阳光下。然而从人类发展历史上看来，这生物也就相当古怪，近百年来知识的堆积，工具的运用，已产生不少奇迹。能明白人之所以为人兽性与神性的两方面，就一定会好好地来活个几十年，不至于同虫蚁一样了。世界上必照例有些愚妄人乐于在地上爬，以为手足同时贴地走动时最方便，姿势又最美丽。我们自己若知道必须站起来才像个人，尤其是站起来后两只手方可好好使用到各种工作方面去，世界才有个更好的明日，我们应当自己振作，凡事从自己起始。想征服人类的愚妄，是必需先从战胜自己一切弱点开始，方有结论的。流金^④已到洛阳，事情大致还好。之琳已入联大教书，学生不少。然而每每看到三百学生在一大课堂学经

济学成本会计时，相形之下不免令人痛苦。多数优秀头脑都有成为人格上近视眼的可能，为抽象法币与具体法币弄得昏头昏脑，在一种找个人出路实际主义下混生活，使我们感觉到一种高尚勇敢的情绪，如弄文学的向一个人类庄严道德原则追求的兴趣或勇气，如何稀有而可贵！不要发小牢骚，好好结实硬扎活下去。生活上小不得意必需忍受，就因为整个国家就在一种忍受中，希望有个更好的明日！近年来“广东精神”成为一个习见的名辞，表示这个名辞的意义，常用到学生打架一方面，未免可惜。真正广东精神应当是华侨向外求发展争生存的生命扩张性与坚韧性。所以在学校打架，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斗士，但在读书与做人方面，却希望你好好利用广东精神！

载二十九年十二月《大公报》

本篇发表于1940年12月30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原题《废邮存底——给一个广东朋友》。署名上官碧。

① 夏圭 南宋画家，工人物，尤擅山水。

牧谿 即僧法常，本姓李，南宋画家。

② 近卫 即近卫文磨，日本首相，于任内发起全面对华战争。

③ 《吕氏春秋》 书名。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编写，为杂家代表著作。

④ 流金 即程应镠。

三 给一个大学生

××同学：

从乡下回城，见你来信，信中提及同命运奋斗挣扎情形，我很明白。因为我认识许多这种想用赤手空拳来同这个社会作战的朋友。廿年来许多人在沉默中倒下了，腐了，烂了，可是新的理想将依然在年青的心中发酵。我相信你是能够成就所要成就的那个事业的。你由学生变成公务员，转入警校、军校，到现在又转入联大文学院，你的勇敢的盼望，就证明你能从艰难奋斗中创造你自己。我是个过来人，总觉得生存是每个人的权利，好好生存又近于人的义务，因此有许多日子寄身于各个小小机关中，半军半匪队伍中，不管生活如何艰难，做人向上的气概照例不失去。有一时吃的住的毫无办法，每到他人吃饭时，就闯去凑数，晚上睡到烧火处或军械处成捆军服上面，还常被人逐骂。可是虽然如此，我白天还依然精神很好，兴致很好，做一切事都充满生气。一个人真要好好活下去，总是有办法的。个人出路并不困难，可怕的倒是生活压力一去，有了小小出路以后的堕落。你如今既考

上了大学，希望为了作人的气概，也能好好地忍受这四年的生活压迫和人事训练。我极羡慕尊敬以个人能力用大学来教育自己的年青朋友。因为各人长处不一致，大学课系多由学有专长的人主持，年青人在学校求进步容易有进步。且知识发展平均，对少数特殊天才言，也许近于损失，为国家进步言，实在很有意义。盼你能明白国家的需要，和生命的庄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气馁，不灰心。“建国”和“做人”两个名词，原本就包含一种长时期的挣扎与苦战，承认这个事实的朋友多，各在不同情形中努力，到某一时，且会联合起来，用一个更勇敢更庄严方式去接近社会，处理事实，解决问题的。……多看点好书，莫把有限精力耗费到对人疑忌或小小争持方面去。莫以为生活穷是最可怕事情，莫以为一切成就都靠“天才”，苦干并无意义。这世界一切形成多决定于人的“意志”，并非“偶然”，亦无“徼倖”可言。对自己尽管苛刻，征服自己一切弱点，正是一个人伟大的起始。

二十九，二月三日昆明

本篇发表于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为《续废邮存底》总题下的第一篇，署名沈从文。

四 给一个青年作家

× ×：

得信并文章三篇，文转香港。有新作寄我处可为想法分配。你读书不算多，最好将必要功课补习一年，考入大学，多学点，多知道一点，对你将来发展大有关系。如实在不能继续读书，正好趁此时随军队到前线去讨一两年经验，多知道一些中国目前种种，数千万人民转徙流离，近百万壮丁在炮火中挣扎方式，如此一来，也可写出一些比较成熟的作品。若照目前情形拖下去，文章有了出路，可不是办法。用一个空头作家名分留在家中过日子，见闻有限，生命易枯竭，生活就堕落。你年龄正是必需用“现实”训练“身体”和“精神”好将人格扩大的年龄。看机会许可，或向书本中钻，或向社会中滚，都比坐下来看看流行杂志，写点不三不四文章好。文章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大作品不能凭空产生，得作知识和经验上的准备。希望你认真一点，把这分工作也看得庄严一点，来好好苦干一番！孩子气能节制节制，向人类远景凝眸，会多看出些东西。不要怕生活变动，担心新环境难

适应。世界是成天在变动中！不要怕困难，想活得像个人，生存本来就是极艰辛的，更不必怕危险，一个男子应当有冒险雄心与大志！你读过《邓肯自传》^①，称赞她文字矫健而又富于情感。一个女人尚能凭幻想把生命带到伟大成效上去发展，何况一个二十二岁的男孩子。

廿九年二月三日昆明

本篇发表于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为《续废邮存底》总题下的第2篇。署名沈从文。

^①《邓肯自传》书名。邓肯，美国女舞蹈家，现代舞派创始人。

五 给一个诗人

××兄：

文章看过后，据个人私见，觉得不发表较好。你见到的，正是社会最普通现象。目前至少有上百组织，无不虚有其表。若循名责实，近于少见多怪。你对于他们希望太大，由于你生活不离学校，学校以外机关的内容，通不明白。我以为假若对这类空头作家失望了，不应当对一切人失望，也许还得鼓励另外一些人来认真苦干一番。社会进步既不是二三装幌子的“文化人”可以弄好，就一定要有人永远对一切有益于人的“工作”或“理想”，用热心与善意帮助他进行。从近三十年来的“过去”看看，我们就会相信社会各方面是在进步中，尤以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建立，从各方面表现得很好。进步的情形也看得出，凡为人小有才嚷嚷闹闹的，近于装点场面，与真实进步无关。个人虽因缘时会或为名流，为政客，为委员，领导这个，办理那个，事实上只作成了一件事，即他个人生活终日放在赴宴开会习惯中，觉得平常而自然。凡不声不响埋头努力于他们专门工作，关

心这个民族发展，帮助这个民族发展的，由于工作态度的朴实，而又坚韧持久，照例影响较大，成就较多。“改善”一切若果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文学运动应当在“实事求是”一方面。我们很可以先建设一个诚实朴重的作人态度。在个人工作上弄出一些成绩，再用一个比较宽容的热心态度，促进社会明天有个新文运出现。各样好事都需要去作，正因为这是一个民族向上挣扎的主力。不要说灰心，我们活到当前情形中，既想要有个更好的明天，“灰心”两个字对我们不合用！

二十九年二月三十日昆明

本篇发表于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为《续废邮存底》总题下的第3篇。署名沈从文。

六 给一个中学教员

××先生：

来信谢谢。关于思想问题，因个人读书不多，似乎不能提出如何明智圆通意见，作为参考。惟就个人所见来说，读书多应当不是坏事。读书杂更不会有不良作用。先生说读书太多，反人迷途，恐系指仅仅读习某一类书而言。读书性质窄，容易有闭塞。尤其是所读的若大部分是纯理性观念符号的书，常常不可免与“人生”相去一间，难得调整，易有冲突。如谈“真伪”，名词意谓与人事情形即不相干。“文学”和“政治”门类不同，真伪意义又因之完全不同。问题也许不在求“同”，倒在明白那不同的原因，承认那个不同。

至于稳定生命，使不为一切现象困惑，一个二十五岁的男子，他若身心健全，发育正常，所需要的也许并不一定是何等抽象观念，只是同样一个生物，一个与他虽同而不同的生物——一个女人！你所谓无聊烦闷，表面上是脑子中的书本作祟，事实上居多倒是生理上求发展受压抑结果。你要的并非抽象“真理”，它的名字应当叫“恋爱”。正因为任何一

本书都不能如一个女人的爱情，更容易在廿五岁左右男子心中产生“真理”的作用。这可谓自然之巧，使每个人生命成熟时，求发展居于第一位。俨若上帝派定，他需要爱人，也需要被人爱，从爱中生儿育女，方能完成生物的任务。人要抽象观念稳定生命，恐得在三十岁以后，已由人事方面证实一部分生命意义后。或因精力耗损，或为现象困缚，有所不足，无法弥补，方用得着抽象观念，贴近它，依附它，信仰它，可望得到安定，觉得活下去还合理。这恰恰又证明自然之巧的另一面。自然先要每一个人如一般生物，尽种族义务，尽过这种义务后，若照一般生物原则，即将死去。有的生物在求偶后虽还活着，亦若事无可为，只等待周期性生活的回复，再来服务。人似乎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生物，因此活到某一时，即不免感觉生存的空虚和厌倦。然而妇孺养育还得男子。妇女生育后，将对于男子独占情绪转移到孩子方面去，男子情绪从女人方面释放，因此方得自由思索的机会，这自由思索的结果，于是产生人类文化与文明。且产生若干凝固观念，来稳定生命，肯定生存。没有文字以前，这些观念即包含在传说神话中，反应人之所以为人，必需有一种或许多种抽象原则，方能满有兴趣的活下去。有文字以后，产生了书本，更增加抽象原则的应用。这原则不仅人能够从“当前”“过去”得到生存的意义，且可从“未来”得到生存的信心，为一个未知的未来，耐心忍受不幸与牺牲（除非万不得已，生活虽极厌倦，也决不自杀的）这种自然安排之“巧”，实在不是偶然的。若承认这种事实，你就会明白你目前决不会如你所形容的发疯自杀了。你说读书太多，反而转入迷途。假定真是看书太多，想从一本书中所说的“真理”

来统一调和和其他各书中的矛盾，你需要的书，或者得从另外一方面去找寻，必不是哲学报告论文。一本《性心理学》或《情绪卫生》，一本《安娜小史》或《人心》，都可能对你有些帮助。因为这些书讨论到的是“人”，是为你年龄生活所不明白却亟于想要明白的种种人事问题。若读过这种书后，肯老老实实承认，就是那么一本或十本书也依然无助于你，你的无聊的确是生命发展压抑，需要解除，最好还是放下一切书本去结婚或恋爱，在一个女人情分得失上耗费你的精力和想象，并证实生命存在更生物的一面。若这么办机会又不可能，那就得承认你所倾倒的那个外国作家提供的意见，让生命力“转化”或“升华”，说的相当有道理。用文学艺术培养陶冶你的情感，与自然景物接近，可产生转化作用。爱一切抽象造型的美，用这种爱去有所制作，可产生升华作用。两者都能平衡调整你目前的纷乱和不安，但是也能引起你生活愿望限制后更大的纷乱和不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可为注脚。关于这问题你若觉得还有兴趣，肯从一个较新观点去研究研究有形“个人”和无形“文化”，我以为看书多而杂，正是你的幸运。即如说你想多认识你自己，也许就值得你去扩大看书的范围，用文学艺术和近代生物学心理学所提供的知识奠基，来分析，来追究，方有望有些较新的发现！这种发现的结果，并不能使你活得比当前“快乐”，不过一定活得比当前“合理”。

廿九年四月十五日昆明

本篇发表于1940年5月1日《战国策》第3期，为《绫废邮存底》总题下的第4篇。署名沈从文。

七 给一个军人

××：

得你信谢谢 相隔一年，你来信我还是不大看得懂，所以回信真不知说什么好。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论^①先生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我只记得陈先生写了篇“英雄崇拜”，我写了篇文章^②驳他。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时的技巧，与事实是完全不相符的，你若有机会翻《战国策》也就会明白，不至于同意杂感家胡扯了。你有兴趣看我的书，正不妨看看《习作选》序文、《边城》题记、《废邮存底》、《烛虚》，我有些关于写作的意见，或者可帮助你读我作品时参考。《习作选》、《边城》、《八骏图》、《记丁玲》、《湘西》、《湘行散记》、《长河》……这些作品虽还是习作，读来似乎不会给人十分恶劣印象，也不至于使人堕落的。去年不劝你读我的文章，只因为我把他看成“习作”，觉得不值得向一个陌生读者推销，这正是一个乡下人老实打算。照近十余年来一般习惯，是“抢读者”，或用各种式样为有权有势者捧场凑趣

抢大读者，或用前进姿势抢小读者，我兴趣不在此。一时之间读者有尤是件小事。我的理想是慢慢地写，慢慢地求进步，目前无读者，无出路，不足介意。我却希望好好写三十年，到二十世纪末还有读者。读者如不能从我作品取得做人气概，至少还可望从我作品中取得一点做文章技巧。如果文学运动的意义，是要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青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活力，据我私意，若照当前一些文学掮客抢群众方法，是不会有何成就的。他得有好作品，方可望得到。要有好作品就要作家耐得住寂寞，用一个比较诚实素朴的态度来从事工作，三十年还只是个假定，事实上是应当终生努力，到死为止的。好的文学作品照例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可是如今一部分作家，却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我的意见受许多人批评，以为不切实际，也是极自然了。你还年青。从文学上就可看出很聪明，如果从事这个工作，盼望你有个雄心和远志，来老老实实准备几十年。这也正是一种战争，虽不见断头流血，困难处说不定比军队中炮火对垒还需要精力和勇气！因为看得深远，你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都可能成为一般人的笑话，且工作成就，也未必能与普通社会价值相合。但加上个“时间”，总可望得到明日社会认可，且得到真正多数爱重的。抛弃当前，为的是要有个更好的明天。这“明天”说不定作家自己是看不到了的。可是这不妨事！你若明白自“五四”以来，几个作家能有以自见，是在如何困难中与习气环境奋斗，就会觉得这时节我们通讯中，劝你好好努力的意义了。诚诚实实在地“学”，在一切失败中去讨“经验”，在任何困难中莫“灰心丧气”，是我们这个民族明天翻身唯一的希望。这不是

一个人的事，是中国所有年青人的事。这不正是我的理想，还是我的信仰。你在军队中若什么都学不到，至少还可望学得知道当前许多事，许多人，还不够好。既然是人的事情，只要有人肯求好，就可望从努力中慢慢转好。求好向上不是读什么指南，应当是就机会所许可读许许多多书！单单读书不济事，要有气概去做人，做一个精力弥满，不畏艰难，勇敢诚实的人！

沈从文

五月二十三

本篇原载刊物不详。

①《战国策》 综合性刊物，1940年4月在昆明创刊，林同济、陈淦、雷海宗等编辑。

陈淦 现代作家。

②《英雄崇拜》 即陈淦所写论文《论英雄崇拜》。

我写了篇文章 即作者所写《读〈英雄崇拜〉》，编入全集第14卷。

八 学习写作

××先生：

××兄转来你的信和文章，我已收到。文章我想带下乡去看，再告你读后感。关于升学事，我觉得对“写作”用处并不多。因照目前大学制度和传统习惯，国文系学的大部分是考证研究，重在章句训诂，基本知识的获得，连欣赏古典都谈不上，那能说到写作。这里虽照北方传统，学校中有那么一课，照教部规程，还得必修六个学分，名叫“各体文习作”，其实是和“写作”不相干的，应个景儿罢了。写作在大学校认为“学术”，去事实还远，联大这个课程，就中有四个学分由我担任，计二年级选第一次两学分，三四年级选第二次两学分，可是我能作到的事，还不过是为全班学生中三二个真有写作兴趣的朋友打打气而已。我可教的只是解释近二十年来作家使用这个工具的“过去”，有了些什么成就，经过些什么曲折，战胜了多少困难，给肯继续拿笔的一点勇气和信心，涉及写作技术问题，只是改改卷子，这种事与写作实隔一层，是不会对同学有何特别好处的。我对于这个问题的

看法，总以为需要许多人肯在这个工作上将“生命来投资”，超越大学校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上流行的“文化”价值，从一个谦虚而谨慎学习并试验态度上，写个三十年，不问成败得失写个三四十年，再让时间来检选，方可望看得出谁有贡献，有作用，能给新中国文学史留点比较像样的东西。若是真有值得可学处，就只是这种老实态度，和这点书呆子看法，别的其实是不足道的！所以你如果为别的理想升学，我赞同你考。如为写作，还是不用升学好。如打量写作，与其升学，把自己关在一个窄窄学校中，学些空空洞洞的东西，倒不如想办法将生活改成为一个“新闻记者”，从社会那本大书上来好好地学一学人生，看看生命有多少形式，生活有多少形式。一面翻读这本大书，到处去跑，跑到各式各样不同社会生活中明白一切，恋爱、发疯、冒险……一面掉过头来再又去拼命读各种各样的书，用文字写来的书，两相对照一下，“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实际与抽象相去多远，明白较多后，再又不怕失败来写各式各样文章，换言之，即好好地有计划地来使用这个短促生命（你不用也是留不住的）！永远不灰心，永远充满热情去生活、读书、写作。二五年后一成习惯，你就会从这个习惯看出自己生命的力量，对生存自信心工作自信心增加了不少，所等待的便只是用成绩去和社会对面和历史对面了。这也是一种战争！因为说来容易，作来并不十分容易的。说不定步步都会有障碍，要通过多少人生辛酸，慢慢地修正自己弱点，培养那个忍耐力、适应力，以及脑子的张力（为哀乐得失而不可免的兴奋与挫折）！且慢慢让“时间”取去你那点青春生命之火。经过这个试验，于是你成熟了，情感比较稳定了，脑子可以自由运用，一支笔更

容易为脑子而运用了，你会在写作上得到另外一种快乐，一点信心，即如何用人作为题目，来写二十世纪新的经典的快乐和信心。你将自然而然超越了普通人习惯的心与眼，来认识一切现象，解释一切现象，而且在作品中注入一点什么，或者是对人生的悲悯，或者是人生的梦。总而言之，你的作品可能慢慢地成为读者的经典，不拘用的是娱乐方式或教育方式，都能使他人生命“深”一点，也可能使他人生存“强”一点。引起他的烦乱，不安于“当前”，对“未来”有所倾心，教育他“向上”“向前”“向不可知”注意，煽起他重新做人的兴趣和勇气。能够如此或如彼，总不会使一个读者因此而堕落的！写恋爱写战争，写他人或你自己，内容尽管不同，却将发生同一影响，引带此一时或彼一时读者体会到生命更庄严的意义，即“神在生命本体中”。两千年来经典的形式，多用格言来表现抽象原则。这些经典或已失去了意义，或已不合运用。明日的新的经典，既为人而预备，很可能是用“人事”来作说明的。这种文学观如果在当前别人看来是“笑话”，在一个作者，却应当将它当成一种“信仰”。你自己不缺少这种信仰，才可望将作品浸透读者的情感，使读者得到另外一种信仰，“一切奇迹都出于神，这由于我们过去的无知，新的奇迹出于人，国家重造社会重造全在乎人的意志。”

三十一年六月三日

本篇原载报刊不详。

九 职业与事业

× ×：

谢谢来信并附寄长诗。我不懂新诗，目下新诗标准既不一致，仿佛极聪明的人和极低能的人都在写新诗，都能写新诗，文字符号共通性越来越少，作者自得其乐情形越来越多，所以我不敢再充内行说出好坏，又觉得一个人写作的动力，应当自内而发，若靠刊载露面来支持，兴趣恐难持久。因此把长诗寄回，望还给那朋友。若他欢喜写诗，我个人私意，从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陈梦家、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各人作品折衷，大致不会受坏影响。这些人作品虽不怎么“新”，却比较“深”，且很可能比并世其他作品经久些。

银行事既很与你性情相宜，生活稳定，又不大累，闻人说跑警报还有钱，做下去自然甚好（你读朋友来信，莫总想到是在讽刺，事实上是不会有。除非是个病人，就不会成天在讽刺人中讨生活的。这只看看那些努力“学讽刺”充战士的人写的文章，就可知道。凡是装做有思想来写小品文的，末了还是既无文章又无思想，可以证明）。在职业选择上，因

为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从比较广泛点看去，这其间并无是非，只有不同。稍稍明理懂事一点的人，都必然尊重这点不同，何况是熟朋友。人太熟，在书信上间或说说作人做事意见，措辞直率显得唐突处，决不会有一回以上的。你以为被讽刺，或者是初到银行，生活与习惯已不相同，心情却保留一些旧的东西，所以人一说话即感觉受讽刺。日子久些，自然就能适应现状了。既在银行服务，主要应当是对本分上事尽职，此外再去学些有关会计经济高深知识，才是向上，或作些无害于事的消遣，费去多余时间，才能够安于职务。向上是常态。不大争气的从业员，照一般习惯玩玩牌唱唱京戏，吃吃喝喝，年终分几个月红利时，就把它投资到什么小生意上去，所思所愿不出职业范围，也可算得是常态。或不甘心同流合污，尚保留一点学生习气，把剩余金钱买点书来读，也还近于常态。至若有计划逃避到比多数中国人还舒服安适环境里，活在最不需要脑子的事务上，却打算作最需要用脑子单独与人生对面的工作，想象体会一切变动中国民的苦难生活，抽出观念，编排故事来表现它，这似乎是变态。因为如此一来，结果不是把业务弄糟，就是把当前中国人的痛苦挣扎，与未来中国人的理想，弄得歪歪曲曲。你不改业，我还希望你用头脑来与生活奋斗，以为也许可做些别人做不了的事。你一改业，我除了盼望你好好服务，好好过日子，别的什么全不想说了。写作不是“职业”，却是一种“事业”。这事业若包含一种国家重造的理想，与一切现有保守腐败势力的观念组织，都必然发生冲突，工作沉重与艰苦，就不是恋恋于职业上生活安定的人能办得好的！

你现在既安于当前职业难道还不明白写作“用心”的方

式，与银行职业需要完全不同？古人说“心不二用”，为的是恐怕两不讨好，所以我以为普通银行从业员，拿笔是不必需的。我虽不入银行，倒很尊重在银行忠于职务又肯向上的人，也不十分讨厌只知照习惯吃得饱饱的养得胖胖的生活下来不大用脑子的人。并不一定要他会写小说。若一面做事，一面写作，那写作等于“玩票”，玩票态度照例是要有人捧场，才高兴做下去，唱不好就会歇手的。过去二十年不少女作家的忽起忽落，工作难以为继，就吃的是玩票的亏。用心不专不深，成就即有限，对自己言还好玩，对整个文学运动言，实在可有可无。写作是要有信心，有热诚，不计功利，不问成败，正义感特别强，对人生充满悲悯博大同情，而又能坚持到死去干的一分庄严工作。不特玩票的方式难见好，即热心从事，有点功利思想和投机打算掺杂其间，如目前二三文化人的生活方式，也未必有好成绩留得下来。实在说，写作是一种相当沉闷，又不能从任何报酬取偿的事业。他努力于新经典的产生，却必需把整个生命放上去。一个人体力神经都有个限度，一认真，便常常不知不觉要超过这个限度去使用，心情状态很可能就将失去平常人过日子的平衡。由于对人生哀乐民族发展看得远，想得深，作品更容易被普通社会抵制或压迫，一时间得不到读者认可。谈不上作品成功，也难安于一般生活方式。试想想，一个以站银行柜台认为生活有保障的大学生，那能适宜用生命投资到这种冒险事业上？我承认文学运动要有一点生气，是需要从五年来寄食在都会中那些“文化人”以外想办法的。十年前我就提出这个理想，以为新的作家，不能在“职业作家”上寄托更大希望，必就一切从业员方面来培养，方可望有大作品产生。可是当前寄生

在银行中，习惯于“生活稳定”打算的人，实不必学使用这支笔来思索“人”事，编排人事。只因为人在温室中长大，是不能谈户外气候寒暖与人生意义的！我并不反对人来拼命写作，可不鼓励一切银行职员都来“玩票”。欢喜玩票的，唱京戏比写文章方便得多。因为可以参加彩排，又不至于使脑子混乱，不安分职务。在习惯上虽把写作看得庄严，可是流行风气（即政治把文学放在装点场面上来使用的风气），也就可能使它变得异常猥褻卑污，作家从“说教者”、“经典制作者”、“思想家”身分，变而为“白相人”和“小打手”、“清客”和“混混”。这只看在各大都市中，单纯为装点场面而有一生一世从不会也无可望写一个像样作品的人，还无碍于作一个“文化人”，从从容容过日子下去，就可知道这件事的另一面是什么了。如再加上一批不三不四的票友，文学运动的堕落，恐更难得有个转机。

凡事得于此则失于彼，彼此并及是不可能的。作家埋头努力的，就不大习惯于参加宴会，如朋友巴金你便知道。若你想一面在银行得意，一面从写作找寻生命意义，这是故事上一个妇人“东食西宿”的婚姻观，世界上也正是这种女人继续存在，说明这种半解放的人生观实出于情感混乱。如像有些女人，永远用“某夫人”“某小姐”身分，在社会上露面，做那个“妇女解放运动”一样。本身生活和理想，两相对照才真是最辛辣的讽刺，可是这些女人自己却照例从不觉得的。

一株在温室中培养长大的花木，能在一定温度下好好开花，也就有它生命本身光辉动人一面，即无作梁作栋价值，还依然不失去美的价值。女人或男人中，也有不用脑子思索，

一辈子还活得上好的人，实不必一面想一面活动才动人。想不深，活得又恹恹无生气，目下这种年青人已够多了，凡自愿加上去的，我们得放弃了他，任他以什么方式活下去都无碍于事。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群，男的或女的更年青的那个多数，在国家各事都需要人时，他们能把“生活稳定”当成一种羞辱，去在各种无保障待开发事业里冒险，忍受当前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苦难，从学习讨进步，将来成为专家，成为统治者或领导者。因为自己在生活经验上有了免疫性，能抵抗得住忧患来临支持“好好做个中国人”的信心，更能设法扩大这点信心到更年青一辈青年生命中去。

这点教育这点做人力量是从诗中可以取得的，只看一个人如何去读诗扩大他的生命幻想而定。我有个姓刘的朋友，十五年前也读诗也写诗，写给什么女孩子信时，必在信笺上加一点极好闻的香水，房中镜框中必有些好看的干花枯草，或一个小蝴蝶，代表一个女孩子的情感和印象。秋天来时书架上必插点枫叶和芦花，增加一点萧瑟感，也等于在心上装饰一点萧瑟。自己衣冠翩翩，日子过得又快乐又忧郁，恰恰如故事上“多情人”一样。可是也许是有这么一回，真的诗扩大了他生命的幻想，忽然从枫叶蝴蝶去研究生物，十五年后成了一个专家还依然用“诗”给他的超功利思想，为研究小白蜡虫，在西南数省徒步走了六七千里路。这才是写诗、学诗、真正懂诗的人！

本篇发表于1942年7月7日香港《大公报》，原题为《事业和职业——新废邮存底廿二》。署名沈从文。

十 给一个在芒市服务 的小学教员

李豪先生：

谢谢你远道来信，对这里人生活关心。昆明市区虽一再被炸，城中房屋毁去很多，读书教书的熟人精神都还好。上次学校被炸时，有几个同事险被活埋，有些同学住处全毁掉，第二天还是照样上课。芒市应当快到××了。在我想象中，你们过的日子一定相当艰难沉闷，虽艰难沉闷，可并不颓唐。这就是中国新生的一闪光。在各样职务各样生活中，我们到处都碰到这种可敬可爱好朋友：一面就他的耳闻目睹，知道国内许多使人痛苦的事情，一面却在嘈嘈啾啾人群里，独自对国家远景倾心，做人诚朴而坚实，与社会习惯奋斗。这也正是一种战争！虽免去断脰流血，能持久不懈，真不容易！你要书看，过不久当为你想法寄些来。这里书也越来越稀少，不大容易得到了。一折八扣的选本卖到一二元一本，著作者实无能力买自己的书，正是必然的事。负责方面对学术事无计划，商人又唯利是图，因此市面上流行的当然不是书籍，

多是日用品和不必要奢侈品，一年来市面不同处，只是多了许多小食店和小茶馆，其次是大小杂货店都可以买到扑克牌。古人说，“见微知著”，从这些东西你可想见留在这个都市中人，一定有许多是用吃点心喝茶方式消耗他每天的有用生命的。多数人在某种闲散生活上也不必用脑子，因之养成用胃的习惯，聊以解嘲地说，这习惯自然也可以说是在繁荣都市，且当真繁荣了都市了。钱多事少的办事员，和某种暴发户，自然还有更多稀奇古怪开心取乐的方法，一言难尽。至于知识阶级，教授中如所传闻的艰难窘迫，过日子如“黔娄先生”^①，家中孩子吃烧饼必需限制数量的，固大有其人。然而活下来莫名其妙，过日子从从容容，把玩扑克牌当成一种高雅娱乐，消磨他有涯之生的，恐怕也容易见到。看他们在公共地方（有时说不定还是他们的研究机关），神气兴奋旁若无人的玩牌神情，总令人十分痛苦。这些人过的日子，去腐烂堕落只相差一间，与你所羡慕尊敬的人格，实在相去太远了。对他们你应当把“羡慕”变成“轻蔑”，“尊敬”变成“怜悯”。这些人间或写点文章，告你们这样那样，也不过骗些零用钱花花罢了。事实上他们真正的兴趣，是在麻雀牌或扑克牌上头的。把他们所追求的低级娱乐和你们在边地服务所追求的崇高理想对照，不仅你们人格伟大得多，生命显然也庄严得多！这些人到外国去读的虽是第一流书籍，生活方法却常常学第三四流式样，你对他们“迷信”，正说明你对自己工作还缺少“自信”。这种人对当前中国忧患毫不关心处，说起来有时竟到令人奇异程度。原因也简单明白，这些人在欧美可作一良好公民，在中国便近于一个废料。

你不要因为职务卑微就感到自卑，不要因为事情平凡就感到自轻。国家正在苦难中挣扎，凡有做一个中国国民良心和气概的人，总都明白要国家从困难中翻身，得忍受个人那一分不可免的痛苦，虽事事受挫折，却不丧气，不灰心，更不取巧为个人出路担心或分心。一定明白个人出路得失问题小，民族兴衰国家存亡问题大。个人生活好，对国家存亡必充满热忱，个人生活不好，也不会消沉堕落，把自己缩小成为一个零，“无所谓”地混下去。他只要活下来一天，就总得像个活人。是活人，就不会无所谓活下去！有些人甘心为虎作伥认贼作父，不知羞耻地在沦陷区作这样那样，即出发于活下来那点“无所谓”气质抬了头。然而凡是为虎作伥的，坏处分分明明，有目共睹，人所不齿。这些人若清夜自思，也不免觉得有愧于一个“人”字（第一号汉奸郑孝胥^②死前就有这种表现）。至于另外一种读书人，活下来对国家“无所谓”的人生观，试稍稍注意一下他的影响，真未免可怕！我们战争工具长时不如人，打两回败仗，还不怎么要紧。若我们气概不如人，前方战事未失利，后方读书人精神上即见出败北趋势，你想想看，这个国家明天怎么办。若知识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脑子极不健全，行为马马虎虎，这些人或当前在为人之师，或当前在作高级公务员，凡是他们所在处，就有麻雀牌或扑克牌。个人或受国家供养培植前后将近二十年，到这时感觉专门知识难与战事相配合，好像战争只是五百万人放枪放炮的粗事，与自己毫不相干，生命俨然别无用处，就用花骨头和花叶子来耗费它，你想想看，这个国家明天当真怎么办。这种不振作的现象，虽只是少数中的少数，也

够可怕了！很可恼的是若有人提起这个问题时，这些抱定“无所谓”人生观的读书人，照例还会装作洒脱、聪明、而又痛苦不过的神情，“国家到这个样子，全是过去的政治不良，不关我的事！我难受，我能做什么？我不玩牌将更难受！”或者且恼羞成怒，“你以为你一个人对国家热忱，你去‘爱国家’好了！我玩牌并不犯法，比贪官污吏好得多！”这么一来好像事情就完了，于是一切照旧。昔人说，“哀莫大于心死”，指的便是这些活人作死计的现象。所以这种“无所谓”的人生观，也正是吴稚晖说的“人死观”。在个人受肉体受疾病摧残或自然限制死去以前，先用懒惰自杀方式僵硬那颗心，腐烂那颗心。更可怕的是这种“人死观”的特别传染性。本来是少数，在三缺一的凑数情形中，即可渐渐成为多数。你说的大学停办消息，似不大可靠。不过如果国家最高负责方面，能察觉到大学教育，年来有专为银行公司训练小事务员趋势，社会习气又正影响到许多年青读书人，以从大学毕业站银行柜台认为“有出路”，教书人且可能有百分之几抱定“人死观”，用极少热忱教书做人，用极大热忱去玩牌寻开心，在那里等待战争结束，等待自己生命结束，因此由国家设计，把大学停办一二年，试一试使用这些大学生到别一方面去，不管结果如何，至少“人死观”的传染性总可遏止一下，目前由军事专家观点说来，国家组织难适应新的事变，人民知识又一时难运用新的工具，所以把全国大学停办，把大学生全部放进军队，未必有助于整个战争，不过变一变读书人生活方式，把长于玩牌的专家，通通送到社会各方面去见识见识，让他们明白一下中国人当前是怎么过日子，对明日建国，损

失究竟少，成就实在多。大学若当真停办若干部门，正说明国家最高设计方面，已看出了这种因循成习不生不死教育制度有毛病，有问题，在试验中求解决，且具有勇气来作改造打算，在你还能留在边境服务时，实用不着担心升不了学，你身边有的是待你教育的更年轻的一辈，得把这个民族近二十年来在侮辱和压迫中挣扎，以及挣扎中逐渐恢复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各种方式注入到他们年青纯洁的血里去，好让他们明白，这个国家的明日，是需要更多的身心健全的年青人来努力，方可望有转机的。打胜仗后想翻身，就得每个人把所有智慧和能力粘附到“国家”上面去，方有好结果的。你活下一天，就得好好地尽职，不幸倒下去，死了，烂了，完事了，就等于多出一个五尺来宽空地，让更年青勇敢的小朋友填补上去。个人可死去，必死去，国家民族却不能灭亡！更不应该把四千年来祖先刈草焚林开辟出来的一片土地，和生息到这片土地上朴实耐劳的五万万人民，凭它断送到少数民族败类，和少数顽固、糊涂、自私、懦弱、读书人的消极颓废行为中！想法把这个国家重造，若包含的是这个民族生活态度和思索方式的重造，据我想来，这件事并非几个做大官的用法令奖惩即可见功。目下无名分的个人，真若有做人勇气和雄心，似乎还未到学无可为束手待毙的时节，你当前工作虽十分卑微，工作意义却实在重大。能坚忍强毅毫不含糊地去面对当前困难，虽不是和狡诈贪狠的敌人作战，实俨然与“民族积习”、“社会弱点”作战。若能经受得住任何挫折，也不逃避变质，永远照所信所守支持下去。日月流转，人事亦必然因之有新陈代谢，如此做事对国家有益无益未可知，然如此

给一个在芒市服务的小学教员——

做人，总还像个“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户何能亡秦？所以能亡秦，应当是这种做人的气概，你想对不对？但愿安佳。

三十年十二月，昆明

本篇发表于1942年2月16日《文聚》第1卷第1期。署名沈从文。

① 黔娄先生 战国时齐国隐士。齐、鲁国君请他出来做官，他总不肯。家甚贫，死时衾不蔽体。

② 郑孝胥 汉奸。“九一八”后，唆使溥仪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并出任其总理。

十一 给一个作家

××：

我住昆明附近的乡下，假中无事不常进城，因此寄××信件，十天半月方能见到。××已从香港回来逃出桂林，有机会演戏，大致还是要带病上台做戏。凡事能热心到“发疯”程度，自然会有成就。只可惜好剧本并不多，导演难找寻，一个班子能通力合作更不容易，因此××走到各处，似乎都不大如意。不过她那点对事热心处，还是令人钦佩。因为各种挫折失败中，还能有信心和勇气去支持理想，实在是少有的！这个问题一面受事实限制，一面要达到理想，一面得应付人……，比你我坐在家中关上门来写小说，困难累人多了。

关于写作事，我知道的极有限。近来看到许多并世作家写的“创作指南”一类文章，尤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若照那个方式试验，我想若派我完成任何作品都是不可能的。我虽写了些小故事，只能说是习作，因为这个习作态度，容许自己用一支笔去“探险”，从各种方式上处理故事，组织情节，安排文字。且从就近着手，写到湘西方面便也特别多。

在种种试验中，如有小小篇章能使读者满意，那成功是偶然的；如失败，倒是当然（为的是我从不就他人所谓成功路上走去，我有我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目的）！失败时也不想护短，很希望慢慢地用笔捉得住文字，再用文字捉得住所要写的问题，能写些比较完美而有永久性的东西。就写作愿望说，我还真像有点俗气，因为只想写小故事，少的三五千字，至多也不过七八万字，写成后也并不需要并世异代批评家认为杰作，成千万读者莫名其妙赞美与爱好，只要一二规矩书店肯印行，并世百年内还常有几十个会心读者，能从我作品中仿佛得到一点什么，快乐也好，痛苦也好，总之是他得到了它，且为从别的作品所无从得到的，就已够了。若说影响，能使少数又少数读者，对于“人生”或生命，看得宽一点，懂得多一点，体会得深刻一点，就很好了。（我们常常说经典的庄严性与重要性，其实也就不过如是而已。）能做到这样，或许还要努力十年八年，方有希望。至于目前的成就，是算不得的！个人为才具性情所限制，对工作理想打算得那么小，一般人听来或者觉得可笑，这是无碍于事的。个人所思所愿虽极小，可并不对别人伟大企图菲薄。如茅盾写《子夜》，一下笔即数十万言，巴金连续若干长篇，过百万言，以及并世诸作家所有良好表现，与在作品中所包含的高尚理想，我很尊重这种有分量的工作，并且还相信有些作家的成就，是应当受社会上各方面有见识的读者，用一种比当前更关心的态度来尊重的。人各有所长，有所短，能忠于其事，忠于自己，才会有真正的成就，只由于十五年前我们文学运动和“商业”、“政治”发生了关系，失去了它那应有的超越近功小利的自由精神，作家与作品，都牵牵绊绊于商场和官场的得

失打算中，毁去了“五四”以来读者与作者所建立的正当关系，而得到一个“流行点缀”的印象。因此凡从商场与官场两方面挣扎而出，独自能用作品有以自见的，这个工作在当前或被人认为毫无意义，在将来将依然具有庄严价值。我们只有一个“今天”，却有数不清的“明天”！支持市场点缀政策的固然要人，增加文学史的光辉，以及叙述民族发展形式的工作，还要更多的人！拿笔的能忘掉作品“出路”，他也许会记起些更值得注意的问题！

你办事想不十分忙，尚可读书写作。国家多忧患，一个人把书读来读去，有时必感到疲倦，觉得生命与历史已游离，不相粘附。一个人写来写去，如停停笔看一看面前事事物物，恐也不免茫然自失，会疑心自己一切工作，“究竟有何意义？”但尽管如此或如彼，这个民族遭遇困难挣扎方式的得失，和从痛苦经验中如何将民族品德逐渐提高，全是需要文学来记录说明的！但一切抽象名词都差不多已失去了意义，具体事实又常常挫折到活下来的年青人信仰，并扰乱他们的情感时，在思想上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热情和信心的，还是要有好文学作品！好作品的产生，我们得承认，必然是奠基于作者人生知识的渊博和深至，以及忠于其事而不舍那种素朴态度上。事情得许多人来努力，慢慢地会有个转机的！

本篇发表于1942年10月15日《文学创作》第1卷第2期，署名沈从文。原题为《为什么写，有什么意义——新废邮存底廿五》。

十二 给驻长沙一个 炮队小军官

××：

得你信，很久不回复，因为从附来相片看，实在想不起那么一个胖胖的小军官是谁。直到今天我这里来了另外一个漂漂亮亮小军官，他叫×××，刚从缅甸突围走回，谈起家乡中年青人时，才知道你们是同街坊的小伙伴！我还以为田家儒圆八一三驾坦克车在上海作战，一直冲到杨树浦江边，车辆被烧后还能回来，算是家乡小英雄模范，想不到同样的小英雄还很多！

闻你叔叔升了团长，照他的为人说来，也许还应当升师长、军长。民国八年我和他在沅陵总爷巷一个小衙门里作小事，他就有个军官派头，大家又穷又脏精神可极好。现在轮到他来带一千人和敌人作战，自然应当更有精神的！他若升了军长时，说不定我会到他身边来作个“教练官”。这个位置比我在大学校还相宜。我的理想是要教教小军官在炮火中那点“学习”精神，会读会写，每个人都还有升学的远志和雄心！这事情对你们说有些困难，我很明白，可是慢慢地努力

总可做得到的。日月江河还是时间做成的，人要向上就必然可战胜环境。

你既然当炮手，若不是时时刻刻放炮，每天就很可抽出一二点空闲来学许多不是放炮用的知识，或与放炮有关的高深知识。当年拿破仑^①也是个炮手，如不用脑子，不过永远是个炮兵小军官罢了。凡事无妨从小处着手，做人勇敢，做事认真，莫吃烟酒，更莫只想吃肥肉。二十年前伟人多大胖子，到走路时自己搬不动自己身体，就特别被人敬畏，认为是天生福相福气。现代伟人可不同了，要能跑能跳才够，太胖了是容易成为目标的！无事时能把字写好，又敏捷又整齐，将来升学对你有好处。我看不惯流行“伟人字”和美术字。还是应该让张飞、张宗昌^②写伟人字，三脚猫艺术家写美术字，你就为准备升学来写“记笔记”作战时抄“报告”的普通字吧。

你说到装备能增加士兵勇气，一个新上战场的士兵，头上有顶钢盔也许在勇气和虚荣上都有点儿作用。至于一个现代军官，单是头上有钢盔并不济事，还要同时武装那个脑子才够格！钢盔只能防备流弹，可并不能抵抗社会中流行愚蠢有毒的观念和打算。流弹不可怕，随时随处都可以发现的糊涂小气才是最可怕东西！在军队中多有几个钱，能用来买书读，比买自来水笔或镶金牙齿有意义多了。要能管自己，从小处又严又狠地来管自己，要学习，从各方面学习，这才像是个理想军官！

你羡慕“教授”，二十年前我和你爸爸一辈人，在军队中混日子，糊糊涂涂地玩下去，耽误了正经事，所以才轮到如今不文不武地来在普通学校中教书。教授有什么稀奇？我看

到过一些专家教授，在五年战争中，受不住生活变动的试验，精神萎靡，一切国家向上理想，都随同他个人生活的不稳定而失去，就只会用玩牌赌博消遣日子，唯一希望是等待和平回家。这种人目前过日子方式，实在是不值得羡慕的！学术知识可尊重，因为一般学术知识的发展，正可表示这个民族的进步。至若知识与做人气概脱了节，对国家无信仰，对战争逃避责任，这种人的知识，平时既造成了他过多的特权，战争时且作成他一种有传染性的消极态度，在学校即使大学生受坏影响，在目前社会，真可说是毫无用处的！为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患难中，想挣扎，想翻身，最需要的就是从大处看从远处想的做人气概！知识阶级有些不争气的，也有些特别值得敬重的。照例用“时间”来淘汰，十分公正！凡知自尊自重又永远有青年精神，对个人工作十分认真，对目前环境挫折永不消极的，必然得到世人应有的敬重。因为这也是一种勇敢战士！此外低能的、生性懒惰的、工作成就拿不出手，在埋怨中颓废下来，活得恹恹无生气的，可说是精神上的败北之士。即或会涛张为幻，逢迎投机谋个一官半职，在应景凑趣场合中也好像活得有声有色，其实不过三五年，还不是原来叭儿狗原形出现。正因为一切的逐渐进步，终会把这些人丑处和不中用处显露的。

过去的人物，过去的希望打算，都应当随同一去不返的时间，完全成为过去了。这回轮到你们来奋斗作人，给历史上见出一点奇迹了。打了五年仗，年青人在炮火经验当中，虽事事都见出可乐观的征兆，可是空洞乐观并不能应付事实。事实是在一切职务上，国家设计上，抵抗敌人的火力或修正习惯上弱点，都需要万千优秀青年来担当分内事情。所以凡

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就一定要好好地有计划地来活几十年。我们和敌人有形战争，也许三五年内因国际局势好转转劣都可以告个结束。另外民族与民族间，却有个永远不能完结的无形战争！谁个民族能团结向上，谁就存在，且活得又自由又尊严。谁个民族懒散而不振作，谁就败北，只会在奴隶身分中讨生活。三十年来社会方面有人把事情稍微做得好一点，有点小小成就，就给你们许多鼓励，增加不少求生存求上进的勇气和信心，你们假若一切作得更好些，岂不是对年青一辈有更大帮助？

凡事得慢慢来。“信仰”是要靠“韧性”来支持，不能单凭“冲动”来表现的。湖南人单纯性急处于事实无补，只作成到处冲突精力对销的机会。一个新的湖南青年，若不参加“政治”并不可羞，若缺少做一个新中国青年的气概，才真正可羞！

所谓湖南精神若只知“打仗”或“打架”，那未免太小了。我以为真的湖南精神应奠基于做人态度。要紧处是对工作理想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放松，谈改造尤其是能用耐心和勇气去求实现。努力时永远不灰心，学习中永远不自满，小小成功永远不自骄，困难来临时永远有办法去克服战胜。重视“人”而不迷信“神”。明白国家转好，完全出于多数人的意志，大家只要有信心和勇气，修正一切积习上的错误，自然免不了有牺牲，个人不幸被这种除旧布新的战争毁去了时，就沉默地死去，让更年青更结实的填补上去。若经营的是一种新的职业事业，不幸破了产时，也如此不声不响，休息一会儿再想办法重新做起。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新湖南精神”！这点精神在长沙三次战役中，新军人方面已有了充分表

现。我们还应当努力表现于其它各方面。我相信这是办得到的！

云南局面虽紧而不紧。向缅边前线补上去的部队，士气都很旺，相信可以把敌人打败。在城市中传述谣言的，多是发财太多或贪心不足的商人，有的想在谣言中走路，有的又想从谣言中发财，所以川湘两地都传说昆明有一时节已炸平，事实上近九个月来，我还不曾见日本飞机在市空上飞过。谣言说昆明人已跑光，事实上新来的人想找个住处即不容易。且以联大一校而言，就依然还有三千学生照常上课，照常打球，照常演戏，而且还有少数顽皮学生，照常为同学起绰号，像你那么一个人，就会有人叫你做“迫击炮弹”，恰恰如像别的什么女人应分叫作“航空母舰”一样。他们日子过得相当苦，精神却并不坏。使人苦恼的不是敌机敌人，倒是当地法币多，以及当局对这种游资的活动无从控制。虽有数万万游资，只闻在有限现存货物上转手增加物价，从不曾有人用过十万块钱到出版业上投资，增加多数人一点理性或知识。二十万人口大城市中，除了四家报馆，只有一个定期刊物，还是从国家拿钱，带点救济性敷衍下去，完全缺少学术上自由批评检讨的精神，俨然只为装点场而而存在。比起桂林五十个印书的书店，五十种期刊向全国各处分布，二十家报馆，供给本市需要，我们也就大略可以看出一点“钱多也要会用”的情形来了。若不会用钱，在家庭或社会，是都只能造成一种不必要的纷乱，丝毫无补于实际的。随同商业荣枯而流行的谣言，虽能增加一点生意人的财富，和神经不健全分子的悲观（再增加他们用胡闹消磨生命的理由），然而对明白责任、且不失去做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的年青人，是不会有更多

少作用的。这也正如伤风嗝食一类小病小痛，对于你那么一个体力极健的小军官无作用一样。

卅一年九月昆明

本篇发表于1942年10月15日《文学创作》第1卷第2期。署名沈从文。原题为《新湖南精神——新废邮存底廿六》，收信人“××”为“一葵”。

① 拿破仑 法国政治家、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及百日王朝皇帝。

② 张宗昌 奉系军阀，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人据山东。

十三 明日的文学作家

从辛亥革命起始，中国算是一个民主国家了。可是自从满清帝国被推翻后，依傍到这个组织建立的一切有形制度和抽象观念，似乎同时也就崩溃消灭了。新的国家的权与位，于是只在一群知识不多贪心又大的北洋军阀手中转来转去，如此十年后，国家元气消耗，便在一个不堪设想可怕腐败情形中，勉强继续存在。当时派往各国的公使，竟靠私自借钱度日子。保卫北京皇城广场的内务部，竟可随意拆卖皇城墙砖，作为部中开支。即以最应明理懂事的教育部而言，将京师图书馆的善本书抵押到银行去弄钱发薪水，当时社会也不以为奇。至于军人，自然更无事不可为了。物极必反，事理之常。这个转机的基础，想不到却建立在几个读书人身上

当时就有三五个读书人，想用文字作工具，将国家重造的理想，质诸多数国民。他们的方法，是从文字着手将工具重造后，再将工具重用，用到追求几个抽象原则上面，争自由，争解放。……这一切问题在书呆子方面，原本虽近于空想，注入到更年青一辈生命中后，不久便成为一种行为。因

之“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思潮，二而一，即燃起年青人做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随着“五四”影响，在广东方面，国民党也就有了新的觉悟，将建党建军当成一件事，重新加以试验，因之就有北伐。革命军能用极少数兵力，在长江中部取得优势地位，终于使北洋军阀解体。

可是正若这个国家恶运灾星尚未脱尽，军阀虽解体，民国十余年来所培养的专横负气自大贪得的军阀气质在一部分军人心胸中犹有作用。再加之从“五四”起始，书呆子的幻想，漫无所归，无所不在。一部分幻想实奠基于苏俄革命方式，这种空洞理想先既在中层分子的读书人中发生作用，后复在平汉线铁路工人与上海机器工人与一部分兵士生命中见出影响，因之又即有北伐成功后种种分崩离析。如广州之焚杀，长沙之焚杀，^①阎冯在陇海一场大战，以及江西一隅某种势力五六年的负隅自固。即以年青人和壮丁牺牲而言，也在二百万以上，这些严重的事实，想起来就够令人痛苦！

正因为这个痛苦教训，刺激到能思索的各方面，也就应了那句陈旧格言，“多难兴邦”。即在朝的负责者，和在野的知识分子，能够就现象加以检讨，找出症结，并计划出种种方法与技术。“九一八”事变，虽突如其来，其实有个因果，正反映出恶邻对我民族觉醒的一种恐惧和忧虑。因有所忧惧，便只想捡点小便宜，来个措手不及，得多少是多少。且满以为我国遭遇新的挫折，必可产生新的分裂与混乱。凡于我有损必于彼有利。用心之狡狠，无不见倭奴趁火打劫习惯，三百年如一日。可是料不到事势却又适得其反。

“九一八”以后，负责者虽处于一种新的困难中，试验耐

心与能力，然而爱国团结号召下，最先即得到了普遍国民的信赖与拥护，从共同应付困难战胜困难努力表现中，重新见出一点光明。江西局面的崩坏，年青军人的进步，知识阶级的合作，政府各部门专家的逐渐抬头，在在都说明这个国家的重造，是可能的。重造的希望，是从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生长中也可见出的。虽因租界关系，尚包庇得二三空头政治家，利用“爱国”口号作种种活动，其誇張为幻作用，似亦惟在租界内，对于多数国民终亦无所售其技。福建人民政府的喜剧结束，西安事变的简单明朗化，都表现国民多数向心力所在，已日趋一致。谁分裂国家团结，谁即是罪人。谁在国力增加上有办法，谁即得信仰。因此到了二十六年的夏天，我们才又被恶邻强迫来接受一种新的课题，即在中国土地上，发动一次历史上空前的战争。

我们要站起，就决不会为他人从妒嫉出发而加于我们的威胁吓倒，这是极显明的！所以战争起始时，虽显得我国在军事准备上极不充分，可是终究很勇敢地接受了这种挑衅，奋起应战。在战事发展中，虽陆续将沿海各省和长江中部的名都大城学校工厂毁尽，使得全民族四分之一的人口转徙流亡，四万万五千万人生活起了空前绝后变化，各在艰苦困难中忍受战争带给我们的教育。可是五年半过去了，我们不仅无败北丧气感，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转而日益增强，国家要重造，能重造，不必待战争胜利结束时用建设来表现，事实上从××万青年壮丁应付战争生活的方式上，以及从军队中学习态度上，也就业已办到了！

这些壮丁全部分都是从国内各地农民中征来，有些人伍时年龄还不过二十岁，可说是从炮火中慢慢长大的。先前多

一字不识，一事不知，二三年后，却已经有多数人能读书看报，且明白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深知从战争英勇表现上，和战争以外学习表现上，如何尽一个国民的义务了。就眼前的近事取例：昆明城郊是炮火所不及的地方，驻防部队且多流动性质，这种部队日子过得简单而艰苦，然而有条理，知爱好，是有目共见的。无事可作时，用修工事热忱来整顿环境风景，都若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我把这件事问及一个最近参加某线军风纪考察团的朋友时，那朋友却说，“还并不仅是昆明情形，即最前线也还好好保留这种习惯，在民众间起领导作用”。这种情形虽若平常细微，但试想想看，这××万有训练有知识的壮丁，复员时遣散到国内各个小乡村里去，若事事尚保留一点军人爱好作风，起领导作用，对将来国家重造，所能引起的良好影响，会有多大！

记录这个国家重造过程中各方面的贡献，足供十年后国人参考的，应当是有历史家感兴的文学作者的事情。这工作既伟大，也艰难，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太广，问题太大，原因太复杂。若就过去当前成绩说来，去实际实远。既以中日战争前后国家大事作题材，用新闻记者叙事笔调来写这个发展过程的，如萧乾先生记载滇缅路的修筑，以及中央社扫荡报记者对武汉外围战种种报告，某某君南京陷落后十日报告……，都留给读者一种深刻印象。用小说来表现的，年青作家中如骆宾基、黄碧野、刘白羽、田涛、姚雪垠诸先生，也同样有许多优秀作品产生。惟这类作品的成就，都若有个限度，记者的笔照例在事件发展上着眼，只见事，缺少人，当时得到效果，事后读来即少意义。作家又多侧重在故事组织上着眼，且有装点战争情感掺杂，描绘英雄容易，有声有色，

刻划平凡即感觉棘手。至于综合景物与人事，好好加以处理，忠忠实实恰如其分地来从一个作品中写出一个时代历史场面或一群人的生命发展以及哀乐得失式样的宏章巨制，似乎就还待另外一种作家来努力，方可望从作品中见出必不可少的大和深。正因为本身从炮火中接受这分庄严教育，且在变动中生长，深切理解人与人关系的变迁，以及个人理想和多数愿望在发展中所遭遇的挫折，并熟习应付困难战胜环境的经过，换言之，即必需“活”到这个历史每一章每一页中，才会有“写”出这种人类迎接命运向上庄严历史的可能！这种年青朋友在目前，是从任何一个部队中都可发现的，或因勇于学习，或因忙于其它工作，当前尚无从事写作的兴趣，然而他们的存在，将来终必有一日能有机会来好好使用手中这支笔，来叙述这个民族新生奋斗的经过，是毫无可疑的！

同学朱先生，把他的朋友宣傅焘先生一本小书给我看，读过后，使我保留一种印象，即作者从生活讨经验的勇敢和热忱。对新环境的适应性，以及就环境中景物人事的理解鉴赏情趣，带抒情气氛地学，更加上那分接受忧患不以为意的年青人健康态度，都可见出若准备来从事这个伟大工作，是有希望可以慢慢完成的。正当他这个小册子出版时，把我这种感想写出来，作为本书序言，也作为我对于生长在战争中一切年青陌生朋友，一种普遍的尊敬与期望。国家在重造，新文学也在重造，目下为前者努力，明天还可为后者作同样有意义贡献。国家在新生长成中，文学作者也在新生长成中，培养他们需要的是同一泥土，即修正错误的勇气，和成功的信仰。关于这一点，我相信也不大成问题，使我稍稍感到忧虑的，即完成这个工作不可免的长时期寂寞，是否能忍受？

只为此的工作虽具体，却需要的是一种追求抽象的人格或性格，比起其他事业来，实费力而难于见好！但想想这也正是一种“战争”，就应当不会气馁了！

三月廿一呈贡

本篇原载报刊不详。

① 广州之焚杀 指 1927 年广州“四一二”政变。

长沙之焚杀 指长沙“马日事变”。

十四 美与爱

宇宙实在是个复杂的东西，大如太空列宿，小至蜉蝣蝼蚁，一切分裂与分解、一切繁殖与死亡，一切活动与变易，俨然都各有秩序，照固定计划向一个目的进行。然而这种目的却尚在活人思索观念边际以外，难于说明。人心复杂，似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目的却显然明白，即求生命永生。永生意义，或为精子游离而成子嗣延续，或凭不同材料产生文学艺术。似相异，实相同，同源于“爱”。

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必觉得那点光与色，形与线，即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人类的智慧亦即由其影响而来，然而典雅词令和华美仪表，与之相比都见得黯然无光，如细碎星点在朗月照耀下一样情形。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能低首表示虔敬。正若因此一来，虽不会接近上帝，至少已接近上帝造物。

这种美或由上帝造物之手所产生，一片铜，一块石头，

一把线，一组声音，其物虽小，亦可以见世界之大，并见世界之全；或即造物，最直接简便那个“人”。流星闪电于天空刹那而逝，从此烛示一种无可形容的美丽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出那种圣境。一个人的手足毛发在此一闪即逝更缥缈的印象中，并印象温习中，都无不可见出造物者之手艺无比精巧。凡知道用各种感觉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永生不灭。屈原、曹植、李煜、曹雪芹，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篇章，保留得完整的几个人，这些人写成的作品，虽各不相同，所得启示必古今如一，即被美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

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①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惟宗教与金钱，或归纳，或消蚀，已令多数人生活下来逐渐都变成庸俗呆笨，了无趣味。这些人对于一切美物，美事，美行为，美观念，无不漠然处之，毫无反应。于宗教虽若具有虔信，亦无助于宗教的发展；于金钱虽若具有热情，实不知金钱真正意义。

这种人既填满地面各处，必然即堕落了宗教的神圣性庄严性，凝滞了金钱的活动变化性。这种人大都富于常识，会打小算盘，知从“实在”上讨生活，或从“意义”“名分”上讨生活，捕蚊捉蚤，玩牌下棋，在小小得失上注意关心，引起哀乐。生活安适，即已满足。活到末了，倒下完事。这些人所需要的既只是“生活”，并非对于“生命”具有何等特殊理解，故亦从不追寻生命如何使用，方觉更有意义。因此若有人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美特具敏感，即自然将被这个多数人目为“痴汉”。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

疯狂，为恶徒，为叛逆；换言之，即一切不吉名词，无不可加诸其身。对此消极的称为“沾染不得”，积极的为“与众弃之”。然而一切文学美术以及多数思想组织上巨大成就，却常常惟这种痴汉有分与多数无涉，则显而易见。

世界上缝衣匠、理发匠、作高跟皮鞋的，制造胭脂水粉的，共同把女人的灵魂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本性，亦恰恰如宗教、金钱，到近代再加上个“政治倾向”，将多数男子灵魂压扁扭曲所形成的变态一样。两者且有一共同点，即由于本性日渐消失，“护短”情感因之亦与日俱增。和尚、道士、会员、议员……，人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得十分庄严，事实上任何一个人却从不曾仔细思索过这些名词的本来意义。许多“场面上”人物，只不过如花园中盆景，被所谓思想观念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不表现出对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抽象和人的愚心。然而近代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大多数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予说明与界限。这也就正是一般名为“思想家”的人物，日渐变成政治八股交际公文注疏家的原因！更无怪乎许多“事实”、“纲要”、“设计”、“报告”，都找不出一一点依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立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美术，背后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换言之，即“神的解体”！

神既经解体，因此世上多斗方名士，多假道学，多蜻蜓点水的生活法，多情感被阉割的人生观，多阉宦情绪，多无根传说。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堆牛粪，在无热无光中慢慢燃烧，且结束于这种燃烧形式，不以为异。本来是懒惰麻木，

却号称为“老成持重”，本来是怯懦小气，却被赞为“有分寸不苟且”，他的架子虽大，灵魂却异常小。他目前的地位虽高，却用过去的卑屈佞谀奠基而成。这也就是社会中还有圆光、算命、求神、许愿，种种老玩意儿存在的理由。因为这些人若无从在贿赂阿谀交换中支持他的地位，发展他的事业，即必然要将生命交给不可知的运与数的。

然而人是能够重新知道“神”的，且能用这个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现象的扩大，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启迪的。

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五月又来了，一堆纪念日子中，使我们想起用“美育代宗教”的学说提倡者蔡子民^②老先生对于国家重造的贡献。蔡老先生虽在战争中寂寞死去了数年，主张的健康性，却至今犹未消失。这种主张如何来发扬光大，应当是我们的事情！

本篇原载报刊不详。

① 泛神情感 源于泛神论。泛神论是一种将神融化于自然界的哲学观点，主张万物皆神，否定超自然的主宰或精神力量。

② 蔡子民 即蔡元培。

十五 论投资

去年二三月间，正当滇边路上五千辆汽车络绎不绝将印
缅各种物资对流时，我有个在市商会任职的朋友，见猎心喜，
带点凑热闹意味，也筹了一笔款，和几个同伙跳上了一辆出
租卡车，参加这个活动。不多久，许多人都白手起家了，问
问这朋友的经营如何，才知道二十万资本，全搁到一种货物
上，等待主顾，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脱。朋友究竟是个
读书人，即做生意也依然从书生立场着眼，现在商会供职，
明白本市需要什么，为什么却异想天开，别出心裁，却投资
到“文化”物品上去？物品到了地，当然无从找寻主顾，因
此把手中一点点本钱，冻结在一批“不切实用”货物上。过
了三个月，桂林失守，东东西西物价下落，朋友担心拖下去
会更加受损失，不易填还债款，因此赶忙抛价脱手。事后将
本利一结算，不多不少，赔了五万七千。这一下经验，对朋
友倒不无好处，弄明白了“投资”是商人的技术与智谋的协
作玩意儿。读书人若还保有一点书生气或书呆子气，想来有
所经营，是不容易见好成功的！

不过用法币经营商业企图增加法币的幻想，虽已打破，正如古人说的“塞翁失马”，还可将“生命”投资到另一方面去。生命投资不问成败得失，但看有无意义。因此一年来，朋友生活得似乎还满有精神，荷包中虽不如许多人胀胀绷绷的，精神上却表现一种神奇健康光彩。同道中或尚有人把他的商务经营失败，茶余酒后当作笑料，我却觉得在做人方面，这朋友毫无可愧怍处。

又两年前的几个朋友，眼见大学里不少青年学生，为了生活出路的忧虑，一齐向“政经系”跑去时，这些有雄心和远志的朋友，都深刻感到社会的沉闷，和个人对于社会关系的密切，以及重造这个关系的信心，恰好得一个善于投资的银行家合作。这合作方式，是朋友把生命投资到年青人方面，写写文章，为“多数”读者打打气，并给读者创造个新的健康活泼人生态度，好应付将来。对我们投资的某公，就出点钱，便于将我们文章一一印出。办法本十分平常，真应了“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两句口号。可是给普通社会看来，自然是不免有些怀疑的。因这个墨家态度墨家行为和社会习惯似乎不大相称，不易理解。社会既不能理解，自然便多离奇的传说。加之有些朋友文章所表示的意见或观念，又似乎对于一种裙带政治（官僚万能政治）有点冲突，然而在一般读者方面又保留个大刀阔斧坦白痛快的印象，所以过不久，一切必然发生的事就完全来到了。首先是投资的要计数一下抽象利息，意即这刊物与他的关系如何，其次是被投资的要估量一下作用。……直到后来有人报告上去调查下来为止，我个人就始终活在一个简单基本信念中，完全想不到对于“多数”读者有益的事，对于另一方面会有什么损失。“调查”

既已到来，朋友中有几个懂“政术”的，知道机会已临头上，得失出路全看自己表示。所以短期间刊物停顿结束，这些朋友却各个成为重庆官场中新伙计一员。用金钱投资到我们名分上的可说已完全失败，至少在他个人感觉上，恐怕算是失败了。用生命投资到年青朋友“人生观重造”上的，都俨若在识天命畏天命的从权方式中，皈依受戒，有了个安身之处。至于我呢，正如杀猪的王屠户，出股分买猪的东家，“本钱”既已收回，扯脚捉耳刮毛开肚的伙计，又都散了伙，换好新衣去赴会吃喜酒。空坪中只剩下我一个人，却依然在想象我应当如何来继续弄下去。我那么打量：有钱的，固然无妨把千万资本投资到一切生利的事业中去，没有钱徒有理想的，似乎也还可望某种高尚理想，在更年青的生命中发芽生根，郁郁青青！民族品德的重铸，若不是“法币”办得好的工作，说不定就还得要“热诚”来完成！然而想到一个“思想家”在用一种阿谀神气解释“英雄崇拜”后，一点钟的谈话，即领取二十万元法币，供其余“思想家”随意花用，回过头来我却不免被小顽童追问：“老兄，你的热诚值几文一斤”时，自然不免茫然若失。因在事实上，热诚在市价方面都是一文不值的，这是个古典名词，于实际人生，是无意义可言的！我仿佛在一种明亮灯光下，亲眼看到一些衣冠整齐的男女，脸上现出从容欢乐的颜色，一面轻轻吹口哨，一面用极溜刷牙式分散扑克牌给其余同座时，就想起一个离奇问题，将二十岁左右的有用生命，每夜集团投资到这个玩意儿上，这种不经济的耗费，是谁设计作成的？应当归谁来负责？是个人的羞辱，教育的失败，还是国家的损失？很明显，这个问题是不大钻入到思想家脑中，当成一个问题，也不会钻入年青

人脑中，引起年青人对自己生命价值怀疑的。一切在“承认现实”情形中，都那么镇定，我却独自大惊小怪，是不是真如桂林某刊物上说我的，只是“受不住战争试验”，“神经有点儿失常”？我似乎相当害怕这些人之一，会站起身来学小顽童追问我，“请问老兄，热诚值几文一斤？”照例必赶忙走过。我受得住战争试验，可实在受不住年青朋友这种试验。若说话不犯公私忌讳，这情形实在太可怕了！这是中兴鼓吹？还是中兴闲气？我们能为一个平常事件大嚷，大闹，大哭，大笑，虽不免被通人溢为“幼稚”，但从幼稚中究竟还见出一点生气。在比较沉静反省下，即可认识求生存待发展的生命意义和价值。若我们只会用一种幽默自解，如此从集团方式来养气，来否认政治上的现实，在军事上即或不久便可望完全战胜了敌人，在别一方面，是不是将会近于打了个更大的败仗？十五年前一个普通“官僚”，也许会认为国家是用随身“副官”、“师爷”、“庶务”三种助手，加上他个人的“威风”，即可望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现代大学生，是应当明白要国家转好，得靠一大群“专家”共同努力来处理方有希望的。我们跑到正义路时，可以说因为手中空空无所有，想做什么都不成功。我们若在学校，就会发现手和眼睛和脑子还有些用处！我们在共同沉默中忍受战争，为什么忍受？要翻身，怎么样才能够翻身？课室中我们“记”这样那样，课室外是否还能限制我们不许“想”这样那样？当我们偶然想起一些“抽象原则”或“具体事实”觉得痛苦感到软弱时，是鼓起勇气来战胜环境、重造环境，还是将一切支撑自己作人的壮志和雄心撤去，听其随波逐流，浮沉于当前习惯此后机会中？

我们都明白小商人投资常常近于无眼光，无计划，只知在市场上将有限货物转手，造成物价高涨现象，却不大关心个人生命，同样无计划的投资到某一种行为上，对国家明日可能造成什么坏影响。

我们做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倘若并未因生活上一点穷困失去时，会觉得可做的事，实在还很多，应当想办法来好好使用这部分剩余生命，也一定有办法用得比桃花杏花王子皇后竞赛中有意义得多。然而这个投资的设计，应当归谁来负责？是上帝还是青年本身？

十六 读书人的赌博

“关于知识阶级，最好少说话。察渊鱼者不祥。”

“是的，老师。不过这是我两年前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的玩意儿，从没对人提起过！现在读书人变了。”

“你意思是他们进步了，还是更加堕落？”

“老师，我从不觉得他们堕落，因此也不希望他们进步。我只觉得他们是有头脑的人，以为不妨时常想一想。只要肯时常想一想，国家就会不同得多了！”

当我翻到《关于知识阶级》一段小文预备摘抄时，仿佛和骑青牛懂事故的老子，为有趣那么一个短短的对话。……作新烛虚一。

我想起战争，和别人想的稍有不同。我想起战争四年还未结束，各个战区都凝固在原有地面，像有所等待的神气。在这种情形中，前方后方五百万兵卒将士，或可即用战地作教场，学习作战并学习做人，得到不少进步。国家负责方面若像我一样思索到这个问题，想到这五百万壮丁将来回转他

们那村里的茅屋中时，即以爱清洁有条理的生活习惯而言，对于国家重造所能发生的影响，可能有多大，就一定会想出许多方法，来教育他们，训练他们，决不至轻轻放过这个好机会了。这自然是我这个书呆子的妄想！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会那么胡思乱想的。

以“教育”两字而言，目前即似乎还是学有专长读书人的专利。读书人常说“学术救国”，可不相信壮丁复员后，除了耕田，有别的用处更能救国。这事情也极平常，因为许多读书人对于自己的问题就不大思索，譬如说吃教育饭的读书人，在目前战争情形中，是不是在教书以外，还想到如何教育自己？打了四年仗，世界地图都变了颜色，文化经济都有了变化，读书人有了多少进步？应不应当进步？我们且试为注意注意，有些现象就不免使人吃一惊，因为许多人表现到生活上，反映到文字上，都俨然别无希望与幻想，只是“在承认现实”的现状下，等待一件事情，即“胜利和平”。好像天下乱“用不着文人”，必待天下太平，那时一切照常，再来好好努力做人做事也不迟！战事结束既还早，个人生活日益逼紧，在一种新的不习惯的生活下，忍受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试验时，于是自然都不免有点神经衰弱。既神经衰弱，便带点自暴自弃的态度，因之“集团自杀”方式的娱乐，竟成为到处可见的情形。这类人耗费生命的态度和习惯，幽默点说来，简直都相当天真，有点返老还童的意味！正像是对国家负责表示：“你不管我们生活，不尊重学术，好，我也不管！”所以照习惯风气，读书人不自重的行为，还好像含有不合作反抗现实的精神，看不惯社会的不公正，才如此如彼。负军事责任的，常说只要有飞机大炮，即可望有把握打个大

胜仗，料不到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行为，恰恰就表示在民族精神上业已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败仗。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却似乎和目前许多别的问题一样，不许人开口。触事多忌讳，不能说。用沉默阿谀事实，竟是必要的。或有人看不过意，要提出讨论讨论，或想法改善，结果终亦等于捕风，近于好事。好事过分或热心过分，说不定转而会被这些读书人指为有“神经病。”以为不看大处看小处，而且把小事放大，挑剔自家人何苦来。“小子何知，吾人以此自溷耳。”因此一切照常。

这种知识分子，事实上对生命即无一较高的理想或目的，必用刚正牺牲精神去求实现，生活越困难，自然越来越不济事。消极消极，竟如命里注定，他人好事热心，都是多余了。不过我们若想起二十年前，五四前辈痛骂遗老官僚为何事，真不能不为这种“神经衰弱”的知识阶级悲悯！

我于是妄想从病理学上去治疗这种人，由卫生署派出大批医生给这些读书人打打针，从心理学方面对付这种人，即简简单单，当顽童办理，用戒尺打手心。两个办法中也许后面一法还直截简单而有效果，为的是活了三四十岁的读书人，不知尊重自己，耗费生命的方法，还一如顽童。不当顽童处治，是不会有作用的！

细想知识阶级的过去，意忽有所悟。这类人大多中产家庭出身，或袭先人之余荫，或因缘时会，不大费力即得到当前地位。这些人环境背景，便等于业已注定为“守常”，适宜于在常态社会中过日子。才智聪明，且可望在一有秩序上轨道的国家中作一有用公民，长处是维持现状，并在优良环境中好好发展。

不凑巧就是他们活在当前的中国，战前即显得有点不易适应，他们梦想“民治主义”，可是却更适宜生活在一个“专制制度”中，只要这专制者不限制他们的言论，并不断绝他们的供给，他们赞同改变一切不良现状的计划，可是到实行时，却又常常为新的事实而厌恶，因此这些计划即使可逐渐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还会用否定加以反对与怀疑。可是反对与怀疑尽管存在，一面又照例承认事实。在事实上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只要不饿坏他们，总可望安于现状活下去。虽活得有点屈辱，要他们领导革命，可办不到。所以过去稍有头脑的军阀，当前的有手腕的政客，都明白不必担心知识阶级不合作。这些人目前也有好处，即私人公民道德无可疵议，研究学问也能遁序渐进慢慢见出成绩，虽间或有点自私，所梦想的好社会，好政治，都是不必自己出力即可实现，而且不能将生活标准降到某种程度，可是更大的好处，也许还是他们的可塑性，无所谓性，即以自我中心出发，发展自己稳定自己的人生观。因此聪明的政治家，易于运用他们的知识和社会地位，从事政治上的一切建设。不必真正如何重视他们，但不妨作成事事请教的神气，一半客气用在津贴研究费上，即可使他们感觉当事者的贤明。如运用得法，这些人至某一时无形中且会成为专制的“拥护者”，甚至于“阿谀”。正因为这些人在某一点上，常常是真正“个人主义者”，对国家“关心”相当抽象，对个人生命“照常”却极其具体。书本知识虽多，人生知识实不多。至于牺牲地位，完成理想，或为实证理想，自然是不可能的。话说回来，这些人又还可爱，可爱处也就是在他那种坦白而明朗的唯实哲学，得过且过的人生观，老实性格，单纯生命在温室中长大而又

加以修理过的礼貌仪范。读的书虽常常是世界第一等脑子作的，过日子却是英美普通公民的生活打算。……

我好像重新明白一个问题，即前面所说，遇到这种人不自爱与不自重时，就打手心的办法了。因为这么一种人活到当前变动社会中实在是一种悲剧。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幻想，已完全毁了，完全给战争毁了，读书由于分工习惯，除了本行别的书又无多大兴味，他们从“集团自杀”方式上找娱乐，还能做什么？我幻想廿年后国家会有个新的制度，每个中国人不必花钱，都有机会由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到那时，所谓“知识阶级”和“政客”，同样已成为一个无多意义的名词。国家一切设计全由专门家负责，新的淘汰制度，却把一切真正优秀分子，从低微社会中提出来，成为专门家的准备人材，到那时，对于知识阶级，将不是少说话，却是无话可说，那就太好了。

三十二年四月 改

本篇原载报刊不详。

新废邮存底续编

新 废 邮 存 底 续 编

XIN FEIYOU CUNDI XUBIAN

本集为新编，收作者《废邮存底》和《云南看云集·新废邮存底》之外，还收写于1949年之前并公开发表的“废邮”及相关附录38篇，共43通。集名《新废邮存底续编》，为编者所加。

致施蛰存函

蛰存我兄：急就章直到今日为止，尚未完篇，十分罪过。二期月刊我恐怕只能充一读者，无从将稿件赶上付印，特复，并致歉意。

弟 从文 顿
四月廿九日

本篇 1932 年 11 月 1 日以手稿形式发表于《现代》2 卷 1 期，原题《沈从文手札》；1945 年 6 月 1 日《文艺春秋丛刊》之四又以《致施蛰存》为题发表此信。署名沈从文。原信写于 1932 年，现用题为《全集》编者所加。

施蛰存 现代作家，时任《现代》主编。

致王云五先生

拙作续写下去，便为胡也频死前死后种种，惟涉及此类事时，照所经过记下，字数或较之预期者为多。因之对于贵刊久载此文，是否能引起读者兴味，思之颇为疑惑。……

此文因综合其人过去生活各方面而言，间或叙述中复作推断与批评。在方法上，有时既像小说，又像传记，且像论文。体裁虽若小说，所记则多可征信，即秩序排比，亦不混乱。故私意此文以之作传记读，或可帮助多数读者了解此女作家作品与革命种种姻缘；以之作批评读，或较之其他批评稍能说到肯窍。然此种写作方法，究属试作，处置题材文字时，虽十分谨慎细心，惟其得失，一己乃毫无把握……

本篇属作者致王云五信的片断，见王云五《关于〈记丁玲女士〉》一文，刊于1933年8月14日《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原信已不可得。按相关资料推断，此信当写于1933年8月上旬。

致一个作者的公开信

先生，谢谢你的来信。某君信寄还。你要我作的不知是什么事。是不是说应当多写点小论文？是不是说评评《水星》^①？若说的只是要我写点对于创作的态度和意见，我本来有几篇讲演稿子，说的话也许同一般人稍稍不同。但不成，这篇文章我不想发表。第一件事就是每个人脑子乃“生活”同“一堆书”安排的，观念同情感是一片生活一堆书籍的反映。同样的生活，同样读了那么一堆书，但体质稍稍不同一些，到结果也就变成两份东西了。人与人原来很不同！你尽管相信人类应当平等，但事实上人与人有时候比人与猴子差别得还多，你得承认。我说的是差别不是智愚。我的生活同“一堆书”与人不一样，这个真如你说的很帮助了我，使我想到的写出的皆走了一条新路。这自然是事实。五年内我若不病死，十年内又还不自杀，我也想到我一定还可以在“一堆日子”里作出许多事情！我可以写出些比目前完美的文章，一定的。但我今日明日实在还不配教人，不配指导人。大多数人受过“学校教育”，我受的却是“人事教育”。受学校教育的人，作人观

念似乎就不大宜于文学，用功地方也完全不对。他们爱憎皆太近于一个“人”了。一个像人的人，同社会哀乐爱憎原应当一致的。但一个饱受人世教育的人呢，他热得怕人也冷酷得怕人。对于生活上得失既全不动心；他不要及格，他无需奖励，他有他自己；整个的有他自己。对于工作则只知死死的扣着。看书时不受书支配，却只利用书。过日子时一切不在乎。他没有伟大和渺小的感觉，也没有成功失败的快乐和失望。他听机会安排住处同饮食，这些好坏不能分他的心，可是他决不放松每一个日子。不问生活怎么样，环境怎么样，他要作的事，总得在这一天里去作。他什么都不怕，只怕糟蹋日子到琐碎意气上。他无牢骚，无恩怨。他写文章，单纯的写下去，到死为止。先生，是的，我说的是到死为止。他需要报酬和快乐，在工作上他已得到了报酬，得到了快乐。人事上成功了，与他无关，失败了，他不过问。先生，这种写作态度，一个从大学校出来的人受得了？大多数人皆太需要社会，却太不知如何爱惜自己了。多数人皆习惯于受社会上的奖惩所控制，我却劝人抛开一切，自己来控制自己，先生，这对人有多少益处？你说。其次是关于写作的思索、安排，这是用脑子的问题，比作人更难说。我想到的别人想不到，恰如别人想到的我想不到一样。这件事若我能够帮助朋友，不是我来说教，倒是用我小说同散文作例，用篇章所及的各种形式，文字所及的各种形式作例，也许对人有小小益处。另外来解释怎么写就写得好，有说教者与骗子两种人，一个人若不相信自己，就去听他们指挥好了。

如今我可以同朋友说的，不是告人如何写作，传授什么秘诀仙方，只希望大家能够单纯一点，结实一点，共同来努

致一个读书人的公开信

先生：

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很感谢你。你所说的困难我明白，我懂。这是每个编者所熟知的事情。我曾经接收过从国内各处寄来性质相近的信若干封，皆说到如下的话语：

先生，文章若可用，请你放宽容点，救救我，把它很快登载出来；若不合用，请你说明一下，什么地方不对，指导我，退还给我。

一个编辑人当然乐于作这件事。凡是能帮忙处无不愿意尽力。一个编辑应尽的责任，能尽的责任，编者从不躲避。

只是想不到一个报纸小副刊，会有那么多来稿，这小副刊的编辑，会被你们那么看得起。更想不到一个小副刊编辑，还有那么多责任和义务，这责任和义务纵有十个编者也实在担当不了。照一般情形看来，一个编辑的责任和义务，不过

是检稿，选稿，发稿而已。你们要他作的却常常是他作不到的。第一件事如“穷困”，家庭社会或政府皆应负点儿责任。它们若不能负责，就只有慈善家可以注意能够注意！第二件事是修改文章，你们目前或过去不是大学生吗？你们学校教国文教习作的先生每天做些什么事？他们工作如果不称职，你们为什么还居然让他虚拥高位？他们若偷懒，你们为什么就许他长此偷懒？

每个刊物篇幅原有个限制，经济原有个限制。编者读者和出版者三方而自然皆愿意刊物办得很好，要办好一个刊物，就不能借刊物作私人的工具，就不能作慈善事业！朋友既然爱护这个刊物，愿意把文章送来听凭编者取舍，因此每天我们这方面就得收到十件或二十件来稿。为了看这些稿件，在每一个篇章上改正一些错字，加上一点意见，退还时还得客客气气写一封信，试想想，每日得需要若干时间。你们一定想象不到一个编者为了这些事，得费去多少精力！一件事倘若当真对于旁人有益，谁不乐意来尽力？但个人能力那么小，精力那么少，有心无力的地方自然免不了。文章不合用，不得不退还，文章可用的，因篇幅太小积稿太多安排不下了，照例也只好割爱奉还，在这类情形下编者当然觉得很抱歉。但是不退还，留下来又怎么样？有时退还得稍慢了些，你们就来信质问或辱骂，（这种信我们接得真不少！）来信上常那么说，“喂，先生，你压迫无名作家，压迫天才，包办你的刊物……”那么天真烂漫把你们在这个社会里所受的种种苛刻，一起皆派给一个编辑头上。只仿佛作编辑的把你们文章一登，就一切好办。其中气焰最大，话说得最天真的，自然便是一

些在太学校被称为才子，校刊上或文学会上露过面的先生们。另外就是迷信自己是天才的先生们。先生，看到这类来信，作编辑的应微笑还应皱眉，我问你。

就编者所知道的说来，任何编辑实在皆极愿意得到无名作家好文章，皆希望从一般青年作者中发现天才。但任何编辑，若存心把刊物办得像个样子，也就决不能用刊物篇幅无限制的登载自以为天才或才子的无聊作品。

先生，你真万想不到，你们在学校里所受的作文训练，那个态度，那个方法，如何不适宜于从事创作！放公平一点说，你们在学校只是做“国文”。你们倘若真有天才，那点天才也就早被教员同教员指定要你们读的书本，以及那些名流演讲、杂志上的批评说谎，共力合作毁尽了。每个作编辑的或许皆不免有点偏见，有点私心，有点势利，然而目前国内刊物那么多，一个作者文章倘若真能达到某一个高点，这里碰头还有那里，今天碰头还有明天，出路实在并不困难。最为难的只是你们的文章，如何就能够同学校的习气离远！

你对于读了十年书写了五年文章，以为所读的书同所写的文章还无出路，不受社会注意，觉得十分不平。先生，这件事应当埋怨谁？难道这是所有作编辑的过错？谁告给过你，读十年书就可以把文章写好？谁预约允许你这个希望？学校要你读书，做做国文，你纵能背诵《项羽本纪》^①，默写《秋声赋》^②，摹仿鲁迅茅盾写过几篇小说，学徐志摩闻一多写了五十首新诗，从先生口里知道一点文坛动向文人佳话，且同时在本校周刊上写过了不少关于男女同学的小文章，以及讽刺学校当局一类小论文，这就算从事文学吗？你学的根本就

要不得，你写的也就永远不对劲。把你放到社会里去同人竞争，这失败岂不是平常得很。“从事文学”如果真如你所打算的那么简单，先生，每个文科大学生，谁不读书一大堆，谁不同你一样，他们皆早已成为大作家了。

先生，提到这件事，想起你们的命运，我很难受。就因为你们在学校，天真烂漫过日子，什么也不明白。学校既很少为你们设想，好好的来培养培养你们有创作兴味的学生。你们又各自胡胡涂涂，只在学校小小集团里混下去，到把时间全部浪费后，末了要饭吃时，你们发急了，就胡乱写写文章，附上个信，来逼迫编辑，埋怨编辑。

先生，倘若你当真还以为写小说在生活上纵无出路，在感情上至少还有条出路，那么，相信文字能使人心与心相通，能把人与人之间距离缩短，信托编辑，原谅编辑，实在是从事文学十分需要的德性。文章呢，你得勇气悍然的写下去。只管写，只管改，只管各处寄去，只管尽它失败。在工作上小儿戏，不马虎，而且永远不气馁搁笔，自信非笔直走到所要到的地方不止，你走得到！一切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事业，就是这样产生的！

至于你还想找寻一下那个使你白读十年书的负责者，要好好的算算账呢？莫徒然埋怨编辑，你应当同多数人一样，看着社会，看着代表社会的人物，以及形成社会的一切制度同习气。你有知识有本领，就思索如何去应用你的知识与本领，同那个多数肚子瘪瘪的在一块儿去争回吃饭的权利。你觉得历史有了错误，去努力修改历史，创造历史。谨慎、勇敢、伶俐、结实，不幸你仍然还在半路上饿死了或在别一情

形下死掉了，好，赶快霉烂，（多少人不早那么死了吗？）不碍事，让更年轻更结实的继续来占据了那个地方，向人类光明努力。……

倘若你所谓知识和本领，仅仅只是明白《文心雕龙》^③的内容，说得出《文选》的编者同体例，以及零零碎碎知道一点什么国学常识，书既不能教，小差事又爱脸面不肯屈尊，作人又事事马虎模棱两可，又怕事，又小气，先生，我同意你去自杀！自杀本是一种罪过，为神经衰弱的懦夫最容易发生的罪过。但因为你那么无用，不懂事，爱空架子，软巴巴的如同一条害病的青虫，怕努力，怕冒险，怕出丑，怕失败，生活永远不能自拔，眼睛永远不敢正视社会，你死了，世界上不过少一个吃白饭的人，对人类真无多大损失。

你说你想作个人，想知道一些成功的人如何成功，好的。作人有什么稀奇，一切人其所以能成功，据我想来也不过是他们先前不怕失败，咬紧牙齿苦干一场罢了。一个人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不能支配自己，却来让社会习气造成的机会左右安排，这就是个不配活下去也不配在事业上成功的人。你要活，从大学毕业出来，纵作过一次中学校长，作过教员，再去作一个听差，一个小书记，有什么为难？你真有计划，有目的，更要紧的还是你有魄力，这时作的即便是洒水夫，也不会长久委屈你。你要活得比别人更热闹，更丰富，冒险去各种生活里找经验，想作个巨无霸，除了你的懦弱拘迂观念阻拦你向前，谁也不会妨碍你。

先生，改造你自己！忘了你受的那个大学教育，忘了你那些身分，来作个人，分担这个时代多数中国人的命运吧。

再不要充斯文等待机会了，你应当自己来调度自己，要活下去，就必需硬朗结实的活下去。只有这样才有个光明的明日可以希望，其余全是空话，全是梦。

编者某甲 廿四年元月一日

本篇发表于1935年1月6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编者某甲。

- ①《项羽本纪》 《史记》篇名之一，汉司马迁著。
- ②《秋声赋》 文章篇名，宋欧阳修作。
- ③《文心雕龙》 古代文艺理论名著，南朝梁刘勰著。

给李先生

李先生：

大作同来信皆见到，谢谢，文章寄还。你文章写得很明白，可以推想你思想也很清楚。我是个只会写点小说的人，知识见闻有限，真不配给人贡献什么意见。不过就我所知道的说说：目前正有多少大学毕业生，要生活无可生活，无不希望用一支笔支持生活。（这事很困难，因为人数太多刊物太少了。）你既在学校，若不好好的念书，却成天写文章，企图从写作上发展，似乎不大合算。因为一则常做文章，书就不容易读好，二则呆在学校里文章也不容易写好。一个作者他的文章能写得很出色，并不仅是“成天写”，或是“欢喜文学”。他必需脑子里有许多可写的，充满了各方面的常识，对人事具透明的理解。他知道问题，方写得出问题，并不是他写了，就知道。正因其如此，所以许多命运好的人，能有机会受完全教育，然而可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文章。另外又有许多人命运极坏，任何努力皆不能入一个正常学校，任何努力也不能安顿在同一地方一年两年，生活毫无把握，长年各处流转，可是就那么拖下去，另外一个机会到了，他能拿起

笔来，过去所有种种生活都成全了他，帮助了他，他却把作品写给大学生来看，给全世界人来看了。（高尔基就是这种人！）这些情形真不是人可以自由安排的。所以我们尽管否认“天才”，但得承认那个“机会”。人也可以各处找寻种种“机会”，可是不容易两者同时得到。你如若想同我一样，作一年半补充兵，看砍头五千，五年中在三四个省分边区上、荒村小镇上来来去去流荡，同许多小职业接近，同泥土、马粪、黄疸病与鸦片烟接近，且因一个五四运动的余波，把本人抛到北京城，恰好又遇着……于是来回你的信。先生，你必须承认，这机会并不是我自造的，你愿意照样作也办不到的。认真说来，这条路实在太折磨人了。你即或从事文学，也用不着走这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你还有更好的成就，更方便的成就，只要凡事勇敢耐烦的去学，去接受探索的失败，跌倒了，赶快爬起，鼓起勇气换个方式再来。就你环境给你的方便，珍惜时间，不虚耗时间到琐碎、忧虑、迟疑以及各种无意思的小小得失里。把气派放大一点，不为一时挫折灰心丧气。你将来纵不能作文学作者，却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大人物，做出另外一件大事业！世界上值得我们努力的工作实在太多了，文学并不是高于一切的东西，你若真计划将来从事创作，也不妨先肯定这个前提，方不至于拘束自己到小小天地内，容易为自己一点点成就所限制。此复敬颂
安好。

四月十四日

本篇发表于1935年5月10日《武汉日报》。署名沈从文。原题为《废邮存底》，现题《给李先生》，为编者所加。

“诚实的自白”与 “精巧的说谎”

× × 先生：

谢谢您寄来的文章。恕不用在信上说明，这文章也看得出是“诚实的自白”。先生，我不怕扫您的兴，第一件事我就将指出这种诚实的自白，同文学隔了一层，不能成为好文学作品。您误解了文学。

您在“诚实自白”“写实”“报告文学”“现实主义”一堆名辞下，把写作看得太天真太随便了。一个学校的看门人，不加修饰随手写出的东西，算不得什么好作品，您明白。但您自己在同样态度下写成的东西，却把它叫作新诗，以为是个杰作。且相信这种作品只要遇着有眼睛的批评家，正直的编辑，就能认识您那作品的伟大，承认您那作品的价值。您这打算真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想头。您的意见代表一部分从事创作的青年意见。记着一些名辞，不追究每个名辞的意义。（这事你们自己本来不能负责，全是另外一些人造的孽。）迷信世界上有“天才”这种东西，读过一些文人传记，见传记

中提到什么名人一些小事与自己有些差不多的地方时，就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天才”，一动手写作就完成杰作一部。这杰作写成后，只等待一个批评家，一个编辑，一个知己来发现。被发现后即刻您就成为名人要人。目前您自己不是就以为工作已完成了，只等待一个发现您的人？在等待中您有点儿烦闷，有点儿焦躁。您写信给我，便不隐藏这种烦闷同焦躁。您把那个希望搁在我的回信上。您意思我明白。您需要我承认您的伟大，承认您的天才，来信说：“先生，我们是同志！”先生，这样子不成！您弄错了。我们不是同志。第一，我是个自觉很平凡的人，一切都求其近人情，毫无什么天才。第二，我因为觉得自己极平凡，就只想从一切学习中找进步。

我们的打算恰恰同您相反，我们走的路不会碰头，您把文学事业看得很神圣，然而对付这种神圣的工作时，却马虎到如何程度！四百字一页的稿纸，弄错十二个字，称引他人的文章，前后也发现许多错误。照您自己说，是“好文章不在乎此”的。先生，对于工作的疏忽，如此为自己辩护，我实在毫无勇气。

我以为我们拿起笔来写作，同旁人从事其他工作完全一样。文学创作也许比起别的工作来更有意义，更富趣味，然而它与一切工作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必需从习作中获得经验，从熟练中达到完全，从一再失败，不断修改，废寝忘食，发痴着迷情形中，产生他那出众特立的作品。能这样认真努力，他才会有一点看得过的成绩。这事业若因为它包含一个人生高尚的理想，值得称为“神圣”，神圣的意义，也应当是它的创造比较一切工作更艰难，更耗费精力。（一切工作皆可以从

摹仿中求熟练与进步，文学工作却应当在摹仿中加以创造。他不能抛开历史，却又必需担负它本身所在那个时代环境的种种义务。)

文学有个古今一贯的道德，就是把一组文字，变成有魔术性与传染性的东西，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由“争斗”求“完美”一种理想。毫无限制采取人类各种生活，制作成所要制作的形式。说文学是“诚实的自白”，远不如说文学是“精巧的说谎”。想把文学当成一种武器，用它来修正错误的制度，消灭荒谬的观念，克服人类的自私，懒惰，赞美清洁与健康，勇敢与正直，拥护真理，解释爱与憎的纠纷，它本身最不可缺少的，便是一种“精巧的说谎”。一个文学作家首先得承认这种精巧的说谎，其次使得学习这种精巧的说谎。譬如您写诗，这种语言升华的艺术，就得认真细心从语言中选取语言。一首小诗能给人一个印象，发生影响，那里是但凭名士味儿一挥而就的打油工作所能成事。

您说您有您的计划，一篇短文章也不能好好的作成，却先想设法成为“作家”，这算是什么工作计划？您说您倾心文学，愿意终其一生从事文学，事实上您不过是爱热闹，以为这种工作不什么费力，可以从容自在，使您在“灵感”或“侥幸”两个名词下成为一个大作家，弄得生活十分热闹罢了。……

先生，得了。我说的话太老实，一定使您不大快乐。可是这也不什么要紧，假若您当真是个准备终生从事文学的人呢，我的老实话对您将来工作多少有些益处；假若您还是迷信您是个天才，不必用功，自信奇迹也会在您身上出现呢，

就不妨那么想：“我又弄错了，这个编辑比别人还更俗气，不是我理想中的同志！”您不必发愁，您有的是同志。我为您担心的，只是与这种同志在一块时，不是您毁了他，就是他毁了您。

编者

六月二十一

本篇发表于1935年6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沈从文。原题《废邮存底》，现题《“诚实的自白”与“精巧的说谎”》为编者所加。

谈话剧创作

先生：

从天津转来您那封信，我已收到。您预备写短剧，有勇气在这条比较寂寞的路上走个十年八年，这点勇气很令人敬佩。来信说“一篇小说，一个剧本，写它时皆应当如同写一首诗。必需有音韵，有节奏，处置文字安排故事能够达到周密妥贴，毫无瑕疵，方有希望成为一个好作品。”一篇小说一个剧本是不是应当如一首诗，能不能如一首诗，那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把写作看得那么认真，我完全同意。古今尽有不同的习惯，不同的道德，同时同地人与人之间也尽有不同的爱憎，不同的哀乐，然而一个作家动手写作时，必需有脑子，必需用脑子，那是毫无问题的。

您信上讨论到话剧问题，我们的意见稍稍不同。几年来社会对于话剧无多大兴味，有种种原因。旧戏与电影，两样东西的存在，皆妨碍到话剧的发展，那是明明白白的一件事情。至于把话剧失败的责任，派给观众的浅薄，演员的无能，以及杂志编辑与新书业发行人对剧本的轻视或忽视，您的意见不大公平。多数人对话剧不能发生兴味，似乎应当另外找

几个直接负责人。我有个朋友×先生，对于话剧抱有极大希望与浓厚兴味。他到法国看了三年戏，回国来又看中国的戏，也就常常向朋友埋怨说：“中国演出太少了，观众太少了，一切刊物皆不欢迎剧本，一切书店皆不肯印行剧本，这怎么成？”他同您一样，对话剧失败大有感慨，可不明白话剧为什么失败。中国有了演员同观众，演些什么？观些什么？你们似乎皆不曾注意。

就北方言，观众多数是受有相当教育的观众。他们今年花一块钱看这个戏，明年花一块钱依然看这个戏。不管演出的戏如何失败，散场回家时，总笑眯眯的说“不错不错”。观众数目虽不多，但观众的宽容与忍耐，可说是世界上稀有的观众！至于演员呢？有希望的角色，实在随处可以发现。这些人毫无物质利益的企图，常常放下其他正当工作，来排演一个组织散漫对白平凡极不精彩的剧本，他们的忍耐，与他们的牺牲，真亏他们！

您说许多书店皆不愿意印行剧本，我问您，目前究竟尚有多少值得付印的剧本，还搁在什么人案头，无法付印？把印出了的算算看，译的、改的、抄袭的、凑成的、创作的，共总列出一个单子，十年来中国有多少剧本？有多少剧本不排演过若干次？（有多少剧本真值得排演？）

一个剧本写作者，不可缺少的是才华与辞辩，慧心与魄力。对于语言，文字，社会，人事，理解力的强弱，便支配着他从事剧本写作成败的命运。若剧本不成，排演主持人尽管长袖善舞，每次公演皆能与新闻界合作，在本市新闻上弄得十分热闹，尽管有多少朋友，为了“看朋友上台演戏”，不问天晴落雨，皆跑来看戏，尽管有多少富于天才的爱美演剧

者，皆热心出场帮忙，结果精神上还是失败。要热闹，大家仿佛也通力合作在那里热闹过了，到底还是热闹不起来。他的失败原因很简单，就是上演的剧本要不得。戏剧艺术假若应当由编剧者与导演人及全体演员平分责任，每次公演我们差不多皆可得一印象，就是台前台后人皆已努力尽责。剧本写得不能吸引人，不能抓住人，剧本写作者的责任似乎还得卖点力气。老实说，有好些剧本的公演，皆只是在那里给人制造一个对于话剧头痛的印象。关于这方面的事，几个专家十年来的努力，他们的经验同知识，皆值得我们同情与尊敬。然而伟大作品的制作，我的意思却不妨保留一点希望于剧坛新人。

就目前情形言来，想使现在的话剧代替旧有的京戏，那是办不到的。想使话剧在新兴艺术中占有一个位置，这位置超越小说诗歌而上，那是无希望的。埋怨群众诅咒编辑皆为昧于事实的行为。它有出路：它的出路只在剧本写作者本身。假若一切成名的专家，对于剧本写作并无多大兴味了，那就看新来的是否能继续奋斗。您说十年来的中国新小说，成绩还不令人完全失望，许多新进作家皆能独树一帜，皆有超越前人独自达到一个高峰的趋势。您既然注意到它，便应当认识它那进步的原因。小说比较起来虽容易成就，虽可以向较宽泛的社会取材，组织上虽受限制较少，然而有一个根本理由您应当承认，就是一种人自为战肉搏而前的精神，在小说作者间如何存在。这可贵的创造精神，正是剧本写作者所需要，同时又恰恰极缺少的。

戏剧作者的努力，您说到这一点时，心怀无限感慨。以为中国群众，知道欢迎萧伯纳^①，却永远不会产生萧伯纳。中国不能产生萧伯纳，并不是中国的耻辱，也不应当使中国

戏剧作家垂头丧气。在这个时代，中国作者要有自己对这个时代负责的感觉同理想，很可以写出非常伟大的作品。既不必产生一个萧伯纳，更不需要仿造一个萧伯纳，至于您说到的“中国群众”，对群众似乎得分开看看。

我记得上年这个老丑角来到中国上海，受所谓群众欢迎时，一家中国报纸，曾有过如下的记载：“老英雄来了，在会场上这个斗上还未开口，群众就已大大激动。”很可惜，我们不能详细知道这受激动的欢迎者，有多少人读过一本两本萧伯纳的戏剧，有多少人研究过萧伯纳的思想。但我们却可以想象得到，列席于那个欢迎会的人，大多数只是看看热闹而去的人。这些人回家以后，受激动的脑子留下的印象，必是一个长脸白胡子的老头子，两只毛手先是插在裤腰边，到后却互相捏得格格作响。（估量那样子吃东西时一定很敏捷，剥栗子胡桃也溜刷在行。）到后这人开口说话了，一开口就用绅士式的英语骂了一顿“绅士”，接着就是一片幽默。二十分钟过后，那老人掏出表来望望，完事了。把这种欢迎群众情绪检查一下，不外为了“好奇”觉得“好玩”罢了。这欢迎使用的是“崇拜”字样，真够幽默了。

多数集会皆差不多，其中包含了一个游戏因子。当日到会的若不是萧伯纳，却是一只人面长须白猿猴，列席的人或许会格外多一些。这些人白天在沉默的萧伯纳面前大大激动，当天晚上十二点钟，在明园跑狗场看台上，对着奔走如飞的电兔，实际上必更兴奋。他们有时到“世界社”出席什么欢迎会，有时也过“大世界”参观人面蟹和万能脚一类玩意儿。群众原来也有许多种，应受作家尊敬的是一种群众，在那里尊敬作家的又是一种群众。

一个人努力写作，准备把自己全部生命献给艺术，就为的是希望某一天来受消闲群众的喝彩，这个人的打算，我可不大了解。我的意思却以为我们若从事艺术，第一件事就是应当把某种无知识凑热闹的群众喝彩，以及言不由衷隔靴搔痒的阿谀与批评，认为一种重大侮辱或一分灾难才对。像您这种年龄，血是热的，骨头是硬的，眼睛是光亮的，脑子是清清楚楚能够思索一切的，活在这个时代里，若只是徒然梦想群众承认你的“伟大”，受某种耗费阶级的崇拜，您真是把自己看得太小了。有些人极倾心于一个伟大人物在社会上所得的光荣，且迷信自己是个伟大天才，而又时时刻刻只在极琐碎事情上留心注意，把精力浪费在“设计出名”一类蠢事上去，禀赋这种不健全性情的人，由道德观点言来，实应当称为“疯了”。疯人院虽不能拘留这种身心俱病的家伙，然而当前社会决不需要这种有精神病的人，那是很明显的。您若愿意脚踏实地苦干一场，本来不那么疯，还好意思装做这种疯子吗？

先生，看远点，我希望您看远点，把您作人气魄也就放大一点。这个时代一切事业皆需要硬汉，需要心热脑冷实事求是的硬汉。文学艺术方面希望产生一点点站得住的成绩，帮助这个民族在衰落与灭亡中挣扎支持，而且使那个真正多数人获得竞争生存的勇气，也就得这种人来干。您必需忘掉社会给您的“光荣”，来注意充实自己的“实力”。

六月二十四日

本篇发表于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沈从文，原题为《废邮存底》，现题《谈话剧创作》，为编者所加。

① 萧伯纳 爱尔兰作家，一生著有剧本51种。

关于“批评”一点讨论

××先生：

您的信已从报馆转到我手里。小公园负责者另外有一个人，这您只须看看两星期来编者种种回信就可明白的。那种对读者作者掏心滤忱交换意见和感想，写得那么诚实坦白而且十分美丽的信件，很幸福，我同您一样，原是个“读者”！您说正留心值得留心的作品，我以为那些信件就值得您特别留心。您说您喜欢创作，努力创作，可不知如何写下去，方能同社会接头，得到出路而且是个正当的出路，要听听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依然是劝您去读读那些信件。

关于批评，一般书报上的批评您觉得失望，因为根据批评买书您很上了些当，受了些损失，这自然是真事。但这件事您不能怪批评家。一切人皆有它的爱憎，缘于学识同趣味，政治主张同友谊立场不同，批评者对于一个作品具有意见要说几句话时，失轻失重皆不可免。对于一个作品的估价，又或由于批评者的浅识与偏见，自然常有“不大公平”的情形。（海水还有它相当的曲度，为什么您却把“批评”看成一种不

可能的东西?) 假若您觉得批评家喜欢说大话, 说谎话, 尤其是少数人常常有种过分自大的态度; 总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在左手捏着作者的咽喉, 右手捏着读者的咽喉, 而且在事实上却又多少能够做出一些混淆是非的行为, 大有流弊, 影响及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应当想个办法。这有办法。办法原很简便: 若我们目前还无什么好方法使批评家愿意自重, 就不妨把他们看轻一些; 把他们所有意见的价值估小一些。若读者不把批评当成“法律”同“圣经”, 认为它是一个“比较细心的读者对于某一本书的意见”, 这意见也信得也信不得, 那么, 即或这些人所写的自以为是圣经, 是法律, 也不能发生多少作用, 使读者上它们的大当, 受它们的欺骗了。

照目前情形说来, 身居内地的青年朋友, 买书标准是照广告和批评定下的。这一来自然太便宜了一些在作品以外兼营批评业务的人物, 便宜了些善于掠取阿誉的人物, 便宜了些有书店的人物; 同时也就委屈了不知其数无所依傍的作者和他的作品。这是文学成为商品之一, 新闻纸同一切广告又控制了商业的社会一个自然现象。企图“清除积弊加以补救”, 我们除了把批评看轻一点以外, 仍然得对批评家留下一点希望。一切作品都需要批评的, 一切好作品坏作品都应当有种公正的批评。纵或目前大多数批评家还不能把他们的批评同“政见”“友谊”“商业”分开, 纵卖膏药的批评家也还俨然道貌的在批评上保留一种说教传道者的模样, 然而我们应当希望, 过一时批评家中会有几个人, 忘了自己是“导师”, 却愿意作读者的“朋友”, 能用一种缜密、诚实, 而又谦虚的态度, 先求了解作品, 认识作品, 再把自己读过某一本书某一个作品以后的印象或感想, 来同读者谈谈的。具有

这种态度的批评，若真是中国读者作者所需要，如今还缺少。我们想法培养他。一切事皆受时间支配，时间不停顿，坏现象就不会永远继续占有势力。对批评目前纵难“乐观”，未来却很可“努力”。便是纯粹广告，有信用的几个书店，到近来，不是皆慢慢的注重在诚实可靠方面发展，不至于胡说八道了吗？轻视那些先就不知自重的批评，同时也重视那些在批评上克尽厥职的批评，这是一个还在学习写作的我对于批评的意见。

您不满意一般批评，还预备自己动手写批评，我希望您就能够那么试来写您的批评。不要走人人在那里走的道路，尤其是当您已经明白那个“多数”不大可靠时节，即或那是平平坦坦的大路，也不要跟着走去。

七月二十日北平

本篇发表于1935年7月28日天津《大公报·小公园》，原题为《废邮存底——关于“批评”一点讨论》。署名沈从文。

谈作家集团组织

××先生：

来信收到。你提到作家集团组织，意见很好，希望有人来作。不过必须这人有本领，有空闲，且有很好的知识，动机又极纯粹，方作得好。我个人知识极少，不配教人，且受职务拘束，空闲时间不多，恐作不来。

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一切事能“分工”或者比较妥当。高兴办事的办事，会作首领的作首领，肯低头写作的就低头写作，容易弄出成绩。一个人若能够各样都插一手，自然更好。但明知能力有限，不量力去作，或有顾此失彼的情形。我比较宜于写小说，所以很希望把大部分时间来学写小说，细心看别人的，谨慎写自己的，再过十年八年，也许能弄出一点点小成绩来。至于如何指导人念书，那是大学教授的本行，如何打进社会，那是精于商业作家的工作，这两件事情我全不大懂，也就不能冒充内行，胡说八道。

你说年青人有种苦闷，要发表，要讨论，要……说简单一点，其实就是要感情与生活的出路。这个自然而且合理，

因为这正是青年人的活力。社会也就要它来推进求变革。不过我认为，一切出路的基础，皆应建筑在个人埋头苦干上面。尤其是比较远大的理想，比较孤寂的事业，总不能从侥幸与马虎讨到多少便宜。就文学言，好作品不一定能从团体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①，高尔基，王五或李三，照你说，这些人免不了曾经出席过文学团体的集会，或者为某某文学团体的会员。可你应当明白，不是他加入了文学团体，就成为大作家。一个作家支持他的地位，是他个人的作品，不是团体。

再说到从事创作要鼓励，要刺激，要批评，我明白。我可以告诉你，事实上最妨害一个大工作的发展的，真没有比同一团体、同一党派的阿谀更坏了！

一个作家若不能逃脱个人爱憎与社会流行毁誉，想伟大实无希望可言。我认为，个人若是从事文学创作，为的是对“真理”或“未来社会”有所倾心，鼓励他应当是他对生存的责任或兴趣，刺激他应该是全体人类全体幸福与快乐，批评他应当是现在未来的一切读者！正因为他看的大，看的远，他才有希望能把工作做好，做得坚实；如今许多作者把鼓励放在编辑与一二商人方面，把刺激派给编辑与商人，把批评也给附庸于编辑与商人的批评家同老作家。其所以如此，不外乎将“出路”认为“出名”，小看了自己的作品的成就，同时也小看了自己的能力。谦虚本来是人类极可称赞的美德，但过度谦虚一用到这件事情上来，便不免成为对于团体的依赖，把新起作家毁掉了。把一群年青作家放在一个团体里，受一二个人领导指挥，他的好处我们得承认，可是他的坏处或许会更多。目前从事文学创作独自埋头苦干的人真不少，这些人同流行的“热闹”或不大发生关系；照俗话说就是

“不上文坛”，但也无妨。真的大作品，必然会从这种人努力慢慢完成的。至于那些出了名的，只顾捞钱，不出名的，只图出名，于是前者便马虎滥造，后者便想法出名，结果是已成功的站不住，只好倒下，不成功的虽勉强站住了，也依然倒下；多数人想明白中国为什么无伟大作品产生，这便是一个简单而真实的理由。就一部分人看，觉得很可悲观。就全体看，——把那些不预备上文坛却在努力作品写作的朋友全算在内，中国新文学的将来，应该乐观。就因为还有许许多多，在各地方各种生活里努力锻炼，埋头搞自己那个工作。这一点我知道的比你清楚。这些人用不着在一处开会，用不着在一处办刊物，却同样在沉默里走上了一条应走的大路，异途同归，对于整个中国新文学运动，是各有不同贡献的。此颂安好。

十月十日写

本篇发表于1935年10月1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署名沈从文。原题《废邮存底》，现题《谈作家集团组织》，为编者所加。

① 陀斯妥耶夫斯基 俄国作家。

答 辞 六

——从艰难中去试验

上超先生：

您文章收到，看过后奉还。您把“写实”两个字解释得简单了一点，以为照样写下就完事，因此写成您寄来的那个短剧。这失败似乎是必然的。一个剧本得比您写的还要完全一些，我意思说的是要像剧本些。要点故事，要点变化，要点人为的凑巧。不光是赤裸裸的对话。也有赤裸裸对话的剧本，那需要有从语言中挑选语言的本领，不止是能够选取美丽有力的，还要活的，合式的。而且要会安排，会剪裁，应当多就多，应当少也不得不少。这不需要什么天才，顶需要的还是经验，照您来信说，经验实在太少了。您的环境似乎又不大宜于戏剧。不妨放下您写戏剧的打算，写小说会相宜点。多读点好小说，在失败上多写几百回，作品能到一个相当完美时，有您的出路。现在急于为这种短剧找出路，有了出路反而毁了您。一切艰苦工作都得忍受寂寞，从事创作，更不儿戏！您把它看作一蹴而至的工作，所要表现的又恰好是十年来一种用万万千人的心血还写不妥当的那件事那个问

题，先生，这不容易。您必需把它看得艰难一点，同时又却有勇气从艰难中去试验。这工作专读几本书并无多大用处，脑子不用熟，手不用熟，即或很了解那个问题，可是不能把那问题好好表现出来。取得这种表现能力，师友并不能帮您多少忙。师友的好处只能给您“打一点气”。

沈从文

本篇发表于1936年1月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署名沈从文。

答 辞 八

青先生：

文章已送过另外一个地方，不久可以载出，当有一万人来读它。这不能说是有什么“成功”，一个人可做的事能做的事还很多。就说写作，也应当用一百万读者作对象（至少得占有那么一个数目），方能说“工作有了点儿结果”。文章末尾的几页不用，因为那太像一个通俗小说的末尾了。好的小说在一切俨然如真，不在有头有尾。就效果言，也用不着那种大团圆或角色死亡的悲惨作结束。作者应当明白“经济”两个字在作品上的意义，不能过度挥霍文字，不宜过度铺排故事。他努力只在给读者一个“印象”。如何安排便可以给读者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他必需明白。好作品不一定是故事完美无疵，文字干干净净。一切小毛病都无害于那个作品的成就。聪明不凡的作家还会在作品上有意无意留下一些缺点，把作品表现得更生动一点。这正同“人”一样，我们觉得他好，用不着“十全十美”，好处在他和别的人有点“不同”。他必需有人类共通的弱点，但弱点以外却还有一种不可企及的高

尚风度或真诚坦白动人处。若照你那个写法，在小说为“俗套”，在“人”为“装模作样”。你欢不欢喜装模作样的人？我问你。

第二篇写成看看，若好，可转给×××；不好，重新再作，这不出奇。学成衣得三年六个月满师，你预备做的工作，比缝件蓝布大褂难多了。明白它的艰难，同时又还能够在相当时间中战胜这种艰难，这才像一个人。只有这样子作人，才配活在将来的社会里，活的才会有意思。一个人，若觉得自己的命运被社会，家庭，以及一般环境安排得不太妥当，很受委屈，他本可以用两只手重新来安排他个人的命运。第一件事他别怕难，第二件事他别偷懒。倘若他是个女子呢，就先得学习忘却了他是女子（抛弃了社会对于女子的种种优待），同一个男子一样来在工作上奋斗。中国道德哲学得重造，便是这一点，在稍后一时，会用它来代替过去女子奴隶人生观，成为所有健康女子不可否认的人生观的。让那些娼妓同姨太太成天商量衣服和脂粉，这是可怜的她们仅有的生活！至于一个到阳光与空气下来活着的人，可作的事太多了。

沈从文

本篇发表于1936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署名沈从文。

答 辞 十

——天才与耐性

言先生：

您文章见到。您想在短短的篇章中达到一个“境界”，或造成一个“境界”，工作不容易。假若从这方面已试验过而且失败过，还要试验，还要失败。可讨论的是方法，您还不很懂得驾驭文字的方法。一个作品的成功，文字弄得干净利落是第一步，不是最后一步。您明白了如何吝惜文字，还应当如何找寻那些增加效率的文字。这一点近来的人常笑它是“小技巧”，以为不足注意。其实一个作者若多少懂得一点技巧，也不很坏。茅盾用三十万文字写个长篇，重技巧的人，或许用十万字也能同样写一个，字数虽比较少，却可以收同样效果。苏俄的《铁流》，照许多人说，不是靠技巧成功的。您且承认它，不妨事。但苏俄有许多用革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只《铁流》^①最著名，成功的理由是“写的特别好”。这“写的特别好”靠的是什么？您问问他们。

您文章写的太快，一来许多篇，这对您毫无好处。这世界也应当有“天才”，凡有写作，文不加点一挥而就。不特写

的下，而且写的好。不过一个忠于工作的作者，他或者愿意放弃“天才”，尊重“耐性”。他即或一天写成它，却愿意花十天去修改它。同样是作品，有的给人看过后，完事；有的却给人看过后留下一个印象，想忘掉它也办不到的好印象。正如同很好的音乐，有一种流动而不凝固的美；如同建筑，现出体积上的美；如同绘画，光色和叶，恰到好处。用文字写成的一切，也能作到这个情形。那不需要天才，需要耐性。伟大作品您初初一看，好像也不过如此如此，多看看，不同了。理解艺术还要耐性，何况动手作它。

沈从文

本篇发表于1936年1月22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署名沈从文。

①《铁流》 苏联长篇小说，绥拉菲摩维支著。

答辞十三

席士先生：

您寄来的信同诗已全见到。信上的意思我明白。您把写作看得似乎太简单了一点，太容易了一点。北平这个大城里目前至少有一万大学生，像您那么会写诗，至少有一千大学生愿意把写成的诗发表，至少有一百大学生把诗写成后居然各处寄去，可是至多却不到三十个人有出路，这三十个人虽有了出路，到后来未必能有三个人有把握可望成功。我告您这件事不在扫你的诗兴，只是要你明白这种工作同社会上别的工作一样，并不儿戏。你住在乡下，照道理说不是个坏环境。在乡下可认识中国种种，比住城市中大学生方便的多。不过您的写作观念妨碍了您对于这个工作的进步。观念不对，因此您虽住乡下，触目是可写的材料，您不曾注意，反而来摹仿城市中人的俗调，用许多您不会用的新名词写恋爱诗。这失败是当然的。您倘若真如信上说的要向这条路上走，先就得看看应当如何走，方不至于徒劳无功。值得您摹仿的是“大公报”上那个长江先生的通讯。您住的正是边远匪区，半

年来那几万人如何流窜，官军方面又如何围剿，当地的社会情形事前事后有了些什么变化，……用通讯形式写来，会写出很多极生动的短文，比您那恋爱诗强多了。

沈从文

本篇发表于1936年2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署名沈从文。

给志在写作者

好朋友：

这几年来我因为个人工作与事务上的责任，常有机会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不拘相去如何远，人如何生疏，好像都能够在极短时期中成为异常亲密的朋友。既可以听取你们生活各方面的意见，也可以坦白诚实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昔人说，“人与人心原是可以沟通的”，我相信在某种程度内，我们相互之间，在这种通信上真已得到毫无隔阂的友谊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快乐。我和你们少数见面一次两次，多数尚未见面，以后也许永无机会见面，还有些人是写了信来，让我答复，我无从答复；或把文章寄来，要我登载，我给退回；我想在这刊物上，和大家随便再谈一谈。

我接到的一切信件，上面总那么写着：

先生，我是个对文学极有“兴趣”的一个人！

都说有“兴趣”，却很少人说有“信仰”。兴趣原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随寒暑阴晴而变更的东西。所凭借的原只

是一点兴趣，一首自以为是杰作的短诗的被压下，兴趣也就完了。我听到有人说写作不如打拳好，兴趣也就完了。或另外有个朋友相邀下一盘棋，兴趣也就完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工作靠兴趣，不能持久，太容易变。失败，那不用提；成功，也可以因小小成功以后看来不过如此如此，全部兴趣消减无余。前者不必举例，后者的例却可从十六年来新文学作家的兔起鹘落情景中明白：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好像那么多，真正从事于此支持十年以上兴趣的人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因缘时会，在喜事凑热闹光景下一把捞着了作家的高名，玩票似的混下去。一点儿成绩，也就是那么得来的。对文学有兴趣，无信仰，结果是所谓“新文学”，在作者本身方面，就觉得有点滑稽，只是二十五岁以内的大学生玩的东西。多数人呢，自然更不关心了。如果这些人对文学是信仰不是兴趣，一切会不同一点。

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同时就是对文学有所希望（你说是荒谬想象也成）。这希望，我们不妨借用一个旧俄作家说的话：

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的功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

话说的不错，而且说的很老实。今古相去那么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

这单纯信仰是每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大作品产生必需的东西。有了它，我们才能够在写作时失败中不气馁，成功后不自骄。有了它，我们才能够“伟大”！好朋友，你们在过去总说对文学有“兴趣”，我意思却要你们有“信仰”。是不是应当把“兴趣”变成“信仰”？请你们想想看。

其次，是你们来信，总表示对于生活极不满意。我很同情。我并不要你们知足。我还想鼓励一切朋友对生活有更大的要求，更多的不满意。活到当前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大多数负责者都那么因循与柔懦，各作得过且过的打算。卖国贼、汉奸、亲眷、流氓、贩运毒物者、营私舞弊者，以及多数苟且偷安的知识分子，成为支持这个社会的柱头和墙壁，凡是稍稍有人性的青年人，那能够生活满意？那些生活显得很满意，在每个日子中能够陶然自得沾沾自喜的人，自己不是个天生白痴，他们的父亲就一定是那种社会柱石，为儿女积下了一点血钱，可以供他们读书或取乐。即使如此，这种环境里的人，只要稍有人性，也依然对当前不能满意，会觉得所寄生的家庭如何可耻，所寄生的国家如何可哀！

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社会改良家如此，思想家也如此。每个文学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良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异途同归。他必具有宗教的热忱，勇于进取，超乎习惯与俗见而向前。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社会黑暗的否认，以及未来光明的向往。一个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种伟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难，在极端贫困艰辛中，还能支持下去，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的美丽而光明的合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表现多数人在灾

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数人都浸润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辉里，能够向上。

可是，好朋友，你们对生活不满意，与我说到的却稍稍不同。你们常常急于要“个人出路”。你们嗔恨家庭，埋怨社会，嘲笑知识，辱骂编辑，就只因为你们要出路，要生活出路与情感出路。要谋事业，很不容易，要放荡，无从放荡，要出名，想方设法难出名，要把作品急于发表，俨然作编辑的都有意与你们为难，不给机会发表。你们痛苦似乎很多，邀求却又实在极少。正因为邀求少，便影响到你们的成就。第一，写作的态度，被你们自己把它弄小弄窄了。第二，态度一有问题，题材的选择，不是追随风气人云亦云，就是排泄个人小小恩怨，不管写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深刻，不亲切。你们也许有天才，有志气，可是这天才和志气，却从不曾好好的消磨在工作上，只是被“杂感”和“小品”弄完事；只是把自己本人变成杂感和小品完事。要出路，杂志一多，出路来了，要成名，熟人一多，就成名了，要作品呢，没有作品。南京首都有个什么文艺俱乐部，聚会时常常数百人列席，且有要人和名媛搀杂其间，这些人通常都称为“作家”。大家无事，附庸风雅，吃茶谈天而已。假若你们真不满意生活，从事文学，先就应当不满意如此成为一个作家。其次，再看看所谓伟大作品是个什么样子，来研究，来理解，来学习，低头苦干个三年五载。忘了“作家”，关心“作品”。永远不在成绩上自满，不在希望上自卑。认定托尔斯泰或歌德，李白或杜甫，所有的成就，全是一个人的脑子同手弄出来的，只要你有信心，有耐力，你也可以希望用脑子和那只手得到同样的成就。你还不妨野心更大一点，希望你的心与力贴近

当前这个民族的爱憎和哀乐，作出更有影响的事业！好朋友，你说对生活不满意，你觉得应当是为个人生活找出路，这是另外一件事？请你们也想想看。

我在这刊物上写这种信，这是第一次，以后恐无多机会了。我很希望我意见能对你们有一点用处。我们必需明白同生存的国家，当前实在一种极可悲哀的环境里，被人逼迫堕落，自己也还有人甘心堕落；对外，毫无办法，对内，成天有万千人活活的饿死，成天有万千人在水边挣扎，成天还有大规模的精壮国民在另一个地方互相杀戮，此外大多数人就做着噩梦，无以为生。但从一方面看来，那个“明天”又总是很可乐观的。明天真正是否可以转好一点？一切希望却在我们青年人手里。青年人中的文学作家，他不特应当生活得勇敢一点，还应当生活得沉重一点。每个人都必需死，正因为一个人生命力用完了，活够了，挪开一个地位，好让更年轻一点的人来继续活下去。死是不可回避的自然法则。我们如今都还年青，不用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活。我以为每个人都有权力活得很有意义，很像个人。历史原是一种其长无尽的东西，我们能够在年青力壮时各自低头下个十年八年，活够了，死了，躺下来给蛆收拾了，也许生命还能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活得很长久。徒然希望“不朽”，是个愚蠢的妄念，至于希望智慧与精力不朽，那只看我们活着时会不会好好的活罢了。我们是不是也觉得如今活着，还像一个活人？一面活下去，一面实值得我们常常思索。

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北平

本篇发表于1936年3月29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署名沈从文。

致施蛰存函四通

蛰存兄：

来信并转巴金信，皆已如囑转致，可释念。关于《萌芽》^①被禁事，巴金兄并无如何不快处。此间熟人据弟所常晤面者言之，亦并无误会兄与杜衡兄等事，因上海任何谣言，似乎毫无知之者，故无传闻，亦复无误会也。上海方面大约因为习气所在，故无中生有之消息乃特多，一时集中于兄，不妨处之以静，持之以和，时间稍久，即无事矣。刊物能想法支持下去，万勿因小故而灰心，环境恶劣则设法顺应其势以导之。即一时之间，难为另一方面友好所谅解，亦不妨且默然缄口，时间略长，以事实来作说明，则委曲求全之苦衷，固然必不至于永无人知也。弟于创作即素持此种态度，不求一时即面面周到，惟老老实实努力下去，他方面不得体之批评，无聊之造谣，则从不置辩，亦不究其来源，亦不亟图说明，一切皆付之“时间”，久而久之，则一切是非俱已明白，

前之为仇者，莫不皆以为友矣，前之贬其文为不值一文者，乃自知其所下按语之过速矣。弟以为从事文学者，此种风度实不可缺少，因欲此一时代所有成绩较佳，固必需作者间有此坚韧性才克济事，想吾兄亦必以为然也。《现代》得兄努力，当年来之成绩，实使弟等钦佩之至，以弟之意，即书店环境不佳，无一稿费，友朋间犹应将此刊物极力维持，能作稿者作稿，负编辑责者耐忙负责，何况尚不至于如此为难。关于与鲁迅先生争辩事，弟以为兄可以不必再作文道及，因一再答辩，固无济于事实得失也。兄意《文选》《庄子》宜读，人云二书特不宜读，是既持论相左，则任之相左可，何必使主张在无味争辩中获胜。

天津《国闻周报》希望得兄与杜衡兄创作，若能特为写一篇，作新年号用尤佳。兄若需款甚急，可于文章到时代为设法即日汇申，申津之间邮汇固不出三日外，亦不至于久待也。《文艺副刊》实亦亟盼代作文章。望舒^②若能写一篇法国文学现状之通讯文章，《国闻周报》必欢迎之至，去函时代为一提及。专颂近安。

弟 从文 顿首

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二年）

《月下小景》已收到，谢谢。日记当于另日抄来。

二

蛰存兄：

从洵美^③兄处出一刊物事，我可以来一个。但事实上若只在弄点稿件，使刊物好些，热闹些，不列我名字，我仍然想法为刊物弄稿件来。

《现代》停刊，可惜得很，惟上海出版家多，完了一个也许还可办更好的两个！希望莫气馁，莫太在小事上注意。几年来几个作者，皆为应付个人把日子糟蹋了，这实在是不必需的战争！西谛^④我不常见到，见到时也不会说到什么。我觉得他为人很好，只是许多事情热得过分，便乱一些罢了。你受点小小批评算什么？你莫疑心这些，莫注意这些，方能作你要作的事。在上海住下来真想不到大家那么容易生气。我总想，作者间若能有五年“私人攻击”的休战，一定有许多好作品产生。我希望有朋友在这方面努点力，莫使大家尽写局外人看不懂的小评闲话。写杂论自然一时节可以热闹些，但毫无用处。一个有魄力的作者，他有作品，批评并不妨碍他的成就。不要太注意批评。我们假如有个信念，难道一个什么人写一篇两千字的批评，就可以使我们这信念动摇？中国似乎还需要一群能埋头写小说的人，目前同政治离得稍远一点，有主张也把主张放在作品里，不放在作品以外的东西上，这种作品所主张的，所解释的，一定比杂论影响来得大，来得远。或者这是一点迷信，也就需要这迷信，方有作品产生。新刊物若着手办去，我以为将来的目的，就似乎应对作品加一点注意，让它名副其实成为一个文艺月刊。至于幽默，

杂论，小感想，挑眼儿的评呀论呀，各有专家，各有专刊，新刊物不妨少登一点。能像这样下去，刊物自然可以走出个新路。专颂安好。

弟 从文 顿首

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三年）

三

蛰存兄：

闻兄一再为二竖所苦，甚忧念。赵家璧兄来平，得闻情况一二，于兄处境，尤难去怀。《文饭小品》能支持，实可贺。《诗刊》若出，此间似宜邀梁宗岱孙大雨诸兄参加，当可热闹不少也。不知近已着手集稿否？又闻望舒回国亦大不如意，不卜近日尚在上海否？

《文艺副刊》近想大加变动，希望多登小说，望兄同杜衡兄各写一创作，若能逼兄等于七月初将大作寄来，实可增加此间发稿人勇气不少！此间稿费只五元千字，为数并不多，惟刊物固定读者约二十万人，且多数为大中学生阶级，于文学作品欣赏力似不弱，北方人态度又稍沉静，于创作小说尤其兴味，兄等若有文章北来，亦读者与发稿人之幸福也。病若较佳，深盼能逼兄一执笔。专此并颂
安好。

弟 沈从文 顿首

六月十四日（二十四年）

四

蛰存兄：

家璧来平时，谈及您有病，虽沉重，已告痊。不久又闻其他朋友谈您又转重，多日无消息，实念念。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自九月份已扩大，每星期出版四次。平日内容较活泼，星期日作特刊。近拟特约八个朋友为特刊写短篇小说，字数四千字到六千字，稿费约五元千字，每人两月一篇，很盼望您高兴答应一篇，并望将弟意转达杜衡、望舒，彼等若不写创作，翻译、介绍、批评皆好。文章若可以作，盼望您告我一声。九月里就很需要您的文章。《文饭小品》闻不知谁某说已累您不小，行将停刊，不知真实情况如何，北方办定期出版单独出版刊物，失败是必然的事；您在南方算老行家了，怎么一个小小刊物还不易支持？真古怪，你看到什么好书，我们还盼望您为《文艺》随手写一点书评，这方面太需要书评了。望舒兄这方面不知能帮忙否？

弟 从文 顿首

八月二十八日（二十四年）

本篇最初收入孔令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5月版）。其一写于1933年12月15日，其二写于1934年12月15日，其三写于1935年6月14日，其四写于1935年8月28日。

① 指巴金创作的中篇小说，1933年被查禁。

② 望舒 即戴望舒，现代诗人。

③ 洵美 即邵洵美，现代诗人。

④ 西谛 即郑振铎，现代作家。

致赵景深函一通

景深兄：

燕尔新婚，近来想复多所创作，兹可贺也。

近因在此教《新诗之发展》，想从你领教一二，且因各集子无从一一寻找，不知道你有多少，若可借用，则诚乐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谈谈，请告我一个时间和地址，最好或为你新家，便登门重新道贺。并颂

双安

从文 六日

本篇最初收入孔令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 1936 年 5 月版），写于 1930 年 5 月 6 日。

致赵家璧函二通

—

家璧兄：

昨寄文章想可收到。子华稿收到，极好。朱光潜已去四川，因此不能同他谈及。他不久当回北平，必过彼家中将兄意转达。

北平前月极热，日来已较凉爽。地方表面极平静，秩序尚好，惟汉奸，浪人，遗老，皆把它看成将来争夺地方，前途实无希望可言。教书的天口不知，还以为不过问国事，我领导学生不过问国事为责任，表示清高守分，除掉教书外我只知听戏。到危险时长腿则一跑了事，不跑则保守原来地位，作新朝顺民，这种人在北平占多数，事实上已不是中国人了。

您要的字恐怕写不好，我的字在信纸上有时看得，挂上墙简直不成样了，写点来玩玩吧。专颂
安好。

弟 从文

八月十六日（二十三年）

二

家璧兄：

《文艺》自九月份起即拟扩大，每星期出版四次，很希望大家帮忙写点文章。我们拟约八个人写小说，每篇三千到五千字。稿费约五元千字。另外还想约几个人写名著介绍（每篇二千左右）作家介绍（四千左右），因为篇幅较小，字数至多也希望只有四千至六千左右，稿费同特约小说一样。这种文章您如高兴写点，很希望每月写点来。另外我们还想很公平的来写书评，同时要外面帮忙写书评，写得态度正当，即或是那个作者自己写的也愿意登载。又如大部头书如《世界文库》，《新文学大系》，我们想上海方面有朋友肯能公正的写点文章来，好处在什么地方，坏处在什么地方，应当由比较知道的编者一方面的人来写，方不至于偏。北方出版物少，北方需要看南方出版物，上海出版物太杂，我们愿意为读者打算打算，来介绍好书好杂志，提示好作品。这事对出版前途也很有意义，所以希望朋友皆来帮帮忙。

弟 从文

八月廿八日（二十四年）

本篇最初收入孔令境编《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 1936 年 5 月版），写作时间为 1934 年 8 月 16 日和 1935 年 8 月 28 日。

给一个作者

邓骏先生：

七点钟回转宿舍，得到你来信和一篇文章。只从字体上看看也可估计得出你的文章是写得极认真而有内容的。我很觉得幸运能得陌生朋友信托，看得许多陌生朋友第一篇文章。只可惜个人知识少，闻见窄，提供不出什么有益意见作朋友写信参考。个人在这一行工作上，虽写了一堆故事，实在那只能称为“习作”，用学徒作譬喻，一时还毕不了业的！近来倒只想如何从应付生活杂务中抽出手来，好好再写十年，试验试验究竟还能不能用规模较大的篇章，处理一下这个民族各方面较大的问题？更盼望有许多朋友都能在一种诚实态度中来共同努力，用诚实态度重建一文学运动，且用作品重建一社会改造运动。工作对面不是个人的财富得失，是这个民族明日的荣枯；为应付未来忧患；种种民族道德人格形式之创造。我照向例每礼拜四要下乡，去到一个难童学校教点国文，你文章拟带下乡去，俟下礼拜回城再约你谈天，告给你

读后感。关于你说的年青人生命使用问题。从一方面看，你以为可悲观，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也可乐观。我意思指这个民族自信心普遍的觉醒一点而言。因这种普遍觉醒，既是一种事实，国家的重造，又是多数有良心和不缺少青春的血的国民一种共同承认的愿望，这点种子或因子，当前尽管显得如何薄弱无力，在三五年后自然会有极大影响的。战争虽堕落了若干人，或增加他们的神经衰弱，怕变动，怕改革，或增加他们的胡来乱为机会，只图发横财。失去一个公民的应有道德，然而却教育了更多的中国人，使这些人明白战争是什么，而且因战争延长，加强了他们作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和责任心！使他们明白打败仗并不可怕，空袭的破坏更不可怕，只要我们多数领略过这种战争教育的人，都有个信念，有勇气，以为这个国家可以由我们努力弄好事实上就可把它弄好的。至于从瓦砾堆上重建若干更美丽城市，那更不是什么困难事情了。……从这一点来说，我个人以为明白文学运动的重心，当然不会再像过去那么争持名分徒耗力量，共同趋势必然是这种“信念”的产生，和“勇气”的“获得”。既然重在这两点，所以作品的题材，用前线或后方不足可争论点，形式新或旧也不是可争论点，问题在如何可以有计划产生这类作品。在当前情形下，如果有了这种作品时，又如何有计划分配这类作品。文学运动十年来虽已成为“政策点缀物”，却尚不曾更庄严一点成为“国家设计之一部门”。若说有“问题”这倒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然而这问题就个人看来，解决它依然在作者本身。作者必需对这工作有一新的看法，庄严而慎重，比“玩”政治的个人得失打算少，且再

不甘心作政策的点缀物，方能产生庄严伟大的效果，但是目前我说起这一点时，一定还有人觉得不平的，这种人必然是事实上写不出什么好作品，却希望他的作品在被利用上得到“成功”的。我们应当把这种作家放在“希望”以外。

本篇发表于1941年2月18日昆明《中央日报·文艺》第21期。署名沈从文。原题为《新废邮存底（十）——给一个作者》。

对作家和文运一点感想

耕寒先生：

得信甚感谢。《战国策》并非我主编，负责人是林同济先生，我不过间或写点文章罢了。在当前凡事都犯忌讳情形中，我也写不出什么好文章来。你见刊到福建报上的话，实相信不得。毁誉常因爱憎而异，有时过奖，转令个人惭愧。得于此者失于彼，另外说不定正有人指摘我是个落伍代表，你若同时见到这种文章，也许就不至于好奇来找我们那个刊物了。

目下社会中大致有些人因忘不了人给他穿衣吃饭的“好处”，或更想到“出路”问题，拿笔时总犯忌讳，自然便不免言不由衷，写文章近于捧场凑趣。又或别有打算，理欲交战于心，勉强附会，欲为自己出脱，自然更多做作处。我不需要为“出路”担心，也不打量到衣我食我者的喜怒，所以写什么时，笔下或者就比较老实，也比较放肆。这种老实放肆处，或许会接触到一些社会现象。可是照个人所知说来，这些文章除得罪了些低能护短阿谀自卑的人以外，是谈不上什么影响的。正因为中国读书人有个“多数”，都生活在一种可

怕的习惯中，尤以做“大”事的常常眼光特别“小”，多重在“经验”，而一生经验的运用，又只重在能够“对付目前”。这些人既少对国家明日的幻想，又少爱重真理的勇气，更少对崇高优美的抽象原则认识追究的兴趣。虽做统治者，其实只宜做个三等公务员；虽做设计者，或者天生倒是个小官僚；本来虽是专家，在官场习惯中已不知不觉渐渐变成办公事好手，结果一例只知在“承认现状”下拖混，即明知拖混不是办法，然而也决不敢大胆去想想，这个国家如果如何如何，就可能如何如何；要如何如何，必如何如何。在位者以为大势如此，将当前明天，一同付之命运。不在其位者，尚有少许热忱，且明知在习惯中拖混不是了局的，自然便觉得事事痛苦，也令人恐怖。实在沉默不下时，就不免大声叫喊几声，想使多数中的少数知道侥幸的人生观绝对应付不了“明天”。这个民族若不甘心灭亡，想要挣扎，得有勇气先从“因循”习惯中挣扎出来，这国家方可望有个转机。

这就是当时几个朋友办刊物的一点理想。只是理想与事实对面，失败了，这刊物出了十七期，就不能不停顿。《大公报》上这个《战国》，可说是它的后身。原来小册子可为你设法找来。

我那些小文章，已另外集成两个小本子，一个名《昆明冬景》，文化生活社印行，桂林可以买到。另外一个篇幅比较多，也由文化社印行，不久或可印出。这些文章并无什么特点可言，只不过把问题看得远一点，话说得诚实一点而已。我的工作理想还在小说一方面，想凭过去经验作些新的试验。工作将慢慢的来。过去虽写了那么多，其实这一行还未到毕业程度。也许从今年开始，可以写些规模稍大的东西，我说

的大规模作品还只是五万到十万字左右的中篇，内容也必照过去那样平平无奇，不会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大场面。我还是在努力学习明白“人”，并训练如何控制运用“语言文字”，用乡下人老实方法，来处理，来表现。

照一般市场行情来说，我的作品难免不成为“失败”“落伍”作品。我倒不大关心到失败或落伍，我们这个国家极大，即以战争而论，写一城一地得失的要人，写英雄烈士的要人，但同时写因为这种战争，如何在沉默中改造了一些活人的生命，人生观或道德情操，生活方式与生活理想，换言之，即是另外一种“人”的“史”，写它的也需要人。可写的方面多，所以容得下各种人去用各种方式去试验。同时还有那些欢喜热闹又实在写不出什么作品的，也无妨留在大都市中称“文化人”，整日活动，过他的热闹日子，纵不写什么，还是“成功”。但肯低头努力的，亦无妨不声不响的做他所能做所愿做的事。

我是不大了解宣传家所说的文学“运动”的人，所以不大出席何等集会，不领导人也不让人领导，只盼望能用作品和读者对面，或同历史对面。我还私下打量，中国各地方各种事业里，若到处都有这种作者，在稍稍离开为主张宣传或为本人宣传情形下，有勇气拿起笔来，准备写个二三十年，也许会有些好作品——站得住，留得下的作品，可在偶然中产生！至于城市中名气大的作家，日常开会出席，打通电必有他的人名，不是“董事”就是“理事”，拜寿，送丧，写喜幛，办纪念会，这些事照例有他的份，无事时即写写打油诗，充满了海上名士才情与旧官僚气息。这类人在流行政治习惯上，照例是个很有用的点缀物，好像少不得。这就够了。我

们实不应当再希望从他们手中产生什么真正伟大作品。原因是他们太忙，并且已经用另一种努力，使自己就俨然像个“作品”了，还希望他们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是不大合理的。

我说的是正经话。中国很大，各种事都要人去作，为点缀场面，有些本来无用的人，忽然似乎很有用起来。这本是常见的事，你不要觉得我说到这里是在讽刺谁，因为一切讽刺都不如那些人自己两三年来所作为所表现得那么深刻厉害。我纵讽刺也是多余的。我说的全是事实，你想知道的事实！使年青朋友们明白“事实”，有时好像近乎“残忍”。可是，若听你做梦下去，使你只打量到将来走入都市受“大作家”领导，那才真糟糕！

一月二十六日昆明

本篇发表于1942年2月11日重庆《大公报·战国策》。署名沈从文。原副题为《新废邮存底七》。

作家生活自述

××兄：

前寄款（款）早收到，信亦收到。文章在写，照老脾气，自己觉得不妥当时总不好寄出，因此难得到时交卷。寄上一文名《绿魔》，你看看，方法上似乎还新；若以为可用，即用《绿魔》为题。校对时望费费心，错字较少，意思容易表达。第一页子题为“绿”，八页九行有个子题为“黑”，廿一页有个子题为“灰”，排时比本文大一号字体，好看些。排过后原稿寄还给我，希望莫太脏；另外我依然拟写一篇文章补上，怕时间晚来不及付第一期排印，就只好在第二期用了。这里日子太困难，已到自己挑水砍柴情形，好在气候还不太坏，尚有几本书，否则真不容易招驾！并颂
安吉

弟 从文 顿

本篇发表于1944年4月1日《当代文艺》第1卷第4期。署名沈从文。收信人“××兄”为《当代文艺》编者熊佛西。

自滇池寄

××兄：

二月十七日从×××兄处见到你去年十一月廿七寄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尤其是从信中知道健吾诸兄均安好无事。这里佩弦和其他熟友也还平安，只是年分已到，各人双鬓多已带白（孟实闻已全白），白是不可免现象。弟在此住乡下已四五年，去滇池约四五里，终日在小山上看长脚蜘蛛在高大仙人掌篱笆边结网，看云看水，大有作“候补高士”之概。幸尚有些破书残帖，可供消磨。日前曾因心脏虚脱，几几乎已无望重见诸兄，幸救治及时，顷已无事。意者数年后当可与诸兄畅谈南天景物也。乡居极暇。地方景物佳美，气候和暖。孩子已上学读书。凡事自己动手，连烧火砍柴也自己动手，生活另有一种返朴单纯情境。如晤××，并盼为一告近状。专颂

安佳

弟 从文 顿首

二月十九日

本篇发表于1944年11月《万象》第4卷第5期。署名沈从文。

作家书简

××兄：

过贵阳搅扰，忙坏了大嫂，真对不起。我们上月三十就到昆明，半路太累，初到这里气候又太坏，因此一来就流鼻血，发烧到四十度，半个月后方好一点。空气一暖，不知为什么又流起鼻血来了，真是耍命。××离昆明，本想托他带一信，也来不及。××这次因小小问题离开昆明，一时似无一定去处，如果贵州高中要人教书，总望你代为留心一下，免得再向四川跑，看情形到四川总是要教书。昆明情形，他比较知道得多，见面时一定可以谈到。未来以前，我们计划预备住四年。到此以后，我们想住上一年已很够了。我们现在住处名叫青云街，二一七号，离云南大学倒极近。萧乾夫妇，杨先生的少爷小姐，都同住在一处。似乎总得想法搬一个家，一时可不容易搬。这地方找书看，似比贵阳还困难，大学图书馆也不多。新书店倒不少，生意恐怕也不会怎么好，地方出产或者丰富，一般拿薪水吃饭的可极穷，省府厅长据说每月薪水就只八百元滇票，（八十元法币），其余可以类推。

这些人如何过日子，说来倒真是一种“奇迹”。研究起来，极有意思。空气比贵州来得畅朗，不过早晚变动大，出门可不方便。一落雨就可着夹袍。学生精神还好，一般体格也好，只是教书的或因生活太苦，或尚有其他困难，学生所学的，比起湖南两广学生，程度似不如。学校设备也较差，但这些问题多是从本地人听来的，不明白究竟差到什么样子。大学每月不到两万元经费，要办三四院，也亏他们。

听说××改国立不容易，有收束消息，不知真象如何。青崖先生想常见面。黄叔诚先生想已得到费先生消息，我曾去信给通伯先生并费先生，将费先生意思转达。武大四年级尚在武昌上课，费先生应当尚在武昌不动，不至于入川。李先生近来想又得到不少好函。我个人意见，以为就方便在贵阳收集本省作品，必比较容易，且能见好。或有好事者，能就当地妇人自制扣花围胸挽袖手巾包头一类东西，征集到三千件左右，并不困难，但陈列出来，却可称洋洋大观。我倒极希望你和李先生能做这样好事。这工作本地人作来便利，很值得一作。专颂府上大小安好。

弟 沈从文

二十七年五月三十日

本篇发表于1945年3月6日《贵州日报·新垒》第1期。署名沈从文。

收信人“××兄”是《贵州日报·新垒》的编者蹇先艾。

致灼人先生二函

××先生：

诗很好，健实，有力，已付排。惟文字处理还不足副思想所欲达到程度，似得从传统（如古诗中之三曹^①、建安诸子^②、唐诗中之诸方面不同成就）及新语体文（如译文中属于沉思默想比喻丰富，由《圣经》到蒙田、纪德、里尔克^③等断章金言，新作中属于文格试验有成就者，如徐志摩、朱湘、闻一多、何其芳、卞之琳、冯至、臧克家、艾青……等所有不同成就），有会于心，从新融会，从新组织，方能新、能深。至于长诗抒情，尤其大不容易，照目下你所能调理文字技术说来，难望特别成功，词藻尚不敷用，即有观念，亦难表现。文法上还如时下诗人所用方式，“然而”“但是”以及“呀”“啊”“呢”“哟”等虚字助词连用，欲去掉它便若不知从何着手，证明还不大理解中国文体中简洁文格的变化，

与诗如何相关（词曲用虚衬，诗不必要，为的是诗有诗的文法与格），代为删去不少。慢慢的从试验来积累经验得到进步吧。这是个长时期的探寻工作，真的结论不能由任何理论家提示，却必然要真有手和心的新诗人去证实。这工作要真的战士来从事。谦虚、沉默、深思、客观的比证与选择，准确的表现，方可望走前一步，进而达到一个新的据点：个人或一群暂时稳定到此新的法则上，各有不同表现，再从而进取寻觅，真的光辉进步方能得到。诗应当是一种情绪和思想的综合，一种出于思想情绪重铸重范原则的表现。容许大而宇宙人生重作解释，小而对个人哀乐留个记号，外物大小不一，价值不一，而于诗则为——。诗必需是诗，征服读者不是强迫性而近于自然皈依。诗可以为“民主”为“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但是否是一首好诗，还在那个作品本身。一个不高明的推销员所作的招呼，卖不出牙膏和肥皂，何况有些事比牙膏肥皂推销为困难。我们的困难在充数的诗人太多，却迫切要他人认可他为“大诗人”或“人民诗人”，没有杜甫^①十分之一的业绩，却乐意于政治空气中承受在文学史上留下那个地位。表面活泼而内容贫窘，居多在他人承认以前，先由同行估价，估价虽高，成就并不真高。个人或尚可陶然自得，然若用此标准代表一时代成就，则终不免有害于己而无益于事。这个例，可就不用举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部门工作，若还保留些些憧憬，值得共同用一个比较谦虚诚恳态度，来作较广泛的学习。所涉及的方面，或比目下诗人所能到的广一点，深一点。

二

灼人先生：

你的信我已拜读了，因载出的诗有些小小字句掉动，以及明明白白写作“废邮”的短信也使你不快，两天思索还失眠一夜。这事太平常，你怎么就会这样？我是个编辑，什么人寄作品来，我觉得好，为刊载出来众目共赏，这是十分自然的事。觉得不够，为小增减，就为那些普通读者能理解而略为增减，也极平常。改得对，无功可言，改得小失原意，也不会得到作者过甚责备，因这事极小，不宜有何恩怨。那个短信只是就事便中讨论讨论，也即因为想到这对作者为不必要，所以不给你，只作废邮补白。我说的时下诗人根本没想到你提到的那几个诗人，对他们不相干的。（在云南在北方很少看到他们集子的！）你说我对新诗看法代表什么，我从不代表什么。我只代表一个不大懂诗的编者一点意见而已。有人以为对，很平常，以为不对，也极自然。正如你觉得

路上

碰到了庄稼人

采樵夫

.....

以“呀”字有无影响到诗如此重要有人以为对，有人以为不对，都不可免的。

我看你对于这事太兴奋了，这由于你思索太久又失眠一

夜，你若平静些些，就会不至于以一“呀”字到为此严重了。你若想到这是一个虽不懂诗但却相当懂普通读者的编辑一种好意，什么事都不用说了。

我现在复复你所未明白的几点小事，一、你信第八页说的本来即是“谨慎你的脚步，你的心！”报方遗落一个你。二、隔行处×××是报馆所加，我不会加上的，你只看看你原文即可明白。这大约因你分行，他们恐错误，方为加上。凡涉及这些地方，你大致是发表诗不多，太爱好，方为此也十分难过，且来责备编者。如写到一百篇以上小说，想想那些排字工友为何仔细为你排字，也就不好意思责备人了。三、你这个信既明明给我的，不好发表 即发表了，将更引起你的不快，因为第一、你这种对我的责备不大合情理，我不在意，别的人会觉得你不合，第二、你引的诗如

去
创造
传奇

以及分行主张，能理解的怕不多，若诗还一定要靠分行来表现，且为此分行，那写这句子成直行即不成诗，所谓诗岂不全依赖分行方存在？又如用“！”代“呀”即到使人啼笑皆非，及“呀字蕴含无限热爱”，我也是个读者，以读者立场来说，是不能如作者那么明白理会的。诗要人人懂，要普通人懂，普通人怎能从呀字懂许多隐约感情？你写诗认真，对读者能力程度的估计，可太不认真了。

你说我盲目，这形容很对。因为避免更多读者说我盲目，

复你的信我寄给你。我既然是个盲目的人，又不懂诗，怎么再能指教？现在这个信只是告诉你一点事实，免得你因误会难过，难过太久，又写这种信骂我。你若写诗，无妨把这个信和你自己的信保留下来，十年二十年后，或者还有用处。目前你除了自己的诗，什么好意见都不需要的。你也不必因为误骂我而难过，我写小说，就重在从一切人的行为表现上学理解人长处和弱点，不大注意到他人对我无礼的。这是小事！你的信和诗原稿同奉还。

沈从文 三十六年三月廿五

本篇所收废邮两则，其一原载1947年3月22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原题《新废邮存底》，署名编者；其二原载1947年4月21日《清华周刊·清华文艺》，原题《沈从文先生的回信》，同时发表的，还有灼人致沈从文的信。

① 三曹 指三国魏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

② 建安诸子 指汉末建安时期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场、刘桢诸人。

③ 蒙田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散文作家。

纪德 法国作家。

里尔克 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

④ 杜甫 唐代诗人。

【附录】

灼人先生的信

沈从文先生：

三月廿二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看到我的诗了，谢谢。还看到你的《新废邮存底》，知道是你写给我的，我这才发现了拙诗已经被删改了很多。有些地方改得很好，有些地方就感到不舒服了。我重新仔细地看了你的《新废邮存底》，我这才明白你所以那样删改，是因为你对新诗看法不同。为了这，我经过两天的思索，并且有一晚上失眠了。我是否应该给你写封回信，说明我对于诗的意见。我对于新诗还是一个初学者，诗既写不好，文辞又拙劣，不能表达意思于万一，所以迟迟未敢执笔，但又觉得自己的不舒服还可忍耐下去，诗的本身既变了形，不免影响到一些人，以为这样的诗才值得学习，有些朋友也以为我忽然写起这样的诗来了，这却不应缄默。所以我这时不计较文辞的拙劣，硬着头皮写这封信，说明我对新诗的意见，如果先生喜欢，并且有这种度量的话，最好能够把它发表。

你对于诗的看法我想可以代表一派人的传统看法（照一

般人所说的“京派”也未尝不可)。你希望我从三曹，建安诸子，唐诗及译文中属于沉思默想比喻丰富，由圣经到纪德，里尔克等断章金言，和徐志摩，朱湘，闻一多，何其芳，卞之琳，冯至，臧克家，艾青……等人的诗中去学习，“有会于心，从新融合，从新组织，方能新，能深”。是的，这各方面的诗我都愿意去涉猎，并且都已经多少涉猎过了，其中有些诗作还摸得透熟，不过到了现在，除了艾青，何其芳的诗有时还看看以外，其他你所列的“新语体文”的诸人诗作已经不再感到兴趣了，正如你所编的《文学周刊》及《星期文艺》发表的新诗不使我感到兴趣同一个道理。因为这些诗似乎落后一些了。它停留在抗战前的阶段，即使在内容上有现实的东西（如臧克家的诗），在形式上仍没有摆脱传统的格式，以新的内容附托在被人抛弃了的骷髅上出现，更加难看。诗之所以成为诗，第一个条件，就要使读者感动，如一首诗像豆腐干式或泼妇数说家事式的干燥，固然味同嚼蜡，而埋在一大堆词藻底下所谓沉思默想比喻丰富的诗，除了把活生生的思想，放在铸范的文字上玩弄玄虚的把戏以外，找不出有血有肉的感动人的东西来。什么“生命”“永恒”“智慧”等空洞的观念，转来转去，这才是道地的所谓“内容贫窘”。

你似乎特别注意到文体简洁，（但又喜欢一大堆词藻）反对“时下诗人”所用的“文法方式”。你说诗不必要虚衬字，“为的是诗有诗的文体法与格”，所以代我删去了不少“然而”，“但是”以及“呢”“呀”“啊”“哟”等虚字。这似乎有点不大妥当，因为这样无情地一概删去，不管那个虚字与诗的情绪及思想的闪露有没有关系，只有不懂得诗的人才这样做。一首诗是作者主观意志的燃烧，情绪与思想混合着闪现

出来，由深底向表面激动，每一个虚字都助成它激动程度的深浅以及情绪显现的完整，如：

她的叫喊
是这样的微弱么
呵
生物

——孙铤：晴干的乡间

这里的“呵”字是作者对一个脆弱的乡妇表示叹息，不可去掉，同时把它当做一行，有加重其感叹的意思，与后面“生物”一行连起来看，情绪就很圆熟，并且在这情绪底下使人体会到作者有种温热的忧伤与同情。如果把它去掉，或把它拼合在别一行里，情绪就不完整，同时也会失掉它温热的感情。同一作者的另一首诗《途上》“呀”字也用得很好：

路上
碰到了庄稼人
 采樵夫……
他们呀
是我们的便衣哨

这个“呀”字就表现了作者对“庄稼人”“采樵夫”们的无限热爱，如果改成

他们

是我们的便衣哨

便冷淡无味，失掉了使人感动的热爱。如果把它拼合为“他们是我们的便衣哨”那就不仅不能使人感动，连诗的情绪也失掉了。

到天晚所有的我们底裸麦
必须割完……
你在哪里，朴洛克，西丸 司丁奈且？
怎么不来帮助呢？……

——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

这是俄国诗人的诗，译者孟十还先生在末句放上一个“呢”字是根据诗中人物说话的情绪而放上的，你能说这个“呢”字用得不好吗？这个“呢”就表现了说话者的温婉感情和忧虑的心绪，如果去掉，诗中的说话者就变成一个性格躁厉的人。“怎么不来帮助？”毫无温婉感情可言，也失掉了

到天晚所有的我们底裸麦
必须割完……

的庄重，温和，忧虑的感情。

我的缄默成熟了吧
于是
吐了唾沫

用脏污的袖子抹去了
脸上的汗
跟随着
一个跟随一个
我们去搜索那些烧焦了的
轰毁了的屋子

——孙铤：七月里的行进

这里的“于是”照你的意思又是“不必要”了，从前后文看去，不仅是必要，而且还必须单独排为一行，

于是
吐了唾沫

显示了作者的分明的决心和意志的推进，并且使人感到心情的沉重，后面接着较长的一行，在诗的情绪上表现了作者思想的庄重，不是放荡不拘的人。如果后面接着的都是连续的短行，作者的思想 and 情绪就不甚庄重，意志也就不深沉。如果后面接着的是一连较长的几行，则诗的思想 and 情绪就显得呆板滞重。所以，长短句的排列也是基于作者思想情绪的内在节奏而产生的。读者应该抛弃因袭的见解，细心地去体会，就可以知道一部分“时下诗人”诗作的好处。先生以为“时下诗人”的诗作“表面活泼”“内容贫窘”，大概是你不大了解它的内容或者缺乏这种思想与生活经验所致。自然“时下诗人”的诗作不会全部都是内容充实的作品，但有些内容很

充实，却不能一概抹煞。如上面所引孙钊的诗，孙钊我不认识，也不管他是否“先由同行估价”，仅就他出版的诗集《旗》里的内容看来，我知道作者在抗战时期在敌人后方艰苦战斗生活中成长，他的诗篇铿锵的内容，是“纯真而坚决的战斗意志的声音”，其他如：

手呵
像十月的森林……

——绿原：行进，歌唱

并没有一大堆比喻丰富的词藻，如果稍微有点国内外历史知识的人，懂得社会的实情，就知道这诗句比喻的丰富，内容的充实，不仅表面活泼而已了。又如：

去
发掘
牧歌
去
创造
传奇
去
拥抱
新大陆
新世纪
和新生代

这是彭燕郊悼东平的诗《在这边，呼唤着……》中的诗句。在形式上容或受玛雅可夫斯基，田间等人的影响。“表面活泼”自不待说，并且有种“打鼓”的声音，同时也表现了“主观意志的燃烧”，就整篇作品来看在内容上你能说是“贫窘”吗？在桂林的时候，我曾经认识彭燕郊，并且和他来往过一些时候，我知道他在学识上或许差一点，但他的生活经历却相当丰富，有天才。他的诗也是从战斗中获得思想与认识。作为一个诗人或文学家，首先必须经历过战斗生活，他的作品才有深远的思想，和充实的内容。即以沈先生而论，如果没有经过那一段上兵的战斗生活体验了兵燹与农民生活的实情，恐怕也不会产生前期的辉煌的作品来吧？在这基调上，你多少与“时下诗人”的战斗生活有些微相通的地方，由这一点引申出来，也可以解释你的喜欢引用艾青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点缀的微情了。

我喜欢你这一点微情，虽然自己不懂得“中国文体中简洁文格的变化，与诗如何相关”，也乐意把拙作送给你发表。当时你曾经对我说“我也不懂诗的”，我以为这是你的谦虚，你也当真把我的诗改了发表，并且还写了一篇《新废邮存底》，你的好意我自得感谢，我同时却知道你当真不懂诗了。我的诗不好，我应该有这点自知之明，但是你改了我的诗，有些地方却使我的诗更坏，所以感到不舒服。开头我说有些地方你改得很好，如第一首《月黑晚上》有一处地方原意是“三月失掉了春天”，你把它改成“春天还早”，就比我乐观得多。但末后一段原文是：

别在这方格子窗下做儿女的梦吧

准备你明天的旅程

你却把它改成

别在这方格子窗下做儿女的梦！
准备你明天的旅程——
谨慎的脚步，你的心！

把“吧”字删掉，加上末后一句。依你传统的看法，当然很好，但却比原文累赘呆板得多。原文不是更加自然么？情感不更加温婉深沉么？第一首改的地方还很多，这里不必赘举。第二首也有很多改动，单就末一段来说，原文为：

我愿意化为尘雾
溶解为声音

你把它增加成“传统”的完整形式：

我愿意化为尘雾
溶解为声音。
我迷惑，喜悦，重新发现了
自己的存在——永生。

这样一来形式自然完整，词藻也增多了。但却并不是画龙点睛，而是画蛇添足了。我觉得原文意味无穷，可以给人反复咀嚼，思想可以任意延伸，形式上也转动自如，经你一增加，

已经没有给读者思索的余地了，在形式上也使人感觉到暗中有一条绷带在束缚着。第三首（内陆的海）几乎所有的“呵”“呢”“呀”都被你删掉了，（你所说的“然而”“但是”等虚词原文并没有）你这样的删削似乎有点盲目，证明你的确不懂新诗。

内陆的海呀
白天你使大陆明媚
黑夜你使大陆生光

你把它删成

内陆的海！
白天你使大陆明媚
黑夜你使大陆生光

用冷酷无情的“！”惊叹号去代替那蕴含着无限热爱的“呀”字，看后使人啼笑皆非。这首诗第一行原文本来是

不平静了……
内陆的海

你把它拼合为一行：

不平静了内陆的海……

作者正待展开的一面温热的感情浪潮经过你那么一拼合，变成被歪扭的狼狽者的情绪，不仅不能激动读者，反使读者竟觉得狰狞可怕。还有使我不同意的是段与段间的空行，你都用×××去塞了起来。本来留空行是分别一段与一段的意思，或是情绪向前波动时内在节奏的暂停，藉以整顿展开的情感，使它更幽美或更激动地向前闪现。所以空行的深底是有着段与段间思想情感的联系的，你把×××塞上去，无疑的是对于艺术的割裂与破坏。

你说“诗必需是诗，征服读者不是强迫性而近于自然皈依”。这话倒很有意思，也可以窥见你对于“时下诗人”那种意志的燃烧和打鼓样的情感感到害怕。一个冷静的漠然的艺术家只能够在柔和的微风中与温暖的阳光下去制造艺术和欣赏艺术，如果艺术品带有风暴的性质或强烈的光芒，就有被强迫的感觉。如果一位读者读一读“时下诗人”的诗，就感觉被强迫，证明他还不懂得一点诗的艺术，只是他的思想认识和勇气太缺乏了。有思想认识，勇气和经历过生活风波的人，对于这种“强迫性”的诗，我想他不会感到强迫，只会被深深地激动。使读者缓慢的自然皈依，不是诗，而是散文，（这意见或许有点武断，我希望能够再听到你的意见。）诗也不是强迫别人，而是感动别人，诗与散文的区别主要也就在动的深浅上。

末了，说一些题外的话，我始终是敬重沈先生的，对于沈先生的诗论虽不敢苟同，但沈先生的散文的确很好，细腻深刻。在散文方面，我希望得到沈先生的指教。

祝 文绥

晚生灼人上 三月廿五日

（这两封信恐保存不周，未及一二十年或即遗失，我把它发表出来，倒还符合沈先生的意思。至于沈先生的泡沫样的理由底下包含着怎样的心情，由读者去理解吧。

——灼人附言）

致大牛先生

大牛先生：

得来信谢谢。你二十岁过头还自称“孩子”，这是很可羞的事！由于你的把自己看得太娇太脆弱，我无从和你谈写作问题了。你说你想挣扎奋斗，我看就从这一点起始吧。你已早到了应当对自己生存和发展负责的年龄，不要再以为是孩子吧。我见过好几位十二三岁即作小护兵小学徒，自谋生活，到后且能由中学到大学，大学毕业时还只二十一岁的青年。也见过好几位十四五岁即经营一家大小杂事，一面作人家庭教师一面读书自食其力的小姐。这才像是在战争中长大的青年！你二十岁了，和好些缺少自觉以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的人一样，还用个孩子的情绪状态过日子下去，也前进，只为了怕人说落伍，也间或作点抒情诗，只为了以为这个工作比别的学习容易表现成就，也烦闷，说是为国家前途茫茫，你就从不好好从历史多明白一点这个国家究竟问题何在？你的做人态度和写作态度，正代表日下一型。比起另外那些结实少年来，相形之下，你的脆弱与无知，以及什么都不曾学

好却先学得世故的小聪明处，倒真是个孩子，但这实在是个如何不自重的孩子！你长于算计处，且如何像个小老人！你说你写作已三年，写完后自己却懒于再看，只望编者多改改。字义那么草率马虎，四千字不到有十六个错。这种懒惰中的聪明，拖混中的向前，怎么能得到进步？思想即再前进，对社会重造能作出什么贡献？我问你。我想从你更新工作表现上，看看你是否有勇气做个独立自主的人。你说“前进”是虚话，你得学“结实”。工作表现上用“诚实学习”代替“虚伪激烈”，对你实更需要。我们不怕激烈，怕的是虚妄和世故，在别方面需要的，在写作学习上可不需要！

本篇发表于1947年4月12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36期，原题《新竣邮存底 二五三》。署名编者。现题《致大牛先生》为编者所加。

致今是先生

今是先生：

得示谢谢。大作不拟用。刊物来稿诗格外多，每星期出专刊也排不了。新诗目前发展的确是个问题，解决它恐不在空间理论，还在作家。要有很多忠实诚恳的作家，来各自努力寻觅发掘，来作种种试验。我对这部门工作，所有意见对你写作恐无什么帮助。说外行话我总觉得诗应当是一种比较精选的语言文字，在有限制的方式上加以处理的艺术。在表现上它至少得比普通散文讲究些也经济些。容许于小小篇章包含一个较深刻的观念，倘若作者真有这种观念。也容许用它来解释一种抽象原则或表现一件具体事实，重要的是以约见著，能于少分量文字中解释并表现发生较深较持久的效果。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和效果得有极深理解，更懂得传统诗与人生命结合时的情绪状态，尚如何影响到当前的传递和感受，能如此，方可望写得出真正好诗。这意见很显然和目下一些诗人意见有个鉴赏距离，也有个根本歧异。因为就目下许多即景诗作而言，若在散文标准上比较，深的即晦涩得比古文

难懂，浅的又显得单薄无意义。

但这照例都叫作诗，而且有许多人在创作，在模仿，在应用。问题也就在应用上，由于应用不同因之而有距离，有歧异。深的希望收容哲学，浅的却乐意配合政治，两者都各有成就，惟本身真正的成就却独待来日。问题不在是否“容许”，只在是否“成功”。目下“成名”的不能说即是“成功”。

你说发表能鼓励写作，正如什么学术奖金作用一样，虽是事实，恐只能鼓励普通作品产量的增加，无助于伟大作品的露面。文学作家和科学工作者，在这一点上有个一致性，即工作动力不必要外来奖誉，却发自生命深处的一种超越理想。并且一个刊物的理想，也不仅在鼓励他人写作，还必需挑选发掘那些结实的新人新作品。这种新人文笔长处各自不同，却必然有个共同认识，即写作愿望并不维持在批发趸售上。凡勤于学习、勇于试验而怯于发表的，路走得必较远，即有挫折亦必能努力克服，得到应得成果。至若急于小成，对工作又缺少虔敬和谦虚，并缺少广泛而客观学习兴趣的，或二三年间，即另有所图，搁笔不干，或十年八年，把握工作虽认真，可毫无真实进步（不幸的是这种人甚多）对从事写作的优秀少壮言，有无“出路”实不必为他担心，（近二十年极少真有成就受委屈的作家，多的倒是做了作家十年八年不知如何用笔。）可担心的倒是他并无优秀作品。为的是动力薄弱则难持久，玩玩即完事，不特别努力，即玩下去也不会有何特别成就也。至于用诗作政治抒情工作的，到末后当然是他作了“活泼的诗人”，可不大容易留下多少“结实的诗”。因为这似乎已经分成两件事，照目下流行方式，虽兼顾并及

不容易。虽然我们都希望有人能兼顾并及，我们希望这种诗人成就实在常常比他自己希望还深切。

你说写作需“天才”和“进步意识”，我看恐怕还是要“规矩”“认真”的工作态度，缺少这个不会有奇迹发生。除此以外要对工作专诚狂热和持久，由态度进入实证。熟人中有写到五十万字作品，搁下三年还不发表的。有出过三个单行本创作集后，明白工作成就难望突过他人纪录，即转而致力译述，印行过二百万字译文名著，还不让人知道真实姓名的。也有每星期写一短篇，四年来工作从不间断的。这是写作一例。是从事这种庄严工作应有的单纯素朴态度。你问我工作方法，十分简单，不过是小心写成，重抄重改个七次八次，如此而已。这也许应当名为“秘诀”，为的是说来你依然不会照样去做，为的是方法相当笨。孔子说，推己及人谓之恕，因便中附及。

本篇发表于1947年4月12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36期，原题《新废邮存底 二五四》。署名编者。现题《致今是先生》为编者所加。

谈新诗五个阶段

××先生：

大文已拜读。您想对“诗”的界说得到一个印象，一种概念，由我试作说明，还不如从近三十年这部门优秀成就，有所折衷，容易得到一个“新诗是什么，可能怎么写”的结论。近人欢喜说时代，若把新诗分作五个阶段，且尊重一个“明白易懂”原则来读它时，我们会觉得回看五四时代诸作，至今依然还有启蒙性，值得注意。“新月”时代如徐志摩，朱湘，闻一多……诸专集，一面具有多方面的试验勇气，一面且企图把握到语言节奏的本性，也得到相当成功。第三期从民二十起始，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卞之琳几个人的成就，正表示这个试验又有了新的的发展，如何由明朗入晦涩，在作品中则个人性格凸出。到抗战，高兰、王亚平、彭燕郊、艾青对朗诵诗各有贡献，到最近，如冯至，杜运燮，穆旦……几个新印诗集，又若为古典现代有所综合，提出一种较复杂的要求。到明白近三十年这部门的工作时代不同的成就，

弱点与长处何在，且看得出还有些什么新路可走时，自己用笔就会有把握多了。

本篇发表于1947年7月20日北京《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第13期。署名从文。原题为《新废邮存底 二五八》，现题《谈新诗五个阶段》，为编者所加。

谈文学的生命投资

××先生：

谢谢寄来各件，我并不懂诗，尤其不懂近十年来的“诗”，对你作品得失自然也说不出什么道理。不过试从散文观点看。你作品运用文字实在太讲究了，似乎只想向深处走，求于精美中见深，企图运用抒情词藻和具有抽象意味名词揉成一体。结果是文格理解稍窄受其拘束，因之不免有点涩味。写来虽十分费心，可得不到共通传递效果。若写诗也许值得你从近三十年新诗作个广泛的探索，可望得点新的启发。最好还是用手中笔转而写散文，兼叙人事的散文，不太拘泥于故事所需要的过程完整，却容许在景物印象、语言对比、观念诠释、人事发展上作各种不太谨严的段片拼合，涂金绘彩至于夸侈，素朴无华近于贫俭，粗俗中增饰妩媚，庄肃中又注入点点幽默，总之，如彼或如此，重在将一支笔向各方面活用。这一面可引导你手中笔紧贴住事，在叙述上即容易落实、具体。另一面，又可望将一些属于抽象观念和纯粹抒情

的词藻，加以节制、拣选。因为这个习惯的获得，文字用得准确而用力，这自然也只是我一种推想，未必对你写作有用，为的是各人有一分各不相同的经验背景，对文字对人事，感受反应也不尽同，简单原则实并不适用于每一人。惟就事言事，你值得那么试试。至于纯粹照我的习惯经验取法，恐无意义。正如每一个船长不必如哥伦布^①方式航海。我因缺少基础工具，方从标点起始，一点点学习，慢慢的把传统作广泛吸收、消化、综合，而又努力将这个传统抛弃，试用种种文格来在我所接触的人生，作种种塑造重现试验。试验了近三十年，对自己还不脱离学习状态，对读者自然也只能留下个模糊印象。若把精力浪费和工作成就比较比较，就可知成就实在极少，生命却已浪费太多，这对我纵不妨事，对于一个正常人的生命而言，实在太不经济了。工作未免太费事，担负未免太沉重了。这么写作一支笔常常不免把作者带入了宗教信徒和思想家领域里去，每到搁笔时衰弱的心中必常常若有一种悲悯情绪流注，正如一个宗教信徒或一个思想家临死前所感到的沉静严肃。并且我明白，也幸而是写小说，无节制的大规模浪费，方能把储蓄积压的观念经验，慢慢耗尽，生命取得平衡。若写诗，情绪过于集中，耗费不了，恐就只有一堆观念一堆人事印象滞塞疯狂而死了。

提到这一点时，你想必能明白，因为你的诗节见出沉思的组织 and 对于文字的较深领会。要写作，把工作慢慢持续发展下去吧。这也正是一种战争，可比那些大将军应付目前的问题还困难得多，需要一个人从完全孤寂沉默中来完成，待突破的却是文学史上一堆作品作成的高墙。这是种艰辛事业，

不是普通职业，唯有人肯把生命作无取价的投资，来寄托一点希望的，方能参加，而不至于中途改辙或短期败北。

本篇发表于1947年7月20日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第13期。署名从文。原题为《新废邮存底 二五九》，现题《谈文学的生命投资》，为编者所加。

一首诗的讨论

张白先生：

大作已拜读。读过的印象很好。乡村抒情注入悲痛，文笔拙质中见出一点妩媚，此时下常见流行名词一堆的新诗实不相同。惟这种村女簪花样子，出现于大都市，摩登青年能欣赏能理解的恐不会太多！私意这正是现代新的抒情诗一格，充满土气息，泥滋味，还有前途可供作者用笔作各种发展，唯有对农村原有的素朴和平具深刻诚挚的爱的作者，才能够写得出。深盼望有新作能够寄来。且就你笔触所及看来，如能够试用于散文，人事景物兼叙，将农村土地人民为无终止战乱，所摧毁残杀伤心惨目无可奈何的种种，于篇章中试作各种设计来加以审慎处理，定必有更高成效。近二十年来所处理这方面题材的，如芦焚、废名、沙汀、艾芜诸先生，多因文格各自不同，使景物人事鲜明凸出，各有成就。（近常为人道及的赵树理先生《李有才板话》，也同属一型，则稍近变格。）最近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常载邢楚均先生有关西南地方性故事，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揉游记

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二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具有这种企图，以为这种方法处理有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功。但作者一支笔若不能好好控制运用，在文格上见不出如何长处，又对人事景物描写若缺少敏锐感觉时，也不易有何特别效果。这么写无疑将成为现代中国小说一格，且在这格式中还可望有些珠玉发现。□□□□□正如处理都市人活动与情感复杂，尚有待于另外一种文格作种种试验探寻，方可望保留些动人篇章，足为论及现代文学的学人同好示例作范。极可惜即现代文学受政治牵引力过大，“深思”二字在作家中实近于忌讳，一切以“信”出发，在取舍徘徊上，在有形限制无形禁忌上呆住了多少有用的笔！因此在这方面的试验探寻，恐亦不免成为无益之业。目前期望多数能用笔的具有这种正确认识及牺牲勇气，为不可能。必待二三优秀作家于沉默中作个长途跋涉，有优秀表现后，大家方承认问题如此如彼发展，为自然合理，这部门工作进步，一半实决定于“工具重用”原则，为“用到各方面去”，方能够真有进步也。废话一堆，若与尊兄小有牴牾，能不以为意，幸极。

九月十日

本篇发表于1947年9月2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58期。署名编者。原题为《新废邮存底 二七三 一首诗的讨论》。

一个边疆故事的讨论

萧兄：

得你来信，草原文章续编极希望能早日见到。××苗区文章也盼能拜读。

关于喇嘛庙中制度，绥蒙区大庙中会松弛散漫到这个样子，真想不到。庙规制度紧严或数西藏拉萨，曾闻一旅藏几十年康先生谈及。在游记文章中提到青海拉卜楞寺僧侣生活制度的，顾颉刚先生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写得很好。涉及南中国藏族喇嘛庙僧侣生活制度的，李霖灿先生有一篇“中甸十记”，也极有意思。其余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一定还多，可惜不常注意到。（想理解这个区域宗教信仰的形成和存在，情绪背景不能不多有一分注意！）关于康藏情歌，刘家驹先生辑译的若干首，多用天地鸟兽虫鱼花草自然状物和草原情爱并及，有“原诗”意味，拙质中多妩媚，富草原游牧气，奶酥气，我觉得很好。收集的分量并不怎么多，曾印行过，有朋友从云南维西木里带回，值得选一二节放在你那故事中，可增加草原游牧人抒情空气。

这个故事将来应重作安排处，似在字数分配上和量物添补上，都须给以谨慎注意。故事字数可扩大到六万。故事既大部分在一个草原孤立庙宇中，即用绥远“五当召”作范本，就要从各种情形下（四季和早晚）作些不同风景画描写加入，这种风景描写且得每一幅用一不大相同方法表现。还得记住要处处留心，将庙中单调沉闷宗教气氛和庙外景物鲜明对照，将僧侣拘板生活装束，和集会期中蒙藏女人大绛绸黄衣袍、料珠镶绣装饰于头上手上那分活泼生动对照。男子在“禁忌”与“期望”上挣扎游移，作错综发展。二十岁和四十岁和六十岁有个不同过程，要理解又能用文字说明。这个人如何由观念凝固转入狂态自虐，由痛苦中得快乐，也有个心理过程，要作用力而扼要叙述，方与全事相称。至于僧侣由小沙弥^①身分到作大德高僧，升级种种仪式即不能细述，最好要交代一笔，照规矩去拉萨留学，受训，拜佛。一面是智慧增长，一面是人情不断，方可收道高魔高相对峙映照印象。女的由病而疯时，仅写本人难见好，不如把本人放在外景中，好好布一场草原外景，用黄昏和清晨可画出两幅带音乐性景物画，牛羊归来和野花遍地，人在这个背景下发疯，才和青春期女性情绪凝结相切合（这也要占个二千五百字左右）。还要在全故事中点缀一些游牧外景和蒙古包中内景，比已写到的笔要细腻些，得写一二次吃喝，一回敬佛，这些描写都要故在疯后生活中。想从修整中见天然，还必需在整个故事里充分注入作者贴近土地的浓厚兴趣，如牲畜群聚散或生子描写，如内地商人和蒙人作交易描写，有些小景小人事穿插介入，故事即可在动中进行。一切似乎都永远在动，却有个由爱情而游离了的凝固灵魂，静静的独自反复唱歌，似乎不受时间影

响，而凝固于原来观念上、时间上，悲剧性就强多了。（这是作乐曲的方法，许多音都在随同一组声音相互关系而发展，就中有一个主要的声音却似乎停顿延续于另外一种方式上，形成矛盾对立而又谐和一致状态。）有关小小人事，比如说，蒙人与内地商人作生意，照规矩内地商人要故意装作不小心，让他们偷携一二小物事到袖口袍中去，再来谈买卖，游牧人因占了点小便宜，心中过意不去，即不甚还价买了许多东西。内地商人狡诈的，更常常故意和他们要好，大家都喝醉后，这商人就装作十分慷慨，分一半商品给他们，他们有了醉意，却当真慷慨分一半牛羊给商人。这种“情感交易”也宜于插入。处处写他们拙重厚实而容易上当处，另外即见出一种伟大，亦即所谓加重草原气和奶酥气！这些事与本事进行若游离，实相关，因必需如此如彼方能增强本事效果也。这种广大而精细的处理，普通人写不到，是由于理解不够，思索不够，组织力也不够，故无可希望。许多人会以为如此努力用心，还不如另写一篇，照例即讨论到也倦于修补（这种写作态度即注定了他们作品的平凡命运）。其实你与其写十个平平常常故事，还不如用十倍精力来扩大重造这个故事。一个有分量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却常常比一大堆作品有意义，就全看作者态度和用心。

照我个人意见，一个作者大致能“狠心”一点，不怕头脑中血管破裂不怕神经失常，在一故事上想来想去，在一堆故事上更养成这个想来想去习惯，结果会慢慢的使头脑形成一种感觉，一种理解，发现一切优秀作品的必然性和共通性，从自己从他人作品中，从今人或古人作品中，从本国人或异族人作品中，都若可有会于心，即作品中可以见“道”。因为

这些作品完整处将恰恰如一种思想系统。一个人生哲学家可能要用十万二十万字反复譬解方能说透的，一个作家却可用三五千字或三五万字把它装在一个故事过程中，且更容易取得普遍效果。这个安排是否有望，从作者言即在我说的是否“狠心”。要狠心到不怕中风不怕疯狂程度，不在作品篇幅数量上注意，不在作品问世时成败上注意，只注意到把故事从最高标准式样上完成，而有个永远不惜工本的专注，能够那么作下去，你即或写的是一个比这故事还要荒唐无稽的传奇，正如一个雕刻家用粗麻石雕一个海怪的狂态，以及一群毛毛虫的三匹蜗牛沿木而上自得其乐的神情，在表现上也将充满人性，而又分量沉重，诉诸人类感觉，得到完全成功。至于用较细致材料如铜木玉石来处理人事哀乐，自然就更容易着手容易见功了。

这么写作很显然对许多人都不习惯，还会自己嘲笑自己的。因为用心方式正和普通写新闻通讯完全相反。可是却不能不承认，在文学史上，留下许多有分量东西，大件的不用提，即小件如三五十字诗歌，篇章虽小却见得分量沉重而生命活跃，形成另外一种伟大意义的，即是那种头脑那种心情，那种对工作虔敬精一忘我的作者产生的东西！

这里当然也有一点困难，非人力可尽功的困难，即一个作者生命的发展并非抽象原则方法可以控制或决定。它的完成实由于各方面的凑合，并非单一的运用。它和“时间”有关，和“知识吸收排斥习惯”有关，和“生活”有关，和每一个人“体质”发展“情绪”发展更相关。就中有若干偶然的因子，形成极大的势能想作有效控制并不容易。不仅每个人发展不能尽同，即同一人也不容易在两种日子中有个相同

生命，能使手中一支笔作相似运用。一切都流动变易中，包含外面存在和生命本体。从这个变易不定的世间中，想用文字或其他材料，从某种方式中完成一些东西，保留下一些虽变而不变，或在变易人生中一种过程，或在过程意义上依然留下些不变的憧憬，（比如说，人性基本上的爱憎取舍，这一时代的爱憎取舍方式，在这方式上保留下的较高尚的憧憬。）从这个意义中，我们看出文学家或艺术家的伟大，也看出他们的天真。越过名词褒贬，还可看出它在人生中存在的庄严意义。因为唯有它能在宗教和政治以外，把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生长的生命，以及生命不同的式样，发展不同趋赴相同的目的，作更有效的粘合与连接！由此认识出发，一个作家应当如何忠于其事去热诚工作，用不着任何理论来支持，来说明，他都必然英勇而前，……而真实的成就，又必然是寄托于更多执笔者的努力各自为战，不是少数人独霸独占，情形都很显明！用那么一种创作态度去写作，即如你写的这种故事，也就必然会充满了传奇性而又富于现实性，充满了地方色彩也有个人生命流注。这个混合在目前即缺少读者理解，到另外一代，还会由批评家发掘而出……

为另外一代，我们需要培养这种作家，也培养这种批评家。至于这一代，我们很可能是要各自分担时代悲剧所给的一分，官僚万能而哲学贫困。这种故事的写作，将看作毫无意义可言，也不出奇。为的是它什么宣传意味都缺少，作者努力用心，却只能说明一个生命向内燃烧的形式，事到末了，于是圆寂。决不会有人理解到由此消失的还能在另外一处生长。在彼存在的在另外一处依然存在。正因为近三十年来文学革命，新作品的写作，还多只停顿到“叙述”上止住，能

叙述故事编排故事已为第一流高手，一切理论且支持了并叙述故事还无能力的作家，共同作成的标准和趣味都和“时代”完全相合，这时代就是决无一个人会相信：一种“抽象”比“具体”还更坚实，一个作品的存在比一个伟人的存在还永久。

本篇发表于1947年9月20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58期。署名从文。原题为《新废邮存底 二八五 一个边疆故事的讨论》。

① 沙弥 7岁以上、20岁以下男性修行者，俗称小和尚。

致周定一先生

定一：

入城见留件。萧兄小说，已安排于商务出《文学》近一期中。还盼她能有新作可共欣赏。近十年国家变乱，人事倏忽，凡参与这个民族挣扎悲剧过程的，无处不有人走到，新疆青海沙碛草原，西南黑夷区，傣族摆夷区，藏族古宗区，印缅原始森林，……战事反复为火与血所涂饰过的洞庭三湘湖泽地，应有多少惊心动魄血泪交进故事可写！以至于在沦陷区由俘虏到顺民，各个阶层分子情绪生活，如何由抑塞、萎靡、凝固、无所谓，到新的兴奋、希望与忧虑交织，再进而为“胜利”。避过法律拘束而避不过良心上道德的责谴，形成一种人格分裂深刻苦闷，于新的扰攘人群中，如何陷于孤寂变态，或又进而勉强自解，转入某某阵线里，重作经营前后对照，奇诡变幻，真是到处如戏，而又到处是看不见说不尽的酸辛！随意截割一部分，即可用笔保留下一部分人民生活情绪变迁史！问题多，机会多，伟大作品并不多。原因或有两种：其一是职业作家近二十年在写作上所形成的独占

趋势，他人无从插手。二是正因为独占而无能，便不免将文学限于一种贫泛定型格式中，使一般人以为必如此如彼，才叫作小说，叫作散文，叫作诗歌。习惯观念既缚住了自己一支笔，无从使用，更使一般人望而却步，不敢用笔，即用笔，写出来和习惯不大相合，也不成功！以弟个人私见，两者拘束都应设法努力解放，才会有真实文学，有崭新作品。添一批生力军进来，产生百十部别具一格的现代史，这点希望，对于一个兼具记者的作家，比寄身大都市纯职业作家尤有把握。因为生活接触面范围比较宽广，且更紧贴上地人民，一支笔又因习惯不必过于受词藻格式困缚，只要肯从这方面用笔，结果比职业作家发展健康，成就大而多，可以断言。但记者最近三年并不闻有新而有力特创局面文学作品问世，即通信也仿佛比在战时作品枯窘，问题或在一个抽象型式上提出疑问，即明知一支笔可保留些较有永久性东西，深感不知从何着手苦恼，因而搁笔。萧兄生活底子既丰富，正好用于新一代文学创作上。笔有情感，有光彩，而又特别宜于乡村抒情，如能忘掉那些好作品在印象中保留的完整印象，不甚在修辞设计上太费心思，即用邢楚均兄在《大公报·文艺》上连续发表的写故事方法，带点“保存原料”意味，用绥远草原蒙藏人民与宗教有关情感纠纷，和湘黔山区苗族与鬼神迷信有关情感纠纷，半叙景物，半涉人事，安置人事爱憎取予，于特具鲜明性格景物习惯背景中，让它从两相对照中形成一种特别空气，必然容易产生动人效果。这工作成就，更无疑将于芦焚、艾芜、沙汀等作家，揉小说故事散文游记而为一的混合试验以外，自成一个新的型式。如能好好发展下去，将充满传奇性而又富有现实性（写都市，我们把希望寄托于

另一女记者彭子冈)。这种新的创作，不仅在“小说”上宜有新的珠玉产生，在女作家方面，也可望作到现有成绩纪录的突破。这个工作的继续，望你便中带催催逼逼。现代文学史许多举例示范作品，当时似乎即半由编者催逼而成。鲁迅之阿Q，由孙伏园先生催生。徐志摩许多精美散文，由于自己作编辑，无稿可发连夜赶出。第二十年来多数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叶圣陶，徐调孚，施蛰存诸先生主持杂志编辑时，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时移代易，谈这部门工作发展，以及水准倾向时，也不免举以为例，不仅仅个人工作纪录，早已成为这个国家情绪历史或抽象价值一部分了。就近三十年文学发展看来，女作家的工作成就，更若与外来鼓励特别有关。许多人忽然而兴，才思文采惊人，可是不到三五年后，创作能力又熄灭晦隐，不可寻觅。就中问题和社会家庭组织关系十分密切，和生理情绪年龄或更有复杂作用。女作家的成就，很少有过三十五岁以上完成的。前事若可师，更不能不想方设法劝劝那些有光彩有力量的笔，在四十岁以前得好好谨慎使用，真恐怕岁月一过，即乐意来用用笔时，一支笔将不免呆在上手不知从何用起！

××过××教书，精力强，兴趣好，对学生当然极有意义。若尚可编一个“散文和诗”一类周刊，正可邀他帮忙。文学院两系多“文章魁首”，日下应当得一善道人写文章编者来做点事！北方平津报纸多，新闻少，报纸真值得作事情，这事对作者对读者都极有意义，恐不在人民死亡新闻报告上争一日之长，求如何特别动人。一个有理想有眼光的报纸主持人，似值得从传统好记录取法，依旧从教育观点出发，从副刊上作各种发展，且于此相互观摩作改良竞争。报纸分布

面积广，二三年中当可形成一种特别良好空气，有助于现代知识的流注广布，人民自信自尊心的生长，国际关系的认识……这一切都必然因之而加强。在文学方面，则更有助于新作家的培育，与文学上自由竞争传统制度的继续。这个制度在过去，已有过良好贡献。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得到用笔的方便，于工作上容易有以自见。在目前，或正有更多少壮，宜于从这个方式下沉默作长途跋涉，争成就，争表现！很显然这和另外一派文运并不相同。这是两种发展。若文运能并进兼及，则失于彼犹可望得于此。若两俱有益，一面为作家对社会否定或重造信仰增强，一面又能用作品来使这点健康信仰扩大延长，则文学运动意义，当然比目下一部分人所能作所已作更多些进步机会，于明日也会多留下些礼物给后来者，不至于让二十年后人们追数这一段成就时，只留下三两本作家名册，不是百十本优秀作品！

刊物之重要意义，恐仍为于文学中表现较多通常人性，并进而解释如何由于进步憧憬与保守观念的矛盾对峙，统治无能引人民人流血过程。一切为不得已，为理想变质，终于由此为整个民族带来一悲惨命运。作者能对此同归于尽之现实局面注入较多哀悯，比从作品中掘发仇恨意义更深远。因国家已如此破碎，斗争个三年五载独占局面，用人民血肉作注的，决不会担心将来亏欠。可是十年廿年后，这些人都不免恩怨相消，同人虚无，功名权位，成尘成灰。然万千新生人民，却将依旧寄托于这一片广大土地上，无论作主人，作奴隶，总得勉强活下去！就活到这一片由于烈火焚灼刀兵摧毁之破碎荒芜土地上！现代伟人政治家或思想家若留给他们的，又是那么一个悲惨景象，现代文学家是不是还应当给他

致周定一先生

们一点别的东西，一种观念，一种鼓励，一种刺激，一种对于悲剧之来公平的说明，增加他们深一层认识，由悔悟产生勇气，来勇敢的克服面临一切困难，充满爱与合作精神，重建这个破碎国家。世界上不会有一个民族，能用半世纪以上时间去作集团流血而认为是求进步所必需的。到三五年后，若各方面都有勇气承认这种流血为不得已，则一个真正理解人民的作者，必明白迎接一个废墟上的和平，在文学上当前明日还可以作些什么事！

本篇发表于1947年9月28日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第23期。署名从文。原题为《窄而霉斋废邮（新十九）》，现题《致周定一先生》，为编者所加。

致柯原先生

柯原先生：文章收到。关于现代诗，我提不出什么特别意见。因为我并不怎么懂现代诗。在刊物上关于诗的选录似乎比任何刊物还广泛，即由于不太懂诗。你若认为作编辑的看文章意见还有点用，我要说的是真正现代诗人得博大一些，才有机会从一个思想家出发，用有韵或无韵作品，成为一种压缩于片言只语中的人生观照，工作成就慢慢堆积，创造组织出一种新的情绪哲学系统；它和政治发生关连处，应当由于思想家的弥湛纯粹品质，和追求抽象勇气，不宜于用工作人员的社交世故身分，以能适应目前现实为已足。这个区别极其分明，不应混淆也不能混淆。若说诗人中有真伪，真伪之辨或即在此。

正因其如此，所以我觉得这部门工作与其寄希望于当前三五少数有名诗人的兴趣集中，不如更多后来者的各自为战，不仅是需要许多人从各方面使用手中一支笔，去试验发展，即某一作者也需要在他个人工作中，充满冒险精神、探索兴趣，作多方面注意关心并习题，才可作成些新纪录，或对于

前人的纪录突破！这事要慢慢的来，因为不是蒸馒头包饺子可以定时交货。

本刊由我发稿五十期中，载了不少新诗，各方面的作品都用，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也得到一二读者来信责备我不懂诗，专登载和编者一样宜于人博物院的老腐败诗作！这些读者可想而知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青的还只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廿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还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所以读者这种错误责备，对编者言反觉光荣。刊物自然也有老作家，比如说，近两期纪德作品译者盛澄华先生，是个纪德专家，他作的关于纪德论文在《时与潮文艺》发表时，当时就有人以为是五十岁长胡子教授的工作。想不到作者虽教书已多年，还当真如或人想象有一把胡子，可是这一把清秀胡子却是装在一个漂亮青年教授下巴上的！……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正如你自己，若从作品看，那有人会相信是十八岁人的手笔。

本篇发表于1947年10月25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63期。署名从文。原题为《新废邮存底 三二四》，现题《致柯原先生》，为编者所加。

谈现代诗

……诸先生：谢谢你们好意，把大作寄来，并问问我这个外行对于现代诗意见。“现代诗”若包含了一点国际风气，或国际水准，这问题我无法谈，即说来意见也难中肯。因为俄文诗和英文诗我全都隔阂，不能像其他批评家一样，在经人嚼过的饭上来讨论口味，增加通人笑料。我在工作上得看诗谈诗，照例对于“诗”先有个传统概念：“诗其所以成为诗，必出于精选的语言，作经济有效的处理。”并用读白话诗习惯方式，看看这个作品从散文水准上，从近三十年白话诗水准上，有没有能够保持应有的明朗、条理和综合文字能力，作成纪录突破的新意，以为取舍。用这种方式读诗、选诗，加之刊物又不能将过多篇幅来登载新诗，所以免不了有委屈作者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个人印象若还可作他人参考，照我所知说来，中国现代诗正面临一道关隘，即传递与欣赏，作者如未设法通过，读者实感困难。（写诗越容易，读诗越困难。）为的是诗人的作品都若各自有一起点，缺少一个共通标准可以给读者比较把

握。这情况也有了些时间，且可说从五四即起始。照旧话说，即“载道”和“言志”形成新诗写作两种动力，亦即形成两种阻力。新月派几个诗人看明白这一点，把格律提出作为欣赏的尺标，即见出相当效果。到文学运动后期约在十九二十年左右，这两个名词换成了两个更明朗具体的名词，即“政治”和“抒情”。诗从政治效果要求，以为“浅”有效果，就唯恐不浅。另一面从抒情观点出发，以为需见出个人性情和风格，即不知不觉成为晦。诗既在两个观念两种势力下被分割，新月派诗人如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从民十四起始，在作品上建立的格式标准，到此就无形打破，诗的共通性因之越来越少。出于政治要求，诗不可免成为社会科学名词堆积物，公式口号化是必然的趋势。这也就是革命文学有了廿年，革命文选想用一点诗作例，将廿年左右作品举例时，即不免感觉困难的原因。用于抒情观点，诗又不可免成为抽象名词和摩登词藻的混合物，逐渐转入隐晦生涩，也是必然的趋势。这也就是心细而密，文字简洁如卞之琳废名作品，将诗认真写来，多数人还是难于领会原因。或力求通俗，只期望把在论文上成习惯在诗歌中还少弹性的名词分行排列，或力求新巧，努力把个人情绪经验用一种度越流俗方法，自作处分，到此却异途面同归，归于在作品上。抒情诗能欣赏的越来越少，政治诗也还是只有对政治有信仰的少数人能领会。至于一个普通人，即如我和你，以及大部分文学院同事，都不免望洋兴叹，感觉到缺少一道桥梁，沟通人我。虽说诗本身原就是一道桥梁。一个习惯了从报章杂志上读社论、专著、报道、小说等等文章的读者，说是从中国现代诗作中，可得到比普通一般文学作品更能“以约见著精练丰富”的启示，

似乎是不可信的！

这自然是个问题，值得许多人来讨论。但外行商讨或内行批判，和这个在实际发展中的风气接触，很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一切转机不在理论得失上，还在作者工作表现上。三十年来理论已够多了，少的是肯用三十年工夫来实验的诗人。我们实不能以仅有纪录为自足，还需要一群胆大、心细、热忱、勇敢的少壮，从个广泛一些工作态度上来试验来探索。企图把作品由平易和现实政治作更紧密的结合也好，这原是个异常庄严的课题。希望用作品由个人对于自然与生命的深刻观照带来一阵新鲜空气也好，这更是个值得鼓励的探险。总之，诗人欲表现“思想”得真正有深刻思想，欲创造“情境”，得真正有动人情境，即此还不够，尚得透彻明白文字的性能，以及综合文字的效果。他想从作品证实一切，必作到诗不仅仅是二十岁年青灵魂的发酵物，还可望是四十岁以上思想家表示思想情感和人生态度最经济精巧工具，以及沟通生命更深一点的东西，这么一来，才会有大家所希望的诗人和好诗。

至于读者的问题，大多数读者，都可说即或无最大好奇，至少也永远在最大容忍情形下，等待优秀作品的产生。然而从一般成就上检讨，我们却不能不说或在工作态度上，或在文字学习上，“严肃认真”以外，一个诗人实在还需要一点宽博温厚悲悯人类爱，才成其为诗人，才能够征服这些读者。诗还待寻觅，待发现，待创造，事极显明。个人对于诗与政治结合不仅表示同意，还觉得应再进一步。政治在当前正导演着民族无可奈何的悲剧，是尽人皆知的事。世界事一例交给“政治”，在习惯上即永远是纵横捭阖，继以剑戟刀枪。中

国近三十年特别训练政治哲学之一章，更是持刀而前相对而欲见个胜败。虽导演人各有专长，却终不出以民命国运作注，取个赌博方式，决定前途。极少能够在这个方式外，在驱人死亡迫人疯狂方式以外，于科学和艺术观点上，建设一个进步理想或一种进步事实。在这种情形下，一个诗人若仅仅以工作能依附政治，推动政策，用处未免太小。诗人不只是个“工作员”，还必需是个“思想家”。我们需要的就正是这么一群思想家。这种诗人不是为“装点政治”而出现，必需是“重造政治”而写诗！

这自然近于一个梦，但想想，若灵魂中最纯洁的诗人，也缺少了对于国家的前途的憧憬，这国家，还能不能像个国家？我问你。……

本篇曾先后刊载于1947年12月15日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第34期，1948年1月17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74期。均署名沈从文。原题为《新废邮存底 三五七——谈现代诗》。

据《平明日报·星期艺文》本编入。

复一个木刻工作者

景初先生：

赐教并示木刻多幅，深谢厚意。木刻我不当行，所以对您工作成就，恐说不出什么中肯意见。曾为写了点短序，我谈及的不是您目前工作技术得失，只是整个新“艺运”中像您这么一个人，住在那么一个地方，打量从事木刻工作时，可以怎么作准备，并用什么态度工作下去，将来又可能达到什么目标。我说的似乎和一班从事木刻青年所悬望的目的都远得多，困难得多，也就容易显得荒谬得多。（正如谈新闻特写，一个新闻从业员，照习惯还只把他的工作限于写点好文章，以笔作桥梁将自己渡入“政治”时，我却觉得这其中应当有人把他的工作转入“思想家”领域。宜于用一个思想家态度来处理工作，并接受种种挫折，努力克服，把工作慢慢的成为转换历史一个杠杆。能那么打量那么作下去，工作自然将超越普通成就而一直向前。为的是从文学方面，近三十年发展，便可看出这不仅是“可能”的，还是“必然”的。）您既然来作这件事，就慢慢的努力下去吧。能谨慎而庄

严把握工作，个人成就即必然会比百十人工作还丰富伟大得多。这成就不只是作品风格独异，还将带来一种新的空气新的发展，会影响到木刻，也会影响到整个艺运。人家常说湖南多“战士”，其中寓意褒贬实各半。照目前情形看来，充满别扭精神，于无可奈何情形下，来参加这个民族大集团自杀的战士，的确已很多。使人乐生并各遂其生，为人类进步繁荣有所致力的战士，却并不多。以我私见，您和更多年青同乡，宜于来学习作第二种战士，就现实广泛吸收知识与经验，为家乡为中国热诚素朴工作二三十年。这个国家民族当前实面临一种严重试验，即在分解圯圯中，或新生，或毁灭，二者必居其一。要得救，必从一新的信念出发，对强权政治与一切腐败存在加以完全否定，修正现代政治所作成的病态残忍及麻木自私，而为下一代重新安排，重新粘合，由亲爱与合作出发，泛滥此健康信念于一切表现上，才可望得到一点转机！国家必于真实和平与民主中，方能够将民族精力与热情，好好用到发现和发明，创造与建设，来和其他优秀民族作进步竞争！工作庞大而艰难，唯有忠于人生忠于人民不以个人成败得失的真正战士，才有勇气来沉默担当的！

本篇发表于1948年2月21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79期。署名沈从文。原题为《废邮存底 三五八——复一个木刻工作者》。

复市中老百姓社诸同学

诸位先生：

谢谢你们来信的好意。我因为不会说话，所以无从来贵校和各位谈天。关于读书写作，贵校有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师长年在一起，一定对你们学习有极大帮助。至于普通会作点文章的人，可不一定会教人的！如果你们认为我的工作有点参考价值，第一点可以提出来的，这个工作要老老实实来从事。我到二十岁时还不会使用标点符号，就从这个起始，来克服一切困难，学习用笔。论聪敏才智，实在毫无过人处，占便宜事，不过是肯老实耐烦学下去，三十年不敢懈惰不敢自满罢了。你们生活环境都比较好，学习机会又多又方便，肯老实些学下去，将来应当有更好的成绩表现。这工作初初把握还使人快乐兴奋，持久便沉重异常，只有十分老实认真的人才作得下去，才会有突破纪录的成就。若把它当作国家再造的武器，首先应当明白武器原有许多种，小型的如蹩脚手枪，子弹放出去不过二十步远，打到七八颗子粒后即难以继。新型的大炮，却能做长射程用，一下子就摧毁半个城

市。武器射程远效力大的，创造程序必然比较麻烦。要配合各种器材，还要较多方面学理设计，经过许多时间，方能完成。动摇社会重造社会的文学，有相同情形，必须有分量结实作品才会见功。必须作者用全生精力来从事，才有希望产生这种作品。既然是爱好文学，让我们一同来学下去使用手中这支笔吧。不必对作家好奇，作家并没有什么可贵，可贵的应当是他工作谨慎态度，和作品中表现的健康的人生观。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敬复，颂学安。

三月二十一日

本篇发表于1948年4月25日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第53期。署名沈从文。原题为《废邮存底 三九一——复市中老百姓社诸同学》。

论议无从产生作品

××先生：

得教示，好意谢谢。你所说问题，正和许多陌生人通信谈及的相似，我无什么特别意见可言。因为一切意见都是相对的，限于某文某事及意义，无从概括全体的。属于“题材如何处理”问题太泛，不易答复。只为某故事可能如何安排，容易产生某种效果，从技术上谈或对一作者尚可说点话供参考也。凡属写作指南指迷书籍，都很少实用，能制造“作家”，无从产生“作家”，无从产生“作品”，为的是许多人一到能引用这些玩意儿时，都不知不觉已成为作家，但关于作品呢，还得抛开了这些书，忘掉了这些书中的一切原则、议论、警句、格言，完全从经验积累，来作实际学习，才有进步可言！凡欢喜称引其他作家什么的，这种人照例很少是真正作家，更很少是小说作家。因为一个人若真正有过用笔经验时，就明白任何高明论议，都无从根据它有效生产作品。你的诗盼望能抄写清楚一些，每个标点都让它清清楚楚，

可节省编者，排字者，校对者精力不少。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美德。

编者

本篇发表于1948年6月12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96期，署名从文，原题为《废邮存底》，现题《论议无从产生作品》，为编者所加。

复姚明清信

明清先生：

承赐信谢谢。你对文学看法，完全正确。唯关于拙作过奖处，实转增惭惶。因为就时代发展看工作，我已成为过时人，与现实不甚配合得来也。我工作自视还停滞在学习阶段上，要再摸索十年八年，才可望有点结果。可是时代变动大而快，要求作家又太多太切。我由于性情内向，埋头努力易，活动应变难，所以近年在此教书用笔实有和全个发展脱节之势。一个湘西乡巴老的长处和弱点，于此可以充分见出。时代如尚有五四文运理想，可从一个较广泛原则上为“民主”与“自由”而工作，作家得各自守定工作据点，挣扎下去，不败退，不投机，克服困难，战胜挫折，生产作品，作品且得朴素坚实，受得住时间淘洗，我似乎还应当有资格叫作“战士”。环境即再恶劣，也还可以在本分工作上努力十年八年，不以成败得失为意。时代如已大变，要求一个作家的，不仅仅如过去方式严肃制作作品，还必需活活泼泼来把握政治上常在变动不居的新办法，新政策，新方向。一切得配合，

由于配合，有时还必需改变一个旧式“思想家”的工作态度，用一个“工作员”情绪去服务去领导，这种领导既得具活动应变之才，又得有强烈领导欲和技术，方能办到。这通通不是我能力性情所长，所以近二年来，我不仅对新文运无助，且在误解中很容易给人一种和“进步”游离、落后现象，一些内地读者，从我作品中，虽然尚可取得一点社会重造信心和力量（从《边城》或《湘西》《湘行散记》都可以），并不以为我真正落后，然而在都市政治竞争过于剧烈，文运工作又转入一新方式时，我的工作态度、方法，实在都已太陈旧，容易被看作落后，作品也成为无意义的存在，没有多少人要看了。这就是所谓现实。一部分现实既如此，很明显，我即用笔，也得从头学起，方能把握“动”的一面，如依然只能处理“静”的农村分解过程，稍稍注入一点理想（即社会尚未大变的区域，读者所能接受的启发），自然不能与目下文运作一致发展。至于你所说的“竖起战斗旗帜”来如何如何，社会虽十分需要，不过这件事，恐得由另外一些人来作了。目前国内很有几位作家把文运领导得很好，可不是我的事！在这个新发展新要求情形下，我很尊敬那些真正能领导年青人的作家。至于我自己，即存心从头来学，恐不免如朱佩弦所谓“要慢慢来才有希望”，可能还笨脚笨手学不好。与其画虎不成，倒还是在在一个不重要的点上，用二十年前旧方式、旧工作态度，来写写这一代社会分解苦难过程比较有把握。即或所写的限于区域性，对读者或者将还有点用。因为工作方法态度过于朴质，无从适应新时代发展，不免使许多朋友失望也无可如何。长处无用武之地，弱点也易致误解，所以个人觉得如果一个新时代来临，很希望有更多伟大作家和少

壮在都市能将文运弄得更活泼有生气。这一定作得到。我却只想就较小区域来写点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并鼓励他们来坚定信心，在毁败的瓦砾堆上，齐心将国家在一个新计划中重造。用二五百万言写大事变，我似无可望，用三五万字写小题目，或容易工作下去。来信相勉，好意极感谢，有些事因相距过远，先生或不易明白，因尊信不免一倾吐。

专复，颂著安。

沈从文 启

十一月二十八日

本篇发表于1948年12月12日长沙《小春秋》。署名沈从文。

【附录】

姚明清给沈从文的信

从文先生：

拜读了你很多的大作，我的心灵宛如敏感的寒暑表，跟着客观的环境，起了变化。

这些年来，我对文艺发生了热恋，生命无形中引起了意义。从十五岁开始，到今天整整五年，我用笔尖写下了许多不像样的东西。我老想拜识当代成功的作家，学习文艺的阅读与写作。而今我呈献着这一封草率的信给你，我微笑了，因为我相信你会原谅我底冒昧，而知道有一个年青的孩子，在朝着理想的远方奔驰……。

我时常这么发慌的想，文艺作品，他的艺术性和政治性是至要的，通常对一篇成功的文艺作品底批评，它的艺术性和政治性是不能被分开来看的。凡政治性浓厚的作品，必然有高度的艺术性，而艺术性极高的作品，也就是正确的政治性的集中表现。比如屈原的《离骚》、但丁的《神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你老的《边城》，不都是从艺术的领域，表现了政治意识么？可是在这动乱的年头，政治控

制了文艺，黄色刊物充斥市面，像娼妓般的出卖灵魂；而许多的作家，看不惯这些丑态，对现实竟失掉了描绘的兴趣。这种以色情代替政治的文学，如果不及早毁灭，国家民族实不堪设想！亲爱的先生：我祝福你，竖起战斗的旗子，表现着崭新的思想意识的转变，导引着文学参与现实的斗争，你老以为如何呢？

扯得太远了，该在这里住脚。期待你在百忙中给我一个好音。

祝福！

姚明清 拜

十月十三日